



看衰中國的代表作

中國即將崩潰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章家敦 (Gordon G. Chang) 著

譯者 / 閻紀宇 侯思嘉

雅
言
非
文
學

杜拉克說：「十年之內，中國一定會分裂。」



梭羅說：「中國就是個大型恩隆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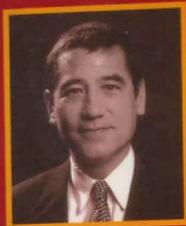


《經濟學人》總編輯艾摩特也認為，
中國可能崩潰。



連中國官方機構的學者王紹光、胡鞍鋼、丁元竹，
都要對中國政府提出「最嚴重的警告！」

2002年金石堂
年度最有
影響力的書



章家敦 (Gordon G. Chang)

祖籍江蘇，一九五一年出生於美國，康乃爾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 法學博士。章氏開始執律師業後，適逢中國改革開放，即為所服務之跨國法律事務所派來亞洲，先在香港，後轉上海，專責輔導中外合作之併購案與投資案。關於中國經濟之評論曾發表於《紐約時報》、《亞洲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等報刊，並曾為美國國會及華府各種智庫，做有關中國經濟之簡報。本書於上海起筆，於上海完成。章氏於二〇〇一年五月離開上海，返美定居。八月本書英文版即由美國藍燈書屋出版。

譯者簡介

閻紀宇

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
翻譯工作者。

侯思嘉

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碩士，
現任職某報國際新聞中心。

ARS LONGA

社會人文 01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中國即將崩潰

章家敦 (Gordon G. Chang) 著

譯者 / 侯思嘉 閻紀宇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Copyright (c) 2001, 2002 by Gordon G. Chang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Trade Publishing,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社會人文 01
中國即將崩潰

作者：章家敦 (Gordon G. Chang)
譯者：侯思嘉 閻紀宇
編輯：卓子維
設計製作：王黎
印刷：華字印件整合有限公司
出版者：雅言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T): 02-83693416 (F): 886-2-23652130

Publication Date: 2002/3

台澎金馬總經銷：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三重市大智街139號
(T): 02-29818089 (F): 02-29813049

海外總經銷：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108和平西路三段二四〇號4F
(T): 886-2-23049302 (F): 886-2-23066842 es@readingtimes.com.tw

定價：380元
2 4 6 8 9 7 5 3

謹獻給辭別中國追尋更美好生活的男孩——
我的父親。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國即將崩潰 / 章家敦 (Gordon G. Chang) 作 ;
侯思嘉, 閻紀宇譯 -- 初版. -- 臺北市:
雅言文化, 民91
面: 公分. -- (社會人文: 1)
譯自: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ISBN 986-80180-0-5(平裝)

1. 中共政權-政治與政府 2. 經濟-中國
大陸 3. 社會-中國大陸

574.1

91002675

目錄

中文版自序	
我為什麼看衰中國	7
作者自序	
完結篇	11
誌謝	19
第一章 請客吃飯	
共產革命日薄西山	23
第二章 燃油之湖	
民怨沸騰無以復加	39
第三章 工業恐龍谷	
國有企業垂死掙扎	71
第四章 封網不手軟	
中共消受不了網路嗎	99
第五章 無限上綱	

我為什麼看衰中國

本書英文版去年9月於美國問世後，最常碰到的詰問之一，就是問我為什麼不跟隨流行看衰日本，卻偏偏看衰中國。日本雖然問題叢生，但勢必仍將熬下去，原因很簡單：日本不比中國，沒有時限問題，沒有甚麼事件會扣動扳機，摧毀日本國體。而中國的入世，卻正是這樣一種事件。北京領導人把入世當做震撼療法，來治療50年來的經濟沉痾。但改革如今還長夜漫漫路迢迢，中國從此卻會門戶洞開，讓老舊的毛澤東體制撐不下去。

入世當然有它的好處，但必須等到結構性改革見效後才會到來。入世最嚴重的效應會在今後數年內衝擊中國：更多企業倒閉，更多人失業，社會更加動盪不安。中國的各行各業，從銀行到零售到紡織業，對全球競爭都沒作好準備。政府本身對入世的意義也是不甚了了。更糟的是，中國時運不濟。去年夏天起，全球已開發國家已明顯集體走向經濟衰退，北美、西歐甚至亞洲一

工業政策造成永遠的無能.....	127
第六章 銀行淪亡錄	
中國的銀行來日無多.....	159
第七章 反咬一口	
國家啃蝕民營企業.....	185
第八章 公路女郎	
中國經濟停滯不前.....	209
第九章 WTO的駝鳥	
入世將引發全面崩盤.....	231
第十章 荒腔走板	
意識形態與政治阻礙進步.....	261
第十一章 自東方崛起	
中國能再向上提昇嗎.....	287
第十二章 毀滅之路	
中國如何淪亡.....	311
尾聲	
中國分崩離析.....	341
參考資料.....	345

無例外，發生了911，對全球經濟更是雪上加霜。

無巧不巧，中國正是在全球經濟走下坡的時候加入WTO。當今世界各國企業都努力搶占中國市場，他們不得不如此，因為傳統市場正隨著消費者減少支出而萎縮中，所以必須尋求新市場，而這個新市場正是全世界唯一提供新消費者的中國。在入世前，中國政府能夠控制貿易的交流，但入世後北京再也沒有偌大的權柄去操控國境外的商業交易。

進口商品激增之餘，出口必然衰退。中國的出口機制在911之前已出現毛病，開始吱嘎作響，加入WTO後更加速此一傾向，因為中國當局再也無法提供優厚的出口補貼。欲知中國出口業的未來，只需問個簡單的問題：911之後全球消費者裹足不前，中國貨物要外銷到何處？這只是個普通常識：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經濟衰退之際，中國是不可能增加出口的。

中國的出口成長率確實是每況愈下。2000年其出口成長了將近28%，但2001年降到只有個位數：6.8%，這是新華社披露的中國海關當局統計數字。近30年來大陸的出口不曾出現衰退現象，如今看來卻是衰退在即，可能今年就會發生。

出口一旦呈現衰退之勢，貿易赤字亦將隨之而來。就在新世紀的第一年，我們看見貿易出超額連續第三年呈現負成長。自1993年以來中國的貿易未曾出現赤字，但從今以後貿易赤字將是司空見慣的事。一旦中國貿易開始衰退，人民幣的貶值還會遠嗎？

北京卻全面消音，不准人提出貶值的必要性。然而有鑑於出口的持續衰退，中國本土的經濟學者卻堅持應該討論這個問題。

貿易實績每況愈下，自然會對經濟成長率造成衝擊。根據中國官方的統計，國內生產毛額在2000年增加了8%。國家統計局預估，2001年的經濟成長只有7.3%，學者則認為此數據已降到7%以下，而7%正是官方為現行的5年計畫設定的目標；北京當局認為，至少需要達到此一目標才能為下崗工人與新進的人力創造就業機會。

若是外商擴大在中國的投資，能不能挽救中國經濟？很不幸，不大可能。有些專家預測今後多年外商投資項目將如雨後春筍般紛紛冒出，但他們忽略了：中國正苦於通貨緊縮，除了電訊業，各個主要產業的市場皆已生產過剩，偏偏中國的產能過剩正逢上世界各國也產能過剩。如果你是派到中國打拚的外商經理，你會想要興建大型設備以便在此一新興市場大展宏圖。但是如果你是坐鎮企業總部的高層，你會要求世界各地效率不彰的自家工廠把產品外銷到中國市場。中國加入WTO意味著關稅會調降，不利外商的地方陋規也會鬆綁，在此情形下，自海外把產品外銷中國不但可行，而且甚具競爭力。未來數年，外商的投資的確會增加，但規模不會大，期間不會長。

2001年12月，中國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副主任張志剛談到2002年的經濟展望時坦承：經濟情勢極為嚴峻。而隨著經濟的瀕臨衰

敗，社會秩序將會蕩然無存。2001年11月底，在號稱「毛澤東革命發源地」的延安，有400名工人手持鐵棍木棒和武警打鬥，所求者不過是一份工作而已。《南華早報》評論道：「這是一個惡兆。在中國開放市場、減免關稅、撤除進口障礙之際，聚眾鬧事的工人可能是山雨欲來的徵兆。」自那個月開始到今天，大陸各地發生了好幾起爆炸案，有些是針對外資企業下手的。在西安一家麥當勞有兩人被炸死；法商家樂福的大型連鎖量販店則發生了兩起爆炸案，一在深圳，一在青島。在大陸最繁榮的廣東省，有兩個城市共發生了23起爆炸事件，造成5死7傷的慘劇。在四川省有個農夫炸死了他的醫生，有3個人遭到池魚之殃。12月間，廣西一個集體農場官員的住家外頭，有人引爆了一枚土製炸彈。同樣在那個月，重慶一家地下爆竹工廠被人丟了一顆炸彈；上海西門建設集團一名被遣散的工人在這個財團的總部引爆土製炸彈，炸傷了自己和一些工人。

北京的官員目前尚能維繫其統治，不過情勢已開始失控。中共最愛說，新世紀將是中國人的世紀。然而事實擺在我們眼前，這一世紀屬於北京政權的部分不會長久，頂多十年罷了。

章家敦 2002年2月

作者自序

完結篇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澤東

已故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曾說：「實事求是」，他利用毛澤東主義的這個口號來搖撼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基礎。今天有一些人認為，「事實」就是這個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未來無限光明。他們宣稱，從目前的趨勢來推斷，中國2010年時將躍居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這種說法似乎言之成理。從事實來看，不久的將來，中國會先主宰亞洲，然後稱霸全球。將全世界最龐大的人口乘上優異的經濟成長率，這樣的國力令人生畏。美國的經濟力也不過是中國的三倍。只要細察鄧小平1978年剷除毛澤東的遺毒以後，中國進步幅度之大，即可想見未來中國有多麼可觀的發展潛能。

人們對中國也有一種或隱或顯的憂慮：未來中國可能會將鄰國逐出其宣稱的疆域，並且把美國勢力趕回太平洋彼岸。先前傳

聞中國從美國薩阿拉摩斯國家實驗室竊取核武機密（譯按，指華裔科學家李文和案），掀起軒然大波，這正反映出美國的恐懼與憤怒。中國更是現在全球唯一以核武瞄準美國的國家。

歷史的必然性似乎是站在北京這邊。西羅馬帝國滅亡後的1500年間，中國是「全世界唯一的超級強權」。中國的藝術、文化、科學、貿易與探險事業盛極一時，後來才被歐洲與美國迎頭趕上。如今時值新千禧年，如果中國從此執世界之牛耳，奪回原屬於它的聖火，豈不是順理成章？

外國人士出於各種理由，並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一直為中國所迷惑，甚至被其蒙蔽，以至於很難認清事實真相。許多人對中國的潛力驚嘆不已，「潛力」聯結了大多數人對中國的認知。也有一些人只覺得中國很危險，而中國的廣大群眾更大幅升高了它的威脅性。

事情真相是，中國的確有成為偉大國家的所有條件，實現它為自身訂定的終極目標。而且中國格局開闊：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一直追求所謂的「大國」外交，致力於讓中國與美國以及歐盟在世界舞台上平起平坐。職是之故，江澤民毫不遲疑地傾全力推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從書面資料來看，儘管鄧小平推動開放改革還不到25年，今天的中國看起來是強而有力。但事實上這個自命為天朝上國的「中央王國」只是一隻「紙龍」。深入的觀察會讓脆弱的中國現

形，它將陷入長期的衰退，甚至瀕臨崩潰的邊緣。中國衰亡的徵兆已是隨處可見。

從一場運動到另一場運動，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的狂熱讓中國國力耗盡。今日這股狂熱又再度點燃，卻是數百萬人滿懷希望，遵循一位流亡人士的教誨。中共眼睜睜地看著李洪志大搞其法輪功運動，就如同1940年代末期毛澤東率領的農民大軍，秋風掃落葉般的縱橫於中國大地。難怪中國高層對法輪功視之如洪水猛獸，就好像在進行一場政權保衛戰。

中國共產黨自許要永遠領導中國人民。他們決不會容忍黨外任何雜音，即使改革開放廿五年後的今天也不例外。因此1999年4月，當法輪功信徒無預警地包圍北京中南海時，中國的領導人只有一種反應：禁絕法輪功，迫使他們轉入地下活動。但是法輪功發動反擊，其信徒已不知恐懼為何物。

特殊教派信徒、行動主義者、分離主義者與其他各色人等，都是中國要打擊的對象。北京當局「嚴打」這些人士，但是只能使他們噤聲，卻無法撲滅不滿的情緒。異議份子可能暫時撤退，他們的理念卻會固守陣線。

中國面對的威脅不一而足，中共黨官僚貪污與政府無法無天所引發的民怨，遠比街頭抗爭者更難以控制。一黨專政的代價就是：中國共產黨不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子民休戚與共。結果這個黨已演變成基本上是不受歡迎且脫離群眾的孤立團體。

還有那批在中國大地漫遊的失業大軍，他們是目前中共中央與國務院最頭痛的問題。在任何時刻中計算，中國的失業與隱蔽性失業人口都超過法、德、英三國人口的總和。這些失業者什麼時候會發出怒吼？

的確，中共中央已經在思考貪污、民怨與失業的問題，但就是不願進行結構性改革。它排拒大部份重要改革行動，因此無法解決造成國家不穩定的問題根源。從西藏問題到台灣問題，中國最高領導人對付敵人時總是高喊安定至上的口號。但在強調安定的同時，中共也阻礙了原本可望拯救中國的改變。

改革勢不可免，因為經濟衰退的跡象已經無法掩飾。源於史達林主義經濟發展觀念以及毛澤東主義社會計畫理念的國有企業，根本不合乎經濟原則；中國的國有銀行深陷無力清償債務的泥淖，是全世界最脆弱的金融體系；通貨緊縮已經持續超過三年；堆積如山且過期的庫存傷害企業營收；外資裹足不前；貪污散害了經濟體質；外匯大量流失。

如果這些只是經濟問題，那麼北京的技術官僚應該還找到答案。不幸的是，任何解決方案都必須先通過意識形態的檢驗。共黨理論家不斷爭辯到底什麼才是正確的社會主義解決之道。鄧小平對社會主義理論發展的貢獻就是：不要讓理論擋住發展之路，他曾說「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但是鄧小平的繼承人卻另有打算。

隨著時勢變化，潛伏的問題會日益惡化。經濟的混亂蔓延到社會，而政治混亂也是山雨欲來。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問題惡化到無可救藥，屆時中國的經濟與中共政權將同時崩潰。這一刻已經為時不遠。

中國領導人能不能遏阻逐漸滋長的經濟悲劇？現在國務院別無他法，只能以大規模財政刺激方案來維持經濟成長。這種作法的代價是什麼？近幾年來中國的預算赤字節節高升，國企的壞帳與逾期放款讓國債雪上加霜，中國的財政狀況看起來岌岌可危。

中國還剩多少時間？沒有人知道，但中國政府絕不能繼續以目前的步調來支出經費，北京當局有大約五年的時間可以攪亂反正。沒有一個政府——就連中國政府也不例外——能夠永遠違抗萬有引力定律。

由於中國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所剩時間極為有限。為了「入世」，中國同意開放市場。前任美國貿易代表白西芙（Charlene Barshefsky）曾說，入世將會引發「深遠重大」的變化。這麼說恐怕還是輕描淡寫——入世將會徹底搖撼中國。

評論家認為，江澤民因為要進一步推動改革，所以贊同加入WTO。不過更可能的原因是：江澤民期盼立下不朽功業，將來才能在歷史上與毛澤東、鄧小平等人平起平坐。因此我們要探討，入世之後，中國經濟是否能在全球的競爭壓力下存活。中國的領導人是否會被自己人撰寫的國企獲利改善報告所誤導？他們真的

以為那些無力償債、經營觀念落伍的國有銀行能與現代化金融機構競爭？果真如此，那也不是北京當局第一次被誇大自身成就的作法拖累。當年「大躍進」浩劫死了數千萬農民，只因為毛澤東自欺欺人，相信那些輝煌耀眼卻純屬虛構的農作物收成報告。世界只能期盼江澤民不要重蹈毛澤東覆轍。然而江澤民堅持正統思想與漸進政策，同時又採行入世的經濟震撼療法，由此看來，情勢恐怕不甚樂觀。

外國企業對於中國加入WTO寄以厚望，鼎力襄助。在那些關於世界貿易福祉的高談闊論背後，其實是殷切的期待。外國企業明瞭，他們在較平等的競技場中更具勝算。外國企業躍躍欲試，欠缺準備的中國卻危在旦夕。

目前中共中央與國務院還能夠掌控13億人民。然而，事實上每一天都有領不到薪資的勞工、滿腹怨恨的農民與其他心懷不滿的社會人士走上街頭。雖然過去50年建立的機制還能維持社會秩序，但總有一天，中央政府將無力應付層出不窮的挑戰者，屆時後果將難以想像，激烈抗爭一發不可收拾，燃起全國怒火。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能夠違抗全體人民的意志。

和當年鄧小平比起來，今日中國領導人面對的挑戰更為艱鉅。鄧小平有時間，江澤民沒有。鄧小平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地位崇高，很少遭到質疑挑戰；江澤民的黨卻在廿年的改革與十年的疏離群眾中削弱。鄧小平一次只對付一個敵人；江澤民卻對真實

與想像的敵人全面開戰，從試圖分裂國家者到只想靜思冥想的信徒，都是他的敵人。同時江澤民還想當上世界領袖，雖然他並沒有時間來扮演這個角色。

1992年中國經濟改革停滯不前時，鄧小平進行了有名的「南巡」，全憑個人的威望與遠見，從此扭轉中國前途。在他人生旅途的最後幾年，鄧小平發覺在北京竟然無人能接棒。他的繼任者江澤民雖然也鼓勵人民實事求是，但是信念已大不如前。今天的中國領導人並不樂見他們看到的事實，也不願面對問題的迫切性。更糟的是，領導階層對於如何解決問題缺乏共識，因此情勢進展緩慢。過去的中國還能夠踴躍前行；但是現在，入世的相關協定已對中國的結構改革訂出明確時間表。不幸的是，北京政府還沒有準備好實踐江澤民輕易許下的承諾。失敗的後果將使中國現行體制日暮途窮。

今日中國正在向某個目標前行，路只走了一半，對於未來並沒有共識。中國正遭受轉型尚未完成之苦，又無緣享受現代化的許多福祉。自由化有助於中國，但是社會改革緩慢卻成了絆腳石。北京權力中心放鬆的控管足以讓毀滅性力量猛虎出柙，但是無法完成轉型工作。中國正如醉漢般的搖搖晃晃，既不願意按照應有的速度前進，也不可能再走上回頭路。

從1978年12月鄧小平取代毛澤東指定接班人華國鋒以來，中國已有長足的進步，但問題並不在於中國近來的作為是否正確。環

願這個國家時會發現，只要時間充裕並具備政治意志，中共還是找得出解決之道。如果中國能有約莫卅年時間，各方面或許都能夠轉危為安。然而，中國是否已經走上正確道路，這問題現在卻無人聞問。

當歷史家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寫下完結篇時，他們會秉筆直書「中國沒有足夠的時間」。江澤民面對改革時那種小心翼翼甚至冷漠的態度，既無法因應中國陷入的困境，也無法適應一日千里的世界局勢。儘管當年蘇聯解體突顯出改革速度太快的弊病，但北京當局的踟躕不前也是同樣犯了路線上的錯誤。過猶不及，改革太快或太慢都會引發悲劇。

毛澤東曾說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接下來的火花將引爆一場讓歷史無法忘懷的烈焰火海。現在問題只是這場大火將會在何時引燃。

上海，2001年3月

誌謝

羅伯特·艾勒根特 (Robert Elegant) 並不怎麼優雅 (elegant)，至少2000年4月我初次邂逅時是如此，當時這位寫遍中國事物的作家穿著淡棕色的叢林夾克，不過希爾頓飯店中可沒有野生動物，至少沒有四條腿的那種。艾勒根特當時在上海為他最新的一本書做研究，這本書是中國最繁華城市的「傳記」。艾勒根特雖然並不優雅，但他不僅曾向全世界廣大讀者介紹中國領導階層，而且對這些人物別具洞見。他形容中國的領導人：「只要你不出賣真相，他們怎麼樣都會原諒你。」也許這是他的經驗之談。

中國當局不會原諒你的批判。中共中央高層領導人近來非常敏感，作風嚴酷無情，因此我必須說明，所有協助我的人士中，只有七位在提供協助時知道本書主題。「無辜的」協助者則包括朱利安·鮑姆、蘿拉·柏特、保羅·凱維、萊絲莉·張（華爾街日報記者，不是同名同姓的我的姊妹）、麥特·伊頓、岳納珊·芬比、唐·郝爾與羅珊娜·郝爾、提昂·克瓦、伯妮絲·李、卡

比·雷吉特·史蒂芬·麥柯麥克·喬·麥唐納·麥特·米勒·瑞雪·莫拉吉·崔許·塞歐爾·亨尼·山德·麥克·謝利·伊凡·史都華·克利斯·提布斯·金·烏利希·艾莉霞·韋布·彼得·沃納科特。我還要特別感謝《中國法學與司法》期刊的主編塞德·奎斯特，他惠允我運用我先前刊登在這份期刊上的文章。還有傑瑞·柯恩，是他鼓勵我走進寫作這個高貴的行業。

此外還有十餘位居住在中國的中國公民，他們也是無辜的協助者。逐一列名致謝可能會對他們造成傷害，因此等到本書的預言實現之後，我再公開感謝他們的協助。但現在我還是要對他們表達由衷的感激。其中一位是我的研究助理，本書引述許多過去和現今中國領導人的話語，他都一一找出其來源，後來他對母親說：「毛澤東與鄧小平有許多話相互矛盾。」外國人不會認為這是什麼新發現，然而對中國學校培養出的中國人民而言，這是前所未聞的想法。我研究助理的母親告誡他：「你在外面可不能這麼說。」充份顯示中國政權灌輸給人民的恐懼感。現在各位應該瞭解，為何本書的寫作過程會轉化為一股熱情：中國人有權省思歷史、前瞻未來。如今拜台北的雅言出版之賜，一個偉大的民族可以對未來做好準備。

現在要談到幾位事前就知道本書主題的「有罪」協助者，他們是：蘇珊娜·波特·羅莎莉·席格·珍娜·魏格·琳恩·安德

森·麥特·桑頓·丹妮絲·雷格，以及我的妻子莉迪雅。首先要感謝「蘇珊娜·波特非小說學校」的老師們，蘇珊娜·珍娜·麥特·琳恩，感謝你們，尤其是要感謝你們付出的耐心。

感謝羅莎莉與丹妮絲·羅莎莉·席格位於紐澤西州美麗小城潘寧頓的辦公室，堆滿了熱忱作家主動寄來的出書企畫案，已經堆得太高，總有一天她與丹妮絲可以在其間玩捉迷藏。而且我要再度向神明致意，祂們引導羅莎莉與丹妮絲在眾多信函中獨鍾我的出書企畫案。

然後要感謝我的愛妻，沒有她還是會有這本書，只不過作者就不是我了。她不眠不休的工作，而且保持心情愉快。她非常嚴格，敦促我盡全力發揮。更重要的是，當我辭去工作全力寫作本書時，她也沒有怨言。換言之，書中若出現錯誤，她也有責任。

最後是我的女兒，她覺得我寫這本書是很酷的事，但是近來她損失好多可以與爸爸共度的假日。也許這麼說是在道歉，不過我的用意還是要感謝。維妮，謝謝妳這麼善體人意。噢！差點忘了，這句話也要送給我的愛妻。

第一章

請客吃飯

共產革命日薄西山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毛澤東，1927年於湖南

被供奉在「聖壇」上膜拜的毛澤東遺體，很快就會被人移走。當中國共產黨垮台、中國第三次革命大功告成之日，毛澤東將遠離天安門廣場，遠離北京的核心、中國的心臟。過去有太多歷史發生在天安門廣場上，未來還會有許多歷史將在這裡上演。當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這裡宣布成立，無可避免的，它也會在這裡宣布結束。當共和國覆亡，人民將會移走毛澤東遺體，象徵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毛澤東說：「我們要戰鬥而死」。在矛盾衝突中誕生的共產黨，的確也只知道要戰鬥到底。一旦中國人民要求共產黨下台，它

不會順從民意，人民必須靠槍桿子奪回自己的政權。毛澤東告訴我們，「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能「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而中國歷史上的鐵律：一個王朝覆亡在即，威儀體面決不稍減；即使民心思變興革之際，統治者還是會抗拒到底作困獸之鬥。「和平演變」對中國人而言幾乎是天方夜譚。百餘年來，中國人受盡千辛萬苦。如果老天有眼，剛剛開展的新世紀應該會更善待中國人。但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毛澤東說我們要戰鬥而死，這句話一語成讖，中國人的苦難還未結束。

中共已經昭告全世界，只有槍桿子才能把他們趕下台。人民應該會被黨展現的巨大頑強所嚇阻——至少到目前為止，的確多數人囿於其淫威不敢造次。不過人民是敢怒不敢言，怨憎日甚一日。中共深通鎮壓之道，但是已經喪失領導人民的力量。它已經忘掉，當初是什麼因素使它成為一個偉大的政黨。

瑪姬·法莉 (Maggie Farley) 說：「革命已成了請客吃飯。」她徹底顛覆毛澤東的革命名言。然而這句話也蓋棺論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历史。

毛澤東與法莉都說得對。法莉是一位記者，曾在上海住過，如果毛澤東看到他的中國變成今日的樣子，也會同意她的看法。就算沒有人提示，毛澤東可能也會說出相同的話：「革命已成了請客吃飯。」毫無疑問，他會以這句話來譴責中國當前的情勢，或者是作為鼓舞群眾行動的口號。不，革命不應該是請客吃飯，但是這種革命意識在今日中國似已蕩然無存。法莉描繪的革命形象是體制化的群眾運動，然而提出「不斷革命」的毛澤東卻曾試圖阻止這種運動。

今天的中國人民不再需要毛澤東的革命，也不需要搞革命的中國共產黨。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終將淪亡，就像歷史上各個王朝一樣。歷史告訴我們，中國人民一旦揭竿而起，就不可能被撲滅鎮壓。中國最後兩個封建王朝明、清以及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最後都是兵敗如山倒，說垮就垮。

清朝的崩潰幾乎和興起一樣快速，中國人民唾棄清朝暴虐無能的統治者，要求改革。雖然有些人追求君主立憲，有些人發動革命，但殊途同歸，他們都深知當時的體制只會貽害中國。到最後，只需一樁事件——幾乎任何事件都有可能——就能夠引發清政權的崩潰。1911年10月在湖北的一樁意外爆炸，居然就一發不可收拾，四個月後六歲的小皇帝溥儀黯然退位。隨他而去的是兩百多年的王朝與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政體。孫中山的同盟會成為勝利者，中國不僅出現歷史上第一個共和政體，而且在數十年的混亂後首度露出希望的曙光。

但是中國的苦難並未結束，孫中山的中華民國自建國開始就動盪不安，混亂導致國力衰微，進而引發另一波理想主義與行動主義。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亂局中誕生，隨後並在亂局中壯大。他們打著民族主義的旗號，在城市與鄉村都獲得廣大回響。

孫中山病逝於1925年，蔣介石則在1920年代晚期娶了孫中山遺孀的妹妹宋美齡，在他的領導下終於將大半個中國納入國民黨的統治。從同盟會改名而來的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原本都屬於列寧式政黨，兩黨在歷史上亦友亦敵，從1920年代到1940年代，衍生出一段錯綜複雜的恩怨情仇。他們同心協力統一中國，並抵抗共同的敵人日本，但雙方仍無法避免內鬥。國民黨對抗共產黨是一場兄弟鬩牆

之爭，引發慘烈的戰爭，共產黨的紅軍一度面臨被殲滅的命運。1934年10月，毛澤東率領八萬紅軍從江西省的窮山惡水出發，展開六千英哩的大撤退，前後歷時一年多。這場傳奇性的「長征」結束後，紅軍只剩下不到十分之一的軍力，不過他們仍然熬過劫難，繼續戰鬥。國共雙方更激烈的衝突如箭在弦上：兩個列寧式政黨無法和平共存。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經短暫被國民黨統一的中國，又四分五裂成由國民黨、日本、共產黨、西藏人以及回教徒控制的區域。蔣介石的國民黨失敗了，中國人不再害怕分裂。蔣介石無法將中國凝聚在一起，因此他無法再領導中國人民。

國民黨的崩潰是一瀉千里。蔣介石統領數百萬大軍，但毛澤東擁有更重要的事物。裝備落伍的共產黨軍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從鄉村大舉出動，包圍城市，克敵致勝。中國人民對國民黨的貪污、殘暴與無能忍無可忍。1949年，蔣介石的軍隊一敗塗地，共產黨取而代之，過程之快，猶如三百年前清朝取代明朝。蔣介石的首都南京未曾抵抗就投降共軍，他只能黯然撤守台灣。

北京天安門是進入明清兩代皇朝紫禁城的的大門，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這裡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他宣稱：「我們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中國人現在是站起來了，我們民族的前途是無限光明的！」毛澤東選定帝國舊都北京做為共產黨的權力中心。除了台灣之外，他在一年之內統一全中國。數十年的內鬥與分裂告一段落，除了香港與澳門這兩塊彈丸之地外，外國人悉遭驅離中國。一頁長達百餘年慘遭外國人欺侮凌辱的血淚史終於結束，中國的革命家在20世紀第二度獲得勝利，現在他們要按照自己的理想來改造國家，

中國再度看到曙光。

毛澤東寫道：「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當時中國飽受戰亂蹂躪，民窮財盡，餓殍遍野，也就是毛澤東後來所說的「一窮二白」。這種情勢對毛澤東而言反倒是有利的，他可以照自己的想法來建設新中國；他大權在握，一窮二白的人民矢志效忠。毛澤東對中國社會的激進改造始於農村土地改革，財富重新分配讓新政權一上路就獲得支持，更為激進的集體化隨之而來。

私有企業苟延殘喘了一段時間。儘管受到群眾運動的打壓，所謂愛國的「民族資本家」還能繼續經營，與政府的企業並存；這些政府企業是將外資或蔣介石追隨者的企業充公而來。私營企業起先佔中國工業產值的40%，也許毛澤東認為中國在發展社會主義之前要先經歷過渡階段，也許他自知無法畢其功於一役。無論如何，中國混合私營與公營企業的經濟體系，在共產黨建國初期似乎運作正常。

但毛澤東後來還是改絃更張。1953年，中國啟動「第一個五年計畫」，同時正式宣布「向社會主義過渡」。「第一個五年計畫」是依照史達林主義的理念來快速推動工業化。國企紛紛成立，後來成為中國工業實力的代表。國有化進行到1955年底時，已經結束了大部份私人所擁有的工業資產。

推動史達林式的工業化在當時並未引發爭議，日後因進行資本主義實驗而備受讚揚的鄧小平，當年也支持史達林主義式的激進措施。民族自尊再加上經濟自給自足的考量，壓過了共黨幹部對於採行蘇聯工業化模式的疑慮。更甚者，建國初期接受蘇聯援助的經濟

成功經驗，使得黨內人士繼續支持史達林主義的模式。

為了建立並維持國企，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出現代化的官僚體系，其規模之大史無前例，就當時全世界而言也是數一數二的。當然，國企不會依照市場效應來營運，它們必須遵循經濟計畫人員的決策，這些計畫人員組織成各局處部會，規模與人數不斷成長。毛澤東既要快速工業化，也要施行由中央控管的計畫經濟，但是他卻無法忍受達成這些目標所需的官僚與專業菁英。

毛澤東相互矛盾的野心引導出「永久革命」的理念，後來又轉化成「不斷革命」。這些理論觀念導致毛澤東最為後人熟知的暴政：「大鳴大放」、「反右運動」、「大躍進」以及中國所有混亂之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些事件從1957年開始一波接著一波，儘管運動的性質基本上不同，但都是毛澤東不斷試圖從黨政體系中整肅官僚與其他份子的結果。然而，如果想維繫毛澤東在1950年代早期構想的中央集權社會與經濟體制，這些人士是不可或缺的。

接二連三的运动，留下永遠難以抹滅的傷痕。以大躍進為例，這個運動企圖為共產黨創造千年的福祉，更明確的目標則是「偉大的舵手」毛澤東在1958年許下的承諾：中國將在15年內超英趕美。毛澤東推行烏托邦式的群眾運動，將工業化轉變成普通老百姓家後院搞大煉鋼，將集體農業分散到各地人民公社，結果導致數千萬人民死亡。大躍進摧毀了農業生產，但是偽造的統計數據竟呈現出農村大豐收，悲劇因此釀成。當穀倉中還堆滿過去幾年收成的穀物，數百萬人民卻淪為餓殍。中國大地上屍橫遍野，但是沒有人膽敢告訴黨的領導人：人民正因為黨的政策錯誤而沒法活了。以革命熱情與樂觀為基礎的中國共產黨，無論如何都不肯認錯，因此儘管發生

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嚴重的饑荒，但相關救災措施卻無法推行。

結果，建國功業彪炳的共產黨將中國帶到崩潰的邊緣。1961年，連黨內高層幹部都不得不承認，除了揚棄大躍進之外別無選擇。中國重新開始重視大規模工業化。從觀念上來說，與大躍進分散公社發展的烏托邦式理念相比，國企總還是好得多。大躍進為中國農民帶來無法想像的苦難。

接下來就是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在1966年發動這場詭異的運動，試圖恢復社會的生機，方法卻是「破四舊」——舊風俗、舊習慣、舊文化、舊思想。在這段中國歷史上最反常的年代中，數百萬青年在中國各地四處流竄。國家鼓動的混亂摧毀社會體制，傷害了好幾個世代的中國人。最後靠中國人民解放軍出動擺平了紅衛兵，才恢復了國家秩序。1969年，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但是基於後繼領導人的政治目的，官方歷史卻認定文革要到1976年才結束，因為惡名昭著的四人幫——其中包括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在那一年垮台。中國從奮鬥掙扎的年代中走出來，展開艱鉅的重建工作。

中國的經濟被文革搞得天翻地覆，而且在毛澤東統治末期，他抄自蘇聯的經濟發展模式顯然已經不合時宜。與其說中國工業在技術上落後，不如說它的體制在本質上就有問題。中國工業受困於龐大的中央計畫體制，而且過度強調產量，因此極度缺乏效率。就在毛澤東統治即將結束時，改革出現試探性的開端，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於1975年1月宣布著名的「四個現代化」：農業、工業、國防、科技。毛澤東死於1976年9月，為那些在他統治時代不可能實現的新計畫闢出坦途。先是毛澤東指定（但政治上無能）的接班人華國鋒，然後是鄧小平，他們改變了毛澤東較為烏托邦、不切實際的政策。

鄧小平成功掌握黨政軍大權之後，各種新穎的實驗蓬勃開展起來，鄧小平因此也成為改革的標竿人物。各種事務，無論是否屬於四個現代化的範圍，幾乎都有一番變革。以「共產」為名的黨開始實驗私有化，雖然「私有化」這個名詞在今日的中國仍令人聞之色變。國企股票在1980年代中期首度發行，對象主要是企業員工。上海與深圳的股票市場先後成立，人民重新獲得致富的自由。鄧小平曾說這是「非常好的」事情，他並提醒黨的理論家：「貧窮不是共產主義」。鄧小平能夠接受「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觀念，儘管強調平等重於一切的人士仍然難以接受這個觀念。無論如何，毛澤東已經不可能跳出棺材來抱怨了。

在1978年到1990年代中期這段輝煌的年代中，中國經濟成長之快速冠於全球，甚至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也極為罕見。大部份人民均是受害者，一小部份人藉炒做股票或自行創業（或兩者兼營）而致富。但是讓少數人致富卻並非這場經濟運動的目標，在中共幹部眼中，少數人致富只是改革所帶來令人厭惡但無法避免的結果。

然而改革也只能進行到這個程度。國企頑強抗拒變化，這些企業的建構是受史達林觀念啟發，由毛澤東規畫，不僅為國家提供各類貨物，同時也是主要的社會福利機構。國企在完全自給自足的社會中能夠興盛，但是一旦進入互動日漸密切的世界，就顯得缺乏競爭力，全然沒有立足之地。今天，中國「第十個五年計畫」已經展開，但中國的經濟計畫官員仍然對國企一籌莫展，國企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心腹大患。

北京當局多年前曾延誤一次真正的改革，讓原本就很嚴重的問題更是雪上加霜。政府不願設法改造中國的企業，反而決定以金錢

換取時間，強迫國有銀行向國企放款。看似源源不絕的流動資金維持住國企的生機，但是最終的受害者是銀行。沒有人知道北京當局對金融的傷害嚴重到什麼地步。有一點卻很清楚：如今中國不只是面臨一道難關，而是面臨兩道難關。

當北京當局還在猶豫徘徊，中國的工人卻首當其衝先受其害。鄉村貧窮迫使農民離鄉背井，湧入城市，加入數量已經很龐大的謀生人群。在中國從「指令式」經濟轉化成半市場經濟、從農業社會蛻變成都市社會的過程中，人民不斷失去工作。同時經濟發展也逐步趨緩，1990年代初期的高度成長後繼無力，隨之而來的是嚴重的經濟脫序。中國工人缺乏涵蓋全面的「安全網」，近年來疲弱的經濟也無法完全吸納失業人口。失業問題與性質相近的隱藏性失業問題，已經威脅到國家的穩定。在變化中遭到犧牲的人們，往往認定是中國共產黨要為這一切負責。

其實改革最大的犧牲者是中共本身。改革意味黨要逐步解除對人民生活的箝制，給予人民選擇權。毛澤東主義的社會控制機制已經鬆動，極權國家也降格為威權國家。不知何去何從的黨先是喪失它對人民的意義，然後又喪失活力，許多人認為這個黨已經來日無多。今天共產黨或許還在高談闊論自己是「生產力的先鋒」，但是這番論調幾乎已經無人理會。人們很清楚，在那些令外國人羨慕的經濟奇蹟中，國家的作為不過就是讓人民走自己的路。政府並沒有任何開創建樹，它只是不再阻礙發展之路。

共產黨在跌跌撞撞走向未來的同時，失落了許多過去的事物，而人民也是若有所失。維繫黨的愛國精神被自私心態取代。孫中山遺孀、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的國家副主席宋慶齡，若地下有知必定

大驚失色。她曾說：「幫助國家就是幫助你自己。」，鄧小平正確地反轉了這個命題，他經歷數十年毛澤東主導的運動之後終於了解，理想主義多半會導致悲劇。只有當芸芸眾生開始努力改善自家生活，中國才有希望。鄧小平的改革就是要賦予人民改善生活的機會。

鄧小平解釋道：「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以「革命」來形容他的作為或許言重了。但無可否認的是，與鄧小平1978年底從華國鋒手中接下的中國相較，當他在1994年最後一次公開露面，並將國家交給欽定接班人江澤民時，兩個中國的面貌已經是迥然不同。

但是有一個領域例外。中國的異議份子指出「民主」應該是「第五個現代化」。民主政治在中國有過曇花一現的生機。創建中華民國的孫中山先生相信，中國人民終將能夠治理自己，但是他在位的時間太短，無法讓民主理念深植人心。1912年，在中華民國建立的第二天，孫中山就表明將辭去臨時大總統，讓溥博滿清皇帝遜位的軍閥袁世凱繼任。袁世凱雖是接任中華民國總統，但對孫中山的民主理念毫無興趣，他破壞人民自治的新政府機制，自立為帝，此舉大失人心，中國開始解體，各省紛紛宣布獨立，軍閥崛起，民主始終沒有時間落地生根。中國人民還未準備好治理自己——至少掌權者還不打算讓人民這麼做。

接下來的數十年，代議制政府在中國毫無進展。蔣介石不是民主人士；毛澤東高談「民主的集權主義」以及「人民民主專政」，但這些觀念與民主政治毫不相干。毛澤東經常提到「人民」，但那只是他犯詩癡時的舞文弄墨。新中國之內並無新政府體制立足之地。共

產黨實行一黨專政，而黨的權力又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共產黨使命感就是統治人民。

當年鄧小平掌握大權時，曾預言中國五十年內會舉行全國性選舉，不過這番預言已證明是癡人說夢。對於群眾的政治參與，鄧小平只願做最小幅度的讓步。中國的領導人並無意推動真正的改革。也許是對於清朝覆亡之後混亂年代的記憶，仍然太過慘痛。無論如何，改革只是輕描淡寫，對那些要求更多的人士而言，顯然不夠。

1989年「北京之春」的動亂，是十多年來一連串示威運動的高峰，本來有希望催生民主政治，但是倡導人民自治的時機仍未成熟。曾參與1989年示威的韓東方坦承：「我並不了解民主的真正本質，只是使用這個字眼而已。」但無論天安門廣場示威者的民主觀念為何，鄧小平都無意讓步，共產黨的統治不可挑戰。1989年6月3日夜晚到4日清晨，人民解放軍出動，在北京街頭捕殺示威者。標悍的27軍開向天安門廣場，驅散示威學生及其支持者，北京市民赤手空拳迎戰坦克與裝甲車。直到黎明時分，死亡人數可能高達兩千人，確實數字永遠不得而知，這是一場由國家策動的屠殺，慘劇結束，舉世震驚。

儘管那個夜晚已經是多年前的往事，中國人至今仍在為六四哀悼。然而，現今共產黨領導人對那些敢於示威抗議的平民百姓——鄧小平所說的「社會渣滓」——仍只有輕蔑鄙視。世界各地的人們要求中共向人民道歉，但是黨的立場堅定，毫無妥協的餘地，至今仍然不承認當年的暴行。中國國防部長遲浩田1996年年底訪問華盛頓時說：「當時我是總參謀長，我能以負責而嚴肅的態度告訴各位：天安門廣場上沒有死一個人。」

也許北京領導人對天安門廣場那天晚上發生的事記憶猶新，反而無法面對事實。也許江澤民還忘不了：他就是在當時被意外拔擢至黨的最高領導職位，擔負恢復秩序與共產黨正統的重任。但北京領導不肯面對事實還有更深層原因：黨雖然承認毛澤東曾犯下「嚴重錯誤」，但不能以同樣的說法來形容鄧小平，否則無異於建立一種思考模式，暗示整個體制出了問題，而這個體制是遲浩田和其他領導人安身立命之所。此外還有一個原因：黨的大政方針是由鄧小平拍板定案，批鄧將有動搖黨國根本之虞。

鄧小平的務實理念讓共產黨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繼續掌權，加速改革，進一步減少對人民生活的干預。結果，舊日中國的罪惡又捲土重來，人口販賣就是一個嚴重問題。金儀12歲時就以相當於幾百美元的代價被賣給別人做新娘，她說：「我已經忘掉了怎麼哭，怎麼笑。每次我一哭，他的家人就會毆打我。」隨著北京當局放鬆毛澤東式的控管，諸如貪污、賭博、毒品、納妾、賣淫等罪惡都死灰復燃，威脅社會。

無論好壞，鄧小平改造了中國。平心而論，他的改造工程讓中國獲益良多。但是今天的中國必須完成鄧小平未完成的志業。如今中國雖然表面上看來已經現代化，但毛澤東體制仍陰魂不散，鄧小平並沒有改變這一點。高層幹部還是擁有予取予求的大權，而且不明白自己為何不能運用這種權力。這些幹部就像遲浩田一樣，他們不會去尋求真相，而是創造出自己願意相信的真相。遲浩田的天安門廣場謊言厚顏無恥到極點，不僅顯示中國領導人對其他人的鄙視，更反映出現階段他們仍未走出毛澤東主義的世界，他們要控制其他人能看到的真實世界。北京高層不願也不能改變黨與政府的本

質；然而，除非這種改變出現，否則中國未來的進展將極為有限。

毛澤東體制近年來已經達到其極限。黨的幹部希望享有網際網路的利益，但又想實行檢查控制。他們希望新世紀的中國在科技上領袖群倫，但是又壓抑創新的行動。他們期待社會現代化，但是不願釋出權力。這正是今日中國的基本矛盾：雖然有進步，但很快就撞上海牆鐵壁。毛澤東是這堵牆的始作俑者，其繼任者更變本加厲。

現今的北京領導人並沒有多少務實精神可言，他們只有教條式的標準答案。舉例而言，他們仍然繼續執行鄧小平的計畫，就好像大環境從他死之後就沒有改變過。中國領導人一方面推動經濟成長，一方面卻試圖遏阻政治向前進。天安門事件學生領袖王丹後來說：「政治改革必須與經濟改革攜手前進，如果兩者的矛盾衝突日益劇烈，總有一天會爆發。」他的預言也許會實現，但如果王丹要找一項即將爆發的矛盾衝突，他應該把焦點鎖定在貪污——政府貪污以及更嚴重的共產黨貪污。幹部掠奪國家資產引發的民怨正逐漸蔓延。貪污猖獗到極點，人民怒火中燒。黨只能要求幹部不要巧取豪奪，有時也會嚴懲重罰，但是無法解決問題的根本原因：幹部的權力不受制衡。要拿走幹部的權力必須進行根本的改革，然而江澤民絕對無意於此。相反地，他會命令政府停止運作幾個月，目的只是要黨內幹部們更深入學習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當然不是21世紀中國需要的答案，不過毛澤東倒是會欣然接受，他曾說：「你們要讓政治掛帥。」江澤民果真照辦，而中國人民將再一次付出慘重代價。

上一個世紀中國人所受到的創痛，不在世界任何一個民族之下。雖然現在中國人至少還享有安定，不過北京政府恐怕也只願意給人民安定。中國共產黨一直記得中國衰弱分裂的年代，因此並不打算冒險來建立長治久安的政治體制。中共沒有忘記文化大革命，因此一心只重視安定與秩序。中國現在沒有嚴重衝突，他們卻誤認為這代表人民的支持。其實兩者大有差別。鎮壓雖然有效，但只是曇花一現，而且對中國並無益處，至少長期來看是如此。共產黨對抗法輪功但成效不彰，證明這個黨只知道檢查言論、抓人與鎮壓。黨不能再激勵或教化人心，它的策略弊多於利，反而創造出它最憂心的事物：意志堅定的反對勢力。

高層幹部訴諸鎮壓行動，因為他們真正在意的只有一件事。「這些領導人只關心如何保有權力。他們和以往的領導人不一樣。」一位中年的投資銀行家如是說，她頭髮綁著光滑柔亮的馬尾，身穿黑色絲綢毛裝。對她而言，毛澤東深具領袖魅力，讓其後繼者望塵莫及。這位銀行家雖然言之成理，但她並非公正的評判者，她的父親已被視為「不朽」的人物，是當年與毛澤東並肩作戰、建立新中國的老戰友。但是儘管觀點有偏差，她還是一眼看出今日中國已經背離毛澤東與她父親的擊畫。那些元老不會樂見今日的情景，其中一件事會令他們特別不安：共產黨依然強大，依然主宰它領導的國家，但是黨已經迷失方向。

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想再多維繫幾年，就需要一位新的領導人，他必須具備鄧小平的特質，結合遠見與務實精神，兼具勝任愉快的政治技巧。江澤民不是這樣的領導者，但眼前也看不出有誰符合上述條件。如果黨的真正領袖不能及早出現，中國人民勢必將尋

找自己的領袖。屆時中國會再度慘遭鬥爭的蹂躪。天安門廣場上的抗議者韓東方很清楚什麼是鬥爭，1989年民主運動遭到鎮壓之後，這位工人領袖鎖進入獄。他在獄中憤怒地用頭撞牆並大吼：「聽到的人都記住我說的話，我下輩子絕對不再當中國人，不再當中國人，當中國人太可怕、太悲哀了。」

今天晚上這裡有許多中國人，但是他們既不可怕也不悲哀。說實在話，其中一些人恐怕還有點興奮過度。數百名狂歡者聚集在上海老字號和平飯店的屋頂露台上，開懷暢飲，大聲喧鬧。周遭的城市燦爛輝煌，五顏六色的燈光映照著漆黑的夜空。儘管夜色已深，露台下方黃浦江的高船還是熙來攘往。在這個完美的夜晚，在這個飯店的屋頂露台上，富商大賈、社會名流與道地的上海人觥籌交錯，榮耀、驕傲與欣羨全都表露無遺。打著黑領帶的名流與穿灰色長袍的仕紳閒聊；女士們三五成羣，有的一身曳地晚禮服，有的裹著曲線畢露的旗袍，開叉直到腰際。許多賓客是橫越了整個中國或大半個世界，來到光華四射的上海參加這場盛筵。

現在賓客紛紛入座，談話聲逐漸止息。在1999年10月的一個周末的夜晚，中華人民共和國才剛慶祝過五十週年國慶，賓客們看著眼前的一位人物。和平飯店頂樓的豪華舞廳終於安靜下來，這位身材修長的美國女子今晚特別矚目，她穿著最具革命意味的大紅色，禮服上釘著數百個金色與紅色的毛澤東頭像鈕扣，不過這不代表什麼政治宣示，只是流行風尚的展現，因為她是來這裡尋歡作樂。瑪姬·法莉環視全場，開口說道：「革命已成了請客吃飯。」賓客們熱烈喝采。

的確，革命已成了請客吃飯。今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不至

於「溫良恭儉讓」，但也看不到革命精神。國家與領導國家的黨都是老態龍鍾；當年讓毛澤東從潰敗邊緣起死回生、最後大獲全勝的那股熱情，已經消耗殆盡，淪喪在一連串錯誤的運動與計畫中。今晚，在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上海，革命無影無蹤。

其實應該這麼說，革命並沒有完全消失，仍然存在於反抗現今政權的人士身上。雖然今日反抗者的勢力微不足道，但情勢終將改變。現在的中國人民追求變化，就如同清朝末年與國民黨政權崩潰時一樣。人民不再是一窮二白，他們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

中國人民終將如願以償，這一天指日可待。當末日降臨時，中共幹部只能怪罪自己。他們有五十多年的時間可用，但終歸失敗。他們創建的共和國貪污、高壓、暴虐，共產黨的「紙」不再是「沒有負擔」。儘管近年來有長足進步，中國依然貧窮。中國歷史有一定模式：與現今政府類似的政府都會滅亡。1989年春天，共產黨喉舌人民日報的副總編輯王若水，在北京街頭與學生、工人一起前進。他寫道：

「我們走向天安門，那裡已經是人山人海，我還記得我在1940年代後期也曾參加示威，那時是國民黨統治，大家喊的口號是：『我們要自由與民主』。我心想：『天啊！這麼多年來，我們繞了一大圈，現在又回來喊著同樣的口號。』」

當年有無數的王若水走上街頭，要求自由與民主，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因此覆亡，但國民黨的後繼者也將重蹈覆轍。馬克思說：「歷史會不斷重演。」當歷史重演時，人們會把毛澤東的屍體從天安門廣場移走，中國人民終將邁向自己選擇的道路。

第二章

燃油之湖

民怨沸騰無以復加

原本並沒有任何人組織示威活動，經過的人就這樣變成示威者，擠滿了布拉格的大廣場。

——捷克總統哈維爾 (Vaclav Havel)

再過幾個小時就是午夜，中國農曆六十年一甲子中最吉祥的「金龍年」，將從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門廣場開始。那是2000年2月4日，中國即將揮別兔年。通向禁城的天安門高大雄偉，背後白光照耀映襯，讓下方的節慶活動籠罩在一片燦爛輝煌的氣氛中。群眾正在中國的國都歡喜迎新春。

但這天晚上天安門廣場中除了遊客之外還有許多不速之客，老老少少的法輪功信徒也冒著嚴冬走上街頭。就像過去9個月來的許多日子，他們聚集在廣場上，要求國家給他們修習自身信仰的自由。這天晚上一如往常，只不過他們都裹著溫暖的衣物。幾群信徒集合

在廣場中央的旗桿周圍，拉開數面旗幟，沒有多久公安就發現他們，開始介入。數十名抗議者被公安推向停在附近的藍白兩色廂型車。在這特殊節日的夜晚，國家的準備也特別周全。

每輛廂型車旁都有一群信徒，公安把他們強行推入車門。一名女子被扯住頭髮拉倒在地，勉強攀著對她施暴、渾身黑衣的便衣公安站了起來。年輕的信徒還能爬上車，但是一位穿著綠色軍大衣的老人似乎已經耗盡力氣，他被黑衣公安推擠著原地打轉，跌倒在人行道上，雙手不停地舞動著。黑衣公安吐了一口痰，用腳猛踢老人的腰部。一名穿著白色外套的公安走過來，粗暴地抓住老人的衣領，將他拉起來拖向廂型車。

那天晚上北京有一百多名法輪功信徒被逮捕，在金龍年的第一個星期，全中國據信有將近兩千名法輪功信徒遭到拘留，其中包括兩名軍人，他們穿著軍服在天安門廣場上修練法輪功。

逮捕行動並未奏效，法輪功信徒繼續抗議。當安全部隊毆打信徒並塞住他們的嘴巴，天安門廣場的人行道再度染血。依附著母親的孩子也被一起監禁。數十名信徒死在拘留所，數萬名信徒送入勞動教養所與「改造」中心。法輪功發言人王瑤琴曾連續幾個月被單獨囚禁、強迫餵食並遭到毆打。但是當局的策略成效不彰，鎮壓只會進一步強化信徒的信念與反抗。囚禁王瑤琴的人試圖逼迫她放棄信仰，但是她抗拒到底。那些為了離開拘留所而宣布放棄信仰的人，後來又回到天安門廣場上，寧願再度被逮捕。

有些信徒甚至在天安門廣場上殉教，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記者瑪琴農（Rebecca MacKinnon）報導：「一個男人端坐地上，渾身灑透汽油。四名女子一路走來，全身著火，高舉雙手，做

出標準的法輪功姿勢。」在穿軍大衣老人遭毆打整整一年之後，法輪功信徒死在天安門廣場上。一位女性死於金龍年的除夕。幾天後，有名男子跑到北京，往自己身上倒汽油，他打火機一點，全身一片熊熊烈火。他死在中共領導人的寓所附近。

末日的第一個徵兆是反抗。當人民敢於反抗政權，當他們為對抗國家而不惜犧牲性命，那麼政權的最後一幕大概就已經開場了。今日有許多團體挑戰北京當局的威權，法輪功只是其中之一。宗教信徒、民運人士以及追求自己家園的「分離主義者」，都在衝撞北京政權。真正的悲劇在於：這些人其實並不是註定成為國家的敵人，是國家逼他們上梁山。

世紀交替之時，中國政府正與這些團體搏鬥，而且在搏鬥過程中茫然不知所從。有些衝突日益升高，有些甚至無法控制，但國家並沒有去因應真正的挑戰——數十年經濟措施錯誤造成的混亂。每天有成千上萬的勞工與失業者走上街頭，這些人才真正構成中國最大的威脅，中南海的國家領導人應該把精神放在這些人身上，而不是去鎮壓法輪功。

武力對抗信仰

中國的首長們真的是被嚇著了。1999年4月25日，北京的公安武警們絲毫沒有防備，李洪志創立的法輪功逾萬名信徒居然赤手空拳地包圍北京市中心的中國國家領導人聚居的中南海。信徒以無聲的抗議向中央政府請願，要求的不過只是寬容。

中國領導人從來沒見過這種場面。至少在剛開始的時候，他們就像天安門廣場上穿軍大衣的老人一樣困惑。朱鎔基——中國最受

歡迎的官員——出面與意志堅定的示威者對話。據說朱鎔基那天曾經承諾：法輪功不會被禁絕。但是被中南海示威激怒的江澤民另有打算。1999年7月，北京當局宣布法輪功是「邪教」，進而要求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逮捕李洪志。雖然信徒認定李洪志是神的化身，但是人盡皆知他住在紐約。國際刑警組織拒絕逮捕這位「至高無上的存有」。

法輪功信徒隨即發動反擊，在天安門廣場上前仆後繼的進行示威。信徒們似乎相信，只要能佔據中國至高無上之地，就能夠得到安身立命之所。他們面對無動於衷的公安武警，犧牲自我。整個國家以泰山壓頂的力量，鎮壓這個大部份是由老人與弱勢族群組成的教派。

中國政府與法輪功的對決已無可避免。事實上，中共根本無法容忍一個群眾組織，無論這個組織用意有多良善。此外法輪功還有一項罪狀：不肯屈服。共產黨只有在與任其擺佈的組織打交道時，才能夠平心靜氣。因此黨可以容忍「愛國的」天主教會，但這個教會不准承認梵蒂岡教宗的權威。心向梵蒂岡的教徒只能自行祈禱。

自行祈禱的天主教會沒有體系分明的組織，就像今日的法輪功一樣。李洪志的信徒被逼入地下，對於當局反而更加危險，而且也更難以鎮壓。他們沒有組織，無處可見時又無處不在。勉強算是已制度化的共產黨，不能夠理解這種缺乏正規架構的組織。中共無法應付看不見的對手，法輪功信徒和許多天主教徒一樣，已經翻出黨的手掌心。被信徒稱為「李大師」的李洪志，據說能將自己隱形，而法輪功信徒顯然也擅長隱形之道：只有當他們自行現身接受逮捕時，國家才抓得到他們。

因此這場仗還有得打。法輪功誓死不屈，共產黨堅定不移，抗爭之途似乎永無休止。數千名信徒被捕下獄之後，法輪功運動的面貌也轉趨陰沉。共產黨引發了反抗與怨恨，正如同天安門示威者所展現的。反抗運動不斷擴張，心懷不滿的中國人民——特別是新近失業業者——加入法輪功作為「抗議的象徵」。我們看到現代中國的國家體制陷入迷團，對其作為則無法苟同。

如果毛澤東在世也一樣不會認同的。他對法輪功的游擊戰術應該不陌生，但是會大感訝異，因為他的接班人居然忘記他傳授的策略與治國之道。今天國家雖然監禁街頭示威者，但法輪功立刻調整形態，準備面對下一回合挑戰。還會有數不盡的穿軍大衣老人，寧願被拘留也要現身說法。李洪志在紐約表示，監禁信徒無濟於事，他說：「政府能懲罰人民的身體，但不能改變他們的心靈。」中國這個警察國家至今無法收平法輪功，也許原因就在於此。

在毛澤東策動的大躍進時期，這場荒謬至極的運動使得無數生靈死於饑荒，人數可能高達3000萬，有人認為不只此數。當時人民雖然遭逢可能是歷史上最慘重的饑荒，備嚐艱辛，但依舊支持中國共產黨與其領導人。今天，儘管中國享有經濟繁榮，卻深受社會脫序之害。若在別的國家，這種情形可解釋為民眾期望升高後引發的危機，但在中國還有別的原因。自從黨的意識形態喪失活力，黨的聲音再也不能號召一切。中國的高層政治組織或許還保有理想，但是已無法令人信服，而且更糟的是表裡不一，因為黨已漸漸背離社會主義。李洪志宣揚的理念比共產黨的理念更為奇特，不過至少他宣稱自己是神的化身時，看起來還算真誠。李洪志或許是異想天開，但是頗具說服力。而且他填補了另一個異想天開的領袖——毛

澤東——留下的空虛。

認為中國出現衰微的徵兆，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黨已經無法理解人民的想法。過去並沒有這種問題，毛澤東諸多特質之一就是：他是最可怕的干預者。黨透過工作單位與鄰里組織進行社會控制，對人民生活的影響幾乎是無孔不入。但是天安門廣場大屠殺之後，真正掌控國家機器的那小平深知，如果黨還想在悲劇後繼續生存，就必須減少對人民日常生活的干預。今天的中國人或許還談不上「自由」，但是在生活上已經享有相當大的選擇空間。不過，減少干預的政策施行十多年來，已使得黨遠離群眾、孤立無援。結果黨——特別是做為一種群眾運動而言——已經無法影響中國人民，情形之嚴重令人驚訝。黨並沒有創造法輪功，但是法輪功今日的形象、地位卻要拜共產黨之賜，它靠自身根本無法發展到這種程度。中國「無神論英雄獎」得主司馬南反對法輪功，但他也認為政府的作法徒勞無功。他說：「到頭來人們會想：『這個李志洪一定有兩把刷子，不然為什麼政府一天到晚都會談到他？』」

每況愈下的中國共產黨，常常搞不清楚自己領導的是個什麼樣的國家，一旦有事，就往往會把事情搞掉。1999年美國一位駐北京的外交官評論道，一年前創立的非法組織「中國民主黨」，成員數目可能比矢志消滅他們的公安還要少，因此這個黨被剷滅是理所當然的。當公安人員無情地追捕中國民主黨黨徒時，竟然同時對法輪功的日漸壯大視而不見；亡羊補牢動用武力時，卻無法理解這麼做是火上澆油，只有讓法輪功更興盛。

的確，宗教在中國欣欣向榮，但是你要仔細觀察才能一探究竟。在上海市中心的新樂路，中共將一間教堂的教士趕走，以外幣

兌換商取而代之。這座教堂有5座洋蔥形的圓頂，其中一個圓頂大於另外4個，顯然是俄羅斯東正教的遺風。兩座厚重的銅門現在正打開著，等待著信徒上門。教堂裡有一百多人擠在一間煙霧繚繞的房間，期盼著某種救贖，不過這種救贖可不是來自上帝。

壯麗的教堂前面掛著一塊牌子——「市政府保存建築」。這幢建築物以前名為「聖母天主堂」，它的結構被保存下來，但其中的宗教卻無法倖免。聚集在這裡的並非教徒，而是玩股票的股民。這兒現在是上海「國泰君安證券公司」的號子，上海則是中國的新金融中心。在中國，所有事物都要為國家服務；在上海，崇拜上帝的處所居然要讓位給金錢崇拜者。共產黨信奉唯物主義，而國泰公司的客戶當然也不例外。

從新樂路的景象看來，中國的宗教似乎正日漸式微，中共希望你變得富有並鼓勵你堅守無神論。但是以目前趨勢而言，國泰公司有朝一日可能得讓位給教堂，因為現在風靡中國的並非股票買賣，而是宗教活動。在中國，從事股票買賣的人還不到500萬。政府鼓勵市場投資，打壓宗教活動，但近來中國人對於宗教卻是無限渴望。根據官方資料，目前全中國信仰宗教者達一億以上，實際數字必定更高，而且各界咸信教徒要比炒股的股民增加得更快。像中國這樣社會快速老化的國家，宗教的興盛幾乎是無可避免，人民會思索生命的有限，並開始想到來生。

中國社科院「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傅青元說：「中國有許多人正面臨信心危機，不過我始終相信，大部份中國人民仍然信仰辯證唯物主義。」傅青元是中國的意識形態大師。現在你應該知道共產黨脫離現實的程度有多嚴重，也知道為什麼一

個流亡紐約的李姓穀物行店員會在中國大受歡迎。

李大師在1992年將各派思想混合成強而有力的信念，於長春創立法輪功，那是東北吉林省省會。他糅合佛教、道家等中國傳統思想，普遍性的道德原則與哲學思想（真、善、忍）以及氣功——一種引導身體能量的古老藝術。他教導信徒如何在腹部培養出「法輪」來吸收能量，同時在頭上開出「第三眼」與宇宙溝通，並期待信徒最終能獲得「圓滿大法」。最重要的是，他發現了一個新的宇宙最高存有：他自己。現在一邊是承諾有來生的法輪功，一邊是否定有來生的共產黨；猜猜看哪一種宗教比較受人歡迎？

李洪志除了是最高神祇的化身，同時很懂得掌握時機。中國是當今宗教成長最快的地區。各式各樣宗教之所以會在中國興盛，原因不一而足，但歸根究底是：在一個動盪不安、變化萬千的社會中，民眾需要心靈慰藉。而且中共已經沒有力量控制人民信仰。黨甚至無法控制其幹部的思想，數萬名幹部正熱衷於修練法輪功。

法輪功信徒總是會表白他們的信仰。2000年1月，酷寒幾乎讓中國的首都與其他地區癱瘓。在蘇州著名的「拙政園」，一群演員正在拍攝電視廣告片，氣溫極低，這一天的拍攝工作特別困難，演員們擠到小巴士裡取暖。一位臨時演員被旁人問道會不會冷，他說：「會，可是沒關係，因為我練過法輪功，不覺得有多冷。」這位英俊的年輕人自顧自地說道，可是車上每一個人都聽到他這番告白，這群人不過是昨天才認識。年輕人看來無憂無慮，但他剛剛承認了一樁罪狀，對中共以及現代中國的龐大公安體系而言，這非同小可。但小巴士上的人似乎也並不以為意，儘管他們方才親眼見證了法輪功信徒的反抗行動。

法輪功信徒的反抗近來在中國各地層出不窮，連監獄也不例外。2000年3月，全國人大會委員長李鵬在大會中宣稱：「中國在對抗法輪功的決定性行動中，已經取得重大勝利。」然而在全國人大集會當時，儘管當局安全措施做得滴水不漏，法輪功信徒還是有辦法在人民大會堂前集結示威。其中70人遭到逮捕，被拘禁在北京的戒毒所，他們絕食抗議。其他信徒偷偷送出的照片顯示，絕食抗議者儘管身陷囚籠，還是繼續修練法輪功。

信徒們在拘留所修練法輪功，在每一個可能的地方練功。只要有信徒聚集祈禱的地方就是教堂，中國正有數以千計這樣的教堂紛紛出現，取代上海新樂路上的壯麗建築。北京一幢公寓中的一個小小房間，就如首都其他數百萬間公寓一樣平庸，卻是中國眾多教堂之一。房間裡有近十名男子緊緊圍著一張桌子研讀聖經，這不是聖彼得的教堂，但是教徒的信念同樣熱烈堅定。這些教徒對迫害並不陌生，其中幾個人是在2000年元旦當天被捕，因為當局查獲他們「客觀討論上帝與靈魂的問題」。教徒徐永海說：「他們拖著我走，整整24小時不讓我喝水吃東西。」但是這樣做對中共政權毫無裨益，徐永海將他的遭遇告訴CNN記者。

國家儘管資源龐大，但它對宗教的聖戰卻是節節敗退；這問題不可小覷，因為北京當局正承擔高度風險。中共領導人不希望見到一個訓練有素、團結一致的組織向北京進軍。在過去中國帝王專政時期，信仰怪異的特殊宗教總是會染上政治色彩，誰擋住去路，誰就得遭殃，然而法輪功給人的印象卻是一個和平的組織。退休人士實在沒有什麼精力去顛覆政府——除非他們被逼上梁山。如今法輪功信徒遭到北京的鎮壓，真的是被逼上梁山。然而共產黨並不迫

害法輪功為滿足，現在又將目光轉向其他氣功派別，雖然這些氣功派別宗旨更為良善，而且中共也不確定自己能打壓到什麼地步。

今天的法輪功只是個規模特別龐大的教派，但是天有不測風雲。法輪功事件再一次突顯外強中乾的中國共產黨，控制力已江河日下。中共掌握全世界規模最龐大的正規軍，手中有核子武器，但是它對抗老人與弱者時卻踢到鐵板。如果堂堂的中國共產黨連法輪功都應付不了，還指望它能對付什麼敵人？更何況中共如今已是四面楚歌。

悲劇的化身

中國西北地區的維吾爾族穆斯林與藏族、法輪功信徒不一樣，他們並不想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份子。畢竟，硬要說他們是中國人，其意義僅止於他們被納入一個名為「中國」的國家。他們看到蘇聯帝國邊疆的民族在十年前爭得自由，因此決心依樣畫葫蘆。如果法輪功事件可以視為輕快的喜劇，那麼藏族與維吾爾族的遭遇就是陰暗的悲劇。歷史、民族與宗教交雜混合成爆炸性局勢，兩個民族為爭取自由而對抗佔優勢的漢族。這場戰爭正以多種形態、在多處戰場上展開，而且是一場長期抗戰。

印度的達蘭莎拉正在慶祝陰曆新年，西藏喇嘛身穿紅袍，頭戴黃色僧帽，就像波里尼西亞的國王，他們將死神肖像丟入燃燒的茅草屋中，象徵消滅過去一年的罪惡。帶著長牙與怪異眼睛的白色木樨肖像，瞬即被大火焚燬。對民族性相當溫和的藏人而言，如果趕走漢人也像這麼容易就好了。

在漢藏兩族多災多難的歷史中，漢人侵藏史不絕書。8世紀的

西藏喇嘛竹登昌卓多杰仁波切發現了一段神聖經文，警告未來將會有一場侵略：「金屬大鳥飛臨空中，乘著輪子的馬滾滾而來。」這段經文成了1950年中國入侵西藏的預言，中國稱這次侵略為「解放」，但是西藏人要問：「從誰的手中解放？為何解放？」

現在經文預言成真，竹登昌卓多杰仁波切也重返人間，轉世為好萊塢動作明星與「佛教名流」史蒂芬·席格（Steven Seagal）——至少有一些信徒是這麼認為。許多西藏人拒絕接受這個具高度爭議性的轉世，與另一位佛教領袖的繼承傳奇相映成趣。就像大部份有關中國的傳奇一樣，這個繼承傳奇淵源自數百年前。藏族相信在高僧圓寂之後，在世者可以憑藉各種徵兆來尋找他們的轉世化身。「第一世達賴喇嘛誕生於1391年」，此後他不斷輪迴轉世，法力越來越強。今天的達賴喇嘛是第十四世，他流亡國外，爭取國際支持他的佛教家園，因而觸怒北京當局。北京在西藏自治區與藏人眾多的青海省，當然也任命了名不見經傳的藏族與漢族官員，但達賴依然是西藏最孚人望的領袖。

那麼又是誰來選擇達賴喇嘛？傳統上這項重責大任交給西藏第二號精神領袖——班禪喇嘛。十世班禪喇嘛於1989年圓寂之後，一名6歲男孩更登曲吉尼瑪在1995年被認定為第十一世班禪喇嘛。不幸的是，他住在西藏，北京政府將他與父母親帶走，另立一名6歲男童為班禪喇嘛，希望班禪從此任他們擺佈利用。後來更登曲吉尼瑪再也沒有公開露面，藏族異議份子稱他為「全世界最年輕的政治犯」，據說他現在還活著。2000年9月和10月，北京當局向歐洲外交官出示兩張小男孩的照片，聲稱他至今仍與父母親住在西藏北部，不過這只是當局歷來許多自相矛盾的說法之一。北京雖然可以無限

期拘禁他，但是卻無法說服藏人接納他們扶植的十一世班禪喇嘛，他遭遇的問題一如史蒂芬·席格。

西藏第三位轉世宗教領袖噶瑪巴，如今是一個高瘦而手腳略顯笨拙的青少年，達賴喇嘛與北京都認同烏金聽列多傑是第十七世噶瑪巴，不過這回北京政府犯下大錯。當全世界大部份民眾慶祝西元2000年來臨時，噶瑪巴開始逃亡。他乘吉普車、騎馬、步行、轉搭直昇機與計程車，逃離他在西藏的寺院，一路奔向達賴喇嘛位於印度達蘭薩拉的流亡政府。噶瑪巴的逃亡令中共大為震驚，同時充份顯示它無法控制西藏局勢。北京只有一種方法可以報復：官員逮捕噶瑪巴的父母親並立刻帶離西藏，雖然他們只是單純的犛牛牧人。噶瑪巴的父母可能還活著，但無論如何，他們的苦難正突顯中國統治的嚴酷，而逮捕他們的行動無疑也讓漢族統治者的憤怒難耐流露無遺。

北京領導人可以隨意逮捕任何一名男孩與犛牛牧人，不過這種做法對他們並無幫助。達賴喇嘛已經打破數百年來的傳統，宣布其繼承人將以民主選舉方式產生，因此年輕的班禪喇嘛已失去挑選西藏最重要精神領袖的權力。達賴的決定有助於團結流亡印度的藏人，現在有兩位西藏宗教領袖居留此地。回溯1959年，藏人抗暴失敗之後，達賴喇嘛十四世逃到印度，在西藏與中國坎坷的歷史上，達賴並不是第一次出走。流亡印度的15萬藏人，是最獲西方世界同情的一群難民，他們鼓舞了那些受迫害弱勢族群的支持者。因此，藏人流亡印度不啻向全世界提醒現代中國的暴政，同時也形成一座反對陣營的基地，北京觀長莫及。

這一世的達賴喇嘛無論在國外多受歡迎，他在西藏還是難免受

到批評。許多藏人追求家園的完全獨立，而不是達賴尋求的自治，這些藏人也對達賴採行的甘地式非暴力政策不以為然。他們傾向以更強烈行動來抵抗北京對藏人的殘酷壓制。西藏不時爆發起義抗暴，低強度的暴動更是持續不斷，不過中國當局仍然堅守不退。其實北京如果賦予西藏一部份自治權，西藏問題可望迎刃而解，因為自治是達賴的訴求，他也願意談判。但是中國至今一心只想全面控制西藏，且無意與達賴展開協商。現在情勢很清楚，中國不想走康莊大道，因此抗爭將持續進行。

雖然達賴能夠在世界各國首府贏得廣泛的同情，但是誰才能趕走西藏的中國人？噶瑪巴逃抵印度達蘭薩拉之後，在一場農曆新年的聚會中首度公開演說：「藏傳佛教最重要的信念就是慈悲，然而施行慈悲的前提是自由。」他是否意指藏人必須先獲得自由，才能施行慈悲？噶瑪巴年紀正輕，初生之犢不畏虎，他似乎已做好準備要與中國正面對決。如果噶瑪巴能掌握時機，那麼北京藉劫持班禪來主導下一世達賴人選的企圖，終將徒勞無功。噶瑪巴逃離家園的舉動已經深獲藏人民心，目前看來，他必然會繼續抗爭。

噶瑪巴流亡之後，西藏三大宗教領袖已全部離境。總有一天，三位領袖都將回歸故鄉。在這段期間中，西藏青年會像蟻曲的蛇一般等待時機。各種形式的抗議在西藏層出不窮，有時候只是由一或兩個喇嘛發動。藏人耐心十足，畢竟他們已經抵抗漢人數百年之久，在這段時期中，他們有時享受自由，有時被迫屈服。現在藏人既已失去自由，他們正在策畫下一階段行動，希望有朝一日，所有藏人都能在自己的家園中廣佈慈悲。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其實根本談不上「自治」，因為這裡是桀驁

不馴的維吾爾人的家園，而北京當局決心要統治他們的土地。新疆可沒有西藏的慈悲，這裡更像戰場。維吾爾人如同藏人，一度擁有自己的國家。1944年中國正全心對付日本侵略時，「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獨立建國，但僅曇花一現。人民解放軍在入侵西藏的同一年開始鎮壓維吾爾人。維吾爾人並沒有遺忘這段歷史，暴力反抗幾乎每天都發生。

葛蘭姆·艾倫 (Graeme Allen) 1994年前往新疆省會烏魯木齊「新疆假日大酒店」工作時，對這段歷史還一無所知。艾倫原本住在曼谷，他接新職時甚至還不知道烏魯木齊在什麼地方。這個圓胖的愛爾蘭人簽約之後心想，他應該弄清楚自己的目的地，但是他在地圖上找不到烏魯木齊，所以買了一本《寂寞星球》(Lonely Planet) 旅遊指南，當他知道當地種族繁多而且關係緊張時，心裡開始發毛。烏魯木齊本身似乎也不是世外桃源——單調沉悶，到處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早年流行的混凝土建築。艾倫還知道一件事：烏魯木齊是全世界離海洋最遠的城市。

艾倫的專業是旅館經營，他要為烏魯木齊最好的旅館拍一部宣傳片，這是他就工作的當務之急。那天，拍攝工作已經進行了大半天，直到下午。工作人員幾乎已拍遍整個旅館，但艾倫得知他們還沒有拍攝對中國旅館非常重要的中餐廳，艾倫的助理解釋道：「中餐廳有點麻煩，那裡已經打烊了。」

「打烊了？什麼意思？中餐廳沒有打烊。」如果旅館有任何部門關閉，就算只是暫時關閉，艾倫一定知情。

「嗯，問題是在攝影師，他不想進中餐廳。」

「為什麼？」艾倫問道，如今他對這塊異國土地的情況已略知

一二。

「那裡有可怕的味道。」助理回答。

「你說什麼？」艾倫上回到中餐廳時，並沒有聞到什麼不尋常的味道。

「豬肉與豬油的可怕味道。」

「那麼西餐廳呢？」艾倫問。

「那裡就沒問題。」

艾倫說：「西餐廳裡的豬肉與豬油和中餐廳一樣多。」工作人員當天稍早已經拍攝過西餐廳，艾倫注意到，當時那位維吾爾族攝影師並沒有絲毫猶豫。

「就是不一樣。」艾倫只得到這樣的回答。

維吾爾人與中國人的關係向來不睦，近年來更日趨惡化，特別是1997年初之後。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舊都伊寧在1997年爆發激烈衝突，事件經過外界所知十分模糊，因為北京當局將新疆與世隔絕，不過暴動與後來的處決可能導致數百人——甚至更多人——死亡。事件至今仍波瀾漾，穆斯林持續抗擊中國的公安武警。流亡的維吾爾領袖爾金·阿普塔金 (Erkin Alptekin) 說：「新疆每一天都會出亂子。」陷於絕望的維吾爾青年奮力出擊。新疆沒有名目昭然的反抗運動，但散兵游勇式的反抗很難有效鎮壓，而且中國士兵還會將各式武器與炸藥偷偷賣給維吾爾青年恐怖份子。奧普泰金說：「新疆正燃起熊熊大火，中國無法撲滅。」

為何暴力會如此猖獗？維吾爾人就像藏人一樣，曾經歷數世紀的中國統治，兩個民族也都幸運地遠離中國的首都。但是，中國推行的漢人移民新疆計畫，未來卻會使維吾爾人在自己家園中淪為少

數民族，這種情況甚至可能已經發生。中國也用同樣政策來稀釋西藏的藏族人。艾倫如此形容新疆漢人與維吾爾人：「這兩個族群的生活渾渾分明。」艾倫特別提到漢人與維吾爾人連對時間都缺乏共識。照官方規定，中國全境都要遵用北京時間，但如果你在新疆向一個維吾爾人問時間，他給你的答案會比北京時間早兩個小時。如果你再問他是否真的聞得到中餐廳的豬肉豬油臭味，他也會給你肯定的答案，除非他能擁有自己的家園。

只要新疆的前途仍由北京當局決定，這一天就遙遙無期。北京的經濟計畫專家正兢兢業業，努力鞏固漢人對新疆的統治。征服一個民族要耗費許多國力，同時征服好幾個民族更是工程浩大，然而這也正是北京最新的計畫。這項計畫有一個名號——「西部大開發」，充份彰顯它是中央政府的政策。官方媒體幾乎每天都在宣揚中共中央政治局領導人推動「西部大開發」的高瞻遠矚。

馬克思說：「歷史會不斷重演。」中國政府開發西部地區的計畫也是如此。1950年代，當局動員囚犯與退伍軍人闢建基礎建設，將當時剛統一的西藏、新疆與中國本部連成一氣。其中規模最大的是1960年代中期推行的「三線建設」，將產業西移以防範外國攻擊。這個毛澤東創始的觀念重創了中國經濟。

在21世紀的開端，正當中國終於證明了中央計畫經濟行不通時，北京幹部卻故態復萌。「西部大開發」運動又是一次大刀闊斧之舉，著重公共支出與針對特定計畫的優惠政策。所謂的「西部」實際上是指中國的中部與西部地區，當地的確需要基礎建設，但是如果中國過去的紀錄可以作為借鏡，那麼這些建設都將缺乏經濟效益。

為了建立功績，北京政權希望縮小快速成長的沿海地區與內地省份之間的所得差距。兩者差距之大，已有威脅國家穩定之勢，至少會使國家內部出現渾渾分明的區隔。壓制少數民族是北京開發西部政策的另一個考量。多年以來，全然依恃暴力的作法，最多只能達成短暫和平，現在經濟發展則帶來長治久安的契機。當局強硬推動的現代化與隨之而來的漢族移民大軍，將進一步削弱藏人、維吾爾人以及他們脆弱文化。儘管發展計畫會帶來福利，但依然不受施行地區的歡迎。藏人絕對不是個現代化的民族，維吾爾人也相去不遠。然而無論兩個民族願意與否，北京都要強行將他們帶入新千年。

西藏的漢人移民與日俱增，已經令達賴喇嘛深感不安。西藏首府拉薩正逐步轉型為現代化都市，強勢文化全面動員，試圖摧毀弱勢但具有彈性的文化。過去廿年來，西藏的外觀與氣氛一直都是個被佔領的國家，中國不能再將其珍貴的資源虛耗於征服少數民族，特別是那些韌性十足的民族。中國為了達成政治目的，罔顧經濟，強迫沿海地區的健全企業赴西部投資，此舉無異喪盡國力。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金融業，儘管回收希望渺茫，當局仍強迫大型金融行庫在西部地區放款。

達賴喇嘛有朝一日能回到西藏嗎？似乎每個人都會問他這個問題，而他的答案也總是帶有肯定的意味，只不過沒有點明自己是永生不死的。因為達賴喇嘛不斷輪迴轉世，所以必然能在某一世重返故里。但藏人眾望所歸的第十四世達賴能不能回鄉呢？

現在情勢似乎已成僵局，許多人認為時間的演變將助漢人壓倒少數族群的藏人。根據這種看法，強勢的經濟發展將徹底制服藏

人、維吾爾人與中國其他少數民族。這些少數民族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抗拒北京的同化，而且隨著中國統治者的興亡起落，他們至今都還是能讓漢人屈居下風。現今中國其他地區的壓力也逐漸升高，出現反抗運動，但原因不一而足。只有在北京政權保持穩定的前提下，壓制少數民族的措施才可能收效。十四世達賴喇嘛應該能夠再看到家園，就算他不能，十七世噶瑪巴必定能如願。達賴說過：「極權體制不可能永遠存在。」

大限將至

這地方陷入一股狂熱，想要展現出全世界的景觀，全世界耐得住酷寒的景觀。全球知名的水上餐廳「珍寶海鮮舫」與香港最高法院大樓毗鄰而居，但是在真實世界中，兩幢建築是分居島嶼兩端，中間相隔著連綿的山峰。不過1997年2月哈爾濱的冰雕節，地理空間被極度壓縮，好讓中國內地人對這個英國殖民地的勝景一覽無遺。節慶的主題是香港，而所謂的建築只是精雕細琢的冰塊，在東北冰天雪地的黑龍江省會哈爾濱展示。

中國各地的群眾，包括哈爾濱冰雕節的人群在內，都在歡慶香港即將回歸中國。在這個廣大的國家，近來幾乎任何事都會與「回歸祖國」扯上關係。一座時鐘嵌在冰塊中，為7月1日的來臨倒數數秒。北京天安門廣場上豎了一座更大的時鐘，充滿向民眾炫耀的政治意味。在煤煙覆蓋、氣溫低於零度的工業大城哈爾濱，人們站在大鐘前微笑。香港回歸中國的確為人們帶來喜悅。兩年之後，冰雕節的主題是澳門——亞洲地區最後一塊歐洲殖民地，當澳門回歸時，天安門廣場也再豎起一座大鐘。

當年毛澤東之所以深得人心，聲望至今不衰，原因在於他驅逐了割據中國百餘年的外國勢力。民族主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頗受歡迎的政治訴求，共產黨為了強化自身地位，正不斷鼓舞民眾——特別是年輕人——的民族情緒。

鼓舞的對象也包括這些上海花旗銀行的年輕女性。此時在臺灣，中午豔陽高照，空軍飛行員坐在駕駛艙中待命，隨時準備駕機升空。現在是1999年8月初，中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在主席江澤民坐鎮下，剛剛對廣州軍區與南京軍區的前線戰機發出「先發制人」的指令。中國戰機刻意入侵台灣領空，台灣海峽緊張情勢升高，李登輝總統不久前才發表引起爭議的「兩國論」，主張中國與台灣是兩個不同的國家。香港的美國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謠言紛傳，竟說中國與台灣的飛行員已在空中接戰，整個亞洲市場人心惶惶。在上海花旗銀行，企業放款部門職員多半是廿歲出頭的女性，她們聽說兩岸敵對態勢已經爆發，興高采烈。這些女職員的確有時間發揮愛國精神：中國的經濟正在走下坡，她們雖然在美國最大的商業銀行服務，但業務卻是門可羅雀。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言，收回香港與澳門易如反掌，但台灣可就另當別論。你不必通曉北京話，也能了解電視上這位中國將領在說什麼，反正他的話語也沒有多大意義。他傳達的訊息在於那雙兇悍好戰、炯炯有神的眼睛；他的手在空中用力揮舞，指天畫地。素來立場強硬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張萬年，這回是真的生氣了，但是在傳送到全世界的電視畫面中，張萬年看起來像個小丑。大家都知道中國沒有能力入侵台灣，至少無法以傳統戰爭方式入侵。在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台灣完全有能力捍衛自身疆域。

北京一心要將台灣納入版圖，同時還想染指南海諸島，範圍廣及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汶萊與越南的海岸線。中國宣稱擁有南海諸島的主權，其根據是可以回溯到西元前的海上探險事業。但是這種說法荒唐可笑，尤其是中國早在15世紀中葉就開始從海洋撤退，毀棄艦隊。中國對台灣的領土主權宣稱也十分薄弱。清朝與日本在1895年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永久」割讓給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國民黨政權在1945年接收台灣。從事實面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未統治過台灣。

國民黨被毛澤東擊敗後，由蔣介石率領於1949年撤退至台灣，總算在內戰中還留下一塊棲身之地。蔣介石早期對台灣施行高壓暴虐的統治，與其對頭毛澤東不相上下。這一點不足為奇，因為落敗的國民黨與勝利的共產黨是同一個模子印出來的，它們原本都是列寧式政黨。

但是在邁向千禧年的同時，情勢卻出現饒富興味的轉變，國民黨在1990年代開始民主化。中國大陸的政治異議人士銜鐐入獄，台灣的異議人士卻競選總統。2000年台灣總統大選民主進步黨候選人陳水扁，曾在1986年因毀謗國民黨政治人物而入監服刑。1985年，他的妻子在一場神秘車禍之後終身癱瘓，許多人認定那場車禍是國民黨幕後教唆。民主進步黨成立還不到14年，但是在總統大選開票之夜，陳水扁在台北街頭對著廿餘萬名支持者，滿面春風，慶祝勝利。他在就任總統之初，受到國民黨與其他勢力掣肘，日子恐怕不會太好過，但2000年3月這場大選已經是歷史性的一刻。

歷史的確會重演，但是有必要經常重演嗎？北京的領導在歷史重演時一定是扼腕不已。他們再一次試圖影響台灣，不過結果卻適

得其反。北京那些領導人到底在想什麼？這應該不會是文化的問題，因為兩岸都是中國人。如果中共幹部對台灣人民一無所知，憑什麼癡心妄想統治台灣？北京當局一開始是訴諸武力。1996年，台灣首度總統直選前夕，解放軍對台灣海域進行飛彈實彈試射，試圖說服台灣選民不要支持北京當局認定的分離主義者李登輝。美國方面的反應是出動航空母艦，台灣選民的反應則是讓李登輝大獲全勝，使他成為中國五千年歷史上第一位經由民主程序直接選舉出來的國家元首。到了2000年，北京發出最後通牒，對台灣發射「紙上飛彈」，試圖阻止陳水扁當選，結果又事與願違。這場選舉歷史意義重大：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出現政權的民主轉移。中國總理朱鎔基事後只能支吾其辭，蔑稱台灣這場選舉是個「笑話」。

這場選舉絕非笑話。巨大的螢幕上一個身份不詳的女子，她的聲音沙啞，但是傳達的訊息非常清楚。大選之夜，她在台北市的慶祝大會上說：「台灣人民說話了！」那天晚上的台北街頭就像除夕夜的紐約時報廣場，只不過多了數百萬幅旗幟，而且人聲鼎沸，震耳欲聾。陳水扁是這場總統大選中唯一在台灣土生土長的候選人，他也代表與過去徹底決裂的力量，過去50年的國民黨統治一直是以大陸為政策導向。台灣人民的確說話了，說出他們身為台灣人的認同感，以及他們對中國人、中國共產黨與其他勢力的抗拒。

台灣以自身文化與歷史為基礎，正發展出嶄新的面貌。最令北京當局憂心的是：台灣會在世界上走出自己的道路。蔣介石的國民黨在1945年接管台灣之後，無情打壓本土文化。但是在今天的台灣，本土事物蔚然成風，出身台灣本土的李登輝與陳水扁先後當選總統，更暗示了台灣未來的走向。中華帝國邊緣的人民想要過自己

的生活，台灣一連串選舉的結果尤其令北京當局怵目驚心，因為台灣人和藏人與維吾爾人不一樣：他們是中國人。

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如果北京當局願意賦予藏人與維吾爾人實質的自治權，他們會找到調整適應之道，畢竟過去兩百年來，他們大部份都是中國的一份子。然而中共習慣於干預控制，今日中國遭遇的動盪不安都要歸咎共產黨。至於台灣，對於曖昧不明的現狀，台灣人顯然已安之若素。從實務層面來看，中國大陸與台灣其實已運作出了一套調整適應之道。

雙方甚至連軍事衝突都可以行禮如儀。1973年，台灣陸軍新授階的少尉何平憲對此知之甚詳。何平憲個頭矮小，聲音沙啞，總是笑臉迎人。他的職責輕鬆，手下只有幾名士兵，不時要騎車或步行環繞駐防地馬祖，巡查前線崗哨。何平憲處身於冷戰年代的眾多戰線之一，一旦戰事爆發，他完全沒有生還希望。馬祖距離中國大陸福建省只有十餘公里，多年來中國不斷以擴音器隔海發動宣傳戰。不過何平憲很清楚，雙方不會在他服役期間開戰，因為中國與台灣顯然已達成默契：每逢雙數日，馬祖會炮擊對岸的福建幾個小時；奇數日則相反，輪到中國炮擊馬祖；從晚上7點到9點，何平憲會隨著部隊進入混凝土碉堡，吃吃喝喝打發時間。堅固的碉堡足以抵擋炮彈，這些炮彈會爆炸或是裂成四片，散播出大量傳單（軍方菁英的「政戰特遣隊」負責收集傳單）。中國與台灣之間的衝突——如果這樣可以稱之為衝突——可謂節制有度。

何平憲早已退伍，他現在是一位金融專家，不過仍然勤於閱讀歷史。他說：「當年毛澤東改變國號國旗，鑄下大錯。」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建者在1949年時，沒有為了突顯自身勝利而改變國

號國旗，那麼今日的台灣從表面看來就只是中國的一個省。中國政府與世界上大部份國家都有邦交，並且被視為中國的唯一代表。北京應該會樂見「中國的」國旗在台北飄揚，而且台灣政府與北京政府使用同一個國號。這樣一來，在共產黨最重視的表象世界中，所有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台灣人民其實不很在意他們的政府是否被認定為「中國」，而且大體而言，他們並不追求獨立（陳水扁為了勝選，不惜放棄台獨言論）。但是北京當局卻逐漸將台灣推離北京的勢力範圍。中國不時發出嚴峻的戰爭威脅，反而讓愈來愈多台灣人深信必須追求自身的主體性。因為毛澤東的決定，中國與台灣從此飄揚不同的國旗；現在又因為毛澤東繼承人的作為，台灣人開始醒悟他們必須建立自己的國家。

於是真相便不足為奇：台灣任何一個主要政治團體都不希望台灣被一個殘暴、不民主、經濟衰頹的國家吞併。台灣已經走過那段坎坷路，不想再回頭。當然中國是有進步，但是社會更為先進的台灣也不斷向前行，而且速度遠比中國快。憑什麼要台灣加入一個已經是日薄西山的帝國？台灣人民現在——也許已經成為過去——仍安心地認定，兩岸情勢從1949年以來沒有任何變化。中國的戰爭侷蹙並不管用，為何北京當局還要不斷重施故伎？難道中國沒有其他的問題要解決嗎？

因此台灣就像其他北京當局鎖定的敵人一樣，正在分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注意力。近來中國的外交政策著重於大力宣揚「回歸」的偉大使命。台灣令中國朝思暮想，但是卻因此衍生出一幅可怕的景象：龐大的獨裁政權威嚇弱小的民主國家。對一個泱泱大國而

言，這種形象並不值得；透過傳播，中國等於是在世界各國首府與民眾的客廳之中，以這種形象自我貶抑。

1999年澳門回歸中國之後，江澤民逐步昇高對台灣的言辭撻伐，如果他始終無法履行諾言，會有何後果？收回台灣應該是江澤民最重視的功業，他會不會為了歷史地位鋌而走險？邵培德（Patrick Taylor）說：「中國領導階層為了主權問題會不顧一切，不惜衝過懸崖，低估其決心將會非常危險。」邵培德在1993年至1997年之間任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駐北京辦事處主任。在軍事防禦上有一句老生常談：要判斷對手的實力，而不是對手的意願。但是在台灣問題上，當考慮戰爭風險時，我們必須判斷中國的意願而非其實力。中國為了內部政治因素，絕對有可能發動一場無法取勝的傳統戰爭。

江澤民為了爭取解放軍的支持以鞏固其政治地位，已經讓解放軍高層將領在對台行動上取得更大的自由。解放軍原本應該是對黨中央奉命唯謹，不得逾越，但現在卻坐擁涉及台灣外交政策的主導權。1996年，解放軍明顯壓過不贊成對台灣耀武揚威的外交部，一躍而成為決策者。制定現在中國眾所週知強硬路線的人士，正是當時聲色俱厲的總參謀長張萬年與國防部長遲浩田。

1996年3月，美國派遣航空母艦馳赴台灣周邊海域，解放軍將領遭到羞辱，彷彿又回到西方列強砲艦外交的年代。如今這些軍頭一心要討回面子，而且很可能會將中國帶向採取行動的邊緣。情勢最不樂觀的一面就是：由於軍方對於台灣不肯就範大感憤怒，江澤民掌控軍方的能力正逐漸削弱。2000年台灣大選之後，解放軍又獨斷獨行，再次以核子戰爭威脅美國。

如果毛澤東還在人世，他會把江澤民同志好好教訓一頓：制定國家政策的機構應該是黨而不是軍隊。事實上，解放軍已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私有軍隊，其將領不必對國家負責，而是對中國共產黨負責。但是一遇上台灣問題，黨實際上已無法發號施令。等到江澤民下台幾年之後，他的繼承人無論是誰，都將更受制於鄧小平所稱的「鋼鐵長城」——人民解放軍。

這些問題對中國會帶來無窮後患：中國不斷將珍貴資源投注於解放軍現代化，而且逐年增加，然而這些經費原本有其他更適切的用途。毛澤東裝備落伍的農民軍隊在1949年擊潰蔣介石遠佔優勢的大軍，充份顯示精神可以戰勝鋼鐵，但是現在解放軍相信他們要憑藉鋼鐵才能夠奪回台灣。昔日不可一世的解放軍已經了解，他們面對現代化戰爭時容易暴露。因此一有機會就想爭取軍隊支持的江澤民，自然會大力支持各項軍事科技發展，並撥下大筆經費進行解放軍現代化。中國軍事預算攀升的速率愈來愈快，從官方數字來看，2000年的軍事預算增加了12.7%，2001年更達17.7%，兩個數字都超越了當年度的經濟成長率。但是中國軍事預算成長幅度到底是多少，只有中南海的領導人知道，因為中國大部份的國防經費都是隱而不顯。無論中國投下多少鉅款，這是它運用國家經費應有的方式嗎？

絕對不是，然而中國共產黨一遇到台灣問題就亂了分寸，只想訴諸武力解決。令中共領導人如坐針氈的不只是台灣水漲船高的獨立傾向，令他們畏懼的也不只是台灣的民主化會擴散至中國。還有一件事正困擾共產黨：他們愈來愈感受到自身大限將至。共產黨曾經像法輪功那樣蓬勃發展，但好景不常。共產黨親眼見證國民黨的

崩潰，現在開始擔心自己將重蹈覆轍。共產黨已經是一部老舊的機器，不再能像以往那樣主宰中國社會。

共產黨對台灣的「分離主義者」口誅筆伐、文攻武嚇，但是這種做法在世界上愈來愈惹人厭憎，而台灣日漸茁壯的民主政治卻得到國際支持。國民黨早已失去中國大陸，遲至1991年終於完全面對現實。共產黨奪取台灣的企圖也是屢戰屢敗，但不幸的是，它至今仍無法接受這項事實。而且只要共產黨繼續執迷不悟，它日暮窮途的作法都潛伏著危險。共產黨在擁抱經濟現代化的同時，還有許多包袱要揚棄，至少要做到實質的揚棄。現在共產黨仍堅守民族主義，做為其政權合法性的基礎，而且在升起民族主義的大旗之後，台灣地位問題對他們而言更形重要。

毛澤東曾對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表示，中國可以等上一百年再統一台灣。但是今天毛澤東的繼承人不認為時間有那麼充裕。因此危機在於，北京領導人的行為會愈來愈躁進，終將把自己逼入死巷，被迫發動一場不可能以傳統武力取勝的戰爭。台灣2000年大選揭曉後的第二天，北京就是往這個方向走，關閉兩岸協商的大門，宣稱台灣當局必須先認同「一個中國」原則，中國才願意重開談判。換言之，中國要求台灣未談先降。因此你不會再看到朱濤上場；這名解放軍士兵在1999年澳門回歸中國的典禮上升起中國國旗，兩年半之前，他也曾在香港執行過同樣的任務。但是台灣可不想讓朱濤——抑或朱鎔基——也來台北舉行升旗典禮。

的確，中國可以憑藉武力征服台灣，但是就中國目前的軍力來看，解放軍必須動用核子武器才能夠取勝。而且無論是對台灣發動何種形態的戰爭，中國本身必定會淪為受害者。毀滅你的鄰居就是

毀滅你自己，達賴喇嘛說得沒錯，戰爭會使中國經濟倒退數年甚至更久，可能會比天安門屠殺事件後的亂局更嚴重，當時外國投資者紛紛逃離中國市場。除了盟邦北韓之外，中國將遭到國際社會排斥，在這個互動密切的世界中忍受孤立。

然而中國對於和平前景興趣不濃。現在全世界都知道北京無法逼台灣就範，但中國人民不斷被共產黨強大的宣傳機器鼓動，一旦他們明白台灣已經一去不返，會有什麼後果？1996年與2000年，中國兩度以最嚴厲口吻恫嚇台灣要發動戰爭，但兩次到最後都是偃旗息鼓。如果北京政府第三度威脅動武然後又草草收場，這個政府還能存續嗎？中國人民一旦再次受到羞辱，認定政府沒有能力保護祖國，過去兩百年的歷史就會重新上演：人民將起而反抗國家領導，剛開始是默默進行，然後聲勢逐漸壯大。一個中國偏激份子在网上聊天室中留下這樣一段話：「如果共產黨沒有反應，我將走上天安門廣場自戕，促使國家採取行動、瀕嘗國恥！」

其實情勢還有轉寰餘地，中國面臨的問題層出不窮，共產黨領導應該維持兩岸的現狀，而這也正是台灣人民的期望。但共產黨還是要自尋煩惱，加重負擔，把焦點鎖定台灣，反而耽誤了更為迫切的內部改革。

在1999年邁入2000年之際，達賴喇嘛接受咄咄逼人的電視節目主持人賴利·金（Lary King）訪問時，以溫和的態度昭告世人：人類是一個整體，或者至少應該是一個整體。也許這正是在一段年代即將結束時，人們最需要的訊息。達賴說：「我認為跨入現代之後，世界變得愈來愈小，因此將『我們』與『他們』截然二分的觀念是錯誤的，整個世界就是一個整體。」然而並不是每個人的心胸

都是如此寬廣；例如陳水扁在就職演說中說：「台灣站起來，讓人不禁聯想起50年前的一場似曾相識的演說。台灣人民的確是站起來了，等到時機恰當，中國其他的敵人也會站起來。」

化恐懼為憤怒

「對許多人而言，中國代表全球化的所有弊端。」珊卓·史密茲（Sandra Smits）繼續說道：「為什麼美國民眾一定要買無辜中國人民血汗製成的商品？你知不知道西藏發生過什麼事？」史密茲說出許多人對中國的觀感，她是西雅圖街頭一名示威者。1999年年底，世界貿易組織在這裡舉行會議。當經濟學家與企業家在會場聚精會神討論「相對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的觀念，像史密茲這樣的人士卻提醒我們：中國絕不只是個貿易夥伴。當時西雅圖街頭充斥激進份子，但是史密茲的想法獲得廣大迴響，連那些沒有參與示威的人都心有戚戚。

我們可能要以一篇專文——甚至一本書——才能徹底分析史密茲的尖銳看法。但重點在於，在世界上眾多國家之中，只有中國才會引發如此強烈的情緒反應。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會長柯白（Robert Kapp）說：「誰還會談起……1968年在墨西哥城曾有示威者遭到鎮壓？沒有人會談這些事。」柯白言之成理，他也觀察到中國的確是帶有一種「樹大招風」的特質。

柯白說得沒錯，但是他忽略了更嚴重的問題：中國之所以會成為眾矢之的，北京當局是咎由自取。從西藏高原到北京街頭，中國呈現的形象在在令人厭憎。北京政府高幹明明有嚴重的經濟問題亟待處理，他們還是在在攝影機前面板起臉孔，要我們相信溫文儒

雅的達賴喇嘛會威脅世界秩序。誰又能責怪珊卓·史密茲這麼激動？當前中國需要各種幫助，但是就連急欲到這裡做生意的國家，也無法完全接納現今中國的國家體制。

就算外國政府一致伸出援手，也無法挽救毛澤東的共和國免於被人民推翻的厄運。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完結篇殺青之後，發生在四川工業城攀枝花的事件應該已經被人淡忘。換做是其他情境，這事件可能就是引發政權崩潰的火花。1999年10月8日，攀枝花的交通路政崗亭完全沒有預警。一位外省商人劉華偉遭到三名搶匪打劫，向崗亭求救，結果值班的公安竟然將他推出崗亭。劉華偉被歹徒打成重傷，憤怒的群眾隨即包圍值班的公安，到當天晚上已聚集達兩千人。當局的反應是增派五百多名武警，對示威群眾發射催淚瓦斯，群眾則用石塊磚頭還以顏色，縱火焚燒三輛警車，暴動一直持續到第二天早晨。

在一個連來自鄰近城鎮的人都會被視為異類的國家，這種因為外省人士而爆發的示威抗議事件格外引人矚目，提醒我們中國有多麼不穩定。動輒點燃暴動的憤怒，也會在轉眼之間消失，但憎恨仍潛伏在攀枝花與其他數以萬計的都市、城鎮與鄉村之中。中國幾乎每天都會發生示威活動，只不過國家表面上仍是風平浪靜。從沿海大城市到首都北京，似乎大多數人都各安其位。中央政府大員經常大談「穩定」，令人厭煩；然而真相卻是：他們對國家安全的憂慮其來有自，全中國到處都是攀枝花這樣的城鎮。

近來中國人民也愈來愈明目張膽，令人回想起天安門大屠殺的序幕——1989年的北京之春。那時當局殘暴鎮壓廣場上的異議份子，或監禁或放逐，的確讓抗議行動暫時消聲匿跡。但是日復一

日，不滿的徵兆又再度浮現。今天中國四處可見憤怒與反抗。廣州一名計程車司機在叫車的無線電頻道上說：「努力工作有什麼用？反正共產黨就是要剝削咱們。」在熱鬧繁華的廣州，隨處都聽得到類似的牢騷，突顯出人民大膽白白的全新心態。

很多人不再害怕，是因為他們已經沒有什麼好顧忌。徐小英是四川省都江堰風景區賣礦泉水的小販，當旁人警告她有巡邏公安朝她走來時，她說：「我不怕，反正國家已經不再照顧我。」徐小英原本在一家製造建築機具但經營不善的國企工作，如今失業。在她家鄉最有名的觀光勝地——座西元前3世紀修建的灌溉防洪系統，徐小英已經連續兩天因為賣礦泉水遭取締。當局根本不準徐小英這類小販靠近觀光客，但是她對眼前即將發生的事一無所懼。昨天市政府從徐小英破舊單車的小籃子裡沒收了幾瓶礦泉水，她不知道今天這步步進逼的公安還會對她做什麼，她也毫不在乎。當年輕的巡邏警察陳吉修來到，徐小英擺明反抗態度。陳吉修以四川話嚴厲命令她不准說北京話，免得週遭遊客聽懂他們的對話，但徐小英回答：「我就是說北京話，我要讓外國人都聽到。」

造成國家安全最大威脅的不滿情緒，其實並非源自宗教、種族或地域，而是源自於經濟。改革造成數千萬人失去工作，像徐小英這樣的遭殃者深受經濟結構變化之苦。在任何一个時刻，中國都有七千萬到一億三千萬人流離失所，尋找工作。將失業與隱藏性失業人口加總計算，人數無疑超過兩億。而且北京當局一味打壓其他的氣功「邪教」，失業人數又會繼續攀升。例如北京對「中功」集團的迫害，就導致近一萬人失業，因為多家中功相關企業被緊張過度的當局強制關閉。

當北京還在為想像中的敵人小題大作，中國卻遍地都是工人抗議事件；有的是工作多年得不到酬勞，有時是單純的勞資糾紛一發不可收拾。工會在這個號稱工人天堂的國度中沒有生存餘地，因此也沒有機制可以疏導勞工的不滿情緒。當工人受到委屈，他們會滿腹怨恨，有時不惜走上街頭。一旦工人走上街頭，當局通常會訴諸效果短暫的強力鎮壓。那些被國家壓制的人懷恨在心，今天他們還敢怒而不敢言，還沒有像法輪功信徒一樣形成全國性的組織。但是等到工人學得法輪功的策略，同心協力前進，他們將成為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

形成威脅的還不只是失業人口，中國的新經濟衍生出許多受害者。在法輪功信徒包圍中南海的前一天，這個共產黨領導聚居之地就發生了一樁請願事件，事件導火線是「新國大期貨經紀有限公司」遭公安部門強制關閉，原因是該公司主管侵吞四千多名客戶的資金之後潛逃，因此這些客戶要求國家補償。1999年4月的那一天，北京政權運氣不錯，一名官員收下請願書之後，群眾和平離開中南海。但是第二天登場的李洪志門徒就沒有那麼容易打發，中國政府與他們纏鬥至今。

特殊教派信徒、基督徒、藏人、穆斯林，還有台灣人——中國政府一次能對抗多少敵人？又能對抗多久？當大限來時，共產政權將迅速崩潰。正如捷克總統哈維爾所說，極權社會表面上看起來永遠是固若金湯。這位從異議份子蛻變成政治家的詩人說：「每個人似乎都矢志效忠，政權將繼續統治數百年，任何事都不會改變，大家很容易對這一切信以為真。」然而，到了某個時刻，表象將出現裂縫，然後迅速徹底瓦解。「原本並沒有任何人組織示威活動，經

過的人就這樣變成示威者，擠滿了布拉格的大廣場。」哈維爾如此描述捷克首都布拉格發生的事件，同樣的場景也可能出現在攀枝花——後來還真的出現在莫斯科。1992年，美國前任總統尼克森回憶道：「在1959年我和赫魯雪夫的那場辯論中，也就是世人所稱的『廚房辯論』，赫魯雪夫用手指戳著我的胸膛說：『你的子孫會生活在共產主義之下。』而我回答：『你的子孫會生活在自由之中。』當時我確信他是錯的；但是，老實說，我對自己的講法並沒有十足信心。然而過去的三年——特別是1991年的局勢發展——終於證明我是對的，因為赫魯雪夫的子孫如今正生活在自由之中。」

東歐人民也是如此。1989年，蘇聯衛星政權一蹶不振，當人民的恐懼化為希望，政權就此垮台。在中國，當人民的恐懼化為憤怒，北京政權也會崩潰。這場革命不會是溫和的「天鵝絨革命」，流血勢不可免，因為從鬥爭中誕生的共產黨不會風度優雅地下台。革命也有可能要等到冷漠轉變為希望才會爆發。今天有許多人還願意支持現在的執政者，是因為他們擔心下一批領導人可能會更糟。作家戴晴說：「我仍然支持現行政權的唯一原因，就是任何推翻他們的人都會重施他們的伎倆。」因此，儘管今天中國人民還能忍受現行政權，但是如果給他們更好的遠景，人民將會起而追隨。

今天，在中國的某個地方，有某個人，這個人未來將終結中國現行的國家體制。他或者她，會勇敢說出大部份人不敢說或還未成形的思想。這個人可能是因為憤怒、精明，或者只是因為絕望，將藉其人格或理念的力量，領導中國人民追尋更美好的未來。中國已是一片燃油之湖，而這樣的一個人，無論他身處小城鎮抑或大都市，他要做的只是丟下一根點燃的火柴。

第三章

工業恐龍谷

國企垂死掙扎

美國只有一家克萊斯勒，中國卻有許多家。

——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史坦菲（Edward Steinfeld）

這地方是一個鄉下城鎮，在大馬路口附近，一部向北行的巴士只稍微停頓一下，就在街道上放下乘客。裝有馬達的三輪車一馬當先，蜂擁而至，其他人力踩踏的三輪車也輾過破舊的人行道湊上來。塵土飛揚中，五部車子圍住兩名南方來的旅客，五個車伕異口同聲問道：「客人要搭車嗎？」他們拚命向前擠，爭取賺錢機會，而且不達目的絕不罷休——至少在一兩分鐘內不會罷休。幾個車伕放棄了，其他車伕又湊上來，問著同樣的話。第二波車伕更為堅決，其中大部份是女性，面孔凍得通紅，看起來都十分蒼老，儘管其中一些不過卅歲出頭。

貧窮的如舉瀕臨黃海，位於富庶的江蘇省。如皋周遭環繞著一小塊一小塊的個體農場，這座一度相當繁榮的城市，如今正受失業浪潮的衝擊，因為國企一家一家陷入困境。一位六十多歲的老先生解釋道：「他們都是『下崗』工人。」老人指的是三輪車伕，他們最近才被國企暫時解僱。這些人其實已經算是失業，因為重回工作崗位的機會十分渺茫。老人已經退休，搭車的錢得省下來，所以他選擇走路。不過他倒是建議外地訪客雇一輛三輪車，遊覽如皋少有人注意的破敗市區。在多年繁榮之後，如皋現在是一窮二白。市區中幾乎找不到計程車，下崗工人的三輪車佔據了馬路。

「客人要搭車嗎？」又一名車伕經過時問道。近來在中國到處都聽得到這句問話。那是因為國企病入膏肓，工人的生計岌岌可危。自從中共不再密切監控人民的生活，失業人數就很難確實統計。2000年中國都市地區的失業率是3.1%，與過去3年一樣——至少官方數字是如此呈現，但真正的失業率恐怕是這個數字的6倍，甚至更高些。無論如何，近年來失業人口必然有增無減，因為中央政府的統計數字告訴我們，超過30%的國企工人處於閒置狀態，而且中國進入WTO之後，問題會變本加厲，嚴酷的競爭環境將迫使經營不善的國企關門倒閉。

當工人失去工作，他們會走上街頭。過去的示威者是成百上千，現在則是成千上萬。2000年2月，遼寧省的楊家杖子礦場關閉，兩萬名工人偕數千家眷起而暴動，一直到解放軍出動，這個北京東北方400公里遠的工業城鎮才恢復秩序。外面世界本來不應該知道楊家杖子事件，這消息一度被封鎖，我們每星期都會聽到示威的消息，實際發生頻率顯然更高。

中國核心問題在經濟，經濟問題的核心在於國企。它們是中國工業生產力的骨幹，而且至今仍是中國規模最大的企業與僱主，現在它們麻煩大了。意識形態與政治的糾結，阻斷了中國企業改革之路。這些企業儘管病情嚴重，但是年復一年抗拒改變，無怪乎北京將國企改革比擬為「攻堅」。

中國的國企曾被稱作是「全世界規模最大、內容最精彩的淘汰工廠與設備收藏展」。這個說法其實低估了情勢的嚴重性。在廿餘年改革嘗試之後，今日國企仍然在製造中國面臨最嚴重的問題：它們浪費珍貴資源，扭曲政策方向，危害金融體系，造成工人苦難。

抗拒改變

麻雀回來了。毛澤東時代中國將麻雀列為「四害」之一（另外三害是老鼠、蚊子與蒼蠅），在1950年代的大躍進運動之中被無情捕殺。但是今天中國當局已經了解這種小動物對農業的貢獻，並推動復育工作。

但是另外一種瀕臨絕種動物——國企——可就沒有那麼幸運。麻雀在中國面臨絕種，是因為遭到過度捕殺。然而國企正好相反，它們是因為受到過度保護才會瀕臨絕種。這些中國工業界的龐然巨獸缺乏改革的誘因，並沒有因為時代變化而出現多少演進。

毛澤東時代發展出的國企觀念，不僅要提供工作，而且是最主要的社會福利機構。「鐵飯碗」制度扭曲了企業目標，迫使它們同時扮演經濟行動者與類似政府的社會福利機構。工人的盤算很簡單：以低工資換取終身雇用與無所不包的社會福利（房屋、醫療、學校、工作）。每家國企都自成一體，其實根本是一座企業

城鎮。從第一個五年計畫到毛澤東死亡為止，超過23年，中國的作法就好像「相對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集中力量於自身最擅長的領域，追求最大經濟效益)觀念根本不存在。北京當局漠視經濟基本原則，後果就是創造出數以萬計、千奇百怪的「工業主題樂園」——國企。

外界認識的「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簡稱「中國石化」，SINOPEC)是一家以中國南部與東部為基地的綜合性石油公司。事實上，這家龐大企業旗下的工廠還生產牙膏、衛生紙等產品，供應其煉油廠員工需求，這些員工都是在大體上自給自足的社區中工作與生活。中國石化的確是龐然大物，《財富》(Fortune)雜誌將它列為第三大雇主。但「中國石化」的名次正在下滑，幾年前它還是第一大。如今的第一大是它的競爭對手「中國石油」(CNPC)。事實上，財富雜誌所列的世界十大雇主中，中國就佔了七個。

在一個閉關自守、與世隔絕，而且烏托邦式工業組織觀念主導一切的國家中，國企還有生存餘地，它們就像是工人過剩的孤立公社。但是在其他任何類型的社會中，這種經營模式根本行不通。中國石化與中國石油在開放外資認購其股份的籌備過程中，不約而同地進行重整，將旗下「非核心」資產——例如牙膏與衛生紙工廠——與股票公開上市的子公司分割開來。毛澤東的經濟發展模式在今天已經被棄若敝屣，其實恐怕老早就被揚棄。中國石化與中國石油各自分割之後，至少能讓新上市的子公司專注於原油探勘、煉製與行銷，但是那些坐擁無用資產的企業要怎麼辦？

國企抗拒變革的另一個原因在於，它們是為了國家的利益而經營；或者更精確地說，它們是國家的延伸。儘管中國已努力多年，

試圖畫分政府與國企的角色，但是兩者之間的界線，以最樂觀的字眼來形容仍是「模糊不清」。「四川金頂(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的遭遇正顯示出，在實務層面，政府與國企之間的界線有時根本不存在。

四川金頂以製造水泥為主業，總部位於四川省樂山市，創立於1988年，是將一家國企改組而成的股份有限公司。根據四川金頂前任董事長白德華的說法，改組的目的是要「儘可能讓我們和政府分隔開來」。因此四川金頂在1993年遠赴上海證券交易所申請股票上市，公司有高達41%的股份是由證券市場投資者持有，不過這個事實對於四川金頂的經營幾乎毫無影響。四川金頂9名成員的董事會是由樂山市的黨政官員掌控，因此當這些官員有所要求，身兼樂山市委副書記的四川金頂現任總經理古松，根本無力拒絕。

而且樂山市的官員做出要求時毫不客氣，他們強迫四川金頂在1997年底接管「大渡河煉鋼廠」，當時這家國企正因為積欠薪資而引發工人暴動。在這之前，北京的一個部會已經要求四川金頂接收遠在山東省的3家水泥廠。其他四川金頂被迫接收的企業還包括一家礦泉水工廠和一家水泥廠(因為它位於一名高幹的家鄉)。當時白德華還是樂山市的副市長，四川金頂成了樂山市的搖錢樹，因此其他幹部紛紛對四川金頂做非份的財務與其他各種要求，後來白德華乾脆辭去副市長一職，以退阻官員對公司的剝削。

「政府透過經濟、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措施來管理國家經濟，但是不會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與管理。」中共如此描述它的理想世界。然而，四川金頂的遭遇才是真實情況。在中共的理想世界實現之前，事事干預的官員——通稱「婆婆」——仍將繼續扭曲國企的

商業活動。

國家與國企之間的界線儘管模糊，但是比起黨與國家的界線，其實還算是相當清楚。雖然由鄧小平發動的改革已經進行廿餘年，但不足為奇的是，角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難分難解的中國共產黨，依舊掌控國企的經營階層。鄧小平崇尚改革，但他只把改革當作是維護黨生存的手段。現任國家主席江澤民，更堅持黨對國企的掌控。

當健全的經濟管理能密切配合共黨教條（這種情形確實會出現，特別是現在黨試圖改革國企但要避開私有化），變革會迅速啟動，或者至少和中國其他的變革一樣迅速。另一方面，遭到中共反對的改革，若不是根本胎死腹中，就是要經歷漫長的鬥爭與妥協之後才會實現。

雖然中國在毛澤東死後發生過許多變革，但是黨、國家與國企之間，還是無法劃清界線。需要證據嗎？四川金頂前任董事長白德華，是同時由樂山市委與國有資產管理局任命，他要向誰負責呢？優先順序如何？只要黨仍掌握人事任免大權，國企的主管仍舊會傾向於遵從黨的政策，市場法則與現代企業經營的要求則被拋諸腦後。

國企是主要的社會福利機構，被當作國家的延伸單位來經營，同時也是共產黨干預的目標。但是還有一個比其他原因更重要的原因，足以說明為何國企抗拒改革。這些企業——特別是大型國企——生存於其中的體制不可能讓它們垮台；因此，就實務層面而言，這些企業也不可能成功。北京當局鑄下最大的錯誤，就是不敢讓國企倒閉。在二十多年改革之後，今天仍有部份國企寧可不要獲利，

以求繼續接受政府補助，因為企業一旦營運健全就拿不到補助。

國企頭頭們深知中共不敢讓重要企業倒閉，黨不僅需要國企進行生產與雇用勞工，這些企業更在本質上維繫了黨的生存。國企就是中國共產黨名號中的「共產」二字。中國並沒有去發展「道德風險」（moral hazard）觀念，而是直接將這個觀念奉為金科玉律。

大體而言，中共領導人比誰都更了解：除了少數例外，國企難以經營。共產黨目前正在主持全世界規模最大的「跳蚤市場」——出售許多家國企。但是中共無法承認自己正在進行私有化，否則等於犯下教條錯誤，在依恃理論才能夠解釋為何自身必然勝利的社會主義體系中，教條錯誤更是一項罪惡。中國最有興味的政治思想家曹思源對這個無法可想的難題倒是別有妙策：將中國共產黨改名。除非真有改名的一天，否則黨員還是會繼續昭告天下：至少從教條上看，他們是沒穿衣服的國王，或者更精確地說——沒穿衣服的幹部。

在這同時，深陷理論困境的中國領導人，會年復一年地糟蹋珍貴的國家資源。在早年中國，資源分配不當倒不是什麼嚴重的問題。毛澤東苦戰之後拿下了一個凋敝破敗的國家，中國從1912年清朝覆亡以來，動亂與內戰連綿不絕，接著又是外敵入侵與殘暴佔領。1949年毛澤東的農民大軍揮師北京時，中國已是遍地廢墟。後來當國企成為快速工業化的利器時，唯一的考量就是增加生產。國企主管的績效高下，端視他是否能完成中央政府規定的生產配額，以及是否能提升生產性（工業）資產的價值。至少從理論的觀點來看，工廠經理的任務非常單純：生產、不斷生產。

二十多年的經濟成長與外資湧入之後，中國已經生產太多全世

界都在生產的商品，但是老舊的體制與思考繼續墨守成規。近年來，生產過剩要佔去每年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率的2%到3%。而且生產過剩的代價高昂，不符合經濟原則，甚至很不理性。然而中央政府為了創造就業機會繼續鼓勵生產過剩。國家以補助支撐這個效率極度低落的體制，與此同時，北京當局也警覺到問題，開始尋求改革。

現在大家認定，國企應該像一個理性的經濟行動者一樣運作。國企不再是工廠，而應該是——至少在理論上是——現代企業（因此必須在經濟面自給自足）。然而問題在於：國企無法獨立生存。中央政府開出解藥，諷刺的是——甚至有點悲哀，這帖解藥只會讓病情更加沉重。

北京為了邁向更現代化的經濟形態，不再直接補助，而以國有商業銀行的融資貸款代替，現在國企吞噬掉高達70%的國內貸款。當局的理論是，國企會像其他現代企業一樣償還貸款。這種想法有其道理，以貸款取代政府補助，應該能讓國企主管更具財務責任感。中央政府的補助是獎勵，但貸款——無論條件有多優惠——可是要償還的。在觀念上，只要假以時日，國企將不再仰賴政府的直接支援。

這些都是中國國企改革應走的進程，但事與願違，北京當局以貸款取代補助的政策並未奏效。大型國企顯然已經發覺，其實銀行貸款是可以不必償還的，而且這個觀點還相當正確。國有銀行對於國企的貸款前仆後繼，舊貸款一到期，新貸款立刻跟進。銀行有時收得到利息，有時望眼欲穿。反正大型企業總是能得到源源不絕的貸款，因此國企主管已經將這些貸款視同以往的政府補助。大部份

國企只有在迫不得已、別無選擇的情況下，才會勉強償付貸款。

「鞍山鋼鐵公司」的例子說明了中國銀行業的困境。「鞍鋼」是中國第一家鋼鐵公司（直到最近，都還是全中國最大的鋼鐵公司），也是國企病入膏肓的典型病例：鞍鋼用的是1950年代的蘇聯技術，五十多萬退休與資遣員工嗷嗷待哺，數十億人民幣的債務尚未償還。不過對銀行業而言也有好消息，鞍鋼太龐大了，國家不會坐視它垮台。包括江澤民、朱鎔基在內的中央領導人，不時走訪位於東北重工業地帶中心的鞍鋼，為它代價高昂的現代化工作加油打氣。

貸款給鞍鋼的銀行當然了解中央的用心良苦。一位銀行主管談到鞍鋼與其他國企時說：「我們怎麼能夠停止援助這些大型國企？如果我們縮手，這些企業將一蹶不振，而我們也會被拖下水。」國有銀行別無選擇，只能繼續借貸。事實上，鞍鋼既是增加國有銀行對國企貸款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也是北京當局勾消國企債務的最大受益者，它已經解除了69億人民幣（8億2580萬美元）的債務。官方媒體對外宣揚近來鞍鋼表現卓越，不過真相卻是：鞍鋼還在不斷從銀行吸納更多資金。

鞍鋼的案例顯示，中央政府正將國企的問題轉移給國有銀行。北京當局的理念大體正確，想法極其務實。就算是最樂觀的情況，國企主管（或者中央計畫官員與中共領導人）的觀點也不可能一夕之間驟然改變，因此循序漸進遂成為政策。但是循序漸進的作法無論多言之成理，付諸實行後卻是一場糊塗。現在銀行業與國企成了難兄難弟。在舊日的體制中，至少是由中央政府負責補助，並承擔維繫國企的財務風險；但是現在風險轉移到了銀行身上，結果使銀行

的債信奄奄一息。雖然這些銀行也是國有事業，但它們有眾多存款客戶，這些客戶被迫擔國企崩潰的風險：如果國企無力償還銀行貸款，銀行也將無力償還客戶。

像氧氣筒一樣，似乎源源不絕向國企輸入的資金，意謂著真正的改革其實正被一拖再拖。在周恩來宣佈「四個現代化」的四分之一世紀之後，中共領導人依然為國企改革的辦法莫衷一是。更糟的是，他們甚至還沒從錯誤中學到什麼。時至今日，中央政府官員還在呼籲放更多款給國企。改革有時往前進，有時往後退，但國企對改革的抗拒卻始終如故。

當今情勢

中國不必為它們哭泣，它表現得很好。國企大步邁向未來，獲利大增並進行重組。如果你還不放心，沒關係，因為現代中國企業正大發利市。人民日報告訴我們，中國已經取得「國企改革與發展的豐碩成果」。

你可以自己親眼看看這些成果，其實就是一些數字——政府公布的數字。官方消息宣稱，整體而言國企為國家創造利潤。1998年的利潤據稱是490億人民幣（約合美金59億），1999年大幅增加約77.7%，到了2000年更是竄升了令人咋舌的140%。這些成長都是可以預期的，因為朱鎔基在1998年升任中國第五任總理時，誓言要在3年內讓虧損累累的國企起死回生。新官上任的朱鎔基設定了嚴格的時程，對國企主管施加壓力，要他們交出漂亮的數字成績單，而這些主管也的確奉命行事。近來國企的獲利報告紛紛出現，但卻與企業實際表現無甚關聯。朱鎔基就憑著這些好消息，宣稱他在3年期限

未到之前就達成了目標。

欺騙的手法上行下效，中央政府的數據都經過修飾，刻意造成誤導。例如1998年國企獲利490億人民幣，這數據在計算時並未納入1500億人民幣（美金181億）的政府補助款，只要是會基本算術（培養共產黨幹部的中央黨校實在應該好好教這一門學科）的人都看得出来，實際數據顯示當年度國企虧損了1010億人民幣（美金122億），後續年度的數字甚至更為慘澹。我們深入探討2000年的數據時發現，國企的利潤有一半要完全歸因於世界油價上漲，使生產原油的公司大發利市；另有四分之一利潤來自政府直接補助，諸如退還加值稅以及勾銷國企近1兆3000億人民幣（美金1570億）的負債。政府官員迄今仍否認國企的利潤主要倚賴國家補助，但他們無法再混淆視聽。

國企有時乾脆造假。1999年中國財政部的研究報告顯示，接受調查的國企有89%會「捏造」盈虧帳目。根據2000年12月發布的後續查帳結果，99%的國企謊報其財務狀況。當其他所有的經濟指標都不樂觀，國企的獲利卻一枝獨秀，這種情形只有造假才能解釋。1999年中國公開上市公司——幾乎全屬國企——整體的獲利較前一年下滑，虧損企業的家數更創下歷史新高。滯銷的庫存在1999年與2000年大幅膨脹，顯然大勢不妙；閒置設備現在價值高達美金600億，而且似乎還在持續增加。正如一位觀察家所說，國企獲利增進的報告純屬「顛三倒四」。

再進一步深入檢視，國企的結構性問題將無所遁形。根據1999年的官方統計，國企佔全中國生產總值的28%，工業固定資產的53%，都市勞動力的41%。這種扭曲的比例嚴重突顯出效率低落，

真正的改革已不能再拖延。像國企這樣的體制不僅無法維繫，而且每況愈下。北京一位經濟學家指出：「國企的效率問題並沒有出現根本的改善。事實上，情況愈來愈糟。」

然而我們從來看不出高層官員有絲毫紧迫感。朱鎔基可以吹噓國企創造的利潤，但是他無法改變這些企業仍舊仰賴中央政府補助的事實。的確，朱鎔基可以挹注大筆資金支撐國企，但畢竟不是長久之計。接下來該怎麼辦？我們可以寄望朱鎔基總理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走，然而我們對他或者別的高層官員都不樂觀。他們抓著中央政府製造的統計數字，但是這些數字呈現的世界卻已經脫離現實。

在現實世界中，真正要讓中國付出重大代價的還不是國企的直接虧損、政府補助，甚至也不是來自公營銀行的「貸款」。討論國企獲利情況看不出這項最可怕的代價：為了讓國企苟延殘喘，勉強維持一個毫無經濟效益可言的體制。北京龐大的經濟計畫官僚、他們壘壘高築的貨幣政策以及繁瑣的投資審核程序等等，就是要造福國企。國企最大的弊病不在於其現行體制不合乎經濟效益，也不在於佔用原本可以讓私有企業分享的珍貴資源（雖然兩者都是事實）。國企的頭號罪狀是：為了挽救它們而建立的體制，使中國難以與世界各國並駕齊驅。官方與非官方的統計資料一樣，都還無法衡量中國為了維持這套體制而付出的慘重代價。

全面考量各項因素，國企非常明顯欠缺經濟效益。地方幹部可以偽造統計數據，北京領導也可以視若無睹，但是他們不可能逃避未來的命運。重點並不在於獲利情況，而是競爭力。等到中國加入WTO，國企將面對外國企業大舉進攻中國市場。當國企被迫要在比較公平的競技場中自力更生，沒有幾家能撐到新千禧年的第二個十

年。

除非中國出現有意義的改革。但中共的說法卻令人想起不堪回首的歷史，它將中國的「工業化與現代化」形容為「歷史上的一大躍進」。雖然「大躍進」這個命運坎坷的詞語含有向前邁進的意義，但是黨對於國企改革的報告卻年復一年，原地踏步。細部情節或許有變化，但故事本身是新瓶裝舊酒。報告中對於加強嚴格管理、努力工作的耳提面命聽來十分耳熟，但是也令人沮喪。江澤民自己在1999年說過，中國改革國企已有二十多年的經驗。

改革的計畫一提再提，相關辯論仍在原地打轉。政治思想家曹思源主張將他所形容的「心臟病患」——也就是國企——全面私有化，他認為國家應該將手中的企業股份全部出售，但北京當局早已表明此路不通。徹底終結國企才能夠改革中國經濟的觀念，高層領導無法接受。因此中國只能針對特定企業的改革來推動局部私有化，方法是引進令大多數國企感到陌生的觀念：對股東負起經營責任。事實上，國家正在將小部份股份出售給私人投資者，雖然這種作法在中國不能稱作「私有化」。

支持強化競爭與破產的人士相信，冬天不來，春天也不會降臨。他們的解決方案承諾帶來快速改革，但是必須付出痛苦代價，主要就是大量企業倒閉造成的失業問題。這類方案對中共黨內死硬派與安·蘭德（Ayn Rand，譯按：俄裔女社會哲學家與小說家）資本主義學派都頗有吸引力。前者是因為這類方案不必然涉及私有化；後者則是因為企業一旦在市場上失利，就非垮台不可。但是強化競爭與破產的支持者，進展仍然不如預期順利。北京當局奉行的企業政策是以扼殺競爭來讓企業擴大規模，大體而言，這種政策意

謂只有中央政府才能決定讓哪一家企業出局。而且當局深怕引發工人騷動，所以很少坐視企業倒閉。

修補補是推動改革的另一個選擇，在中國正風行一時，因為這種無作法符合當前黨對待爭議性事務的態度：漸進主義——其實就是讓人較能接受的「拒絕」。既然無法正面處理棘手問題，「修補」在中國不僅已成為一種藝術，而且也被提升到官方政策的層級。

在中國演變的過程中，國企改革的前景如何？至少就短期而言，修補措施依然是主流，因為苟且因循已成為國家的常態，就算中國已經進入WTO也是一樣。中央政府仍會推動改革，但進展速度決定於社會主義正統思想與實際改革措施之間的相互角力。整體的結果則是改革牛步化。近來發生的案例已讓我們了解到，為何一碰觸到企業改革，成效不佳的現象反而會大受歡迎。

1999年的國慶日，北京舉行大遊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50週年，一部花車載著江澤民不可一世的巨大照片，背景是他在1997年中國共產黨十五大會上報告的畫面。黨在那場大會邁出重要的一步：承認國家不可能挽救所有國企。因此中共決定「抓大放小」（中共的每一項重大政策似乎都有自創口號）。簡而言之，黨宣稱只會保留約1000家大型國企（當時中國約有11萬家國企）。這是領導能力的最佳展現，黨終於邁開大步。

私有化（雖然中國不作興這種稱呼）並不是十五大會開立的唯一藥方，但是省級與更基層的官員只看到良機出現，並無心深入研究。他們立刻開始大規模變賣較小型企業，有時候買主就是他們自己或親朋好友，而且變賣過程著眼於自身利益。他們甚至有辦法一筆勾消企業拖欠銀行的債務，只不過為圖省事而忘了告知債權

人。胡作非為的故事已經成為傳奇的題材。國家蒙受財政損失，黨再次名譽掃地。更糟的是，有時無產階級大眾會被迫變成資產階級，因為工人被迫買下企業的股份。至於不強迫工人認股的案例，企業的新老闆會直接裁員，讓工人在這個欠缺工人福利制度的國家中載浮載沉。另一方面，新近私有化的企業通常無心償還舊日的銀行貸款（也就是還沒有以非法方式一筆勾消的貸款）或是繳納稅款。

從現在算起，十年之後，經濟學者在回顧時會指出，這場在歷史上規模數一數二的企業出售行動實屬成功，因為儘管私有化的措施弊端叢生，數以萬計的企業還是走上革新之路。此外，最後的結果是大勢所趨，無法避免。國家不可能維繫全部的國企，因為代價實在太高。瘋狂拍賣之後，據估計北京當局仍然需要2411億到3001億美元的資金，才能夠更新剩下的國企，中國可是連這筆錢都負擔不起。

但是從北京的觀點來看，十五全之後的事態發展卻是一場挫敗。中央政府迫不及待，在第二年7月就發布命令，下令放慢出售國企的腳步，結果造成今日的停滯僵局。一個權力過度集中、不知輕重緩急的官僚體系，一個故步自封、茫然無頭緒的政黨，兩相結合，只能創造出牛步化的改革進程。

國企改革進程不應該那麼遲緩。改革工作的大前提簡單易懂：國企受到太多政治因素，太多學說理論的干擾拖累，除掉這兩害，自然會出現行得通的技術性補救之道。以利潤為導向來經營企業，企業就能夠獲利。大多數人——連北京領導班子也不例外——都明白這個道理。但是有時候黨似乎要再過幾個世代，才會施行這種只

要肯定大前提，一切都簡單明瞭的解決方案，是什麼原因呢？

基層官僚讓北京當局體會到圖謀私利與貪婪的威力；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因素遲滯了中共對國企困境的反應。首先，對黨內保守派人士而言，當年蘇聯與其衛星國家的快速崩潰，充份突顯出進展太快的危險。莫斯科的歷史大事對於中國當局的改革觀點到底有多大影響，難以精確衡量，主要原因是，同樣事件被黨內進步派人士認定為改革必須加速的明證。無論如何，蘇聯的前車之鑑使黨內保守派的思想更加僵化、抗拒更加堅定，在未來數年中都將影響改革的步調。

其次，鄧小平逐漸從公眾之前退隱，也導致改革停滯了一段時期。鄧小平最後一次出現在公開場合是1994年2月在上海，從那時起到1997年2月他過世，以及之後的一段時間，國企現代化的速度慢了下來。鄧小平欽定的繼承人江澤民一直要到小平同志確定死亡，自身權力鞏固之後，才能夠開始推動具爭議性的措施。江澤民就像鄧小平以及毛澤東這兩代領導人，喜歡置身於爭議之上，只在必要時介入調停針鋒相對的黨內大老。這種領導風格雖有利於鞏固權力，然而在採取困難但必要的行動時，效果卻不甚理想。現在江澤民已經將朱鎔基排擠到一邊，自己跳出來指揮中國的國企改革，他的領導能力將接受考驗。

缺乏強而有力的領導，對近日這段時期關係格外重大。當改革於1990年代早期陷入停滯，鄧小平遂在1991年1月到2月之間，展開著名的南巡。鄧小平隻手挽狂瀾，達成了快速的經濟成長與共產黨教條的現代化（至少就當時的標準而言）。1994年之後，北京不再有一言九鼎的領導人，可以想見的是，最不具爭議性的作法也最容

易受到青睞。在1997至98年大拍賣之後，對於國家仍然持有的國企應該進行何種根本改革，目前北京當局毫無共識可言。江澤民當時曾大膽出擊，准許出售規模較小的國企，但之後他似乎就失去勇氣。目前看來，恐怕要具備鄧小平的堅定意志與個人魅力的領袖，才能夠推動重大的改革。

第三點，中國成功改造國企的前提是：經濟成長的速度必須夠快，足以吸納經營不善國企所釋出的工人。在鄧小平掌舵期間，中國成長的速度冠全球，逐步趕上先進國家。但是現在今非昔比，官方宣稱的成長速率掩蓋了經濟的衰退。根據官方統計數據，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在1999年成長7.1%，較1997年的8.8%與1998年的7.8%略遜一籌；2000年的成長率據稱是8%，較前一年為佳，但這恐怕只是表象。2001年國內生產毛額的成長更趨緩慢，據官方資料，只有7.3%。鄧小平曾說：「成長緩慢不是社會主義。」但成長緩慢正是今日中國的高照。

第四點，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史坦菲（Edward Steinfeld）指出：「短期而言，國企改革沒有明顯的贏家。」因此中國正渡河走到一半，進退兩難。繼續前進（甚至回頭）都會比今天的境地好。沒有進一步改革，情況不會有進展；但是社會成本太過巨大，而且會危及黨的地位，因此進一步改革在政治上困難重重。史無前例的經濟成長與改革引發怨聲載道的混亂與痛苦，未來情勢也難以掌握，已經很少有人願意冒險。廿年前，每個人都知道中國必須改變，毛澤東勾勒的遠景顯然是夢幻泡影。但是現在，許多人都擔心改變對自身不利，而那些受苦的人也不想再繼續受苦。江澤民正確地觀察到：改變無論是多有必要，都不受歡迎。

最後還有一個原因，而且可能比上述其他原因的總和都還重要，使得拖延改革成爲一股熱潮。中共還無法承認，它並非自身宣稱的解決問題之道，共產黨本身即是問題所在。人們不難理解，江澤民爲何會執意要由中央指導經濟發展，就算不爲別的原因，這種作法至少可以讓黨在社會中佔一席之地。經營散布全國的龐大國企需要數以千萬計的幹部，以及負責監督的官僚系統。因此江澤民堅持黨要積極介入，主導重要的國企以及改革進程。

中共還要積極努力維持穩定，因此已經採取保守作法，至少對約1000家大型國企是如此。這種保守作法令人懷疑黨只是想維持現狀，以免破壞國家穩定。但是維持現狀也意謂這些大型國企前途渺茫。

除非中共領導人認爲國家安穩無虞，否則中國對未來也沒有什麼指望。江澤民計畫的中心思想是修補，雖然他不用這個字眼。對於那些仍然倚賴國家支持的國企，當局幾乎沒有提出任何改革的細節。江澤民曾說：「我們必須確定能夠在恰當的時機前進，在必要時撤退，並且採取適當的行動。」他這番話也許是呼籲大家要有所務實精神（就江澤民偏好理論主義來看頗不可能），也許他是承認：中國領導階層儘管到了今天的地步，還是不知如何去從。江澤民可以訓令全國幹部研讀他的講話，並且確實遵行，但是這些幹部除了更加努力工作之外，還是搞不清楚黨的真正意圖所在。畢竟，在國企領域中所謂的政策，其實只是這個全球頭號共產黨組織內部南轅北轍觀點的妥協產物。

修補讓黨有時間規畫下一步該怎麼走。1999年一場會議之後，黨發布了一份公報，其中充斥著義正辭嚴的文句來強調改革的急迫

性，然後又將黨原先所訂完成國企改革的期限延後至2010年。挽救國企的工作已被拋諸腦後，即使入世在即。

中共近來提出兩項計畫，第一項的名稱是「現代企業體系」，這個空泛的字眼其實意味著大規模組織再造：包括將政府的社會福利機能（住宅、就學等）與國企分離等一系列改革。可惜的是，中共從1993年宣布進行改革之後就缺乏政治決心，因此國企還要繼續背負社會福利的重擔，不知何時方能卸下。

中共的第二個目標是一項精細但無比重要的工作：一方面退出國企的管理階層，一方面維持黨在國企改革的主導地位。中共到底要如何才能完成這項功業？不過這畢竟不是什麼新的使命，中共不斷強調不會干預國企事務，但是又無法自我約束。最近中共又在宣揚：「強化並改進黨的領導，是加速國企改革與發展的根本保障。」黨既然自命爲社會先鋒，又怎麼可能不介入中國面臨最嚴重的問題？

我們已經知道中國共產黨是打死不退的。江澤民說：「在建立國企的長期實踐過程中，我們得到了相當有益的管理經驗，不應該揚棄。」也許他言之成理，但是黨對於自我克制、讓專業經理人發揮能力與創意，並沒有多少經驗。而且這個領域並不適用熟能生巧的原則，中共至今還是沒有搞清楚狀況。這實在可惜，因爲國企內部黨委與專業經理人的持續衝突，已經拖累了改革。許多企業主管知道該怎麼做，也能夠勝任愉快，但是他們動彈不得，因爲企業內部的黨機器封殺了改革。直截了當的解決之道就是撤除國企內部的黨委組織。不過這在中國是緣木求魚，至少目前爲止是如此，江澤民必然會抗拒任何傷害共產黨威權的改革措施。因爲大部份改革都

會傷害黨的威權，大家對現狀幾乎無能為力。

這兩個目標：黨退出國企的管理階層，以及解除國企的社會福利職責，在本質上都是結構性的改革，應該得到比「修補」更響亮的名號。但是要說中共有心完成這兩項目標，恐怕言過其實。真相是，兩項目標已被歸類為「難度太高」，而且突顯出近年來黨對於廣泛改革光說不練的傾向。現在當局討論中的政策計畫（改善管理、增加員工工作誘因等等），在過去也都曾討論並且嘗試。關鍵問題在於：這一次中國能不能更確實地施行這些全面性措施？

當中共正忙著規畫下一步動作時，各級幹部卻千方百計迴避根本的改革。因為其他的方法都無法奏效，馬克思主義者只能夠訴諸科學。也因此北京當局對於高新科技展現的希望大感興奮，從而要求國企邁向科技化。江澤民說：「今日國際經濟競爭的核心在於知識與科技創新，以及高新科技工業化。」科技對於中國領導人總是有一股特殊吸引力，他們身為馬克思主義者，總是聲稱其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有「科學」根據。

科技的確會帶來希望，因為如果運用得當，科技將使國企有機會追上全球各地的競爭者，幫助中國在21世紀站穩腳跟。特別是在過去10年結束之後，中國領導人重新開始致力發展本土的高新科技產業，並倡導網際網路的運用。就大前提而言，他們的策略相當正確。

但是科技對國企的助益有限，中國領導人將企業運用科技看成一種機械化過程，就好像有客觀的公式可以套用。這個觀念衍生自他們的普遍信仰：每件事都有一種「正確」的作法。但是國企的領域和其他領域一樣，專注於宇宙客觀本質的意識形態會成為絆腳

石。

中國政府確定了邁向更高目標的初步計畫之後，立刻雷厲風行。中國有能力而且也將發展出高新科技；有了北京的全力推動，現在只剩下時間問題。但是，中程計畫完成之後，中國是否能發展出奠基於高新科技的現代化工業，仍在未定之天。從初期徵兆看來，中國必須「修正」——借用一個中共黨內的流行語——其工業政策。在大部份人們心目中，經營不善的國企是製造日用品的龐大體系，使用1950年代的科技與數以萬計訓練不足的員工。一部份國企符合這種描述，而且數目還相當多。但是有一些經營不善的國企其實是現代化的高新科技公司，它們和許多龐大老舊的重工業同樣不符合經濟效益，原因不一而足。「中國華錄電子有限公司」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家公司創立於1993年，資金雄厚，坐擁日本松下電器的最先進科技，但是它的尖端產品在中國的市場很小，結果公司負債累累，直到後來才抵消掉。

華錄公司的案例顯示，高新科技未必能造就現代化企業。技術優勢就像其他許多現代化企業的要素，單憑自身並無法確保成功。中國國企在二十多年的改革歷程中，引進了不少全球最先進的科技與最新穎的設備，有部份企業至今獲益良多，但是也有一些企業淪於慘澹經營。所有提升國企科技的計畫，都只是中國過去失敗工業政策的新版本罷了。

這並不是說北京對於科技的重視有錯誤，顯然那是正確的。難道中國只因為擁有低成本的勞力，就要自我侷限於基層工業？但是中共領導人應該牢記，在他們亟欲加入的世界中，評斷企業的標準在於其獲利情形以及為股東創造的價值，科技只是眾多因素之一而

已。在這個網際網路的世界裡，江澤民想讓暮氣沉沉的國企起死回生，但努力終將失敗，因為他的工業政策正是摧毀上述價值的利器。

國企對於摧毀價值的經驗特別豐富，只要它們有機會拿到中央政府的經費。這些夕陽工業的主管最近也找到新方法來挖掘政府經費。北京近年來側重以高新科技解決國企問題，各家公司對此心領神會。製造鋼鐵的「鞍鋼」正在嘗試分散投資到電腦與半導體領域，不消說，他們當然會要求中央政府協助。這家老態龍鍾的重工業想從鋼鐵順利轉型到 I C 晶圓製造業，這種想法切合實際嗎？

中共鼓激勵國企強化其「科學管理」，這一點看似無可爭議。然而企業經營既是科學也是藝術，成功不僅需要科技，更得倚重策略、行銷與組織。江澤民曾警告企業要「避開風險」，但是作生意就是要冒險犯難。如此一來，問題所在就非常明顯了。

社會主義式的現代化不是沒有成功的可能。不起眼的方法有時會小兵立大功。1998年，中國有七萬多名的幹部、官員訪問河北省的「邯鄲鋼鐵集團」，學習「邯鋼」如何將微薄的利潤轉為豐厚，同時不必解僱任何一名工人。秘訣呢？邯鋼實行成本控制，而且獎勵措施的對象並非增加產量而是健全財務。邯鋼證明了「修補」也可以提昇經濟效益。不過儘管如此，邯鋼如果進行裁員，表現會更為優異。

今日的中國領導人仍是「摸著石頭過河」，修補成為時下最風行的作法。當然，有一些國企能夠在審慎前進中成功。北京將邯鋼視為楷模，大加宣揚，但是中國每出現一家邯鋼，就會有一千家鞍鋼。一家邯鋼遠遠不夠，中國的工業現代化需要數百家甚至數千家

邯鋼，但真正的改革至今付之闕如，未來「邯鋼林立」景象出現的機會實在不大。

就算中國能排除萬難，建立數百家甚至數千家邯鋼，但是代價恐怕太過高昂。中國為了將其老邁的經濟體實現現代化，不惜寅吃卯糧。例如，雖然私有企業亟需資金來擴張規模，但國家仍將資金導向國企。為了讓規模較小的私有企業募集資金而籌畫的股票「第二交易系統」（第二板市場），設立時程不斷延後，原因就是擔心它會對大型國企上市的「主板市場」產生吸金效應。第二交易系統早就應該上路，但是現在已被無限期擱置。的確，中國經濟是可以有光明的未來，但前提是國家不要再擋路。

未來

今天如果你仔細觀察，就可以看到中國的未來。這裡是上海的老機場——虹橋國際機場。如果你想見識一下國企經營不善之後會有什麼怪現象，不妨從虹橋機場搭一趟計程車。

1990年代末期，當經濟榮景幻滅，上海的計程車一夕之間暴增，目前有大約四萬部計程車在這座大都會的街道上穿梭，遠遠超過市場需求。全球各大城市中，上海大概是唯一連下雨天尖峰時間都能叫得到計程車的城市。許多司機根本搞不清楚上海市的道路；更糟的是，他們連市政府引以為傲的幾座重要地標都找不到。這些司機在大街小巷中找路時手忙腳亂，他們看來應該比較擅長將熔化的鐵水倒入模子，那是因為有許多司機在上街開車討生活之前，本來就是煉鋼廠的工人。上海將新近失業人口導入計程車行業，但是這些人沒有受過多少訓練。

在一個完美的世界中，不了解內情且沒有戒心的旅客，應該不會被迫接受這些司機的服務。但是在我們的世界裡，這就是上海解決失業人口之道。如果你是在1999年10月帶著行李來到上海老舊的虹橋機場，你得擠過人群，好不容易來到一列計程車前。如果你運氣不錯，會有一名臉色陰沉的女交通糾察引導你搭上一部計程車，她專門負責撮合像你這樣摸不著頭腦的旅客與滿臉不高興的計程車司機。司機會跟你爭論，因為他除了今天早上和老婆吵了一架之外，還覺得你的行李太多，塞不進車廂。不過女糾察在比手畫腳、威脅恐嚇三分鐘之後總是會佔上風，然後你的行李就跟著你一道走。

但如果你是在一個月之後才抵達虹橋機場，你會以為自己進入另一個宇宙。機場的糾察更多了，多到沒有必要。你被引導至同一列計程車前，同一名司機，他雖然跟老婆還是處不好，不過這回卻主動想把你和行李塞進車廂裡。但是你很困惑，因為有個糾察以堅定的語氣命令你多僱一部計程車來載運行李，這回輪到司機力爭他載得下所有東西。司機會趁機場糾察聽不到的時候偷偷告訴你，市政府為了提高計程車使用率，不惜犧牲乘客的權益，而且幾乎已成官方政策。旅客不准再和自己的行李搭同一部車，甚至連自己的愛人也不行。司機痛恨新政策，到頭來他們會變成受害者，因為怨聲載道的旅客只能以剋扣小費來報復。

中國的失業問題已經相當嚴重，這一點你在上廁所時會深有所感。除了計程車司機和機場糾察愈來愈多之外，連廁所服務員也大量增加。上海的餐館恢復設置廁所服務員，因為國企想辦法為剩餘勞動力創造就業機會。中國廁所外面原本不應出現的人龍，當然

不會拖垮國企體制，但是中國的企業——至少就長期而言——無法承受冗員充斥。國家缺乏全面照顧失業勞工的制度，因此上海只能創造無意義的工作當成權宜之計。你可以透過觀察計程車隊伍來推斷上海領導人推動市有企業改革的速度；如果計程車太少，市政府就可以發出更多營業執照；這樣一來，上海可以支持更多改革工作，然後無可避免地造成更多失業。為了紓解失業問題，只好讓更多工人上街開計程車。對失業問題的恐懼決定了中國改革步調的快慢。

中國著名經濟學者胡鞍鋼認為，失業現象是中國最重要的問題。但失業只是症狀，製造失業的國企才是罪魁禍首，因此改革應該列為當務之急。不過實際情形卻非如此，社會脫序的陰影籠罩著中國政權，因此官員大多寧可擱置改革，坐等下一回動亂發生。

中國高層領導過去能夠指揮全局，但現在只是被動反應，因為中共在國企改革領域中正處於長期撤退的態勢。首先，中共允許鄉鎮集體農場——許多其實是私有企業——投入製造業。到了1980年代早期，准許外國人入股國企，實際上啟動了持續至今的出售國企行動。1990年代先是實驗賣掉大型企業的小部份股權，然後准許將中小型企業整個出售。中共稱頌這些變革是「新觀念的突破」，不過如果真有所謂的觀念突破，那應該是黨能夠一方面撤退、一方面宣稱獲勝。今天中共已經對整個國企體系無能為力，只能嘗試縮小打擊面，就好像認定了以往力量不夠集中，是真正問題所在。因此幹部們緊抱著少數幾家珍貴的大型國企，希望能達成至今仍一籌莫展的目標。我們知道，這種想法不切實際。

中共每次撤退的時候，都能熟練地重疊意識形態來因應當前現

實。不過持續不斷對社會主義曲解硬拗，只徒然彰顯了這種意識形態已病入膏肓。中國領導人至今無法面對全世界早已明白的事實：社會主義——無論是否帶有「中國特色」——是行不通的。

但是中共無法對承認社會主義行不通達成共識，相反的，中共在世紀之交時談論國企改革，態度就像未來十年內還要加重國家的角色。當前中共強調思想正統的風氣，已經使鄧小平的務實主義被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信念取代；現今要推動任何重大變革之所以會困難重重，這也正是這個原因。黨內高層同志們是特別難纏的一群，他們不再實事求是，只會提醒自己不能再棄守毛澤東的理想。因此這些領導人不會放棄對國企的管理或控制。也正因為如此，當改革失敗，他們也放棄了時間。

然而隨著中國即將進入WTO，時間益形重要。中國領導人大談入世的好處，但是並沒有實行必要的措施，讓國企作好準備，因應入世帶來的劇烈變化。也許他們真的相信手中關於國企轉型成功的報告，也許他們還沒有認清加入WTO會帶來多大的變化。

中共被一廂情願想法耽誤，因此一直期待，如果他們繼續修補補，遲早總會碰上某種行得通的方法。但是危險在於：卡在新舊青黃不接困境中的黨，雖然高談進一步改革，實際上卻只會枯守現狀。原本是一段鞏固強化的時期，現在正轉變成僵化停滯，因為轉型未竟全功而帶來的痛苦，阻礙了國家進步。幹部心知肚明但是說不出口的事實就是：中國已經沒有多少人還願意維持史達林主義的工業發展體系，更沒有什麼人還會在意理論的正確性。中共領導人根本不願意——或者是害怕——承認此一事實，而且在當前的大環境中也無法承認。江澤民日漸倚賴服從與意識形態正統，不僅使改

革之路遍地荊棘，同時也壓制了議題論辯。他要求黨必須「講政治」，但是真正能助國企一臂之力的不是「講政治」而是「講經濟」。

今天共黨幹部認為還有餘裕推動意識形態正統。未來在面對意識形態和權力之間的嚴峻抉擇時，中共或許會變得比較務實。但是到了那個時候，光是務實恐怕已無濟於事。當北京還在猶豫躊躇，中國的財政狀況已每況愈下，數以萬計的國企以各種名目向中央需索經費。從國企獲利的官方數據或許看不出這種情形，但是國有銀行的逾期放款讓問題無所遁形。最糟的消息是，這些問題貸款大多是1990年代的產物，是漸進主義的國企政策在改革年代中創造出的問題。北京當局一味拖延，讓情勢更雪上加霜。

國企的改革不僅是要挽救特定的公司，如果只是這樣，那麼改革工作早就應該完成了。其實挑戰層出不窮。首先，北京當局必須揚棄自給自足公社的烏托邦模式，並改造國企的結構，讓中國能夠受惠於經營規模的效率。同時還要裁撤數百萬員工（以及官員），並籌措財源來提昇工業設備。地方政府必須接手現在仍由國企擔負的社會福利工作。然後要有人出面規畫讓黨退出企業，並不再插手地方事務。這些工作都必須在中共的體制中進行，但這個體制會阻撓有意義的變革，幹部死守著早被其他人認定回天之術的意識形態。儘管中國領導人在入世的前夕大談改革，中國必須將想法轉化成行動，在最要緊的地方——工廠與地方黨委——付諸實行。

白德華直言不諱，對於朱鎔基在3年內讓國企轉虧為盈的承諾，這位「四川金頂」前任董事長說：「我覺得還沒有人能找到有效方法讓國企起死回生。就算有，我也還沒看到。」香港經濟學家董濤

樂觀地說：「一旦中國整治好國企與金融部門，它的發展步調將令全世界驚訝。」這個預言完全正確，但是當它實現時，中共已經不再掌握大權，它提出的解決方案全都是緣木求魚。歷史告訴我們：中共早從1975年，「四個現代化」首度端上檯面時，就開始爭論國企改革。中共從來不缺理念，甚至也不缺資金，但是今日中共掌控中國的體制下，勢在必行的改革卻無法推行。

等到中國割除毛澤東的遺毒之日，世界其他地區會進展到什麼程度？如今中國正在對抗理論正統以及對工人動亂的恐懼，國企改革步調也像大陸板塊漂移一樣緩慢。要讓過時的意識形態符合當前現實，需要不少時間。世界其他地區不必學習如何調整馬克思主義以適應21世紀，將會全速前進，讓中國望塵莫及。許多人認為中國一直在進步，事實也的確如此；不過別忘了，世界上有許多地方比中國進步更快。真正重要的是相對速度，而中國正逐漸落後。

中國的麻雀重獲生機，現在牠們安全無虞。相較之下，國企在現代中國仍舊面臨滅絕危機，雖然中國已經進入WTO，但還是找不出挽救國企的良方。更糟的是，中共連挽救這些企業的理由都說不清楚。

第四章

封網不手軟

中共消受得了網路嗎

網際網路打破了拉丁美洲五百年來的壟斷模式，也就是資訊、經濟、社會、宗教力量的壟斷。網際網路從根本上賦予個人力量，這在拉丁美洲是一種新的發展。

——費南多·艾斯普拉斯

(Fernando Espuelas, 拉丁美洲入口網站StarMedia執行長)

將 網際網路（互聯網）的大好前景與中國市場的誘惑力結合為一，你就知道什麼是本世紀最令人亢奮的大事。再加上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這股興奮真是一發不可收拾。奠基於鋼鐵、煤礦和重工業的中國，已經跨進網路時代，而且正力爭上游，一心想獨佔鰲頭。對一個號稱擁有全世界最古老文明的國家而言，沒有什麼事物會太過於現代化。對於這套說法，外國企業心悅誠服。

深圳位於富庶強大的廣東省，是中國未來的重心。中國高新科技與網際網路的前景都將在此地大放光明——或是灰飛煙滅。香港就在毗鄰，與深圳之間以鐵絲網隔開，猶如往日將歐洲一分为二的

鐵幕。表情冷漠的解放軍士兵手持機槍邊，雖然這幅景象已經有點不合時宜。從前曾有成千上萬的大陸人游過其實只是一道小溪的深圳河，到彼岸追求自由。香港著名的廓爾喀兵團會在港英那邊的河岸巡邏，守株待兔，攔截不顧一切追求美好生活的非法移民。但是現在，很少人會想離開中國，因為充滿希望的地方不再是香港，而是深圳。

深圳是中國未來希望之所寄，然而在1999年11月13日這一天，中國的命運要在另一個地方決定——至少暫時是如此。在北京，美國貿易代表白茜美（Charlene Barshefsky）與中國總理朱鎔基舉行會談，試圖就中國加入WTO達成相關協議。這一天，廣東的高科技新世界暫時離開深圳，移師到西北方坐一個小時火車可達的城市：廣東省會廣州。西方人士還是習慣稱這座城市為「Canton」，令人想起19世紀的鴉片貿易與罪惡猖獗。中共清除了廣州的罪惡——至少是暫時清除——之後，「Canton」之名從此不再使用。如今這座省城在外觀上遠較往日現代化，當年的地標也所剩無幾，不過老廣東積極進取的精神仍流傳到今日。

在這個美好的11月早晨，廣州老舊的「白天鵝賓館」人群熙來攘往。白天鵝賓館曾經是廣州的榮耀，矗立在這座推動中國進入新時代的南疆大城。看看大廳中的裝飾，你就猜得出來賓館啟用的年代（1983），並且知道它是當時「新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度這樣稱呼自己——最豪華的外國投資旅館之一。白天鵝賓館在周遭的革命前建築之中鶴立雞群，坐落於混濁浩濶的珠江兩道支流會處，珠江是聯繫並滋養廣州、香港與澳門三地的動脈。

老舊的白天鵝賓館中，廣東省長盧瑞華正在主持「廣東經濟發展國際諮詢會」，這場會議邀集美國與歐洲的跨國企業領袖，其中許多都是高新科技業者。從歷史意義來看，身為中國「資訊省」領導人的盧瑞華，選擇廣州舉行這場盛會的確相當合適。當年清朝皇帝將外國商人限制在沿海少數幾座通商口岸，廣州正是其中之一。過去中國向來自認是文明世界的中心，只容許外國人在其領土邊緣活動。不過到了1999年，外國人不再受到中國排斥，反而登堂入室，成為盛會的貴賓。

許多人覺得白天鵝賓館這場諮詢會議是「九九（財富）全球論壇」（Fortune Global Forum）的拙劣模仿，那場諮詢論壇於前一年的9月在上海召開，正逢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50週年國慶的前夕。上海論壇有國家主席江澤民親自出席，其光彩隆重遠非廣州的研討會所能比擬。不過也就像上海的海派作風一樣，這場論壇好大喜功，試圖讓賓客對中國所有的優點一覽無遺。相較之下，廣州的諮詢會議雖然沒有向全球電視轉播，但焦點集中於廣東省高新科技業的遠景。當上海大肆炫耀其全新的會議中心，務實的廣東則選擇形簡陋的白天鵝賓館來談生意。

廣東的諮詢會雖然著眼於未來，不過還是帶有舊日中國的特色，仍然以「關係」為交易的媒介。在開幕當天早上的會議之後，企業家成群結隊與共黨幹部合影留念，這種作法源自於西方，但中國人進一步將它儀式化。廣東省委書記李長春說：「你可以憑著照片打進政府部門，幫助自己的事業。」李長春是老派政治人物，與江澤民關係深厚，各方認為他有望升任中國的下一任總理，不過李長春至少會遇上五位勁敵的挑戰。一張與李長春合影的照片勝過

一千句話，這就是亙古以來中國運作的方式。

那天晚上在白天鵝賓館，21世紀的中國在「風味餐廳」運作起來，那裡是賓館樓上的豪華餐廳。在廚房旁邊一個沒有什麼裝飾的角落，兩位前途似錦的中國網路企業家與他們的財務人員，即將嘗到在公開市場募集資金的滋味。張靜君是網路公司「廣州飛華電信工程」的總經理，以經營中國第四受歡迎網站163.net而聞名。163.net的名號在中國不同凡響：它是中國第一個提供免費電子郵件服務的網站，也是迄今規模最大的。張靜君今天到這裡來開會，事先選得她九歲的寶貝獨生子同意，張靜君的先生支持她為事業打拼，但她的兒子陸蕭可不這麼想。陸蕭就像所有在中國「一胎化」政策下誕生的「小皇帝」一樣，要求父母的全心照顧，而且通常都能如願。不過今天晚上非比尋常，張靜君不能待在家裡。

如果163.net是別的行業，那麼總經理應該會是陸蕭的父親而不是母親，而且年紀也會遠大於張靜君的卅六歲。但163.net不是一般公司，新興行業中的新興公司並沒有一定規則可循。在網路事業中，卅六歲當總經理已經有點嫌老。不過張靜君雖然不符合網路事業主管一般的形象，她在163.net可是大權在握。張靜君具備衝勁、遠見與指揮大局的能耐，而且獲得廣州市政府的支持。她投身中國最炙手可熱的網路事業，是這一行的當紅人物。這一切都可以稱之為名聲，在今天晚上，張靜君的名聲引來了一群男士，當然，男士們都帶著大把鈔票有備而來。

和世界各地做生意的典型方式一樣，出資的金主總是最後才到場。今天來的是香港投資銀行家王統與另一位紐約基金經理人的代表。那位真正掌握資金的基金經理人要晚一個多小時才會到，但是

他不必在意，因為無論張靜君的名聲有多響亮，今天這場會沒有他就根本開不成。

與中國一般晚宴的閒話家常全然不同，雙方連客套話都省略，直接切入核心主題：中國蓬勃發展中的電信業。張靜君與同仁專注聆聽著王統說話，聽他解釋收購163.net的過程為何要刻意設計，好讓它的股票日後能順利公開上市。王統是投資業鉅子高盛（Goldman Sachs）的主管，他提出要規畫「回收策略」（exit strategy），萬一163.net申請股票上市失敗，他可以將自己的投資轉換成現金。

張靜君的黑眼珠紋風不動，她的凝視專注得令人不安。雖然她即將在這個農民國度躍升為鉅富，但沒有流露出一絲一毫的喜悅。網路這個行業是張靜君的熱情所寄，並不只是短期致富的工具。顯然她不是香港人，在那個前英國殖民地，除了做生意之外其他的事都不重要。你隨便到一個香港人，他身上都會流出股票投機交易者的血。例如香港最知名的企業家李嘉誠，他只有為兒子規畫前途時才會做長期考量。李嘉誠從來不曾緊抓著自己的產業不放，他只想做生意、賺錢，他不投資。李嘉誠恐怕連自己土生土長的香港都不眷戀，畢竟那只是他累積財富的地方。但是張靜君不一樣，她關心一起工作的朋友，關心自己一手締造的事業，她是個真正的信徒。

如今這位信徒吸引了香港頂尖投資公司的注意。兩家大有來頭的投資者撤下大筆資金，企圖博取張靜君的青睞。一家是美林（Merril Lynch），另一家則是王統最近組成的新團隊。後來王統的團隊佔了上風，成為今晚宴的貴賓。真正原因只有張靜君知道，不過十之八九是因為美林雖然實力雄厚，但是未能理解她對事業的熱

忱。王統的資金雖然相形見绌，卻能用其他辦法來攔獲張靜君這顆明日之星，而且進展順利。

王統看出來，張靜君和汽車大王亨利·福特（Henry Ford）有一些共同點。福特曾經與兒子艾德索（Edsel）討論要不要賣掉整個福特汽車，老福特說：「如果我們真的賣掉公司，而且真的拿到大筆鉅款，那麼我們會擁有什麼？我們就沒工作了！」結果福特父子並沒有賣掉整家公司，而張靜君也希望日後自己仍然保有公司的掌控權——或者說，在收購條件之下儘可能保有掌控權。

雙方討論的問題相當複雜。王統擔心將來張靜君可能不願意不計價錢賣掉持股，因此會使他難以處置自己投入的資金。王統試圖說服張靜君，就算她被迫賣掉持股，她還是可以「到百慕達享受退休生活」。不過張靜君對這個想法完全不感興趣，對她而言，工作就是生活。王統又表示她不必退休一輩子，在「競業禁止條款」（non-competition clause）3至5年內到期之後，就可以回到本業繼續工作。但是張靜君反駁：「在網際網路這一行，3到5年已經等於一輩子！」

張靜君和部屬能夠作成買賣嗎？他們和王統的對話開始繞著食物打轉，這是典型的中國方式，中國人有時不這樣做就根本無法溝通。雙方第二天上午見面還要再吃一頓，地點選在白天鵝賓館佔地廣大的咖啡廳，若想坐在室內瞭望醜陋的珠江，這座咖啡廳是廣州市內的最佳地點。咖啡廳的餐飲部相當出名，所有領養中國新生兒的西方夫妻都會到這裡來。剛辦好領養的夫妻必須在中國等候，得到當局批准後才能夠返家；廣州辦理業務的官員更規定，想領養當地嬰兒的夫妻都必須住進白天鵝賓館。張靜君雖然是個盡職的母親，但是並沒有注意到腳邊有嬰兒爬來爬去，因為談判已經進入最

艱鉅的階段。她、王統與紐約來的基金經理人，正在討論她與公司高階主管的雇用條件。張靜君努力爭取提高薪資，出資金主也不甘示弱反駁，他們指出主管真正的報酬不是眼前的薪資，而是將來公司股票上市之後的巨大利益，但張靜君不吃這一套。

張靜君的身材高大壯碩，不像一般的中國南方人，她一頭短髮，態度咄咄逼人。當她振作起精神——在這個11月的星期日正是如此，張靜君會是個可怕的對手，滿懷信心，極具說服力。

而且她似乎已經說服王統。當天晚上在白天鵝賓館的二樓，王統和律師、基金經理人齊聚小房間中商議。所幸大家對於是否要對張靜君這位奇女子讓步，並沒有花多少時間討論，因為房間狹小，會議參與者只能站著，而大家都累了。王統決定讓步，並在第二天告知張靜君。當天下午在咖啡廳，張靜君已說服王統，讓他相信中國高新科技業人員薪資水平比他所知的要高。不過打贏這場戰爭的關鍵要素既不是張靜君的說服力，也不是她的高姿態。張靜君之所以能夠佔得上風，而且日後的談判也勢如破竹，是因為投資者渴望進軍中國的網路事業，而她在這個領域已經搶佔先機。

中國的網路事業還真是誘人！只看統計數字並無法了解其中商機。張靜君為金主準備的資料指出，電話業需要約100年時間才能達到5000萬名用戶的規模，視聽業要花30年，但是網際網路只需5年。在2000年與2001年交會時，全中國約有2250萬網路使用者，比起一年前增加不止一倍。一年後，中國網民增加到3370萬，雖然是在一個慣於誇大希望與承諾的國度，但這些統計數字恐怕還不足以呈現網路無遠弗屆的威力。一個網路帳號往往是多人共用，因此許多使用者無法列入計算。依照目前的成長速率推算，中國的網路使用者

將在2005年前後超越美國（不過也有人認為會更早），中國的入口網站「網易」總裁丁磊估計，到了2005年，中國將有五億網際網路用戶。聽起來有點異想天開，不過這個預言再過幾年就會實現。在新世紀的前半期，也許是2015年左右，中文會是網際網路上最通行的語言，中國著名的電子商務公司「實華開」總裁曾強發言頗具份量，他認為這個現象在2004年就會發生，甚至還有可能提早。

表面上看來似乎不太可能。現在中國網路的普及仍受制於高昂的個人電腦價格，一個普通的城市工人要工作兩年才買得起國產的個人電腦，而且前提是這兩年中得不吃不喝不花一毛錢。鄉村的工人更至少要四年不吃不喝才買得起電腦。另一方面，由於多項因素，電話與上網費用也居高不下。

此外還有政府管制僵化、檢查制度嚴苛的不利因素。那天在白天鵝賓館，有五名公安齊步走進「風味餐廳」，坐在張靜君等人的隔壁桌。國家威迫的力量現身，雖然今天晚上這股力量並沒有那麼可怕，因為這幾個身著草綠色筆挺制服的年輕公安顯然是要享受美食。舊中國與新中國並存，在11月的一個週末，雙方井水不犯河水。不過在網際網路上，雙方可就無法這樣和睦相處。

毛澤東企圖完全控制中國人民，隨著時代改變，他的繼承人沒有那麼大的野心，變得較為實際。江澤民知道他無法一方面遏阻網際網路，一方面追求經濟發展。因此他嘗試控制網路，並且讓外國科技為中國服務。中國經濟的骨幹國企已奄奄一息，即使身處中國高度保護的環境中也缺乏競爭力。現在北京當局寄望高科技與網路，能夠幫助中國將來一步登天。畢竟中國曾經發明紙、火藥，還有最重要的——麵條。後來中國沉睡了數百年，讓西方奪去了創造

發明的主導地位，現在輪到中國重新開始學習如何發明。

但是對中國領導人而言，高科技與網際網路有陰暗的一面。他們知道法輪功信徒如何透過網路來組織動員，這些信徒一度包圍中共領導人聚居的北京中南海。而且法輪功被當局判定為「邪教」、非法組織之後，還一直透過網路繼續進行抗議。觀察家大惑不解，為何一個完全仰仗精神性與信徒電子郵件位址的組織，竟然會把中國的國家機器搞得焦頭爛額。

結果就是，北京中央政府面臨無法解決的兩難，用毛澤東的術語來說就是「矛盾」。經濟成長以及網路，與政治控制之間孰輕孰重？還是兩者可以並行不悖？網路的發展基礎在於可得性與多樣性，但是維繫中國存在的觀念卻是壟斷——共產黨的壟斷——與孤立，壟斷孤立同時也是黨的權力基礎。毛澤東在自給自足的觀念上建立他的中國，終於造成孤立。鄉村的人民公社被移植到城市中，以國企的形式出現，每一家企業就是一個小型社會，為員工製造生活所需的絕大部份物品。毛澤東一聲令下，「相對優勢」的概念從中國消失。

曾派駐中國的瑞典外交官魯格·帕姆斯提納（Ruiger Palmstierna），對中國農村做過深入觀察與研究，並描述了1970年代人民公社的典型運作方式。他注意到：所有進出公社的物品都由公社成員揹負，支書記們負責組織公社的勞動力，因此掌控公社與外界的接觸管道。到後來，支書記在公社中高高在上，沒有人敢挑戰其地位。不過一旦公社的事業開始興旺，情勢就出現變化。公社購置運輸與農耕兩用的拖拉機，拖拉機的技工不但負責公社對外交通，而且擁有技術專業，因此有能力挑戰黨官僚。幾部拖拉機引發

的小小變化，會延續下去，規模日漸擴大，發生在報紙、衛星電視與網際網路各個領域。

中共原本很容易就可以控制資訊，進入電子時代之後也是一樣。上海第一輪辦公大樓「有利大樓」，鄰近歷史悠久的外灘，那是黃浦江畔一帶富麗堂皇的老式建築。有利大樓的屋頂上豎了幾十支天線，因為以前上海所有外籍人士的電話線路都在那裡匯聚。監聽外籍人士電話的作業就在大樓的最高一層進行，那裡無法以電梯與其他樓層相通。時至今日，當局已經不再監聽所有電話。在這個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政府監聽人員根本不足以應付所有外籍人士與電話線路。

如果你是一名外籍人士，居住在全球人口最多國家之中人口最多的城市，你在早晨可以收到官方的「中國日報」(China Daily)，包裝上毫不起眼。但如果你訂閱的是外國出版品，就一定要到下午才會收到，外面裹著棕色包裝紙，而且裡面的出版品已經重新裝訂過，因為檢查人員撕掉了所有內容不當的書頁。你看CNN不時會斷訊，官方的理由是衛星功能故障；然後政府每隔一陣子就會取締碟型衛星天線。雖然困難度愈來愈高，中國政府還是勉為其難，試圖操控資訊。

北京當局也正在嘗試控制網際網路。今天中國不再監聽所有電話，原因或許是要轉移部份資源去監控更敏感的領域：中國日漸增加的網路聊天室。檢查人員要刪除觸犯忌諱的言論十分容易，不過北京當局控制所有網站的企圖卻越來越難以實現。這也是十年前波蘭政府面臨的問題。華勒沙(Lech Walesa)說：「事實真相是：共產主義把自己逼上絕路。共產主義奠基於檢查制度，一旦衛星電

視、網際網路、行動電話先後問世，中共的政治警察力量至少得擴大五倍，但是他們根本拿不出經費來做。」

中國可以封鎖網站，但是就如華勒沙指出的，再怎麼動快的政府也無法持續進行這種工作。花旗銀行上海分行一位主管，有一次想幫兒子上網找模型飛機的資料，於是在搜索網站上鍵入「model」一字，但這個字在也可以指「模特兒」，因此搜尋結果是冒出一堆色情網站，嚴禁色情網站的中國當局顯然沒有料到這一點。這也是李洪志經營法輪功組織的方式；法輪功在中國有數百萬信徒，流亡海外的李洪志卻可以遠從紐約遙控。中國當局不斷封鎖法輪功已知的網站，但法輪功總是道高一丈。自稱是最高神祇化身的李洪志，無疑是以超自然力量來凝聚信徒，不過當他要傳遞訊息時，還是會憑藉網路的力量。

中共是否能夠在推動網際網路的同時，仍然維持政治控制力量？到目前為止，還不曾有哪個共產國家像中國這樣努力嘗試。沒有前例可循的中國共產黨，運用各種方法想實現看似不可能的夢想。中共除了持續監控網路之外，也施行密不透風的管制法規，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慣用的伎倆。2000年1月，「國家保密局」頒布全面性的網路管制法規，規定網站發佈消息前必須先經政府批准，以免洩漏「國家機密」。這套法規範圍寬廣得駭人，一旦施行，會讓中國的網際網路無路可走，任何非官方消息都要延遲數週之後才能發佈，而且沒有多少人敢以電子郵件寄送具爭議性或重要的資料，因為何謂「國家機密」，國家說了就算。可以想見的是，北京當局對這套法規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儘管如此，還是對網路活動與企業界造成困擾，並且阻礙了網路的成長。

同樣糟糕的是，這套法規問世後不到一週，中國也發佈了嚴格的密碼登記法規，要求中國境內除了外交官員之外的所有外籍人士，都要向「國家密碼管理委員會」登記其持有的行動電話與筆記型電腦，並取得使用許可。不過這套規定一樣不可能施行，因此也被束諸高閣。

國家對於機密、資訊、保密的嚴格規定造成各界重重疑慮，而且只要這種氣氣揮之不去，中國就無法徹底發揮它的潛力。這些法規突顯出中共政策的侷限性，令人不禁質疑：中國到底進步了多少？CNN記者蕊茲·漢恩（Riz Khan）認為：「中國在共產革命50年之後，又歷經了另一場革命：科技與電信的革命。」的確，中國的電話線路與網路用戶與日俱增，但是那些模稜兩可且無所不包的法規正虎視眈眈，等候毫無戒心的獵物落網，顯示中國還沒有準備好接受網際網路。中國的公安部宣稱：「為了監察互聯網，我們必須加以控制。」中國正歷經另一場「革命」嗎？恐怕言之過早。

儘管如此，北京當局還是體認到：如果一味訴諸檢查與管制，到最後它會一敗塗地。因此北京也另起爐灶，試圖拉攏人心。黨為了顯彈性與務實，已經揚棄毛澤東、馬克思與列寧思想（至少在彈性與務實的層面揚棄）。這個組織向來自豪於其信念的科學根據，以及堅定的現代化進程，現在卻求助於一位比耶穌基督還老的古人——孔子。對這位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聖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早年曾禁絕其思想。孔子的教誨繁多，但中共最在乎的是他對服從的重視。現在中國正面臨新時代的衝擊，卻回頭向一位古人尋求慰藉。你可以說這是絕望之舉，也可以說是神來之筆——其實這種作法兼具兩種特色。

無論中共的靈感來自何處，這都是一場危險的遊戲。鄧小平善於借用毛澤東的言論來拆解毛澤東的體制。同樣地，中共政權的支持者與反對者也都可以借重孔子的言論。如果你的政治立場離經叛道，你會提醒黨：孔子強調天命，肯定人民有權推翻殘暴的統治者。而且孔子思想也為黨埋下另一種擔憂，《論語》中一段警句：「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正好與北京統治者形成難堪的對比，因為共產黨已經當政50年了。

現在我們知道，中共很清楚自己無計可施。支撐毛澤東各種運動的犧牲奉獻精神，雖然早就煙消雲散，但如今這股精神卻在別處再度興起，數百萬人矢志追隨一位店員出身的領袖，儘管他已流亡到美國紐約。如今李洪志的網站言論要對抗孔子的諄諄教誨，兩位導師都是金玉良言，這場對抗將極為漫長。

純粹是為了論述方便，如果我們假設孔子的確能幫助中共控制網路，因為中國人不再接納危險的思想，那麼中國的高新科技前景是否就安穩無虞？可以確定的是，等到中共充分利用孔子，其形象肯定會像是一個嚴峻的父親。在這種體制中，溫馴的「網民」是否還能夠運用思考與想像來創造發明，一心為祖國未來的發展而努力？華勒沙1999年10月接受CNN專訪時說：

「從前你可以拿槍站在一個人背後，命令他揮動錘子和十字鎚，挖出一個長兩百公尺的洞穴。但是現在，你不能站在以電腦從事創造性工作的人後面，命令他『給我做出一個有原創性的東西』，這是行不通的，而我就是佔了這一點優勢。」

江澤民一定不希望中國出現華勒沙這種人，而且期盼創造發明與社會主義能夠並存。這位國家主席正在傾全國之力建設中國的

「矽谷」，地點選定鄰近北京幾座著名大學的中關村。同時中國也鼓勵最優秀的人才投入科技發展。163.net的張靜君就是一個例子，她大學畢業後被安排進入廣州電信局工作，因為廣東省希望菁英份子投身電信業，張靜君坦然接受這樣的安排。

真正的矽谷位於美國思想最自由、最沒有禁忌的加州，這應該不是巧合。但是，我們所認識的中國實在不像加州。理論上，政治自由與創造發明並沒有必然關聯。然而過去兩個世紀以來，兩者之間卻顯現出深厚的關係。當然，中共有的是資源與政治意志，而且網路在中國成長最快速的年代，正是政治高壓與厲行檢查制度的時期，其間關係也絕非巧合。

但是任何一套集權主義的信仰體系——就算是聖人創立的也一樣，無論有多少優點，都無法在充滿互動的未來世界中生存。21世紀的教學形態將不同於以往，教室會連上網路，讓年輕人接觸到百家爭鳴的思想。到那個時候，孔夫子或是其他企圖充當導師的人，還能夠指導年輕人如何思想嗎？

無論如何，中共領導人還是要記上一功，他們決定要鼓勵全體人民使用網路。在中國，政治僵局往往會延誤最困難的問題，因此黨內領導人的這番作為是非同小可的功績。更令人驚異的是，中國還設想出合理的解決方案，這在意識形態僵化的過往年代是難以想像的。當然，中國這麼做有其理由。網際網路既可以讓法輪功默默進行組織動員，同樣也可以讓中國改變其企業模式，從國家經營的龐然大物搖身一變為高科技的新興公司。黨內領導班子如此設想：藉著推動網路，中國將再度在全球科技競賽中拔得頭籌，而且在重工業與資訊電腦業兩大領域都領袖群倫。

這一天是11月16日，星期二，前一天發生了有些人認為是20世紀最重要的一樁大事。美國貿易代表白茜美（Charlene Barshevsky）與其對手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合作部長石廣生，兩人在典禮上目光幾乎不曾交會，不過沒有人在意，中國與美國已經簽署協定，為中國加入WTO做好鋪路工作。於是中國的網路企業家也水漲船高，每個人都可能有數百萬美元的身價。

張靜君也是其中一位網路新貴，她今天看起來比3天前在白天鹅賓館時更貴氣了。3天前她穿一件風格冷酷的黑色T恤，外面罩上非洲風格圖案濃密的外套，今天她穿的是一套黑白分明的「強化服」（power suit），似乎更能襯托出她高漲的身價。現在張靜君是在廣州另一邊的另一家飯店——花園酒店，這地方與香港以前一家著名飯店同名，但是不同老闆。花園酒店內部有如迷宮，許多間私密的廂房圍繞著大廳。張靜君當然會選擇廂房，而且其裝潢要能夠搭配今天晚上的盛大場合。

張靜君今天與王旣簽下協議，163.net創業迄今不過20個月，她就賣掉了大部份股權，而且價錢高到超乎常理，可能比公司的實際價值高出數百萬美元。張靜君以中國人唯一的方式來慶祝這筆交易——一場菜色多到數不清的盛宴。二十來歲的女侍送上每一道菜，在客人面前以優雅的姿態轉動桌子中間的轉盤，這既是用餐儀式，也是餐廳的規定。

有幾位——也許全部都是——來賓只是在忍受這場盛宴。相當諷刺，如果不是中國文化對餐飲禮儀的要求，大家早就一哄而散，如釋重負。例如那位紐約來的基金經理人，他一定會投入溫柔鄉中尋求慰藉；幾天之前他就是這麼逍遙，當時大家都聯絡不上他（結

果到了第二天早上，當他百般掩飾的藉口被戳穿，大家也就知道他幹了什麼好事）。無論如何，他已經令事業夥伴漸感不耐，從前幾天白天鵝賓館的晚宴就開始遲到。全球各地有那麼多人迫不及待想投資中國的網路事業，為什麼一定要找他？除他之外，一定還有幾千個投資者願意支持張靜君。

不過這名基金經理人至少還願意付晚宴的錢。今天晚上的事件雖然意義重大，但實在沒有什麼樂趣可言。近來南中國新流行的社交活動是卡拉OK，不過這場晚宴的賓客卻都盯著中央電視台的新聞看。餐桌上談論的話題同樣嚴肅，集中在前一天中美簽訂的WTO協定。在中國，張靜君是這項協定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大筆資金將湧入中國的網路事業，使她出售163.net之後剩餘的股份，比她先前的持股價值更高。

那天晚宴中的律師比客戶還要多，在向來不太重視法律的中國，這個場景出人意外。不過收購163.net的計畫極為複雜，因此律師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其中一位法律顧問在無意間提及，農民與國企員工會是中國「入世」協定的受害者。他沒有明說也不必明說的是，中國——張靜君的中國——的社會穩定將遭到威脅。不過這位律師就算想到自己這番話的言外之意，也不會在乎，因為他代表的是基金經理人，而不是張靜君。

無論中國能否加入WTO，也無論律師有沒有為複雜的合約架構擬訂法律基礎，張靜君的交易都會繼續進行，因為中國的網路企業比太陽還熾熱。張靜君這一行是由信息產業部管制，現任部長吳基傳是個極端民族主義者，以1950年代的思考來主管21世紀的產業，他是中國在網路企業領域發展最大的絆腳石。

吳基傳熱衷於控制，鎖定的目標則是電信管理局，這是一家國有企業，以「中國電信」之名提供服務，在1994年之前，它完全壟斷了中國老舊的電信產業。到了1994年，「中國聯合通信」（中國聯通）開始營運，然而政府刻意運用法規來打壓這家新起的競爭者。中國聯通迫不得已，只能求助於數十家亟欲進入中國市場的外國公司。

當時中國的法規和現在一樣，禁止外國人直接投資、營運或管理中國的電信網路。有鑑於此，中國聯通以建立所謂「中國中外合資企業」（簡稱中外企業）的方式，巧妙地迴避法規限制。中中外企業雖然有各種形式，但通常都是由層層相疊的合資企業組成，並且讓外國投資者得以收取費用。這種架構使得外國投資者在不必實際擁有企業、也不違反吳基傳規定的前提下，仍然能夠獲利。中國聯通以中中外企業的形態，向全球最大幾家電信業者募集了14億美元的資金（佔公司資金總額的70%），而吳基傳也知道來龍去脈。這樣一來，中國聯通總算能夠稍微搖撼中國電信的壟斷。更重要的是，中國聯通從此得到外國技術的奧援。此外，這種以收費方式規避中國企業所有權限制的策略，外國投資者運用得爐火純青，後來也在與電信密切相關的網路事業中如法炮製。

等到西方電信科技順利引進中國之後，吳基傳突然宣布中中外企業不合法，勒令解散。過了兩年多，外資才與中國聯通就他們應拿回多少資金的問題達成協議。部份中中外企業的合夥人認為這簡直是國家強制徵收，因為他們被迫放棄多項珍貴的權利。無論從何種角度來看，這都是中國與外資關係發展史上可恥的一章。

吳基傳成功整治了中國聯通之後，食髓知味，開始對收購中國

新興網路事業股權的網路經營者開刀。當時全球的業者都蜂擁進中國，包括財雄勢大的美國線上（America Online）在內。而且連升斗小民也能夠分得一杯羹，「中華網」1999年7月在納斯達克（Nasdaq）上市，第一天股價就飆漲三倍。科技與中國的邂逅迥如一場歇斯底里的狂歡；在那段時間中，中國網路公司的股價一路攀升，從不回頭。

但是外國投資者似乎撈到太多好處，至少吳基傳是這麼認為。1999年9月，他宣布所有這類投資均屬非法，就如同先前對付中國聯通的「中中外企業」一樣，吳基傳一手掀起軒然大波。外國投資者獲悉吳基傳的宣布之後，充滿了驚愕、憤怒與不敢置信。怒火中燒，終於迫使國家主席江澤民出面，他趁著當年11月與美國簽署入世協定的機會平息眾怒。在這個劃時代的協議中，只要中國入世，外國人就可以持有網路公司的股份。這項協定其實也意味著：現有的外國投資雖然於法不合，但是當局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王鈺與律師為收購163.net而設計的複雜架構，也許已經沒有必要。但是做生意，特別是與科技和中國相關的生意，有它自身的動力與邏輯。王鈺在白天鵝賓館中曾說，十筆交易中有七筆會一敗塗地，剩下的三筆才會讓你大發利市。張靜君的交易儘管架構繁雜，但是會繼續進行。「速戰速決」是這一行的金科玉律，但這筆交易的速度實在太快，王鈺還沒來得及親身去看張靜君的公司，就已簽字畫押，同意交付數百萬美元，好像是透過網路買下這家網路公司一樣。一位香港律師說，投資者「一聽說是網路公司，還等不及細節報告到手，就急著詢問要如何匯錢過去。」

中國在歷史上大部份時間中，都是與世隔絕，看看花園酒店的餐桌，就知道證據何在。甜點是一盤炸得棕黃、又軟又黏的芝麻球，每一個都用一張廉價的皺紋紙包起來，就是那種杯狀蛋糕用的包裝紙。中國號稱擁有五千年「綿延不斷的文明」，難道就只能拿得出這種東西？就連中國人自己，除非餓昏了頭，否則也不會碰這些芝麻球。一個能夠與外國人交易來往的社會，遇到這麼重大的場合，一定會想辦法準備像樣的點心。

早在網際網路來到之前，中國一直閉關自守。評論家特別注意歷史上觀念改變的重大時刻。15世紀中葉，明代大航海家鄭和的出航，是中國接觸外在世界的巔峰行動。但是後來，鄭和這支全世界最強大的艦隊遭到解散，中國退回自己的天地。自滿與反商傾向使中國孤立了數百年，最後終於走向衰微。中國建起一道防堵外國人的高牆，而毛澤東也是在孤立的基礎上締造中國共產黨。就過去五百年而言，中國真的是一成不變。

中共也讓人互相隔絕，藉此確保他們接受共產黨版的歷史。16歲的盧靜1999年10月接受法新社記者訪問時說：「我對六四事件唯一的記憶，就是看著電視，聽到鎮暴公安遇害的消息。」她指的是1989年的天安門大屠殺。盧靜直言：「我不相信有學生死亡。中國在這方面是個民主國家，不會傷害自己的子民。」網際網路將會掃除像盧靜這些青年心中的無知，等那一刻來到，盧靜對這個政權會有何觀感？

網路無法改變根深蒂固的心態——至少無法在一夕之間改變，甚至幾十年也做不到。今天仍有許多年輕人抱持極端的民族主義，甚至走火入魔。就算讓他們接受來自國外的資訊，他們也不一定會

相信自己讀到的東西。畢竟他們是來自那個創造出吳基傳這類人的社會。吳基傳與西方接觸頻繁，但是並未因此改變心態。

並不是每個人上網之後，都會即刻變成異議份子。中國最有名的網路人物吳士宏女士說：「我的決定不可能不關涉到我血液中的愛國熱情。」她在1999年10月辭去微軟（Microsoft）中國公司總裁一職。吳士宏可能比你心目中典型的「網蟲」——中國社會對網路熱衷者的暱稱——更具愛國狂熱，不過她的例子顯示出，中國人就算是以前網路為生，仍然可以抗拒外國的影響力。大體而言，今日中國仍是以自身為中心（甚或更糟，以過去為中心）。網路不會改變這一點，至少在短期內改變不了。

「你希望網際網路是什麼？」北電網路（Nortel Networks）公司問這個問題。如果你是山塔納合唱團卡洛士·山塔納（Carlos Santana），你會回答：「那是一條道路，通往一個沒有國界、邊境、旗幟、國家的世界。在那裡，心靈就是一個人的護照。」如果你是江澤民，你會期待網際網路是革新中國企業、確保中共統治的利器。吳士宏與吳基傳讓江澤民相信：他可以同時達成這兩個目標。但是長期來看，這是不可能的。以孤立為基礎的體制無法在開放的架構中生存。對於台灣2000年3月的總統大選，中共以其片面的觀點箝制傳播媒體，但是當陳水扁獲勝，中國有許多「網民」在開票當晚得到未經官方檢查的消息，這些消息與黨的說法並不一致。中共之所以會在開放的時代落居下風，還有一個原因。毛澤東教導我們：想登上北京的寶座並不需要勞動眾，一小撮人就足夠了。同樣的道理：想讓中共垮台，也只需要一個意志堅定，肯上網探索真相的人——比如說像毛澤東這樣的人。

中國的網際網路會變成什麼樣子？網路除了為現代化和進步帶來希望之外，在北京領導人眼中還有更重要的特質。1989年6月，中共決定強硬鎮壓天安門廣場示威者時，並沒有誤入歧途或悖離初衷，這個黨無論如何為了求生存會不計一切代價。如果江澤民與其繼承人面臨抉擇，他們還是會選擇保持權力而揚棄網際網路。當你深信自身是進步的唯一道路，做這種抉擇將輕而易舉，而且也不會有心上的掙扎。但是，從此中國會一落千丈。

對張靜君和她的同事而言，抉擇也很容易。網路聊天室中可能充斥者民族主義者的叫囂，抗議外國勢力主宰了中國的網路事業。不過張靜君很高興將外人引進自己的公司，甚至應他們的要求而讓出控制權。入世後，並沒有消除中國對外資持有網路公司的限制，但是在網路世界中，掌握多數股權並非絕對必要。這一行業已經別出心裁，發展出能夠讓外國投資者滿足需求，同時又符合中國法規的方法。對於這一套由外資專家設想的巧妙機制，中國政府還在苦思破解之道。吳基傳可以百般防堵，但是外資自有創新突破之道。對陣的雙方都意志堅定，但是歷史將站在外資這一邊。在一個日漸開放、互動頻繁的世界中，吳基傳註定要落敗。

那些腳步太慢的人也會失敗。網路世界一日千里，儘管張靜君才剛剛做成交易，她必須開始規畫163.net下一階段的集資行動。如果這一步沒走好，163.net就得發佈訃聞。張靜君的寶貝兒子不喜歡媽媽出遠門，但是她需要資金，必須跑一趟「香港特別行政區」——這是現在中國對這座城市的正式稱呼。

香港也擁有高科技的未來，但是與中國內陸的規畫不同。1950年代，中國的移民如潮水一般湧入，香港至今記憶猶新，而且仍自

認為比香港北方的深圳優越，更不用說中國其他地區。香港與廣東之間雖然壁壘分明，但居民同屬廣東人，說同樣的語言，奉行同一套迷信，施行類似的儀式。五十年的中共統治，顯然成效不彰。

隨著世紀交替，現在中國南方是由深圳掌握新千禧年的願景。香港大談國際網路，但是缺乏說服力，它原本應該是亞洲的高科技中心，但是香港無法在未來走出一條不同於以往的路。就高科技的發展而言，香港只是在原地踏步：充當中國與外在世界之間的媒介。對於高科技業，香港能分到的大餅只限於為中國的成功企業募集資金。

11月27日這一天，香港就是在為中國的成功企業募集資金。張靜君與麾下財務人員當天早上搭火車抵達香港，在「蘇利文與克倫威爾」（Sullivan & Cromwell）律師事務所高雅的辦公室會合，這家紐約的事務所是代表基金經理人。「蘇利文與克倫威爾」事務所曾受僱於中國電信，主張中外企業的外資部份違反中國法律，但時移勢易，現在它轉戰另一陣營，協助一群外國投資者對一家中國的網路公司投下大筆資金。事務所的辦公室位於皇后大道——香港的主動脈，居高臨下，各方代表齊聚在這裡。先前為了敲定交易，張靜君與同仁聘請一家倫敦著名的律師事務所，今天雙方是第一次會面，只不過交易協定已經完成簽字。在張靜君的網路世界中，實際的面對面接觸如果所費不貲，通常是能免則免。網際網路就是這麼一回事。

這回換成張靜君遲到，幾乎遲了一個小時。她走進會議室，向在場人員微笑致意，然後不待引介，逕自坐上會議桌的主位。沒有行禮如儀的開話家常，張靜君完全就事論事。儘管交易在不到兩星

期前已經敲定，但是公司的未來仍有許多事務需要深思熟慮。雙方邊吃鬆餅邊喝茶，展開長達數小時的規畫作業。中國預計再過幾個月就要進入WTO，張靜君必須募集足夠資金，才能夠因應迫在眉睫的挑戰：數十家外國網路公司大舉入侵中國。再過一年時間，吳基傳部長就無法保護她了。對於公開市場可望提供的資金，張靜君一分錢都不能放過。

儘管討論的問題事關重大，張靜君還是在下午提前離開會議，趕回家和兒子共進晚餐，這是她兒子的要求。剩下的工作可以交給律師處理，現在張靜君是用西方的作法來談生意。

老生常談偶爾還是有點道理，張靜君和她新結交的外國朋友，就應驗了其中一則。人們在長期合作中培養出默契，這種默契會——至少到最後會——讓中國得以與世界接軌。當張靜君將163.net的股票送到國外的公開市場上市，她會讓公司融入一個更大的體系，而員工也將因此受惠。163.net的首次公開發行（IPO）可能會在香港，也可能在納斯達克——中國網路企業偏愛的股票交易市場，無論選擇哪一個市場，都將為張靜君和她的年輕員工，創造更多接觸外界的機會。

假以時日，中國人的學習熱忱與隨之而來的開放，將會蔚然成風。11月13日齊步走進白天鵝賓館的公安，綠色制服上有著英文標示「POLICE」。更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在幾年前更換公安的冬季制服，是一套棕色皮夾克，風格模仿芝加哥警局，而且制服上只有英文標示。中國社會雖然長期與世隔絕，但是仍然有能力做出驚人之舉。讓中國稍微開放一點，巨大的變化就會排山倒海而來。誰能預測中國人民會把國家帶到什麼地方？

這世界上的最大的分歧，並非我們通常認定的東方對抗西方，而是青年對抗老年。所有青年文化都很容易被貼上「西方」的標籤，然而這名不副實。雖然現代流行文化起源於西方世界，而貓王也是用英語唱歌，不過這純屬歷史的偶然，原因是北美洲與歐洲的社會比亞洲自由。其實這種文化可以在任何地方興起，如果說在歷史偶然促成下，它從中國開始發展，那麼流行歌曲也只有音樂語言會產生差異。全世界的青年基本上是一樣的，他們的文化也反映了這個根本事實。讓年輕人順其自然，他們的面貌就會難以分辨。北京當局似乎還不能理解這一點，但是網際網路將讓北京的幹部心領神會。

1999年，台海危機最嚴重的時候，江澤民已對巡弋台灣海峽前線的戰鬥機飛行員下達「先發制人」的指令，但是當時北京最受矚目的活動是什麼？人民解放軍的鼓號樂隊嗎？不是。是台灣流行歌手「阿妹」張惠妹。四萬五千多名歌迷為了看阿妹而湧進北京工人體育館，這場演唱會一票難求。時間是8月第一個週末，那個一心想告訴全世界它將對阿妹祖國發動戰爭的國家，看起來實在有點愚蠢。

網際網路只是個媒介。今天西方世界正向中國「輸出」其文化，有朝一日將會輪到西方接受中國文化，那時中國已是全世界密不可分的一部份。的確，網路對北京政府形成威脅，但網路上的青年也同樣不可小覷。

因此這場競賽會繼續下去。中共在被網路擊潰之前，能不能在網路上達成自身的目標？答案也許就在深圳。1979年，鄧小平選擇深圳做為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曾經為中國發展充當開路先鋒的經

濟特區，如今已進入尾聲。但是深圳又以高新科技的要素，讓經濟特區這個老舊觀念起死回生。1999年10月，第一屆「中國高新科技博覽會」在深圳舉行，中央政府大員親自出席，肯定了深圳的優勢地位。「如果其他城市都能夠趕上深圳，那麼中國的國民生產毛額將超越美國與日本。」朱鎔基總理如是說。中國向來野心勃勃，因此難以斷定朱鎔基所謂「美國與日本」指的是個別國家還是兩個國家的總和。無論如何，現在似乎中國的每一個村莊都要投身高新科技——或者至少是宣稱要這麼做，並且都要自行舉辦博覽會。

北京與上海正在拚命追趕。不過卻淪為贊助選美活動。他們舉辦了「互聯網小姐」比賽，並選拔相關的「互聯網知識小姐」、「企業資訊小姐」，還有最傑出的：「家庭線上購物小姐」。

真正的「互聯網小姐」是我們的張靜君，她離開香港時，除了把會議資料帶走之外，還帶走了一些東西。如今她已踏上一場偉大的冒險，任何地方都可能是她的目的地。如果微軟公司問：「今天你要到哪裡去？」她的回答將是：「未來。」

「你們準備好了嗎？」另一位張小姐——張惠妹——問道，帶動了北京群眾的熱情。張惠妹已經準備好了，張靜君也是一樣。中共自認為已準備就緒，其實不然。這個建築在孤立之上的組織正在網際網路年代中掙扎，實在還沒有做好準備。

王鈺知道自己已經準備就緒，準備賣掉163.net，雖然他不過是兩星期前才買下這家公司。另一家資金充裕的香港網路公司TOM.COM最近提議要買下163.net這家免費電子郵件網站，讓王鈺與其團隊獲取豐厚利潤。王鈺在敲定163.net的交易之前，還得先趕赴深圳，進行另一筆網路公司買賣。而張靜君也繼續從事自己熱愛的

工作。時機一片大好。

時機不僅是對王統與張靜君有利，對全體中國人也是如此。在這個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網際網路是一般引致改變的力量，因為中國所有正面的因素都匯聚在網路的領域。政府可以繼續巡邏檢查網路世界，但是在過程中它自身也會發生變化，無可避免。網路不僅能夠讓投資者致富，也會讓這個全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充滿活力。亞洲數一數二的網路公司「中華網」首席行政總裁葉克勇最近接受CNN訪問時說：「中國比其它開發中國家更需要互聯網。」

話雖如此，但中國似乎認為自家不需要太多像張靜君這樣的人才。2000年1月，廣東省政府介入，阻止王統收購163.net，張靜君與其同仁目前都在接受調查。

廣東省政府指控163.net的交易沒有獲得充份授權，而且王統收購的價格太低，因此造成國有資產損失。兩個問題的關鍵都在163.net的母公司「廣州飛華電信工程」，到底誰才是這家公司的老闆？飛華公司是一家集資企業，由國家與廣州市電信員工代表共同持有。飛華的所有權並不十分清楚，中國許多新創立的公司都有類似問題，例如中關村的公司就是如此。

事實上163.net一直在虧損，亟需金援。它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廣告，如今業績停滯。如果163.net不趕快籌到資金，競爭者將會蠶食鯨吞它的免費電子郵件服務，然後這家公司的價值將所剩無幾。163.net的確有其價值，但是它就像一朵在沒有水的環境中盛開的玫瑰。在一個尚未成熟、變化劇烈、價值難以衡量的市場中，誰能夠判定一家公司的價格是否合理？不過有一點倒是非常明確：163.net交易的時機是網路公司熱潮的高點。再過幾個月，全世界大舉賣出

網路概念股，將會使163.net這類尚未上市公司的股價大幅滑落。張靜君賣掉163.net的價格，其實正是飛華公司所能冀望最好的價格。

然而國家並不真心關切這些問題。飛華公司在2000年2月1日開革了張靜君，她的同仁不久之後也一一離職。對張靜君而言，最痛苦的經歷並非失去賴以維生的工作，而是向九歲的兒子陸續解釋這整件事。孩子問媽媽，她是否做錯了什麼事才會被解僱？張靜君無言以對。

不過張靜君對其他人就可以侃侃而談，她指出這筆交易必須成功，公司才能夠繼續成長，因為中國的嚴苛法規使163.net無法發揮潛能。張靜君提到中國的法規限制時喜歡用「框架」這個字眼。她說：「這框架不容許任何進一步的發展，無論對個人或是對163.net而言都是如此。」談到抗拒改革的共黨幹部與官僚時，張靜君認為那些人對任何一筆交易都不以為然，因此國家永遠在與改革作對。

而且國家絕不鬆手。北京當局在1990年代早期決定接納網際網路，但是一直保留相當大的控制權，因此有人認為中國根本還沒有出現真正的網際網路。不過，部份黨政高層人士正在思考，中國有無必要開放到這個地步？國家主席江澤民的次子江綿恆發出警告說：「中國必須建立一個全國性的網路，獨立於互聯網之外。」這位受過美國教育的工程師指出，所謂的「中國網路」將會以中文為主，以本國研發的晶片與通訊協定來運作，對中國的相關報導會符合黨的意旨，這種網路就不會出現部份人士所稱的「電子海洛英」。江綿恆可不是說說而已。2001年1月，北京宣布成立「中國C網戰略聯盟」，這個組織將為中國籌設一個類似網際網路的網路體系。當這個網路體系成形，將會與江澤民主席站在同一陣線，對抗全球化對

中國造成的危機，並維護中國念茲在茲的主權。

但是張靜君並不看好「中國C網」。她指出，資訊產業的發展是一種歷史趨勢，不可能被阻擋。不過近來這段日子，她恐怕得承認：歷史趨勢還是有可能被阻擋下來，她自身的困境就證實了中國仍然在全力抗拒改變。現在張靜君一臉倦容，似乎是若有所失——她的確失去了很多。

張靜君的祖國也有損失。她自身象徵的中國新生希望，已經消失無蹤。張靜君必須離開163.net，不再為中國的網路產業開疆闢土，也不再是年輕人的榜樣。她覺得自己實在沒有理由落到今天這種境遇，2000年6月她接受訪問時說：「如果163.net的交易有任何問題，包括法律問題、所謂的國有資產問題等等，任何問題，這筆交易老早就會被打回票。163.net的交易沒有任何不可告人之處，完全沒有，應該要拍板定案。」

可惜的是，張靜君言之過早。當局對163.net交易的調查尚未結案，王統轉手賣給香港TOM.COM的計畫也停滯不前（譯按，這筆交易後來在2000年11月完成），亞洲的網際網路熱潮破滅，163.net的股價一瀉千里。中國繼續干擾阻礙私營的網路事業，但是這種作法也會傷害中國自身的未來。北京當局將運用「中國C網」計畫，再一次嘗試讓中國與世隔絕。

準備好接受網際網路了嗎？不，中共還沒有準備好。

第五章

無限上綱

工業政策造成永遠的無能

企業政策讓無能企業永遠有恃無恐，犯罪事業
如果是由政府經營，就不必付出任何代價。

——無名氏

範疇是：「共產黨組織」，問題是：「全世界有多少個這樣的組織？」如果你是已退休網球巨星馬克安諾（John McEnroe），答案有「兩個」：北韓以及ATP（職業網球選手協會）。其他人的答案更離譜，艾特勒（Jonathan Atler）在1999年12月27日的Newsweek上寫道，共產主義已經「消失」。

馬克安諾與艾特勒都忘記了中國，不過這是可以原諒的。畢竟，連大部份中國人都不再信仰共產主義；而且年復一年的變化，已經使中國日漸遠離其社會主義根源。中央政府似乎每隔三天就會宣布一項重大改革，有時候還真的說到做到。

既然有人認為共產主義已從中國消失，那麼我們是不是該建議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同志，趕快到ATP找份工作？儘管幾年來共產主義在中國並不怎麼順遂，但是澤民同志別擔心，您在北京的職位不會有問題，中國共產黨會繼續維持其嚴厲控制的體系。如今中共幹部正在努力振興病入膏肓的國企，指揮改革的進程，發展新企業與高科技。幹部無所不為，絕不放棄，將會讓這個需要他們的體制永遠存在。

問題是，中國人民不需要共產黨。說實在的，不必領導的事事干預，人民也可以維持生活。1992年初，鄧小平在南巡中宣揚經濟改革，消息傳到雲南省會昆明，民眾立刻熱烈響應。他們蜂擁而上，身體力行經濟改革「一夜之間，無數私營小販就沿著大馬路邊拉起電燈泡、擺上小桌子，開始販賣各類廉價商品。中國人民當時就已明白：改革開放已經上路，不會再回頭。在鄧小平的南巡之前，大家並不是非常確定，還在等候信號。在充斥著象徵的中國，鄧小平的南巡只會有一種意義，廣大的人民群眾是一點就通。

南巡也是外界對中國樂觀看法的起點。許多人認為，今日中國已出現許多現代化的徵兆，終將發展出現代化的市場經濟。中國規模最大的中美合資企業「上海通用汽車」董事長菲爾·墨陶（Phil Murtaugh）說，中國擁有「全世界前景最好的市場，最高的成長潛力，這也是我們為什麼要來中國投資，而且每個人都想來。」但是外推法可能會使一個人迷失方向，對樂觀派而言更是如此。中國大部份的變化都發生在鄧小平掌權的時期，然而他的繼任者江澤民堅守思想正統，上台以後的進展十分有限。江澤民遵循鄧小平畫定的路線，雖然只是東修西補，但已經到達他所能容忍的改革極限。

1978年以來，儘管鄧小平與江澤民推動改革，但對於中國發展必須由共產黨與中央政府領導的基本認知，他們幾乎沒有做任何修正。毛澤東當年依據蘇聯模式發展出的龐大計畫經濟機制，仍然在北京繼續運作。如今中國正從第九個五年計畫邁向第十個，很顯然，在共黨的觀念架構之下，中國很難再次出現長足的進展。當世界正以網際網路的速度飛快前進，中國卻仍舊以五年時間為單位，小心翼翼地籌畫未來。世事每天都在變化，動輒長達數年的固定計畫已經不合時宜，但是北京當局仍然堅持以一板一眼的方式追求發展。千年帝都北京有一種別的地方看不到的自信：自信可以預知並掌握未來。經濟計畫人員繼續指揮整個經濟體的運作，幾乎沒有急迫感。中國無法體認大環境的變動，正逐漸落居下風。一旦中國敗下陣來，老企業與新企業都得遭殃。

南昌的天使

天色昏暗，克利斯·提布斯（Chris Tibbs）看不清這座摩天輪有多老舊，但是在裝飾燈泡的照映下，仍看得出它鏽跡斑駁，而且旋轉時嘎嘎作響。當提布斯的車廂轉到最高處，在微風中晃盪，他開始懷疑自己是否明智，居然把性命寄託在這部老舊的機具上。不過現在後悔也太遲了，此刻他只能遙望景色單調的江西省會南昌。江西是中國南方僻處內陸的貧窮省份，也曾經是共產英雄建功立業的地方，離提布斯不遠處是一座革命紀念碑，矗立在龐大的廣場上，當年中國共產黨傳奇的「長征」就是從江西出發。

其實提布斯不是觀光客，他到南昌來是要救苦救難。如果現在是白晝，這位花旗銀行的美籍主管從搖搖晃晃的摩天輪上，應該看

得到「江鈴汽車」佔地廣大的工廠。與江西省其他的企業相較，江鈴汽車可是一家財雄勢大的公司，以生產輕型卡車為主，擁有最先進的技術與現代化的廠房，而且公司很能賺錢。然而江鈴有一個致命傷：與中國其他汽車廠相比，江鈴的規模是小巫見大巫。

江鈴的董事長孫敏很清楚，北京當局有意整併中國過度分散的汽車製造業。中國的經濟計畫人員看到美國只有三家大型汽車公司，但是在1990年代中葉，市場規模遠小於美國的中國卻有一百二十多家汽車與卡車製造廠。當局決定在10到15年內把車廠數目縮減到4或5家，機械工業部的技術官僚會動用行政命令，確保政策貫徹執行。因此江鈴汽車未來勢將難以獨立生存，甚至可能根本無法生存，大權在握的孫敏也知道這一點。北京的幹部每天忙著為新企業催生，或者命令老企業關門。如果不儘快採取行動，南昌和孫敏都將失去江鈴汽車。

這也是孫敏請提布斯到南昌來的原因。現在這個美國人坐在摩天輪頂上，心想他已經找到答案。江鈴面臨的是經濟問題，但是在中國，經濟問題要以政治方式解決。提布斯的計畫很簡單，與孫敏一拍即合。他們預定花半年時間，試圖說服花旗銀行的老顧客福特汽車出資，買下江鈴一大部份股權，並且開始在南昌製造「全順」(Transit)系列的廂型貨車與輕型卡車。這樣的搭配真是天作之合。福特在中國需要根據地，1993至1998年領導福特的艾利克斯·托特曼(Alex Trotman)曾說：「我絕不能讓歷史把我描述成一個忽略中國的福特總裁。」福特是全球最強大的汽車製造商，孫敏期望引進福特合作之後，能夠阻止北京技術官僚關閉、合併或干預南昌的榮耀——江鈴汽車。結果證明孫敏的作法正確，1995年江鈴與福特的

第一筆交易敲定之後，在北京當局眼中，江鈴從此脫胎換骨，一如來自花旗銀行的天使——提布斯——所預期。今天的江鈴汽車雖然虧損，但是不必再擔心中央政府的干預。

另一家中國舊經濟體制下的「洛陽礦山機器廠」(洛陽礦山)也不必擔心。一位退休員工提到這家公司的主管時說：「他們面對一個心臟病患，卻治療他的腳趾甲向內生長。」這是一個巧妙的比喻。由於不斷讓扶不起的無能公司苟延殘喘，中國政府正在摧毀一種企業、一個經濟體、一個社會。洛陽礦山位於河南省洛陽市，是1953到1957年間中國第一個五年計畫所創立的156家「重點產業」之一，後來成為中國最大的礦冶設備製造廠。到了1990年代早期，一次規畫拙劣、執行失敗的分散投資，使洛陽礦山元氣大傷。如果是在市場經濟體系，解決之道很簡單：解僱失職的主管、賣掉無關緊要的資產，將資金投注於提昇核心事業。如果仍然回天乏術，那麼還可以透過申請破產保護或其他方法，讓公司起死回生。公司的本業也許無法生存，但是它的資產可以透過其他方法發揮生產力。

但是在中國這種「國家萬事通」的體制之中，政府另有打算。他們的計畫看起來類似提布斯的策略：引進具備雄厚政治實力的股東。「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中信)在1994年接掌洛陽礦山，將名字改成「中信重型機械公司」(中信重機)，其他則原封不動。中信公司是國務院轄下事業單位，收購洛陽礦山是輕而易舉，幾乎不花什麼錢，也不必承擔財務責任。換上新招牌的中信重機在法律上還是一家獨立的公司，因此中信公司不必為它的債務操心。

原本負責監督洛陽礦山的機械工業部，失去公司的控制與主導權之後也從舞台上消失。不幸的是，新東家中信公司由於不必負擔

財務風險，對旗下這家新收購的公司不理不睬。中信公司本來要幫助公司拓展海外市場，但是它拿到的國外礦冶設備訂單價格太低，根本是賠本生意。在法律上，中信重機可以不履行這些賠本訂單，然而事實上它無法反抗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大股東。在中國現行體制中，政治考量總是壓倒經濟因素。另一方面，江鈴汽車雖然至今仍仍在掙扎脫困，但是隨著福特汽車引進的科技與管理技術，江鈴至少還有機會成功。不過江鈴一路走來相當的辛苦，首先要延請一家跨國銀行協助諮詢，再引進全世界最幹練的製造業，然後公司才有起死回生的希望。

相較之下，中信重機卻是越陷越深，因為政府幹部拿出來的是政治解決方案。這在中國可能是唯一的解決之道：國家直接對陷入困境的企業撥款紓困，並強迫國有銀行貸款。中信重機何必改變？對這家企業而言，就算經營不善也不會受到懲罰。中信重機下一步應該是申請破產，但是債權人不能這麼做。依據中國的法律，沒有相關政府部門的同意，債權人不能申請國企破產。更有甚者，當一家企業是「公眾的」或是「與國計民生有重要關係」，它通常不可能破產。中國的法律也將拖延戰術正規化，破產企業的主管政府部門雖然只有兩年時間進行「重整」，但是人民法院不會真正執行技術性的法律條文。因此最終結果是：債權人對國企完全無可奈何。更糟的是，債權人的權利經常要屈服在國家的干預措施之下。以「鄭州百文集團」為例，它是第一家喪失償債能力的股票上市公司，中國盤古開天以來這還是頭一遭。債權人在2000年3月向法院提出申請，要讓這家連鎖百貨商店破產。但是本案司法程序很快就被壓制下來，鄭州市政府與中央政府強力介入，幾個月後迫使相關各方接受

一項協議，債權人被迫放棄大部份債權。

收拾鄭州百文的爛攤子已經夠糟了，中國政府竟然連別的爛蘋果也要出手相救。2001年10月，中國的最高司法單位人民最高法院下令，省級法院應立刻停辦所有牽涉到國企的破產案件。有經濟學家比喻道：「沒有破產的資本主義，就好比沒有地獄的基督教。」就因為中國不讓人下地獄，虛胖的公共部門就沒辦法再改革下去了。

並不是說中國的國企永遠不會關門大吉，只不過當這種情形發生時，原因通常是中央政府的企業政策，而不是破產法規市場運作的結果。北京當局總是傾向於關閉小型企業來保護大型企業，完全不考量經濟效益。例如當局曾關閉多家初級煉油廠，以便實施石油產業的雙重壟斷。因此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愈來愈深，並將國家帶往錯誤的方向。當大企業依照政府決策吞併小公司，它們經常會被新收購的公司搞得進退兩難。受到政治干擾的中國經濟，就是被這種消化不良的現象拖累。

破產觀念與共產黨註冊商標的社會主義格格不入；中共一直堅持，決定國企生死的不應是市場力量或破產法庭的法官，而是幹部。對於破產的反感也植根於文化之中。中國人常見的特性就是不願承認錯誤，無論稱作是「面子」問題或是其他更糟的講法，這種特性都主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走向。將三種因素——不肯認錯的心態、共產主義描繪的光明遠景、共產黨塑造自身強大形象的企圖——結合起來，人們就能了解為什麼破產法在中國難以推行。除了最無可救藥的案例之外，中共幹部總是拒絕承認失敗。中國只有少數國企承擔得起債務，2001年又是經濟惡化的一年，然而當年

中國只有8939件破產申請案。這絕對不是一個肯面對問題的體制。

這個體制需要的是像美國奇異電機（GE）總裁「中子彈傑克」威爾契（“Neutron Jack” Welch）這樣的人物。這位美國佬在奇異公司的成就正是毛澤東在中國的目標：不斷革命。威爾契不斷檢視他所領導的公司，讓公司日新又新。他操控自己釋放的毀滅性力量，來為股東甚至整個社會創造價值。威爾契不斷面對問題，但是中國還沒有學到這一點。

結果，中國政府為了避免承認失敗而設想出幾十種伎倆。中國的證券管理機構經常要求準備股票上市的企业先接收幾家營運不良的公司。市政府、省政府甚至中央政府，都寄望銀行繼續借貸給早就生機斷絕的企业。有時政府還將營運不良的公司合併，意思好像是只要把跛足的人綁在一起，他們就能走路了。

中國最頂尖的破產法專家曹思源認為，政府這種避免企業破產的作法，只能延遲無可避免後果的降臨，就好比在地雷區上面覆蓋稻草和鮮花，情況似乎有改善，但只是初步現象。中國當局無論做了多少表面功夫，也很難期待外國或本國投資者願意收購閒置資產，除非投資者相信法律——尤其是破產法——能夠保護他們的合法利益。在這些閒置資產找到買主之前，國企的復甦遙遙無期。中信重機尚未完結的故事告訴我們，企業有時就是要置之死地而後生。

這個道理對於中國的新生企業一樣適用。高新科技與網際網路是中國未來希望所寄，但是企業家要冒風險才有可能成功。當企業家失敗，他們必須能夠脫離困境，浴火重生，這正是健全的破產法規所能提供的環境。今天的中國還不可能出現置之死地而後生的情

形：冬天之後確實是春天，但是中國例外。當幹部試圖逃脫無可避免的失敗，他們同時也封殺了成功的可能。

中國出現的破產案例，原因通常是政治上的失利，不是經濟上的失敗。我們的「南昌天使」提布斯在1999年被花旗銀行指派到「廣東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廣信）查帳，中國最早有十家進入國外債券市場限制較寬的「窗口」，廣信是其中之一。廣信不斷借貸資金，協助廣東省帶頭衝出中國往日的經濟困境。外國銀行與其他金主也對實力雄厚的廣東省慷慨解囊。但是這些借貸資金的投資事宜是由無法無天的省級幹部負責，後來導致廣信償債困難。廣信終於被債務拖垮，因為它的投資收益根本不足以償付眾多的債權人。

中國的中央銀行——人民銀行——於1998年10月關閉廣信，並在隔年1月讓它申請破產。廣信的下場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它的負債相當於47億美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規模最大的破產案件，紀錄至今仍屹立不搖。廣信同時是新中國史上第一個破產的金融機構。更令人矚目的是，它也「榮幸」地成為新中國第一個無法履行國際債券債務的借貸者。

其實在廣信宣布破產之後，外商銀行認為它還有救，因此花旗銀行的提布斯與另一方債權人匯豐銀行的代表定期走訪廣信的總部——廣州繁華市區中一棟摩天大樓，研究是否能在廣信剩餘人員的協助下，設計出重整方案。提布斯雖然是一位精明幹練的銀行家，但是在此顯然無用武之地。他與其他人都知道，廣信其實有錢可以償還債權人：富庶的廣東省已經表明願意介入並提供資金解決問題。然而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拒絕批准。原因是二十多年前鄧小平為了鞏固自身地位，曾與廣東的領導人有過約定，將北京的干預降到

最低程度，讓廣東自行發展。朱鎔基對廣信閣下的大禍怒不可遏，拒絕伸出援手。北京當局封殺了債權人進行公司重整的諸般努力，儘管重整行動在破產法中有明文規定。提布斯和中國許多人土一樣，被政治擊敗。中央政府想駕馭揮金如土、好高騖遠、不受羈絆的廣東省。這種作法在政策上說得過去，因為中國各省實在需要金融紀律。然而重點在於：直到今天，中國企業的存亡興廢主要仍是由北京的政治風向決定，經濟力量依舊是靠邊站。

這一點在中國推動企業現代化時特別明顯，不過2000年4月8日發行的《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另有看法。當期雜誌的中國概覽欄目(China Survey)認為：「社會主義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具衝動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的確，中國的經濟計畫人員雖然先天傾向計畫經濟，但是他們也知道製造洗衣機或微波爐的產業對中國無關緊要，因此在1990年代，共產黨放手讓部份經濟區塊與社會主義正統思想脫鉤。但是具有策略性價值的企業，仍然牢牢掌握在國家手中。政府支持的獨佔事業至今猶存，尤其是軍火等敏感產業。奇怪的是，北京當局似乎沒有察覺中央計畫經濟體制的缺失。在幾個最重要的企業領域，中央政府仍然在嘗試運用一些早就證明行不通的觀念。

在那些理應讓自由市場觀念主導的經濟領域中，政府幹部還是千方百計要限制競爭。北京先前將幾個領域交由市場力量運作，現在又逐一收回，透過監控商品與工業產品價格的法規來管制。在其他經濟領域中，政府的干預更為直接。以民航為例，以前中國只有一家航空公司，名稱是拙劣的「中國民用航空總局」，理所當然的，這個名稱也指的是負責管理民用航空的政府機構。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家民航公司在1984年創立，但是要等到背五星旗的「中國國際航空公司」於1988年從民航總局獨立出來之後，中國民航業的分化才真正展開。這個過程後來衍生出34家航空公司，全國許多省、市先後加入。到了1998年，由於擴張過度，客機採購太多，中國民航業出現虧損。這時民航總局以管制者的身份出面干預，採取措施來終結大部份的競爭。從1999年初開始，民航總局以行政力量試圖讓民航業恢復獲利，它限制機票降價幅度，禁止隱藏性折扣，並要求減少國內民航公司的家數。

過不了幾個月，航空公司就開始陽奉陰違，而民航總局也祭出鐵腕措施，甚至暫時終止幾家公司的航權。儘管怨聲四起，民航總局還是繼續試圖控制票價。2000年4月1日，民航總局決定讓「共產黨治下的中國名副其實，真的對民航業實施共產主義。它訂出政策，國內108條主要路線的營收中，要提撥80%讓飛航這些路線的公司共享，分配比例則由班次和座位數來決定。一位民航總局幹部直言：「我們的目標就是要防範國內各航空公司打折扣戰，降低它們之間的競爭。」民航總局的確是盡全力消除票價折扣，但是它的新措施，雖然用意是要從財務層面懲罰折扣作法，其實還是默認了折扣作法會繼續存在。「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馬克思如是說，他無疑會贊同這種營收共享措施。還有一點，營收共享措施顯然也是為企業合併塑造有利環境。民航總局希望將中國的民航業帶回原點，如果不能做到雙重壟斷，至少也要達成寡頭壟斷，它希望國內民航公司合併到只剩三家。這是錯誤的作法，不過民航總局的管制幹部就像是托拉斯剋星(trustbuster)，可以與監督中國煉鋁業的幹部媲美。2001年2月，北京當局將中國所有的國營煉鋁廠合併為一家巨

型企業：中國鋁業公司，也創造出全球第三大煉鋁公司，在中國本國市場形成獨佔壟斷。中國的技術官僚顯然深信，在創造出具競爭力的企業之前，他們必須先消滅競爭現象。

北京當局就像是拳擊賽中緊張過度的裁判，一看到有拳手流血就要衝上去把兩人拉開。因此，民航總局不但不願見到大型航空公司破產，甚至連讓它們遭受一點競爭之苦都無法忍受。中國到目前為止的經驗顯示，雖然政府幹部願意做競爭實驗，但是他們對於市場的疑慮一直揮之不去。簡言之，中央政府認定，企業的管制者不應該是競爭，而是政府自身。

對於中國的石油業，北京當局更進一步，目標是要完全消滅競爭，而不只是加以限制。他們深信獨佔是通往發達與盛之路。到1998年年中之前，「中石油化工集團公司」（中石化）一直獨佔中國的原油提煉市場。另一家「中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中石油）則壟斷沿海石油探勘與生產。但是在1998年7月，兩大石油業巨擘進行了大規模資產交換，各自垂直整合上游與下游相關產業。中央幹部依省份將中國一分为二，中石化佔有中國的華東與華南，中石油則獨享華北與西半壁。政府的終極目標是要創造兩家巨無霸企業，好讓它們在遙遠的未來能夠與世界上其他勁敵一較高下。然而在夢想實現之前這段期間，政府不希望出現競爭。兩家公司在各自的地盤上都享有獨佔，彼此井水不犯河水。

但是兩家公司資產交換的墨澤未乾，中央計畫人員就很快了解到：雖然是政府控管的企業，只要一有自行發展的空間，還是會展開你死我活的競爭。在資產交換當時，北京當局規定，中石油可以在華南銷售剩餘的石油，只不過必須透過中石化的體系。中石油獲

現商機，資產交換一個月之後，它開始在江蘇省與上海——中石化的地盤——的加油站低價賣汽油。中石化也立刻降低油價作為報復，在華北與西部中石油的地盤上如法炮製。

中央政府的計畫就這樣被所謂的「毀滅性競爭」給毀滅掉，於是當局下令中石油與中石化停止競爭。依照北京當局的觀點，這兩大企業可以經由排擠其他小型公司來擴張自身，但就是不能相互攻擊。兩大企業被暫時拉開之後沒多久，中石油就在中石化的地盤上重新開展銷售業務。北京當局的三令五申敵不過國企的競爭本能。最後到了1999年3月，北京再度出面促成中石油與中石化達成協議，停止這場價格戰。一位中石油高階行銷主管形容：「我們可以坐下來，開誠佈公地協商下一波的價格調整。」可以想見的是，協議並無法遏阻兩大企業的競爭，它們的確也繼續纏鬥。中國的技術官僚現在應該了解一個人盡皆知的道理：周詳規畫的政府計畫永遠敵不過野心與私心。

與石油業的幹部一樣，主管中國電信業的幹部也偏好獨佔。中國以往只有一家電信業者，「中國電信」的獨佔地位可說是包山包海。民眾因為收費昂貴、服務惡劣而怨聲載道，北京當局原本不聞不問，直到它終於了解中國電信業基礎建設已經遙遙落後世界其他國家，事情才出現轉圜。1993年，國務院一道命令下來，「中國聯通通信」（中國聯通）獲准成立，至少在技術層面結束了中國電信獨佔地位。中國聯通原本應該能夠形成競爭的局面，結果事與願違，主管人員為了保護中國電信，刻意打壓這家後起之秀。

因此國務院為了進一步推動改革，在1999年2月下令分割中國電信。許多人認為這代表中國電信業的壟斷現象終於結束，其實更精

中國常見的情形一樣，新事物的基礎往往受人疑竇。新中關村是奠基於一樁中國最大規模的詐欺案。「海南民源」是一家多樣化的地產公司，在深圳股市上市，後來虧損掉大部份資產，並且在1996年偽造公司營收報告，虛報約95%的獲利以支撐股價。到了第二年，中央政府裁定，這家公司的主要股東——北京市政府的科學與技術委員會——必須負責（華北地區的科技委員會為何要去投資華南的地產公司？）。這個單位被迫出面挽救海南民源，雖然挽救行動並無經濟效益可言。這家公司應該申請破產，但是並沒有這麼做，因為當局擔心，10萬8000名憤怒的股東，在血本無歸的情況下會走上街頭。此外還有一個更複雜的因素：這樁醜聞涉及鄧小平的兩名子女。

真正有興趣解救海南民源的是國有資產開發專家朱中(音譯)。為了解決問題，北京科學與技術委員會承諾要將中關村變成「科技園區的典範」，並任命朱中為開發計畫負責人。海南民源的10萬8千名股東也將入股開發中關村的公司。因此，中國就為了挽回一個市政府委員會和兩名皇親國戚的顏面，搞出了個高新科技園區，並搭上了國家經濟策略。

基本目標達成之後，中關村的前景又如何呢？這回的宣傳攻勢更為誇大，任何與中關村有關聯的北京幹部都會告訴你：「21世紀屬於中關村」。江澤民的一名顧問也說：「中關村會變成像香港那麼大的高新科技城市。」中國希望中關村的發展一日千里，超越其他國家的經驗。中關村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冉齊生在1999年說：「我們要將中關村建設成全世界第一流的科技園區，在未來十年成為各方資金與人才競逐的焦點。」

到目前為止，中關村看起來成果斐然。園區的建築比以往更富麗堂皇，大樓林立，到2001年初，已經有8224家企業進駐中關村，幾乎是1999年底的兩倍。中關村的生產總值在1999年增加了27%，到2000年更提升47%。中關村有些公司的確表現優異，例如席捲亞洲的電腦製造商聯想公司。幹部當然是歡欣鼓舞，他們說就像鄰近的國明園以及中國歷代皇帝建造的其他壯麗建築一樣，中關村的成就就令人振奮。

但是這些事實能夠代表中關村的真相嗎？中共幹部最擅於粉飾太平，連國企在剛開始時都可以表現得很成功。新版本的中關村已經快速崛起了嗎？這個科技園區的真正挑戰並不在於初步結果，而是對整個國家的長期貢獻。高新科技業的產值增加，如果是掠奪自其他領域的進展，那對中國並無助益。

先不論整個21世紀，中關村與其他科技園區若想撐過十年，它們必須借助兩大要素：人才與資金。美國未來學家喬治·季爾德(George Gilder)說：「忘掉石油、黃金、土地、海床與外太空，21世紀最雄厚的未開發資源就是中國人。」中國人才輩出，中關村更是得近水樓台之便。包括中國兩大學府——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在內，中關村周遭的68所大學與213家科學研究中心，擁有十萬多名科學家。但是如何運用這豐沛的人才庫，卻是一大問題。中關村一位幹部段永基說：「我和北大與清大領導碰面時，他們口口聲聲說要以科學建國，問題是，建哪一個國——中國還是外國？清大有82%的理工科系學生畢業後前往已開發國家，北大的比例也高達76%。」根據官方統計，這些留學生只有三分之一會返國服務。無論是對清道夫抑或科學家而言，中國都欠缺吸引力。北京當局迫於無

確地說，國務院分割中國電信的計畫並沒有摧毀壟斷制度，只是創造了規模較小的壟斷。照國務院原先的規畫，中國電信將分割為四家公司，各自在特定的領域享有近乎獨佔的地位，四個領域分別是：固定電話線路、衛星通訊、無線傳呼、行動通訊。四家公司各自固守疆域，彼此之間相安無事。

然而，技術與其他層面的快速發展，卻擊敗了北京當局試圖控制競爭的謹慎政策。幹部終於明白，建立四家各自獨佔的公司在現今環境中根本行不通；而且未來電信業的發展與國務院1999年的規畫也是南轅北轍。如今中央愛談「五加一」，並沒比電信公司四分天下高明到哪裡去。依據現行的計畫，中國電信的固話業務將南北拆分，聽起來好像有比較多競爭，其實並沒多多少，因為中國網通和吉通通信這兩家電信業的新兵都將併入中國電信，結果，競爭者還是減了一個。這項新計畫的進步面，是中國電信和中國網通這兩家公司都可以在對方的地盤做有限的營運。然而，政府能為提振電信業所做的，應該不只是如此才對。未來將會有更多的參與者，更激烈的競爭，更大的開放性。後來主管人員對大趨勢讓步，發出更多營業執照，不過他們還是運用權力來強化中國電信的市場地位。可見即使到了這個地步，北京當局仍然企圖阻擋變化。

原因在於中央政府的技術官僚難以放手。他們正正確地了解到：全球經濟是被跨國企業所把持，中國的企業必須規模夠大，才能夠與跨國企業一決高下。因此幹部運行政命令，試圖建立大型國內企業。北京當局認定——或是希望——企業規模最終會導致企業成功，而且兩者都可以透過壓制國內競爭者的方式來達成。其實中央經濟計畫人員是倒果為因：規模是成功的結果而非原因，而且兩者

都是出自於競爭。北京應該要明白：規模是贏家的戰利品。中國經濟各領域的經驗也顯示，外強中乾的企業無法生存。北京雖然大談互聯網的前景，但是中央經濟計畫人員並不了解矽谷企業的發展模式——不斷的分裂與成長。只有讓大而無當的企業在謹慎控制的環境中營運，北京當局才能夠安心。

中國向外界張望，只看到一群來勢洶洶的競爭者，威脅本國企業。中央政府的本能反應就是要保護弱小的本國企業，因此會想控制——其實多半是限制——國內經濟的競爭。「長征」年代的元老雖然已經退出政府，但代之而起的幹部都是接受蘇聯經濟模式訓練，這些從莫斯科回來的留學生對企業競爭並無好感。北京當局難以理解，中國企業必須在市場中磨練生存技能，而且要從現在就開始做。163.net前任總經理張靜君說：「只有競爭才能夠帶來進步。」中國的技術官僚大可不理會她的觀點，但是中國的企業正面臨咄咄逼人的現實：總有一天，它們將要自力更生，憑自己的本事去競爭。

如果北京當局研究過中國哲學就好了。在西方「放任主義」(laissez-faire)興起之前，中國早就有「無為」思想，《道德經》說：「為無為則無不治。」古人開立的藥方，今日在中國應該好好運用。這個國家早已設想出正確的管理（更準確地說，是不要去管理）之道，現在必須重新學習自家先人的智慧。

如果中央經濟計畫人員不想聽從古代聖人之言，也許他們還肯接受「南昌天使」——提布斯的建議。提布斯與其他無數外國人士對於如何讓中國經濟現代化，都有滿腹的理念。提布斯在南昌與廣州的工作可能只是個起點，這位有創意的銀行家知道如何對症下

業，但是中國已無緣享有他的專業素養。2000年7月，提布斯的上司將他調到漢城，讓他更能發揮所長。提布斯原本以為他可以在花旗銀行上海分行一直做下去，因為發展中的中國有太多事情可以做。但是中央幹部抗拒改變，外國銀行前景黯淡。因此提布斯在上海待了十多年之後，終於到別的國家去改變當地的金融體系。這是中國的一大損失。中國仍然會進步，不過將是依照自己的方式與速度。

加速器先生

北京的企業政策不僅要讓老企業苟延殘喘，同時也扼殺新興企業的生機。如果邢菲想到這一點，她一定深有同感。因為今天晚上，紐約翠貝卡區 (Tribeca) 一家專門展出中國現代藝術家作品的畫廊舉行開幕典禮，邢菲是一個人出席。美國恐怕還不太能接受虛無主義中國藝術家的作品，他們以「行動藝術」為名，在雕刻中使用人類屍體，再不然就一次刺穿幾十隻活的爬蟲，並且用電線懸吊起來。因此在2000年6月的這個晚上，翠貝卡區這家新畫廊也不會展出這一類藝術。同樣缺席的是邢菲的丈夫丁崖·拉卡卡 (Dinyar Lalkaka)，他遠離自己的藝術家妻子與一歲大的孩子，隻身遠赴他已去過多次的上海，為加速開展他的網際網路加速器 (accelerator) 一或他所謂的「互聯網孵化器」(cyberincubator) 而努力。邢菲在畫廊中向一對來自上海的夫妻探問丈夫的情形，這對夫妻似乎比邢菲還清楚她丈夫的近況。

父親的過錯經常會在兒子身上重現，而父親的熱情也往往傳承給兒子。丁崖就是繼承了父親魯斯坦·拉卡卡 (Rustam Lalkaka) 的熱情。魯斯坦曾在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工作，也是第一位將「孵化器

(incubator，譯按：即企業育成中心或創業服務中心) 觀念引進中國的人士。所謂「孵化器」，就是要為新成立的公司提供原始資本 (seed capital)、技術、管理以及其他十多項新企業需要的條件。魯斯坦在1987年將「孵化器」的觀念帶到北京，如今中國已經有逾120家政府支持成立的「孵化器」機構，在全世界僅次於美國與德國。魯斯坦也將孵化器觀念引進他的祖國印度，然而成效不彰。但對近年來的中國而言，只要能讓幹部扮演重要角色，政府願意嘗試任何一種現代化的做法。

現在魯斯坦的兒子丁崖要將父親的「孵化器」觀念引進中國，但是要加入私有企業的成份。因此丁崖定期造訪上海，尋求機會建立中國第一個私人出資的孵化器，服務對象則是高新科技與網際網路業的新公司。丁崖在上海結識了交通大學的錢振英教授，上海交大不僅是著名學府，同時也是江澤民的母校。錢振英是上海這座繁忙城市的大忙人，他負責「上海慧谷高新科技創業中心」，這家機構是上海交大跨足企業界的嘗試；錢振英同時還是「上海慧谷創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的總經理。「慧谷」這個名字代表「智慧」與「山谷」。錢振英的智慧告訴他要運用拉卡卡父子的才智來為祖國服務，或者至少是為他涉足的領域服務。上海希望大學建立輔助企業創業的孵化器，拉卡卡父子正好提供絕佳的機會，並趕上中國最新一波創新的熱潮。

錢振英儘管已接近退休年齡，但是依然滿頭黑髮，只有髮根處稍見灰白，這是共產社會中有錢有勢男性的共同特徵，地位重要、經常要照相的幹部，無論年齡多大，必然會有一頭適合拍照的黑髮。因此共產黨員的基因中，頭髮的遺傳一定特別優秀。相較之

下，丁崖雖然比錢振英年輕十多歲，但是這位紐約客滿頭灰髮，只有眼鏡框是黑色的。如果丁崖身為一個共產黨員，外貌肯定會比現在看起來年輕得多。

不過丁崖可是個資本案，他與父親在曼哈頓聯手創立了「企業與科技發展策略機構」(Business & Technology Development Strategies)。拉卡卡父子自稱為「國際諮詢顧問」，創立的機構員工只有兩人(他們父子)，但丁崖指出：「我們有品牌」，而錢振英也正是受到他們品牌的吸引。因此上海慧谷與拉卡卡父子在2000年初決定設立中國第一家私營的「互聯網孵化器」，服務對象以網際網路企業為主，兼及高新科技業。他們為這項歷史性的事業取了一個時髦的名字「大康」，來自英文的「dot com.」(網路企業)的中文音譯。

當今科技是中國最炙手可熱的事物，大康也在媒體上掀起一股熱潮，中國日報以頭條標題「互聯網孵化器終於實現」大幅報導，告訴我們大康的成立有賴於「小型企業援助與創業發展的全球先驅」的協助，也就是拉卡卡父子的「企業與科技發展策略機構」。這真是中國了不起的發展！可惜只是表面現象。慧谷安排買下一處舊日的製鞋工廠，改建後供大康使用。大康將會享有歷來對外國人最有利的租約，時間長達15年；對變動不居的上海而言，15年有如永恆。更重要的是，上海交大——中國最頂尖的科技工程學府之——的師生將會投入大康，任何一家孵化器都需要這些人才。因此大康已經萬事俱備，升火待發。

好事傳千里，而且似乎各路人馬都想分得大康的一杯羹。2000年9月，錢振英教授與一個急切的美國人賴瑞·黎納迪(Larry Rinaldi)

會面，聽他說明他與合夥人可以為大康的股東引進多少資金，這時錢教授眼睛幾乎要冒出美金的符號。黎納迪口若懸河，不時夾雜著「利益共享」這類的話語，但是錢振英很快就掌握重點：慧谷將會得到更充裕的資金，來從事高新科技與網路事業。錢振英對黎納迪說：「中國有龐大的市場，趕快進攻。」兩個人相視而笑。

不過還有個問題，雖然黎納迪與合夥人想投資，但是大康還沒有成立。拉卡卡父子想在新公司名稱加上「企業加速器」這樣的字眼，可是上海市政當局不同意新公司以「大康企業加速器」的名稱註冊。丁崖表示，上海市府幹部認為這個名稱「過於創新」，至今仍然不同意註冊。

還好問題不大，丁崖說：「政府在意的事情對我來說是無所謂。無論以何種方式，這家孵化器一定會成立，這是大勢所趨。」丁崖能夠這麼樂觀很好，因為另一個問題又出現了，而且更為嚴重。錢振英告訴丁崖，他的孵化器恐怕會違背法令。拉卡卡父子已經投入一筆資金來推動大康，並雇用了七名員工。如果公司成立後又被當局勒令關閉，員工們該怎麼辦？

錢振英所擔心的似乎並不是員工問題。他已經57歲，而教授的退休年齡是60歲。他對丁崖解釋，在中國現行體制下，他如果冒險推動大康成功，也不會得到什麼獎勵；可是如果大康失敗，他很容易就會受到懲罰。足智多謀的錢教授想出一個不會危及他退休金的計畫，他知道在國家主導經濟的體制中該怎麼做：引進國家的力量。他認為中國私營的孵化器沒有理由不讓政府投資。錢振英希望政府透過各部門出資，買下大康一大筆股份，再加上交大的持股，國家就會在大康公司中佔絕大優勢，因為交大也隸屬於國家。依照

拉卡卡父子與錢振英原先的協議，拉卡卡父子擁有大康一半股權，但是現在只剩下不到四分之一。「交大懇求他們介入。」丁崖說。「他們」指的是上海科學技術委員會，北京當局可望透過這個機構對大康投資。委員會主任丁學祥非常積極，他對丁崖說：「告訴我們，我們能幫上什麼忙？」

在一個想擁有一切的威權國家中，拉卡卡父子的磨難實際上是必然會發生的。但是大康的競爭者從一開始就解決了這個問題。「波士頓諮詢公司」與「上海聯創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合作，創立了號稱是中國「第一家」孵化器公司，丁崖對這個稱號當然不同意。上海聯創的老闆是江澤民的兒子江綿恆。在一個政治主宰一切的社會中，延聘高層領導的子女是明智之舉。拉卡卡父子很快就會明白，中國並沒有像它表面上改變那麼多。丁崖指出，中國與印度可以領導網際網路世界。的確，中國可以達成任何目標，但前提是要由國家掌控。到今天為止，大康公司雖然備受媒體矚目，但依然是鏡花水月，始終沒有辦法化為現實。在今日的中國，好消息發布之後，往往要經過漫長的時間才有機會美夢成真。

拉卡卡父子已經明白什麼叫做「勢不可免」，中國的法規千方百計抵制私有企業，他們知道惟有接納錢振英的建議，讓國家介入，大康才有可能創立。原本是一家私營的孵化器公司，到頭來卻成了國企。根據大康的營運計畫，對於它所「孵化」的高新科技與網路企業，大康將持有股份，因此國家也將間接持有這些公司的股權。簡言之，這些「新經濟」企業會變成部份國有，甚至有可能成為國企。不過，對於一個80%創投資金來自政府的國家而言，這其實是很正常的現象。

科技在中國的進展似乎已是無人能擋。中國人認為，高新科技前景能夠讓國家大幅超越其他國家。將高新科技加上廉價勞動力，就可以調成一杯醉人的雞尾酒。擁有古老文明的中國一直想恢復往日榮光，高新科技正是希望所在。

當科技大步邁進，國家也不甘落後。中國註冊商標的社會主義，前提是少數人可以為了全體的福祉來控制多數人的經濟行動，這種思想是人類樂觀主義的極致表現。北京當局設定一個經濟目標時，都堅信一定能夠達成，這也是最強而有力的正向思考。中央政府計畫人員說到做到，他們可以灌混凝土、鋪設電線、綠化環境，只要你能畫出藍圖，他們就能化為現實。他們不但能夠建造出新天地，而且他們身為威權國家的統治者，還能夠讓你非進去不可。

如今他們就在建設新天地，這地方坐落於北京西北，由江澤民親自督導。這項計畫非成功不可，它將是江澤民遺留給中國的主要績效，殆無疑義。離圓明園不遠處，是中國第一個國家級的高新科技工業園區。這個號稱是「中國硅谷」的地方就像達賴喇嘛一樣，也是轉世化身。1988年，國務院初次嘗試將各大學的研究成果產業化，在北京西北的中關村設立了一處開發區。中國各地很快就建立起類似的特區，但是大規模的模仿並沒有帶來成功。後來中關村雲集了一堆盜版軟體商店與所謂的「螺絲起子店」——專門組裝沒有品牌的電腦。運用的科技99%來自國外。別的高新科技園區的發展過程更糟，而且至今並無起色，其中一些只是掛著前瞻性名稱的房地產開發計畫。況且中國近來幾乎任何事物都與高新科技掛鉤，連中藥隆乳都可以算上。

北京正捲土重來，舊園區被更新、更大的園區取代。不過就跟

奈，每隔一段時間就公布鼓勵海外留學生回歸祖國的獎助計畫，但除非中國政府能開創出讓人民樂於生活的社會，否則這些計畫永無成功之日。

中國也不缺資金，問題是這些錢可望而不可及。中國大部份資金都以小額銀行帳戶的形式綁死，而銀行業向來都忽視私有企業，直到最近才開始借貸給它們（當然是迫於政府要求）。人民銀行的領導叮嚀國有銀行要聽從從中共中央與國務院的，於是這些銀行就像先前挽救國企那樣，大膽採取行動支援中關村。銀行的理念是：中關村科技園區拿到銀行貸款後，會撥交給合格的新創業公司。但是這項計畫有其先天缺陷，註定要釀成另一次信貸危機。政府幹部並不擅長挑選企業界的明日之星。已經有債債困難的銀行，將眾多小額存款戶的終身積蓄移作高風險投資，這種作法恰當嗎？答案顯然為「是」。無怪乎有數以千計國企看到天賜良機：它們只要掛上高新科技的名號，就能夠再向銀行借到錢。

中關村數千家新創公司以及國家支持的另外52個科技園區，需要的不只是銀行貸款，還要能夠吸引外國資金，不過這並非易事。鄧小平的女兒鄧楠楠及創業投資時說：「創造理想的架構，比單純吸引資金要來得重要。」但是當中國致力於創造「理想架構」時，國家的前景卻日益黯淡。當年鄧小平展望世界時，他知道沒有什麼事物是「理想」的，應該實事求是。不過鄧楠楠說出那種話也是情有可原，畢竟她是生活在江澤民主統而僵化的中國，她的言行都反映了時代的氛圍。

現在中關村大約有十家創投基金，不過規模都很小，而且大部份都接受政府資助。但是中國需要無數外國創投專家的豐厚資源，

他們擁有資本、經驗、技術與判斷力。他們是能夠帶動大局風起雲湧的關鍵人物。中國還必須容許高新科技公司進入國外的股市，來維持初步的成長。但是中國高新科技業只要看看與他們血緣相近的網路公司，就會知道前景並不樂觀。網路公司在外國股市上市的過程可謂困難重重，原因不外乎官僚內鬥，而且當局擔心外國力量主導網路這個新興產業。中國入口網站的國外上市計畫因為多項爭議而延誤，等到終於站上納斯達克市場時，網路熱潮已經退燒，因此所能吸納的資金遠低於先前預期。如果中國的高新科技業面臨相同問題，中關村將一蹶不振。北京正在因應這些對科技園區事關重大的問題，但是進展極其有限。共產黨只知坐而言，不知起而行。

要期待外國投資者大舉進軍中國高新科技業，還有一項困難必須先行解決。中關村的企業約有半數深受所謂「所有權症候群」之苦，肇因於模糊的法規與含混了事的文化本能結合。園區的私有企業需要資金，但是必須它們先證明能夠保障投資人的所有權，否則將求助無門。中關村三大本土的高新科技企業：聯想、北大方正、四通集團，起家時都是國企，因為要讓政府降低持股，它們募集國外資金的計畫都一再延誤。不幸的是，在一個連私人資本都不受歡迎的國家，政府降低持股的過程通常是慢條斯理。一些政府資助的孵化器會宣稱以獲利為目標，來塑造自身是私有企業的形象，不過丁崖·拉卡卡指出，那種形象純屬虛構。

就算中關村真能招募到足夠的人才與資金；就算中國真的停止侵犯智慧財產權，並為投資者提供健全的法律保護框架。還有一個大問題擺在眼前：威權社會能夠孕育創新發明嗎？蘇聯與中國自己都曾證明，他們在某些特定條件下做得到創新發明，例如他們能研

發出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然而，中關村是在一個比以往更自由的世界中決定其命運。理論上，中國共產黨可以一方面容許科學創新所需的開放性，一方面維持封閉的政治體制。但是，中關村亟需的科學與財務菁英恐怕不願接受這樣的條件。人們總是想呼吸自由空氣，而且只要能夠做選擇，他們會離開不自由的环境。不過江澤民仍然深信，社會主義中國一定可以成爲一個科技領先的大國。在2000年6月一場鼓勵科學發展與工業化的演講中，他談到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思想體系，因此支持創新發明。

當然，拿北京中關村與加州矽谷來相比是不公平的，雖然中國官方媒體就是用「中國的矽谷」當做中關村的標籤。但是如果拿印度的邦加羅爾（Bangalore）來比較，中關村將黯然失色。印度政府對邦加羅爾的開發計畫約與中關村同時展開，今天邦加羅爾已經在生產原創性的產品，讓中關村的本土企業望塵莫及，而且中關村的產值遠遠落後邦加羅爾。印度出口的軟體是中國的六倍。這些差異反映了更基本的問題：在資訊產業方面，「現代化」的中國追不上「落後」的印度。

今天你在中關村還是買得到偽造的身份證件與盜版軟體，而中國本土的科技更是鳳毛麟角。中關村裡仍然找不到破舊的街巷，在許多方面都像個貧民窟。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中關村已成了不肖企業的避風港，以其優惠稅制招徠根本沒有在園區設廠的公司。中國政府企業政策從過去到現在所犯的的錯誤越來越明顯，許多方面的實質進展都少得可憐。當然，事情在2010年之前還是有可能發生變化，中國政府訂出雄心萬丈的計畫，要讓中關村在2010年稱霸全球。然而，如果參照過往的紀錄，中國政府屆時恐怕要開始設法挽

救中國的高新科技業與科技園區。因為政府的強力介入，中國今日創建的高新科技公司，將會淪為明日的錯誤。北京當局抱持著史達林年代的老舊觀念，它發展高新科技業的方法仍然是50年前建立重工業時用的那一套。

政府激勵產業的措施在本質上並沒有麼不對，而且幾乎每個國家都會施行，只是方式不同。例如美國的矽谷就是在聯邦政府的優惠措施中發展，不過美國政府只提供原始資本，後來矽谷的企業逐漸自立，整個矽谷地區與資訊產業也是如此。相較之下，中國於鄧小平時代建立的「經濟特區」，在廿餘年後巍然獨存，而且目前還在為往後的卅年做規畫。當年建立特區的目的是要刺激廣東省的經濟發展，這個目的早已達成，特區多年前就不再有存在的必要，但是它們至今仍享有諸多特權。今天中國存在近12000個特區，數量多到讓北京中央政府難以掌握。特區在中國已經體制化：只想控制一切的中共中央不願意採取必要步驟，建立一個更自由，更健全的體制。為什麼不能讓整個中國變成一個大特區？

因為中國不能，所以政府的高新科技產業計畫將難逃失敗的命運。中央經濟計畫人員面對經濟發展的觀念理論時，已經江郎才盡。高新科技園區很類似毛澤東的人民公社與國企：它們與社會其他領域隔絕，需要國家的強力支援才能夠發展。我們不難了解，為什麼每當技術官僚想要有所成就時，他們就會把一塊土地圍起來畫定為發展特區。中國的經濟體系充滿了禁令與限制，非常不利於成長與發展。對一個有限的地區授予特權，遠比改變整體經濟的基礎架構來得容易，儘管後者才是當務之急。特區讓計畫人員可以進行小規模實驗，而且這種作法比較符合一個謹慎體系的本能反應。不

過計畫人員會以授予特權來促進經濟發展，還有一個原因：透過決定誰能夠受益這樣過程，他們可以繼續掌握大權。

因此中關村雖然號稱代表中國的未來，實際上卻只是過去的迴光返照。北京當局很自然地選擇一個與社會隔絕的區域，來發展高新科技的新興企業，並且直接提供各種形式的協助。進入WTO遲早會消滅中國這些特區，因為WTO的法規禁止歧視性措施，但是北京仍然計畫加強中關村與其他高新科技園區的發展。這麼多年之後，中國還是要重蹈覆轍，改不掉濫用政府補助的惡習。

現在問題是，中國的高新科技業是否能破除以往的發展模式。依據17世紀初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說法，歷史上的三大發明是火藥、羅盤與印刷術。三者都要歸功於中國人，但是中國並沒有善加利用優勢，反而不再發明創新。到了明、清兩代，中國與遙遠陌生的外在世界斷絕來往，甚至停止了學習。早在歐洲發生工業革命之前數世紀，中國就已擁有工業革命的所有要素。但是由於各種原因，中國變得腳步蹣跚。為什麼一度擁有全世界最強大文明的中國，在即將邁進燦爛未來的時候卻停滯不前？這是歷史的一大謎團，還有待學者繼續探索。江澤民不是學者，他迫不及待要確保中國這回能夠馬到成功。也許中國在一千年前所做的努力不夠。

魯斯坦·拉卡卡看得出來中國這次不想再犯相同的錯誤。他在2000年10月造訪的幾家中國孵化器都得到強有力的支持，非常明顯，國家供應的資金通常不必付利息，因此這些孵化器就像先前的國企一樣，完全沒有資金成本的觀念，它們的辦公大樓富麗堂皇，對空間的運用已到了「奢華無度」的地步，看起來就像《財富》雜誌五百大企業的總部。魯斯坦說：「它們並沒有嘗試去自給自足。」

事實上魯斯坦造訪過一家由「上海國際孵化投資公司」經營、政府資助的孵化器，開張沒有多久，就因為開銷過大而需要政府紓困。為了快速啟動上海的網際網路企業，市政府在浦東地區成立了「上海張江高科技園區」，同時也想刺激當地的發展。不過這處科技園區位置實在太過偏僻，國方與進駐廠家至今都還在慘澹經營。中國正在揠苗助長，而且想一次完成太多目標，因此註定將再度失敗。

今日中國全心擁抱高新科技的發展與商業化，希望中關村在2010年之前成為全世界最先進的科技園區之一。這目標要如何才能夠達成？中關村管理委員會副主任任再齊說：「我們正試圖說服政府給予我們更多特權，比照深圳與上海。」江澤民的口號告訴我們，科學與技術是「最重要的生產力」，不過負責科學與技術的幹部卻似乎認為：政府介入才是成功的關鍵。江澤民應該不會再讓中國犯下明、清帝王的錯誤，不過他正在重蹈一個近代統治者——毛澤東——的覆轍。江澤民就像他的前輩領導人一樣，付出的努力可圈可點，成果卻乏善可陳；今日中國高新科技業的產值，還不到整體經濟產值的2%。

2000年4月的一個晚上，丁崖·拉卡卡在上海宴請賓客，其中一位對他說：「今天的大學畢業生沒有人想為國家服務。」丁崖回答：「也許這就是為什麼馬克思會說『國家將逐漸消失』。」丁崖剛從紐約飛抵上海，宣布他的孵化器正式成立，為新中國注入希望。但是錢振英還沒有告訴他，他的「大康企業加速器」必須將大部份股權讓渡給國家。在中國，國家的角色應該要逐漸消失，但是目前顯然時機尚未成熟。

國家的希望

「如果將今日的中國與毛澤東時代末期、1976到79年我見過的中國相比，兩者差異之大，實在難以想像。」新加坡資政李光耀如是說。這是一個清朗的夜晚，李光耀坐在黃浦江東岸，他的下方是燈火輝煌的上海，浮華奢靡，充滿魔力。當我們為上海的燈火而目眩神迷，自然會認定中國將繼續進步，成功在望。我們和李光耀一樣，還記得中國的過往，因此認定中國一定要繼續發展。

就像燈火照耀著上海夜空，我們也很容易相信江澤民，他近來的言論似乎總是發人深省。官方媒體一再向我們保證，江主席一直在為12億5000萬人民的福祉兢兢業業，他自己也說這是中國每天都要想到的問題。但我們知道，事實上江澤民並沒有這麼做。如果他真的是為人民福祉考量，他會立刻將經濟自由化，讓無數中國人民改善自身生活。但我們知道江澤民不會這麼做事實，他說：「中國共產黨自1949年以來，歷經了革命、建設、改革等階段，依然掌權，這是因為共產黨是生產力的先鋒。」事實真相是：帶領中國走向未來的力量是中國的人民。共產黨能夠繼續掌權，原因並非他們是什麼「先鋒」，而是因為他們以警察國家的威權壓制人民，有時甚至將人民逼上梁山。

江澤民看到當年東歐共產國家情勢一發不可收拾，終於崩潰，因此千方百計防止另一場革命在中國爆發。他知道，只要各種力量稍微加快一點，共產黨就大勢去矣。江澤民為了建功立業，已經甘冒上台以來最大的風險，支持中國入世；但是他無法再負荷推動其他大膽經濟措施的責任，因此這些措施也不會出現。中央政府主導

經濟雖然是個陳舊乏力的觀念，仍然會繼續施行。江澤民對過去念念不忘，他好像認為中國只要能維持現行體系就夠了。無論是經濟抑或其他問題，江澤民的解決之道都是強化黨的力量。

江澤民無法擺脫政治的陰影，因此我們聽到的解決方案幾乎都是來自已經消逝的年代。北京當局嚴密管控經濟，因為就像中國大部份事務一樣，這關係到黨的生存。經濟領域中任何解決問題的方法，都必須先通過意識形態的檢驗。共產黨告訴人民，只有黨才能夠正確掌握歷史力量，為中國造就強大的經濟。黨怎麼可以讓人民知道：由無數平民百姓匯聚而成的市場力量，也可以達到相同目的？市場競爭在本質上等同於混亂。但是江澤民要求秩序，特別是近來社會動盪不安，秩序尤其重要。中國企業的創建與毀滅，仍然決定於計畫人員而不是競爭。

當中國展開社會主義計畫經濟的冒險——改造國企，政治依舊控制著經濟。改造國企至少還可以讓江澤民誇耀一番。1999年，當國企出現獲利的報告，中央計畫經濟人員都露出微笑，當局竟開始宣揚傳統輕工業紡織業成功的消息！中國紡織業連續六年的虧損到1999年終於結束，還比預訂計畫提前一年。如果國家的政策能夠在紡織業成功，那麼在別的領域一定也能暢行無阻。但是，2000年1月還沒過完，紡織工業的主管人員就已經向北京當局求援。一名地方幹部說：「如果中央政府停止對紡織業改革的政策性支持，所有先前的努力都將付諸東流，使紡織業再度陷入貧困與苦難。」事實上，中國紡織業根本沒有出現過轉機，它和以前一樣完全仰賴政府的支持。在這個沒有時間壓力的國家，企業無論大小，都要靠政府財源餵養，而且讓國家日漸削弱。中國正在設法卸下國企的重擔，

但同時卻又措起新增的負擔，例如科技園區與其中的高新科技公司。

未來還有其他領域需要中央政府援助。現在公營媒體機構與主管人員正想辦法從網際網路獲利，方法則是建立自己的網站。這些網站會成功嗎？一位中國的私營網站業主說：「企業家每天工作24小時，而且是拿自己的錢來投資。政府部門根本不是對手。」但中國政府還是要放手一搏，也經營商業網站的亞洲華爾街日報，在2000年4月26日的一篇報導中說：「這又是一個例子，中國政府硬要闖入它根本不應該涉足的產業。以官方企圖施加的管制來看，他們的網站註定要失敗。」更糟的是，多家政府網站可能會聯合經營，並拒絕提供內容給私營網站，藉此取得競爭優勢。這種作法將會扼殺網路欣欣向榮的私營領域。更有甚者，北京當局在2000年1月與9月發布的法規，就是要刻意強迫私營入口網站，如果不想關門，就得被官方網站併購。因此惡性循環再度展開。首先是重工業，接著又是網際網路，中國政府什麼時候才會學到教訓？

所以，江澤民同志，你還是保得住工作。馬克安諾搞錯了，共產主義至今仍然在中國不可一世。不過如果要問「全世界還有多少個共產黨組織？」這問題將沒有正確答案可言。

第六章

銀行淪亡錄

中國的銀行來日無多

中國政府不會愚蠢到坐視國營金融體系崩潰。

——龍安志 (Laurence J. Brahm)

銀行是毛澤東主義計畫經濟失敗的象徵，也是當今中國經濟最脆弱的一環。但是，如果能讓饒才富掌管中國蹣跚掙扎的國營銀行，情勢或許會大不相同。

饒才富是福建省龍巖市中國農業銀行新羅區支行紅坊營業所主任，根據新華社的報導，他任職十八年來表現優異，經手三千多件貸款案，總金額高達2億2000萬人民幣（約合美金2660萬），這段期間內不但沒有客戶違約，甚至連延遲償還的情形都未曾出現。

是的，如果讓饒才富指揮全局，中國的銀行就不至於陷入嚴重的償債困難，中央政府也不會被迫面對混亂的金融體系。然而就是

從這裡，從金融體系，現代中國的淪亡將揭開序幕。

金融體系自身的終結則是從沙丘的盡頭開始。一幅白底紅字的旗幟，雖然外觀令人想起中國早年的苦難歲月，但是上面的訊息十分友善，也很能引起民眾注意：「歡迎加入農村信用合作社」。這間單層的泥磚建築，其實是甘肅省西部敦煌縣的金融中心，在四週沙漠的環伺下，分外顯得脆弱。窄路另一邊的巨大沙丘，隨時可以埋掉這間破房子，不過民眾還是會到這裡存錢，他們向來是這麼做。

民眾也會來到北京市中心「中國銀行」的總部，華裔美籍建築師貝聿銘為現代中國銀行體系設計了這座紀念碑般的建築。貝聿銘的父親在1918年創立了中國銀行的香港分行，貝聿銘自己在1980年代也為這座分行設計風格大膽的大樓，大樓距離他在廣東的出生地不遠，比北京總行的建築更令人印象深刻。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的底層是以巨石堆積，宛如一座中世紀古堡。從底層衍生出成三角形形式的金屬與玻璃結構，後來貝聿銘也對北京總行運用類似手法。這座香港分行融合了創新風格，深受全球建築師景仰，被譽為建築史上的重大成就。落成時是全世界第四高的大樓，如今則位居第七。

從北京雄偉堂皇的中國銀行到敦煌簡陋破落的信用合作社，中國的金融體系充斥著存款，數億人民將終身積蓄寄託在其中，累積成一個偉大國家的財富。中國的儲蓄率在全世界數一數二，年復一年，平均都在40%左右。相較之下，美國人的儲蓄率幾近於零。到2001年底，中國各金融機構吸收的家庭存款已經相當於8941億美元。

中國的銀行擁有世界一流的存款戶，而且這些存款戶沒有什麼選擇。如果中國的銀行家只走到這個地步，那麼他們會被視為皇族

貴胄，深受全世界的同行艷羨。可惜的是，天意要讓中國銀行家坐上貧瘠荒蕪的王座，他們想盛裝出巡，但卻沒有多少地方可去。除了國企以及中央政府恩准的企業之外，中國的銀行家沒有別的對象可以放款。因此，在中國的封閉體系內，銀行業既是受益者也是受害者。

「資產」反而是中國銀行業最大的負擔。銀行貸出的款項——也就是金融業所謂的「資產」——大部份都「無法履約」(nonperforming)，金融業用的這個禮貌性辭彙，意思其實就是拖欠償還貸款。國企沒有能力或不願償還銀行貸款，因此今天中國正在發生一場無聲的危機。中國的銀行體系究竟受到多大的損害？

如果你真想知道答案，那就不要去問中國的中央銀行——中國人民銀行。人民銀行的技術官僚向來壟斷資訊，有時連他們自己都不願意面對現實。他們在1999年底表示，中國各商業銀行的貸款有25%是逾期放款，但是沒有人把這個數據當一回事。過了一年後，人民銀行又宣布，由於政府的再資本化(recapitalization)計畫奏效，因此為這些銀行解除了1兆3000億人民幣(約合美金1570億)的逾期放款(壞帳)。儘管如此，人民銀行仍然表示，商業銀行的壞帳仍然高達25%。換言之，一場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再資本化計畫，對銀行業的體質其實並無明顯助益。

中國商業銀行的真實狀況到底如何？1999年底這些銀行的壞帳比例，史坦普(Standard & Poor)投資服務公司估計最高可能已達70%。其他評估多半在40%上下，不過40%的估計顯然是低估。德國金融業重鎮德意志銀行最近一項分析指出，中國的銀行貸款有50%是逾期放款，而史坦普認為這數字是下限。曾經負責德意志銀行中

國地區業務的約翰·舒特（Johannes Schoeter）說：「我知道得越多就越感到悲觀。」今天我們對中國商業銀行的真實情況仍然所知不多，最樂觀的看法是：那1兆3000億人民幣的再資本化計畫，應該已經在2000年間將壞帳比例由50%上下降到30%。對照來看，如果以中國的寬鬆標準來衡量，美國銀行業壞帳的比例大約只有1%，低到無足輕重。

還有，北京當局到底回收了多少逾期放款？中央政府的技術官僚估計至少30%，甚至可能高到40%，不過這種說法並不可靠。中國金融業的統計資料根本不具公信力。最近外國專家估計，回收率大約只有10%，這數字比較符合中國企業破產的情形。假定正確答案是20%，那麼中國整個銀行體系無法回收的貸款高達4900億美元，這可是天文數字，不過問題最可怕的一面在於：沒有人真正了解中國銀行體系脆弱到何種程度。一位中國首要銀行的高級主管坦承：「要搞清楚國有銀行有多少壞帳，可不是簡單的事。」中國的經濟計畫人員陷在金融的大黑洞中，如何能夠為中國計畫未來？

然而北京高層幹部似乎並不怎麼擔心這些問題。朱鎔基總理曾經表示，中國的金融機構大致健全；國家審計署副署長劉家義也同聲附和，他在2000年初向全國人民保證：「根據我們的稽核，中國的銀行體系營運良好。」

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司長戴根有強調，中國正在以「實事求是」的態度來解決銀行問題。不過所謂的「實事」在人民銀行幹部眼中，遠不如在外國人士眼中嚴重。這其實是定義問題，中國既然可以自認是「民主」國家，當然也可以認定銀行貸款情況良好。中國的貸款分級制度讓「樂觀主義」有了新意義：多年未償付或是債務

人已破產的貸款，仍然被歸類為可履行的貸款。中國目前正在改進貸款分級制度，用心值得稱許，但恐怕無濟於事，因為真正的壞帳會每年重新議定，在帳面上看起來一如新承做的貸款。

在有心探索事實的人看來，問題相當嚴重。麻省理工學院（MIT）教授魯迪·多恩布許（Rudi Dornbush）與義大利波可尼（Bocconi）大學教授法蘭西斯柯·賈瓦濟（Francisco Giavazzi）指出：「對許多觀察家而言，中國銀行業問題的嚴重性在全世界數一數二，甚至可能是最嚴重的案例。」這樣說還是太輕描淡寫，在任何自由的經濟體中，這樣的銀行早就會宣告倒閉。中國不正常的金融體系之所以還沒有全面崩潰，原因在於北京當局在周圍築起高牆，並限制銀行業的解決方案。當政府財政大員不斷拖延解決措施，問題日益惡化。中國規模最大的「中國工商銀行」已經開始為客戶提供財務規畫服務，它是不是應該建議客戶把存在中國銀行裡的錢全部提光？

也許不必，因為中國的銀行儘管百病纏身，但是在中國金融界的大家庭中，看起來還是健康的一員。遺憾的是，大家庭中有別的病人。中國農村金融的骨幹——42000家農村信用合作社——如今正奄奄一息，有人估計它們的壞帳是商業銀行的兩倍。聽起來難以置信，但中國農村金融部門的確是問題叢生，而且絕對已出現償債困難，這一點連人民銀行的統計數據都無法隱瞞。人民銀行名義上負責管理這些信用合作社，但實際上並沒有進行監管，而且除非出現農民恐慌性擠兌，人民銀行似乎也很少注意鄉村金融部門。

對於中國金融界難以啟齒的一個角色——非法集資公司，人民銀行似乎也坐視不管。實在很難相信，在這個由北京當局掌控的

「半警察國家」中，居然有人可以不經許可就設立一家小公司，公然與合法銀行競爭吸收存款。但是現在中國全國遍佈這類公司，經營者有時就是中共的地方黨部。中央政府官僚對社會的掌控顯然逐漸力不從心。人民銀行訂定存款利率，全國遵行；現在為了刺激滯滯的經濟景氣，利率已經降得很低。非法集資公司付的利息遠遠超出人民銀行的上限，因此大受存戶歡迎。舉例來說，西部大城重慶自1993年以來冒出一百六十多家非法集資公司，並且造成社會嚴重動盪不安。

現在幾乎每個星期都會爆發一樁非法集資公司倒閉案，這些公司經營不善，資金不足，因此體質很不穩定。當非法集資公司倒閉，投資人走上街頭，國家就只得花錢消災，爭取時間。過去人民銀行關閉惡名昭彰的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廣信）時，外國債權人空手而回，不過廣東省政府卻清償了一群廣信的債主——廣東當地的存款戶，儘管他們的存款是違法的。北京當局最不願看到民眾自發性地表達憤怒，而最能夠刺激民眾走上街頭的事件，莫過於非法集資公司倒閉。現在我們終於知道，為什麼北京當局要開始處決高利吸收存款的業者。但比較可行的作法還是應該放鬆那些在商業上不可行的限制，由市場決定利率高低。人民銀行大可發號施令，但市場終究會以某種方式贏得勝利。人民銀行認定集資公司違法，但它的低利率政策勢必難以維持。

人民銀行從關閉廣信開始，嘗試對非法集資公司開刀。之後又關閉了幾家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同時也合併了幾家，然而這個弊病百出的行業並沒有得到多少實質協助。中國的官僚喜歡拖延，全面改革依然遙遙無期。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司長戴根有問：「慢一點

不是比較好嗎？」如果你想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垮台，慢一點的確是比較好。

籠中之虎

在毛澤東時代的初期，中國只有一家銀行。在中國人民的共和國，這家銀行當然只能有一個名字——「中國人民銀行」。人民銀行當時身兼中央銀行與全中國唯一的商業銀行。為了讓中國金融體系更完整，後來又出現了農村信用合作社（放款金額有限）、中國銀行（實際上是人民銀行的分支）、中國建設銀行（徒有銀行之名，其實是財政部的放款單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銀行史，大致上就是一段創造多樣化的歷程。

不過所謂的多樣化也相當有限。今天中國銀行業不再是一枝獨秀，而是四強鼎立。人民銀行停止扮演商業銀行的角色，農村信用合作社依舊存在，不過領袖群倫的是四家完全國營的商業銀行。到了2000年底，四大銀行總共佔銀行體系存款的68.4%，放款量的71%，分行多達15萬家。

四大銀行有償債困難嗎？絕對是的。它們會倒閉嗎？不會。四大銀行不僅能繼續經營，而且還欣欣向榮。它們的故事顯示出：當國家創造出一個完全不具經濟約束力的體制，幾乎任何狀況——甚至是完全脫離現實的狀況——都可能存在。

大體而言，中國銀行體系面臨的問題並不在於銀行自身。以世界標準來看，四大銀行相當落後，但它們不斷現代化。1990年代中期，四大銀行連在受到保護的本國都不具競爭力。如今它們至少還跟得上時代，有自動提款機、共同品牌合作（cobranding deal）、線上

服務，還有其他各種現代化的措施。一位在上海工作的美籍銀行家說，他所屬的美國銀行曾將一份內部信用評估手冊送交人民銀行供其參考，結果不到九個月，四大銀行每家都首度發布了自身的信用評估手冊。不久之後，四大銀行的主管開始對外資企業進行嚴格的債信評估，並且會以尖銳的問題質問客戶；這些都是前所未見的作法。四大銀行持續不斷的轉型正說明了，就算是一個奄奄一息的體制，事情仍然大有可為。

銀行業真正的問題在於中國社會主義的天之驕子——國企。北京當局強迫四大銀行「借」錢給國企，從而以銀行貸款取代政府的直接補助。因此銀行成為北京當局運用的管道，將成本近乎零的資金源源不斷的送進國企，幫助它們苟延殘喘。有人說這種作法是「漸進主義」，其實它只是拖延了重大問題的解決時程。

許多人認為，中國之所以拖延改革行動，主要原因是擔心失業率升高。但是還有一項更根本的原因：當局無法面對並承認中國施行社會主義的弊病。銀行開了一扇方便之門，來避免——至少是暫時避免——令人不安的現象，所謂「政策性貸款」就好像給重傷病人注射嗎啡。因此銀行日漸惡化的困境，就是源於自身體質的脆弱以及中共解決問題的方法。

無論是在政府補助或銀行貸款的年代，中國的國企都不具經濟效益。唯一的差別在於：在官方決策下，問題已經轉移給銀行。國企仍然弊端叢生，唯一的差別是，現在連銀行也無法倖免於難，這是一場金融傳染病。

北京不必在意到底誰會一病不起。國有銀行的貸款取代了財政部門的直接補助，如果你是高踞在國家體制的上層，這種轉換對你

而言只是記帳問題。但是另一方面，將問題轉移給銀行的後遺症卻非同小可，中國大部份的存款人都是在四大銀行開戶，因此銀行的措施與他們息息相關，這與中央財政部會的情形截然不同。

從客觀的角度來看，中國不應該出現銀行擠兌，四大銀行尤其安全。ING銀行上海分行前任董事長道格拉斯·瑞德（Douglas Red）道出其中奧妙：「壞消息是四大銀行有償債困難，好消息則是它們享有國家豁免權。」就技術層面而言，中國的國有商業銀行都無法享有國家豁免權；然而在實務層面，四大銀行雖然體質脆弱，卻都像中國本身一樣堅實穩固。只要政府還存在，四大銀行也穩如泰山，因為北京知道自己無法承受任何一家垮台的後果。如果街頭示威的尋常百姓只是想拿回終身積蓄，人民解放軍會開槍射殺他們嗎？沒有人知道答案，而北京當局也不想知道。就如瑞德所言，四大銀行就像中國本身一樣健全。

不過這實在沒有道理。中國的存款戶不時會對銀行失去信心。銀行擠兌——尤其是存款帳戶大量失血，發生的頻率並不高，而且至今為止都還能控制住。不過這些偶發事件仍然提醒世人，就算是控制如此嚴密的中國，還是會鬧出亂子。1999年4月，謠言原本是在村民之間口耳相傳，後來遂以網際網路的速度傳遍至中國，交通銀行在河南省鄭州市的分行出現擠兌，這家國有銀行是中國實力最雄厚的商業銀行之一，也是中國銀行業改革的先驅。擠兌熱潮在一天之內退燒，因為交通銀行立刻供應大量現金給70家分行，並將營運時間延長到夜間以應付提款需求。但是一天下來，中國第五大銀行流失了相當於1億800萬美元的存款。這次擠兌事件的導火線是網路上一則交通銀行主管涉嫌詐欺的謠言。官方的對策是讓銀行主管上

電視否認謠言，但網路還是贏了。事件平息後，交通銀行各分行原先的存款只有一小部份回流。

近來人民對幹部貪污——事實或傳聞——的反感確實是格外激烈，不過交通銀行擠兌事件最令人困擾的一點在於：一則謠言居然可以撼動中國數一數二的商業銀行，雖然時間很短暫。假設出事的是四大銀行其中一家，有人在網路上揭露事實，而且用的字眼不是「詐欺」而是「償債困難」，那會如何？一個類似的案例發生於2000年6月，地點就在北京東邊的灤縣，當縣府幹部將公款從四大銀行之一的中國建設銀行提領出來，消息迅速傳開，民眾開始驚慌，建設銀行的六家分行連續四天發生擠兌。中國並沒有存款保險制度，政府也不急於實施這類制度。沒有存款保險就意謂著，人民發覺局勢不穩時，只有一種作法能保障自身積蓄：擠兌。難怪擔心中國發生大規模動亂的觀察家會將銀行存款稱之為「籠中之虎」。

銀行「償債困難」(insolvent)是一回事，在中國猶如《愛麗斯夢遊仙境》的金融體制中，這不算太嚴重，可能只是會計登錄的問題。不過「流動資金不足」(illiquid)可就是另一回事。中國銀行業，特別是四大銀行，有一大部份「資產」是借給國企的貸款。這些貸款實際上都是長期貸款，無論是在何時到期，都必須重新議定，以避免觸發危機。然而，銀行大部份負債（主要是存款）是短期的，必須隨時吸納新存款來支應存戶提領。這是典型的金融崩潰模式。如今，中國的銀行不時要限制存戶提款。當銀行狀況成為民眾茶餘飯後普遍的話題，情勢將危在旦夕。到那個時候，網路上一則訊息就可能引發擠兌，而且是會在歷史上留下紀錄的全國性擠兌。

屆時北京當局只有兩種選擇：以武力維持公共秩序，或是趕印鈔票。兩種選擇都將終結共產政權，就算不是立刻終結也不會拖太久。天安門大屠殺的作法現在已經行不通；在1989年時，大多數中國民眾還很難認同民運人士，但是他們對其他起而抗爭的尋常百姓必定滿懷同情。武力無法解決這種問題，中央政府根本難以對抗全體民眾。為挽救金融體系免於崩潰而加印鈔票，會帶來惡性通貨膨脹，因此也不是可行方案。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奠基於能夠持續供應人民生活物資免於匱乏，金融崩潰引發的社會脫序將使這個政權面臨嚴厲考驗。因此對於中共中央與國務院而言，拯救國有銀行是當務之急。

你可以說這是一樁巧合，或許還真的是。在1999年4月交通銀行擠兌事件之後一個月，人民銀行開始籌畫運用本國貨幣儲備來因應「當一家以上銀行出現問題的緊急狀況」，同時也開始實施早期預警系統，試圖建立一個即時網路，讓主管幹部隨時掌握銀行的資產與存款。這些跡象顯示，儘管官方一直大言不慚，北京還是有人憂心如焚。

在世紀之交的中國，大言不慚的聲音還真是此起彼落。人民銀行的戴根有司長在家裡與妻子吵架時，他可能會說：「愛人同志，妳就是不了解我。」但是一進了辦公室，當他必須以中央銀行幹部的身份發言，同樣的念頭從他口中說出來就變成：「古典經濟學觀念不能用來分析很多中國經濟的問題，因為這些問題有其獨特根源。」這是在1999年4月5日接受中國日報訪問時的談話。戴根有訴諸中國官僚最後的伎倆，他試圖向西方世界解釋，中國的金融體系並沒有頭栽進危機之中。戴根有認為，西方分析家之所以會悲

觀，要歸因於他們對中國經濟缺乏了解。

照戴根有的說法，國企負債的原因並非經營不善，而是經濟體系的轉型。他向我們保證，這些債務人並沒有危險。戴根有說對了嗎？只要財政部能讓大小船隻繼續浮在海面上，國有銀行與國企都會像國家一樣經得起大風大浪。雖然不是他的本意，但戴根有的話還是提醒了我們：中國整個體制的確與眾不同。

然而，就算是在反常的體制中，缺乏償債能力的機構也不可能長存。中國的銀行顯然需要進行再資本化。1998年，中央政府往這個方向邁了一小步，財政部對銀行業投注了相當於325億美元的資金。人民銀行宣稱這項再資本化行動將銀行的資本適足率（capital adequacy ratios）提升到8%，符合國際標準，但是沒有公布詳情。雖然這是個無傷大雅的謊言，但至少中國已經開始嘗試。

到了第二年，中央政府宣布真正的重量級措施。從1999年4月開始，財政部為四大銀行分別成立了四家資產管理公司。這些資產管理公司向銀行買下符合特定標準的債權，將債權重新包裝成證券，然後或者賣出、或者轉換成負債公司（大多為國企）的股份。如果債權是轉換成股份，資產管理公司就會變成這些企業的股東，運用其股權力量要求企業改善營運與管理。理論上，這些企業在過了數十年青蛙一般的生活之後，會再度變回王子。

資產管理公司計畫明顯具有改革色彩，它甚至點明金融界亂象的罪魁禍首，將財政責任回歸到正確的機構：中央政府的財政部。在一個政府很少認錯的國家，資產管理公司計畫的意義極為重大。再者，這項計畫有優良血統。中國的資產管理公司是以美國重建信託公司（Resolution Trust Corporation）的成功經驗為藍本。在1990年

代前半期，重建信託公司向倒閉的儲蓄貸款公司買下資產，然後以便宜的價格賣出，使相關企業得以快速復甦。

雖然資產管理公司計畫在美國成績斐然，但在中國卻窒礙難行。世界各國在重整金融業時，都得學會一項教訓：只有堅決果斷的行動才能夠奏效。行動迅速、大刀闊斧、一次解決。重整銀行時，與其分階段進行，還不如根本不要做。牙醫要將所有蛀牙清理乾淨之後，才會開始補牙；局部的再資本化並不會改善惡劣的借貸方式，反而會鼓勵銀行大膽進行放款，因為銀行主管知道日後還會有紓困措施。重建信託公司能夠成功，原因在於它的作法非常美國化：發現問題所在，快速解決虧損，然後繼續前進。但是中國的心態卻是小心翼翼地摸索。北京當局的作法是慢慢來，一次做一點，結果當局挽救銀行的計畫本身也陷入泥淖。雖然政府就算迅速採取行動，金融危機的影響也將持續數年；但如果政府不這麼做，危機永遠無法解除，這正是中國的寫照。資產管理公司有如一項慢動作的研究，但關鍵因素卻是速度。對中國前途至關緊要的金融業振興方案，又再一次被延誤。

因此，就算北京設想出計畫，採行大膽的理念，計畫也常常會碰壁，資產管理公司就是明證。

首先，計畫的規模不夠大。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說：「我認為成立資產管理公司是國有商業銀行的最後晚餐。我知道有些人期待宵夜，而且第二天早上還會有早餐，但我認為那是不可能的。」不過，戴行長，告訴你一件事，那些銀行還是會回來討大餐吃，而你或你的繼任者照樣會餵飽它們。中央政府原先表示，資產管理公司計畫總金額的上限是4000億人民幣（美金484億），但這個數目還不

夠清理銀行的資產負債表，結果當局又得加菜。資產管理公司最後從四大銀行收購了1.3兆人民幣（美金1570億）的不履約債權。儘管金額已大幅提高，但還是嚴重不敷所需，四大銀行的逾期放款超過這個金額的兩倍。2001年春以後，北京開始暗示將做進一步的紓因。

其次，在中國深受政治干預的經濟體系中，資產管理公司沒有機會成功。地方政府幹部是國企的庇護者，他們拚命想繼續控制負債累累的企業帝國。地方幹部一直有辦法阻擋資產管理公司介入本地的企業，甚至不讓企業主管接觸資產管理公司。因為強龍難壓地頭蛇，因此國企並不在乎資產管理公司重整計畫的威脅。對它們而言，這項計畫就像先前的優惠政策，因此它們蜂擁而上，想藉機清掉債務。數百家國企派代表上北京，要求加入資產管理公司計畫。有的企業甚至故意先拖欠貸款，因為這樣才能得到解除債務的好處。第一家資產管理公司宣布成立之前，拖欠貸款的案例鉅幅增加。這項計畫不僅僅是一頓眾人所稱的「免費午餐」，更是一次付款，讓企業可以連續吃十年的大餐。而且當局還發出一張可再吃十年的餐券：那些將債務換成股權的公司，未來可優先向銀行申請新貸款。

第三，資產管理公司已經遺忘自身的主要目標。資產管理公司應該儘快收購並處理債權，以加速銀行的重整，但它們又是以獲利為目標的企業，將強化自身財務狀況視為當務之急。例如，它們擔心將國企的債務轉換成股權之後，自家會嚴重虧損。因此資產管理公司與國企經常對債務轉換股權的比例發生爭執。結果，資產管理公司要求國企與地方政府給予保障，防範未來可預見的虧損。此

外，有些地方幹部非常憂心國企裁員，於是資產管理公司乘隙而入，需索各種避免虧損的優惠待遇，其行徑甚至被指責為「勒索」地方政府。在另一道戰線上，資產管理公司與銀行也是爭議不休。資產管理公司希望收購體質較佳的企業貸款，但銀行一心只想賣債信最差的部份。結果就是，優先考量自身權益的資產管理公司，深陷於一連串爭執中，根本無力展開它們最重要的資產清理工作。

第四，資產管理公司計畫規模太大，不切實際。這項計畫號稱是要協助銀行，但實際的架構卻要同時兼顧國企。國務院的國家發展計畫委員會訂立法規，來規範資產管理公司可收購債權的範圍，被收購的債權必須是1995年之前的案子，借方是大型國企，而且產品具有市場價值，企業的虧損主要應來自高額的利息負擔。如果北京的計畫只是想幫助銀行，那麼資產管理公司應該負責買下狀況最糟的銀行貸款，好讓銀行重獲新生。

「身為負債企業的股東，『信達』可以對公司管理階層施壓，來改善財務收益。」方興海（音譯）說道。他是一個委員會的主席，負責「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中國第一家資產管理公司）與中國建設銀行之間的溝通協調。方興海又說：「信達的主要任務是要協助企業重整。因為直接清算企業債務會造成債權人損失，勞工受苦。」方興海忽略了，其實債權人的損失早已出現，而且他建議的補救措施以前就有人嘗試過，結果失敗。過去廿年來，中央政府身為國企的唯一股東或大股東，都還無法推動改革；現在新成立的資產管理公司只拿到少部份股權，卻自認為可以促使國企發生有意義的變革，方興海為何會有這種想法？而且方興海還認為資產管理公司必須幫助國企，他忘記了這些公司的設立目標是要挽救銀行。

中國已經有專門協助經營不善企業的投資銀行家，現在需要的是能為四大銀行收回債權的機構。我們憑常識就可以斷定：中央政府越是拖延行動，能夠收到的債權就越少，但方興海卻不懂這個道理。現在資產管理公司應該拿下所有的不履約債權，讓銀行無債一身輕。揚棄準則、清理垃圾的時候已經到了。如果這樣做能順便幫助國企，當然很好，但是整頓國企與拯救銀行完全是兩回事。

不過這並不是中央政府的想法，而第一宗資產管理公司交易案也正突顯出這個拯救銀行計畫本身的缺陷。1999年9月，信達同意入股北京水泥廠，中國官方箝制的媒體也大肆宣揚，認為這項協定象徵國企的加速改革。信達先從建設銀行收購北京水泥廠的債務，再轉換成一家新設水泥公司的股份。在觀念上，新公司最後將會買回信達手中所有北京水泥廠的股份，這樣等於償還了原先的債務。但這樁交易詭異的地方在於，此時建設銀行又貸款給北京另一家新設的水泥公司——中國聯合水泥公司，頭兩年不收利息，而且還有多項優惠。

這種作法是正宗的中國式漸進主義，無限期拖延，直到未來。為了讓北京發展過剩的水泥工業回到經濟理性的正軌，信達要等上好幾年。更糟的是，信達的交易使建設銀行涉入水泥工業的程度更深，而這個產業卻是從一開始就讓建設銀行遇上麻煩。北京水泥廠與中國聯合水泥公司兩項相關的交易，或許有助於重整問題叢生的北京水泥工業，但是對建設銀行卻沒有什麼好處。而且如果新貸款也像舊貸款一樣變成壞帳，建設銀行的問題將更為惡化。

幾個月之後外界才知道，信達與北京水泥廠的交易仍然未獲核准。事實上，許多資產管理公司與國企之間所謂的「協定」，雖然在

官方媒體上大書特書，其實只不過是意向聲明（statement of intent）。信達與北京水泥廠的協定一直要到2000年6月底才塵埃落定。宣布最後協定時，大家發現，雖然信達擁有北京水泥廠71%的股份，但是卻無權過問管理經營。連入股企業大門都進不去的資產管理公司，如何能有所作為？在地方力量與資產管理公司的明爭暗鬥之下，這些協定就算能夠履行，恐怕也是好幾年以後的事。

但是不要對北京的人民銀行提這檔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在1998年11月時表示：「我們希望再過兩年，國有銀行的逾期放款就會下降到國際水平。」兩年過去了，中國銀行業卻是每況愈下。以戴相龍的時間表來衡量，資產管理公司計畫並不成功。創立資產管理公司是早就該做的事，但不要誤以為它們就是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

就算資產管理公司能提供解決方案，如果政府繼續逼迫銀行製造壞帳，資產管理公司也無法化解危機。中國共產黨最難培養的美德就是自制，自1949年以來，中共幹部一直在發號施令，至今欲罷不能，連星期日都不願休息。而且幹部無遠弗屆，廣西壯族自治區的三江侗族自治縣也找到他們的蹤跡。三江縣的金融機構看起來並不像銀行，比敦煌的泥磚房信用合作社還寒酸，裡面只有一張桌子，上面掛塊牌子：「小額貸款櫃檯」。少數民族個體的婦女披著黑色外套，戴著簡單的白色頭巾，她們在這個週末夜晚要做一件很特別的事。四大銀行中敬陪末座的中國農民銀行要開始發放貸款，侗族婦女將會加入中國現代經濟的行列，而農民銀行則要到三江縣展開「扶貧」工作。

這些貸款應該稱作「政策性貸款」，雖然不像貸給鋼鐵業龍頭

「鞍鋼」或「邯鄲」的款項那麼龐大，但觀念是一致的：政府政策決定誰能得到好處。北京當局指揮全局，銀行奉命行事，目標可能是要解救內地荒蕪山區的貧窮，也可能是要挽救沿海老邁的鋼鐵廠。就算資產管理公司計畫按部就班施行，想解決問題還是力有未逮。這些公司依法不能收購1994年之後的壞帳，原因是中國在次年實施「商業銀行法」，要求銀行為業務營運負起全責，並且讓它們免於外界的干擾。「中國銀行」前任行長王雪冰在1999年4月說：「任何政府機構或個人都不得干預銀行業務。」

理論上聽起來很不錯。但實際上，人民銀行與政府其他部門仍然會插手干預。舉例來說，人民銀行在1998年6月通令各商業銀行，要支持產品仍有市場價值的國企；2000年1月，國務院下令商業銀行停止貸款給幾家聚福織維公司。這些案例之所以引人注目，只是因為干預者將指示寫成白紙黑字。政府或黨通常是以非正軌的方式指示銀行，而且作法都違反商業銀行法。

中央政府將銀行當成一種「追加預算」，很容易就能找到錢來彌補過去遺留的爛攤子。整頓破敗的國企只是起點。此外還有高新科技園區要興辦，江河上的大壩要興建，中國的大西部要開發。中國的領導期望國有銀行善盡職責，但是如果他們真的有心改革，就不要再把銀行當成傀儡。

然而當權的中國領導人不會自我克制，所以對於人民銀行幹部暢談資產管理公司如何經營的樂觀論調，我們不妨拋諸腦後。只靠希望並不能幫助銀行業。我們再回想一下福建省的模範銀行幹部饒才富，他並不以自身完美的放款紀錄為滿足，進而接上前任幹部留下的129萬人民幣壞帳。的確，饒才富胸有成竹，官方媒體告訴我

們，他在每一方面都無懈可擊。

但是等一等，如果由饒才富來主導中國的改革，是不是所有問題都會一掃而空？畢竟，中國銀行業困境的罪魁禍首並不是人，而是體制。所以就算是饒才富這樣完美的銀行幹部，也無法拯救中國的銀行業。還有誰能做得到呢？

「大臉」在等待

另一位銀行家，我們的「南昌天使」提布斯（Chris Tibbs）有沒有辦法呢？2000年6月，這位退役的美軍陸戰隊少校正在辦公桌前埋頭苦幹。提布斯和他的企業財務小組單獨留在有利大樓——上海第一座現代化辦公大樓。在1980年代，上海大部份外國企業都在這棟棕色高樓設置辦公室，你可以在這裡找到花旗銀行、美國銀行，與其他十多家金融機構，此外還有數十家跨國企業，它們都是這些銀行的客戶。

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這些銀行都聚集在浦西，也就是黃浦江以西的上海市區，選擇聯宜大廈或鄰近的地點。但是現在，銀行紛紛跨越黃浦江，移師東岸的浦東地區。它們幾乎都是在1996年到1997年之間搬遷過去，因為中央政府希望將浦東建設為中國的金融首府。花旗銀行與其競爭者都搬離了老舊的有利大樓，遷進浦東全新完工的中國船舶大廈，對街正是人民銀行上海分行的新總部，一棟外表包覆石材的雄偉建築，形狀設計成像一具椅子——事實上那應該是一個王座。

外商銀行決心要改變中國的銀行業，因此在2000年的6月，你不會在中國船舶大廈找到陸戰隊退役少校提布斯，他並沒有和同事在

一起。提布斯與他領導的小組是唯一還沒有跨過黃浦江的花旗銀行人員，他們盤居在老舊的聯宜大廈一隅，幾近荒蕪的五樓已經沒有別的辦公室還在營運。提布斯這位可能是上海最有見識的銀行家，到底做錯了什麼？

提布斯沒有做錯什麼，他只是堅守崗位，這個位子將來可能是花旗銀行在中國最重要的職務。提布斯正蓄勢待發，等候革命的到來，他甚至知道革命爆發的確切時間。事實上，這時間包含在一項協定之中，而協定簽署時舉世矚目：中國入世之後，外國銀行就可以有條件的提供本地中國人金融服務，過5年，限制即解除。提布斯之所以還守在聯宜大廈的辦公桌前，是因為花旗銀行想在浦西建立營業部。提布斯當時的上司約翰·畢曼（John Beeman）認為，花旗在浦西地區保留人力，有助於日後申領營業執照。因此每當提布斯要與同仁會商業務時，就得越過黃浦江才能如願。全世界最大的零售金融銀行（retail bank）正在伺機而動。

那將是革命的開端，中國的銀行準備好了嗎？今天四大銀行靠著吸收新存款來維持資金流動，未來會有一部份存款流向外國銀行；如果你聽聽中國銀行主管的講話，這一部份將相當可觀。一位主管接受南華早報訪問時指出，中國的銀行「對於零售金融沒有多少經驗，因為我們主要是充當出納員，吸收存戶的存款，然後投注在政府指定的領域。」

假設你是一個住在中國的中國人，大部份積蓄都存在銀行帳戶。現在網路上流傳謠言，說中國工商銀行出現問題；雖然你的存款是在四大銀行的另一家，但是你知道他們都是一丘之貉，而城裡面有一家花旗銀行的分行。既然你可以選擇，你會怎麼做？要把錢

存在有償債困難的銀行，還是轉存有能償付的銀行？你會不會干冒日後無法負擔子女教育費用的風險？你知道花旗銀行的提款機比較好用，不過你在乎的不是這個。真正重要的是，花旗的經營者對於銀行的償債能力念茲在茲。這時你應該會和其他無數中國人一樣，趕快到本國銀行的提款櫃檯排隊。

資金無法流動變現，金融體系就會崩潰，這是銀行學的第一堂課。因此你一定以為，人民銀行會極力刺激本國銀行振作。但是人民銀行並沒有這麼做，儘管情勢已經很明朗，只有讓本國金融市場產生競爭，才能幫助它們順利跨入21世紀，但人民銀行卻反其道而行。中國當局大談銀行業的競爭，然而並沒有身體力行。2000年，人民銀行開始進一步打壓外國銀行的競爭能力，試圖施加各種額外增添的惱人禁令。這只是短期策略，而且是嚴重錯誤的策略。人民銀行幹部能夠保護本國銀行的日子已經所剩不多，中國入世兩年之後，外國銀行就可以用本國貨幣與本國企業進行交易，5年之後交易對象擴大至個人客戶。外國銀行設立分行的地區限制，也會在5年內解除。中國頭號智庫中國社科院曾經警告，入世會使最好的顧客從國有銀行流向外國銀行，大批行員也會另謀高就。

雖然北京現在還可以防範迫在眉睫的劇變，不過「大臉」還無計可施。因此他大部份的時間都在策畫一場盛會。尚一皮耶·雷諾（Jean-Pierre Raynaud）是個大塊頭，下顎寬厚的臉龐蓄滿了花白的鬍鬚。他不懂中文，不過這樣也好，因為他的員工為這位笑口常開的外國人取了一個不太雅的神號：「大臉」。雷諾是法國「東方匯理銀行」（Credit Agricole Indosuez）中國分行負責商業金融的主管。在1998年11月之前，他已經為一場盛會籌備了將近一年。

這天晚上屬於雷諾。上海的「花園飯店」是由日本人經營，不過卻是上海法國人的聚會中心，那是因為飯店的一部份——較優雅的那部份——是以前的法國俱樂部。東方匯理銀行就在這裡慶祝創立一百週年。這天晚上眾星雲集，旅居中國的法國菁英都來到這裡，雷諾甚至請到法國駐中國大使，他專程從北京搭機南下上海。

毛磊（Pierre Morel）大使似乎無所不在，他的臉出現在上海最有名中餐廳的牆壁上。不過今天毛磊大使本人是出現在東方匯理銀行的酒會中。這位高大英挺的外交官正以法語向來賓致詞。毛磊大使溫文儒雅，心思敏捷，而且喜歡曝光，不過他的演講實在太冗長。人們等不及想嘗嘗各類點心，或者和自己的朋友談話。雷諾與部屬別有心事。他們在華麗的大廳中，急著想穿越自己邀請來的一大群賓客，不過卻寸步難行，因為毛磊大使還在旁徵博引、滔滔不絕。連性情溫和的王愚梅（音譯）都有點不耐煩了，他是東方匯理銀行廣州分行的主管。他的父親、祖父與曾祖父都曾為這家銀行工作。近來王愚梅偶爾會放慢速度，坐穩自己錢多事少的職位。他通常有時間從事社交，不過在今晚這場盛會上，他正焦躁地等待，準備進行手邊的重要工作。

東方匯理銀行雖然已經拿到珍貴的特許權，能夠以人民幣進行交易。但它和中國大部份的外商銀行一樣，目前並沒有多大的空間可以施展身手。東方匯理銀行擁有的特許權僅具虛名，帶來的經濟效益十分有限，因為人民銀行禁止得到特許的銀行累積人民幣來從事放款，更嚴禁這些銀行與最有利可圖的大客戶來往。雷諾的辦公抗議，保守拘謹、輕聲細語的洪佩麗是雷諾的指定交涉對象，她的辦公室就在中國船舶大廈對街。不過就算她是在巴基斯坦也一樣，

人民銀行就是那麼頑固僵化。

雷諾不會向對街的中國幹部抱怨什麼，他比較喜歡與眾人同樂。雷諾的名字很接近法文的「狐狸」（renard），他的確是個老狐狸，知道疾言厲色動搖不了人民銀行冷漠無情的幹部，因此他要以醇酒美食來經營自己的客戶關係。雷諾計畫，等到中國施行入世所需的法規，他就可以全力展開競爭。他知道時間是站在他這一方，因此雷諾就像狐狸一樣耐心等待。不過現在他得先等候毛磊大使把話說完。

大使的致辭終於結束，雷諾在掌聲尚未平息前就開始工作。東方匯理銀行專門獵取大型獵物，只與企業打交道。雷諾把最重要的顧客留在最後，目標鎖定法國電信公司阿爾卡特（Alcatel）上海分公司的董事長。中國的銀行已經沒有多少時間可以準備，「大臉」雷諾與王愚梅就要發動攻擊，花旗銀行的零售金融大軍不久也將接替埋伏在聯宜大廈的企業財務小組，革命即將展開。

如果中國本國的銀行還想有未來，信達與其他三家資產管理公司不但得成功，而且必須現在就拿出成績。就算它們做不到，中國到最後還是會出現改革過的金融體系，只不過這個體系不會再由人民銀行操控，擔當重任的人將是「大臉」雷諾與其他外國銀行的主管。

沒有文化

中國號稱擁有五千年悠久文明，今日中國卻沒有文化——信用的文化。中國人原本並不是性好欺騙，但中華人民共和國50年的統治卻使他們信用淪喪。有意願或是自認為應該償付貸款的國企，寥寥無幾。中國農民銀行一位客戶曾經宣稱，他是當地分行唯一肯

繳納利息的客戶。人民銀行曾指示上海的銀行承做消費性抵押貸款，兩年之後，三分之一的貸款出現違約情形。借債人對還債的普遍觀念是：「晚還要比早還好，不還更比晚還好。」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易綱已發出警告：中國正在創造一個「以拒絕償債為生存基礎的社會。」

借錢的人為什麼要還債？法院通常不會做出不利國企的判決，就算做了，法院的命令通常也不會執行。破產法規用意是要保護那些負債的國企。國企主管知道，這個以政治影響力為強勢貨幣的經濟體系好處多多：他們就算有錢也不必償還銀行，許多國企就是這麼幹。德意志銀行前任經理舒特說：「銀行必須寶刀出鞘，對方才會屈服。但是在中國，銀行主管幾乎沒有什麼武器可用。」情況已經嚴重到償付貸款會讓借貸的企業陷於競爭劣勢，因為大部份企業都拒絕償債。大家都知道：銀行如果沒有希望回收貸款，就無法再進行放款，這種作法在世界各地都不通，中國也不例外。

兒童會向父母親學習，在中國，大家都以政府馬首是瞻，而政府也不願履行債務。廣東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失敗的原因不一而足，但是許多人——尤其是債權人——印象最深刻的一點是，北京當局強迫廣信拒絕償債，儘管它在背後金主廣東省政府協助下可以償債。像提布斯這些外國債權人火冒三丈，但是中央政府仍然下令廣東省不得協助廣信解決債務。

人民銀行勒令廣信停業的方式強化了人們的觀念：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拒絕償債是可以接受的事。所以我們也不必驚訝，以美國布魯京斯研究中心（Brookings Institute）研究員尼可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的話來說，中國的銀行體系「近幾年來嚴重惡

第七章

化」。著名企管顧問龍安志（Laurence. Brahm）的論調不太可信，這也是原因之一。龍安志可能是除了美國大使之外，北京最常被訪問的美國人。他寫了諸如《中國第一：躍上舞台的新生代超級強權》（China as No. 1: The New Superpower Takes Centre Stage）這類的書，告訴讀者他認為中國會往何處去。銀行危機？龍安志似乎並不擔心，他向我們保證：「中國政府不會愚蠢到坐視國營金融體系崩潰。」然而，終結中國銀行業的因素並不是愚蠢，人民銀行幹部就和他們遍佈北京的同僚一樣，聰明敏銳，博學多聞。他們知道該做什麼，也出席了所有該出席的國際會議，而且全世界第一流的跨國機構都手相提供建言。

但是他們做的很少。北京幹部無法不去干預國有銀行的借貸決定，甚至無法公開承認問題的全面性。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北京幹部的作法只會令事態更形惡化。他們可以投注政府資金，但是解決不了銀行的問題。他們經費不足，現在中國又即將入世，連時間也越來越緊迫。幹部大可以忽視寶貴的教訓與常識，不過他們要面對後果。他們將會失敗，中國的銀行已經日暮途遠。

共產黨對這些事情有何反應？為了加強控制，黨在金融機構內安插了更多組織，包括中國唯一的私營全國性銀行——中國民生銀行——在內，這些組織的成員努力確保金融機構遵循黨的政策。癌細胞正在擴散，黨繼續任意干預銀行內部事務。毛澤東強調政治掛帥，他的繼承人也亦步亦趨，也許中國銀行行長劉明康的意思正是如此。他說：「在中國這樣的國家，並沒有一個完美的方案可以強化銀行體系。」對於中國這樣的國家，可能根本沒有任何方案可言。

當中國的銀行崩潰時，誰都找不到藉口。大家都看得出來銀行崩潰的模式。中國最早的銀行是由山西平遙的商人創辦，到十九世紀中葉時，平遙已經發展成近四百家錢莊的金融中心。平遙的錢莊主人經常誇稱與清廷官員關係匪淺，借了大筆款項給腐敗的皇朝，結果借款一去無回，錢莊於是倒閉。百年之後的今天，同樣的過程再度重演。

龍安志說得沒錯，北京當局會盡全力維繫國有銀行的命脈，但是那並不代表國有銀行一定能存活；那只是意謂著，在中國經濟各個領域中，銀行業會撐到最後才崩潰。

第七章

反咬一口

國家啃蝕民營企業

在一個冬天，農夫發現一條被凍僵的毒蛇，他大發慈悲，把蛇撿起來放入懷中。蛇在農夫的體溫中甦醒，自然本能也隨之回復，對施恩者咬下致命的一口，農夫死前說：「我是自作自受，居然會同情邪惡的動物。」

——毛澤東

從他的保齡球瓶頂端，陳榮可以看到全世界。這個球瓶應該是全世界最高的雕塑之一，天氣晴朗的時候，幾哩外就可以瞧得見。當然，球瓶旁邊一定有保齡球，兩者都讓陳榮的身材相形見绌，然而配上他對自己新落成保齡球館的驕傲感，卻是相得益彰。

橙色的保齡球與與紅白相間的球瓶相互依附，構成陳榮新球館的大門，這家球館擁有多項紀錄。陳榮宣稱這座位於上海花木鎮的保齡球館是全世界最大的單層建築球館，共有108個球道，比美國最大的保齡球館（當然是在拉斯維加斯）還多兩道，只比世界紀錄——日本一家五層樓的球館——少34道。陳榮的球館雖然龐大無比，

但是從馬路上看去卻不甚顯眼，因為前面有兩幢醜陋的建築物擋住視線。陳榮動工開館的速度太快，還來不及除掉那兩枚眼中釘，不過他很快就會動手。

從陳榮的出生地南匯到花木鎮，距離不過幾英里，但是卻讓農村出身的陳榮走了好多年。陳榮和許多自稱出身上海的人士不同，他是道道地地的上海人。道地的上海人要到市郊的農村中才找得到，都市居民反而大多是從別的地方遷來。南匯屬於上海市政府管轄，不過從各方面來看，它都是與上海截然不同的世界。從上海去南匯得往東走，幾乎要走到盡頭。南匯位於東海之濱，如果交通不繁忙，到浦西需要約一個小時的車程，浦西就是那匆忙、貪婪、世故、放蕩上海的中心。如果道路堵塞，從南匯到浦西可得花上大半天的時間，甚至要走上一輩子。

陳榮只花了幾十年時間就進入上海光彩耀人的世界，但他的人生起步並不順遂。陳榮出身大家庭，六歲時被送給叔父收養。陳榮大概是今日上海的首富，成功的原因卻是他小時候處處碰壁。九歲時，他曾試著用電擊的方式自殺，幸好沒有成功。陳榮回憶道：「我的人生就像一場無盡的噩夢。」他甚至連加入解放軍都吃了閉門羹，因為他貧窮的雙親被當局判定為反革命份子。

陳榮早年曾種田、進手套工廠與市政府單位工作，花了十年時間攢下2000元人民幣。1984年，他用這筆錢開了一家小成衣廠，違法以「集資」的名義來掩護私有企業，以逃避法律懲罰。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事件之後，陳榮把成衣廠賣掉，因為他擔心政府將大舉掃蕩私有企業。他帶著比五年前投下資金高出百倍的收益，將半數投資在上海與深圳新開張的股市，以中國人所謂的「炒做」投機手

法，在股市中獲利數百倍。如果致富是件好事，就如鄧小平對中國人民說的，那麼陳榮就有資格競選上海的榮譽市民。

陳榮從股市脫身的時機也大致正確。1994年，他決定回到做生意的本行。那時中國人民已經有錢花在玩樂上，而保齡球這種源於埃及、比中國歷史還古老的遊戲，正是當時中國最熱門的運動。陳榮回憶，當時上海本地人不受五星級旅館的歡迎，不過他仍在廣州的旅館接觸到保齡球。回上海之後，他發現可以去辦公室毗鄰的國際貴都飯店打保齡球。陳榮經常在盛宴款待客人之後，再請客人打幾局保齡球。當時中國最受歡迎且合法的飯後娛樂是卡拉OK，但是陳榮不感興趣，他解釋道：「我既不能歌也不善舞。每當我要招待客戶時，就會花幾千塊錢飽餐一頓，再花兩百塊打保齡球。客戶會把其他事情忘得一乾二淨，只記得打保齡球的樂趣，記得上海有保齡球可玩。」

陳榮對此印象深刻，因此在1995年四月進軍保齡球排瓶機（pimspotter）與其他保齡球設備製造業。排瓶機就是保齡球道末端的巨大裝置，負責將球瓶收起，排成相同形式再放回球道。而且陳榮為了提振自家的保齡球設備事業，也開始投資興建保齡球館。1990年代中期，保齡球設備業界領導者AMF、賓士域（Brunswick）等外國公司來勢洶洶，似乎將壟斷中國的保齡球設備市場。但後來情勢變化，陳榮切入的時機恰到好處，他的「中路實業」鎖定成長最快的市場區塊，在低階球道市場拿下75%的佔有率。另一方面，AMF與賓士域赫然發現，兩家公司要在高階設備的市場中捉對廝殺，而且潛在顧客日漸流失。成功不但為陳榮累積了財富——他被《富比士》（Forbes）雜誌列入中國最富有的前一百名企業家，同時也使陳

榮聲名大噪，因為他擊敗了世界第一流的外國企業。

陳榮與藍迪

高明的戰略讓毛澤東在戰場上贏得勝利，不過他是憑藉文彩翰發來擄獲中國的民心。在1948年與1949年之交，他借用了一則伊索寓言，描述一條蛇與農夫的故事：農夫救活了凍僵的蛇，但是蛇卻反過來咬死農夫。毛澤東當時所說的蛇是指無產階級大軍遍佈國內外的敵人。時值今日，毛澤東會覺得有必要再強調這個蛇與農夫的寓言，因為新出現的敵人正威脅他的共和國。這回的敵人是私有企業家，他們即將改變中國經濟的結構。

新中國的企業家後來被毛澤東消滅殆盡。鄧小平1978年從華國鋒手中奪權成功時，中國的工業資產幾乎全部屬於國家。後來情況開始變化，在20年驚人的轉型過程中，私有企業大幅成長，連中共都不得不正視它們對中國經濟的重要性。

老朽、無效率、落伍的國企正奄奄一息。許多外國觀察家都認為，中國的國企已經無足輕重，像陳榮的「中路實業」這類私有企業將會取而代之，問題只是時間的早晚。中國的社會主義體制已經被蛇咬傷，而且許多人認為那是致命傷。

統計數字支持這種說法。數字並不精確，中國的環境仍然很不利於統計學家工作。不過最樂觀的估計指出，私有企業已經佔中國非農業國內生產毛額（nonagricultural GDP）的45%。專家為正確數據爭議不休，各家差距非常大，從25%到75%都有。但重點是：在中國經濟振興的過程中，私有企業已經成為穩定成長的重要因素。

本國私有企業家的新投資，應該就是讓中國再度富強的不二法

門，也是中國人邁向未來的康莊大道。但是國家體制尚未明確表態，而且這個體制決心要維護掙扎求生的國企。中國談的是資本主義，呼吸卻是社會主義。陳榮這樣的新興企業家會幫助中國發展，然而政府有時候不甘心當被蛇咬傷的農夫，要回頭來狠咬蛇一口。

為了防範國家侵擾，中國的私有企業要與外國企業結合，陳榮最近一波行動正是如此。藍迪·丹尼爾（Randy Daniel）有著黃棕色頭髮，是美國維吉尼亞州人。丹尼爾的全名最後是「四世」（IV），他的家世背景與陳榮迥然不同，不過兩個人倒是一見如故。他們並不通曉對方的語言，但是都感覺到對方值得信賴。

丹尼爾熱衷高爾夫，不過本行卻是保齡球設備事業。又高又瘦的他也是美國保齡球設備公司AMF的主管，如果完全由他決定，AMF老早就把生產部門搬到中國。但AMF維吉尼亞州的經營階層沒有及時行動，結果使陳榮的公司在中國保齡球設備業取得領先地位，如今號稱是全球第三大廠。丹尼爾說：「中國有十三億人，坐擁全世界保齡球業最雄厚的潛力。」現在丹尼爾當上AMF公司生產部門最高主管，他一心要讓AMF重返中國市場。

而且這項任務有其急迫性。華爾街投資公司高盛（Goldman Sachs）在1996年以融資合併（leveraged buyout）的方式入主AMF，讓它的股票上市，並於隔年在紐約證券交易所出清持股。這一連串高明的財務行動，一部份有賴於AMF在亞洲市場獲利甚佳。但是到了1998年，這項優勢消失，亞洲金融風暴讓AMF受到打擊，它的中國市場也因為關稅調升而每況愈下。因此丹尼爾要與陳榮洽商，讓兩家公司以某種方式結盟。

丹尼爾和陳榮一樣，作風既強悍又坦誠，他們可以彼此信任，

不過當時AMF與中路實業的利益卻是南轅北轍。1999年6月，丹尼爾與陳榮來到位於山嶺上的麥坎尼斯維爾（Mechanicsville），就在美國南北戰爭時期南聯舊都里奇蒙城外，他們走進一間素樸的會議室，隔著長桌對坐。陳榮帶著部屬金偉東已經開了整整一星期的冗長會議，但仍然不太適應美國人的談判方式，因此他們從德州達拉斯找了一位朋友史提夫·羅（Steve Lo）來當救兵。除了午餐的三明治之外，陳榮等人還沒有與丹尼爾及其團隊吃過一頓飯：要是在中國，雙方除了一起吃飯之外，還會舉行各種盛宴、酒會與典禮。現在陳榮不是在中國，他對里奇蒙那些美國化的「中國菜」也興趣缺缺，對維吉尼亞州的大塊牛排倒是情有獨鍾。

談判時間緊迫，因為丹尼爾要去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出席「1999保齡球博覽會」，得在13日早晨動身，距他與陳榮最後階段談判只有5天。雙方對合約條款正逐條仔細討論，情勢有時候並不樂觀，可能要好幾週才能敲定。AMF公司的口號是「AMF就是樂趣」（AMF Always Means Fun），但現在談判雙方可沒有人認同這句話。

隨著期限越來越近，雙方步調逐漸加快，對爭執焦點達成協議的過程也變得容易。他們白天談判，晚上則由AMF香港律師團撰擬文件，香港與麥坎尼斯維爾正好日夜顛倒。12日星期六晚上11點，丹尼爾與陳榮終於達成最後協議，合約完全定案。中路成為AMF在中國的總經銷商，AMF則是中路在世界其他各地區的經銷商。

陳榮與丹尼爾於13日清晨六點半，在里奇蒙豪華的傑佛遜飯店會合。飯店內是華麗而高雅的維多利亞風格裝飾，他們開始簽署數百頁合約。飯店賓客訝異地看著大廳中一群人圍繞著兩位主角，旁邊擺著一疊疊整齊的文件。兩個小時過後，合約終於全部簽署完

畢，陳榮與丹尼爾握手致意，這是兩家企業歷史性的一刻，但是雙方無意舉行典禮。丹尼爾幾乎是跑步衝出飯店大門，直奔機場。陳榮看著飯店的大理石柱，考慮他可以在上海的新家也立上幾根。

大理石柱不算什麼，陳榮如果有意願，可以買下整間傑佛遜飯店。陳榮是典型的上海成功故事，今天他在中國企業名人堂中又再上一層樓。中國企業近來有長足進展，有些就像中路一樣，已經能與外國企業一較高下。中國政府衡量企業成功的標準是，看有幾家公司被列入《財星》（Fortune，中國稱之為《財富》）雜誌全球五百大企業。目前中國有9家上榜，中路還沒列名，但應該為時不遠。

AMF自己也沒有上榜，不過意志堅定的執行長羅蘭·史密斯（Roland Smith）正在力爭上游，進軍五百大。2000年4月6日，AMF的廂形車正往中路位於南匯的工廠奔馳而去，史密斯就坐在車裡面，他帶著丹尼爾與一位華裔主管文康，想親眼看看中路的面貌。當年史密斯剛從餐飲連鎖業艾比（Arby's）公司轉職營運不振的AMF，他矢言要深入了解保齡球這個行業，那時他說：「我要穿上保齡球鞋，找一家球館工作一段時間。」現在他不穿保齡球鞋了，但這位上任不到一年的AMF執行長正御駕親征，造訪他的中國事業夥伴陳榮，好了解中國的生意之道。

文康為了打發往工廠之路的漫長旅途，開始解釋中路公司標誌的象徵意義。他是在和陳榮得意揚揚的員工閒聊時，得知其中奧妙，現在他應該向公司的上級回報。中路的標誌上畫了三條路，指向右上方的天際。文康解釋，外側兩條藍色的路代表AMF與賓士域，全世界最大的兩家保齡球設備製造商，中間青色的路代表「中路」，象徵中國的一句成語：「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學生會勝過老

師。難怪陳榮在里奇蒙簽約前，沒有把這個標誌的意義告訴AMF。

現在中路還是學生，但它學習速度非常快。十年前，中國的企業一出了國境，除了最低階的市場之外，幾乎毫無競爭力可言。但十年河東、十年河西，現在中國正快速取得外國科技，學習外國企業經營技巧。現在中國經濟連較不具保護色彩的領域，都已經有本國企業散發出光芒。

中路就是一個典範。陳榮在1995年利用短短幾個月，仔細研究賓士域與AMF的技術，決定採用後者，因為AMF的技術較為先進。幾年之中，陳榮摸熟了保齡球排瓶機、球道與數百種保齡球相關設備。他改造AMF產品也大獲成功，使得AMF找上門洽談可能的合作計畫。在中國銷路勝過AMF的賓士域也想與陳榮合作，但是陳榮選擇AMF。今天中國要的是最尖端的科技，而AMF正具備這種條件。

「約翰」與傑瑞

「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中國著名的人民公僕毛澤東如是說。但是除了蘇聯人之外，毛澤東並沒有讓洋人為中國人服務，後來他連蘇聯人都厭倦了，把這個北方強鄰逼得在1960年召回顧問團。一直要到鄧小平與江澤民，才將接受外國援助這回事先是重新定義，然後精益求精。現在外國人正在為振興中國經濟而效力，AMF就是一個例子。從1999年6月13日開始的企業合作史，必定會讓中路實業在世界市場上成為更強悍的競爭者。

大家常常覺得外國企業對中國的嚮往永無止境。中國潛在顧客的數目一直令人陶醉，就算這塊市場沒有表面上看起來那麼大，但仍然是跨國企業不可或缺的領域。這些企業要在已經趨於飽和的本國

市場之外，尋求不斷成長的空間。未來十年，中國將是AMF銷售成長最快的地區，這也是羅蘭·史密斯不遠千里來到南匯的原因。保齡球在美國的受歡迎程度每況愈下，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前景黯淡。世界上要多幾個「中國」，才能讓史密斯在麥坎尼斯維爾的500名員工有忙不完的工作。史密斯走訪中國之前，AMF才慶祝過公司創業一百週年，如果AMF還想再興旺一百年，它就必須在中國這樣的外國市場中力爭上游。

當然，外國投資對於中國也非常重要，能夠帶來資金、技術、實際知識，以及改良過的管理經營技巧。儘管外國投資有這麼多好處，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引起很大爭議。一方面，中國政府是奠基於毛澤東的自給自足理想以及社會主義的財產公有理念，此外還有別的原因。

中國人民總是會對外國人施加重重限制，其中有經濟私利與疑慮的因素，這是全世界皆有的普遍現象，不足為奇。然而在今日的中國，對外國人的反感已高漲到很不尋常的地步。重點並不在於中國人的心態——源自於外國勢力入侵與宰制中國的歷史——能否理解，而是這種排外心態會不會耽誤中國未來的發展速度？

在以前，中國的發展並未面臨迫在眉睫的時限，但是隨著中國入世，時限問題已經出現。外國企業家過去常抱怨當局以無數法規來刻意打壓，但現在他們歡欣雀躍，因為中國企業長期處於封閉體系，勢必禁不起真槍實彈的競爭。外國企業受到的種種限制，終將貽害中國自身的企業。

改革的必要性從來沒有這麼迫切過，但是中央政府反應遲鈍。人民與外國人打交道不堪回首的集體記憶，已經耽誤了改革，中共

又對改革潑冷水。老幹部對於那些「長鼻子」——外來者——心懷戒懼，最明顯的表現就是1999年在上海舉行的「九九《財富》全球論壇」(Fortune Global Forum)。《財富》與《時代》雜誌的公司「時代華納」(Time Warner)集團是這場盛會的主辦單位，公司全體董事飛往上海出席。活動的大肆宣傳對時代華納與中國當局都有好處，但後來卻演出這樣。對中國而言，這是一個在重要關頭展現自身的大好機會：在會議籌備期間，1999年的外國投資已經確定將大幅下滑。江澤民親自飛往上海，發表重大演說。

「九九《財富》全球論壇」在當年的九月底舉行，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十週年國慶的前夕，許多新聞刊物都針對這樁大事推出紀念專號，《時代》雜誌與姐妹刊物《亞洲週刊》(Asiaweek)也不例外。

將來我們或許能弄清楚《時代》雜誌紀念專號冒犯中國當局的真正原因，但現在只能揣測。專號中收了一篇達賴喇嘛的短文，還有一篇魏京生的文章。魏京生是許多人公認的中國民運之父，1978年12月，就在鄧小平奪下華國鋒手中大權的同時，魏京生喊出「第五個現代化」，指的是民主政治，這在當時與現今的中國都是敏感議題。魏京生在《時代》雜誌上寫道：「武器不可能抹殺真理。」他說的沒錯，但國家還是可以壓制真理的散播。在「九九《財富》全球論壇」會議期間，中國當局禁止《時代》雜誌發售，而《亞洲週刊》也遭到池魚之殃。

有些人認為這種作法太過份。時代華納已經因為這場會議迴避政治議題而受抨擊，雜誌禁售的爭議又成為媒體報導的焦點，因為記者覺得會議本身實在乏善可陳。時代華納旗下另一家新聞媒體

CNN訪問了受害者之一：《時代》雜誌亞洲版主編唐·莫理森(Don Morrison)，訪問背景是上海的黃浦江與浦西的天際線，莫理森說：「我希望有一天中國對待資訊的心態，能像它對待經濟事務一樣自在。」

CNN繼續打擊，但這一次是似乎沒有經過事先演練的現場訪問。CNN資深記者與「Q&A」節目主持人理茲·漢恩(Riz Khan)在節目中請到新加坡資政李光耀。李光耀雖然位居要津，又是亞洲人，但向來以直言、敢言著稱。這位現代新加坡的創建者從不含糊其詞，元老政治家表達想法時也不必有所顧忌。漢恩提到中國禁售《時代》雜誌與《亞洲週刊》的事件，他對李光耀說：「雖然母公司時代華納主辦論壇目的是要促進商業活動，但我認為還是有點諷刺，不是嗎？」李光耀立刻回應：「時代華納沒有退出論壇，實在諷刺。」

不僅諷刺，而且遺憾。李光耀一席話點出了為何惡棍可以在校園中橫行霸道、不受懲罰。雖然時代華納面對暴政時公然示弱，不過它也再一次讓暴君領教：外國企業會散播不利於當局的危險思想。

不是每個外國人都那麼容易威脅，這個人我們姑且以假名稱他為「約翰」。他是在跨國企業工作的美國人，作風向來不屬於圓滑世故，說他「坦率」相當傳神，說他「好鬥」更是一針見血，他從來不壓抑自己的感受。1999年5月發生美國飛彈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約翰一位中國同事對此大加撻伐，但是約翰沒有時間應付他。當時他們正到中國西南地區出差，住在昆明一家旅館，約翰對他的中國同事說：「你回房間去看CNN，我們明天再討論。」第

二天，那位同事看了整整八個小時CNN的南斯拉夫戰爭報導之後，向約翰道歉。他說，中國官方媒體從來不提這場戰爭的背景。

約翰的幾句話就證實了中國政府對外國人的憂慮：外國人會散播危險思想、破壞官方媒體的訊息。他們在公開場合可能會像時代華納一樣屈服；但是在私底下，像約翰這樣的外國人對當今中國政府絲毫不留情面。當然，中國政府對此早就了然於胸。

中國領導人很清楚，他們無法全憑一己之力來改造中國經濟，雖然有些領導還是想嘗試。他們也正確地體認到，如果要維持國家發展的動力，就必須在已經開放的基礎上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但是中國領導人的務實精神只到這裡為止。老一輩領導人仍然抱持一種信念：在帶動國家現代化的同時，他們可以繼續箝制整個社會。這些領導人每天都在盤算，經濟發展如何才不致於危害他們的統治。

中共頭子儘管機關算盡，但是註定要失敗，因為這是二選一的抉擇：讓經濟持續發展或者讓共產黨繼續掌權。魏京生在1978年指出，沒有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其他四個現代化終將流於空談。目前看來，魏京生似乎錯了，因為共產黨在經濟現代化的同時也保住了政治權力。然而再過幾年，流亡在外的魏京生將有如先知，因為北京領導人無法兼顧經濟發展與保持權力，他們的體制已經到達改變的極限。從毛澤東到江澤民，中國領導人深知漸進式改革的危險，目前正高度戒備。鄧小平曾說：「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鄧小平聲言社會主義仍然是中國發展的目標，江澤民也一再提醒我們這一點。

因此北京當局要一直防範權力與意識形態遭到侵蝕，他們也知

道外國人是引發變化的媒介。當北京高層想讓經濟再多開放一點時，就會看到紐約律師傑瑞·柯恩（Jerry Cohen）的身影。柯恩總是在關涉中國的爭議中出現，他在毛澤東駕崩之前就曾造訪中國，從此開始大聲疾呼，捍衛這個全世界人口最多國家的人權。柯恩的合夥人經常說，如果不是因為柯恩太過活躍，中國政府的司法部早就同意他們在北京設立辦事處。柯恩說，外國企業經常聲援中國的人權問題，也許這是真的，但無關緊要。真正重要的是，北京領導人覺得柯恩這種人無所不在，而且會想：中國有這麼多外國人在活動，他們如何才能夠繼續壟斷權力？北京期待外國企業領袖提供資金與技術，但是對他們的政治觀念與理想敬謝不敏。然而這是一個全有或全無的抉擇，到最後北京當局會選擇後者，因為他們真正關心的是自家的生存。

陳榮的國家

似乎每一位大人物都會與陳榮合影留念，例如精力充沛的上海市長徐匡迪、位階更高但很少露面的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黃菊。那邊那個人不就是前任美國總統柯林頓嗎？在一個政治控制經濟、關係主導政治的國家中，照片非常重要。因此你在中路位於南匯的行政大樓中，會看到這些幾乎與真人同樣大小的照片。

陳榮大部份事業都是靠自己打拚，但是到了現在的局面，他需要共產黨以及照片中大人物的支持。他雖然地位重要，但並不想違逆這些大人物。中國真正的貨幣並不是人民幣，而是政治恩惠。政治恩惠可以讓你予取予求，還會帶來一些額外的好處。河南一位工廠老闆說：「你不知道陪那些幹部喝酒吃飯有多令人厭煩，他們要

吃魚翅湯、鵝肝，一大堆最昂貴的菜餚。」的確如此，但這位老闆與地方官員的關係，也在一攤接一攤的大宴小酌中變得更為深厚。陳榮與官方的關係非比尋常，但是今晚他在上海著名餐廳「太原別墅」的大片草地上，站在人群邊緣，關係也幫不了他的忙。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上海特派員詹姆士·哈定（James Harding）要回倫敦交職。哈定是第一位訪問陳榮的外國記者，因此陳榮特地來為他送行，時間是1999年9月。其實陳榮並沒有必要現身，他早已接受過世界各國優秀記者的訪問。

陳榮努力塑造外在世界看待他的形象，而且是共產黨將他推到聚光燈下。金融時報的讀者已經知道新中國的成就，陳榮等於是中國政策正確的明證。

在這場送行典禮上認識陳榮的人並不多，只有哈定和少數幾個人，因此他幾乎是孤零零地站著。人群中有許多外國記者，陳榮與他們保持距離會比較安全，因為今天晚上的話題除了哈定的離別之外，主要就是已經閉幕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許多人都對會議結果表示失望。原本外界期待黨中央能在教條化的宣示之外，進一步處理重要經濟議題，但大家希望都落空了。連陳榮都有同感，他也在送行典禮上表示他的失望。觀察力敏銳的記者正興高采烈地交談，因此沒有注意到陳榮以及他那值得報導的直率批評。

樂觀主義者認為，私有企業家會成為改變中國的原動力，但這個希望不切實際，至少未來數年都是如此。私有企業家多少都需要共黨的提攜，並且得依賴這個體制才能夠繼續發展成功。大部份私有企業家完全支持政府，出發點與外國企業相同：他們要賺錢。但

是陳榮與眾不同，他是中國少數願意說出真心話的成功企業家。

《財富》雜誌亞洲版主編吉姆·羅爾（Jim Rohwer）那天也參加了太原別墅為哈定送行的宴會，他談論著即將舉行的「九九《財富》全球論壇」，中國努力塑造它在世界上的形象，堅持保留選擇本國與會者的權利，而《財富》雜誌也一反常態，向中方的要求讓步。因此陳榮將會參加這場論壇，也會接受CNN專訪。中國總是要想盡辦法，將本國的成功故事像呈堂證供一樣，送上世界輿論的法庭供人審視。

陳榮將在論壇上展現自己的成功，未來還會有更多的論壇邀請他參加，更多的雜誌以他為封面人物。不過今天他是擔任主人，請到的貴賓則是AMF的執行長羅蘭·史密斯，他在2000年4月首度造訪上海。陳榮選擇在上海頂尖的餐館「小南國」舉行盛宴。史密斯來上海是要談保齡球事業，但陳榮卻想聊一聊電影。上海這個小小國度中最卓越的企業家讓史密斯大為驚訝，原來陳榮還擁有一家電影公司。陳榮公司的最新作品是描述一名江湖郎中如何劫富濟貧。陳榮非常富有，但是為了讓自己變得更富有，他不介意拍攝會損及自身階級利益的電影。這又再一次證明了列寧說過的話：資本主義者什麼都賣，連吊死自己的繩子也不例外。

陳榮的電影公司全名是「上海謝晉中路電影電視公司」，謝晉是一位導演，他拍的「鴉片戰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賣座的本國電影之一，這部史詩鉅片推出的時機正好呼應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那是在謝晉與陳榮合作之前。「鴉片戰爭」並非宣傳片，不過卻符合北京當局的意旨：羞辱英國人，並暗貶他們在香港殖民地的成就。後來謝晉的母公司恆通公司資金不足，無法再負擔謝晉

的拍片計畫。因此，中國當局似乎又為陳榮找到一個報效國家的方法，他不願說明他為何要與謝晉合作，不過這應該是國家的意思。

陳榮要設法保護自身利益，既然他有了電影公司，就應該好好利用。他雙手揮舞，話語急促，雙眼圓睜，大談他的下一步計畫。陳榮希望將好萊塢吸引到上海來，他說：「我的童年就可以拍成一部電影。」指的是他歷經的艱難歲月。陳榮正試圖將過去生命的逆境轉化成商機。很快地，整個世界——不只是上海——將會看到他的前塵往事。而在這樣的過程中，陳榮對中國電影業的貢獻將一如他對中國保齡球業的貢獻。

但是陳榮在這麼做的同時，也跨進一個在中共眼中十分敏感的領域，違背了他自己訂定的致富原則。這回他必須運用政治技巧才能夠獲致成功。陳榮照慣例，尋找安全的地帶。2000年春天，他試圖利用當時中國最大的狂熱，主題仍然是民族主義，不過這回敵人不是英國人，換成中國自己人——以北京當局的術語來說就是「分離主義者」。在2000年3月到4月之間，中國宣傳機器幾乎每天都在撻伐台灣。陳榮想找尋適當的劇本來呈現這個孤島「省份」，不幸的是，北京當局的斥責威嚇似乎徒勞無功，陳榮的電影也一直無法開工。

但是陳榮搜尋有關台灣電影劇本的热情，超越了牟利的動機。他和無數長期接受官方消息的中國人一樣，是個忠實信徒。2000年4月這個晚上，陳榮正在對AMF的貴客藍迪·丹尼爾與溫康講述他心目中的台灣歷史：滿洲人征服中國、建立清朝的時候，並沒有控制台灣，一直要到30年後才以武力拿下台灣。來自台灣的溫康這時轉向丹尼爾，用英語對他說：「這麼說是不對的。」幸好陳榮雖然聽

到了，但他不懂英文。今晚是一場重要的商業應酬，AMF不想引起口舌之爭。

陳榮可說是白手起家，但他並不是毫無依恃，他知道在中國新經濟中致富的秘訣。陳榮觀察到政府視保齡球為一種健康的運動，並支持相關行業。其他企業家也掌握這項秘訣：迎合政府的意旨並接受其協助。在北京經營服飾連鎖店的齊寶（音譯）說：「我只想利用政府對生意人施惠的政策來賺錢；賺錢，是我的目標。」賺錢也是陳榮的目標，因此他要找尋不會惹禍的劇本，來拍攝一部有關台灣電影。

陳榮也和中國許多企業家一樣，分散投資風險，追求更高獲利。他還知道中國新興階級的另一個秘訣：不要擋住國企的財路。他所有的事業都不會與國企競爭。的確，中國的私有企業欣欣向榮，但是它依然脆弱，只能在無關乎當局經濟利益的領域中發展。

不違逆政府有許多意義，其中之一就是遵循當局的一胎化政策。生育兩個或兩個以上子女並不算違法，只是無法被官方認同。新近致富的人們要負擔第二名子女以及政府施加的財稅懲罰，應該是輕而易舉，但問題不在於錢。一位家財萬貫、家喻戶曉的中國企業家明明有兩個孩子，但是他只敢承認生了一個，以免公然冒犯共產黨。

陳榮的兒子也出席了父親招待史密斯的晚宴，小陳榮長得幾乎與父親一模一樣，好像是複製出來的。陳榮的確有一家子公司從事複製羊，這家「中路生物工程」宣稱已將人類基因植入綿羊體內。不過在製造自己的後代時，陳榮應該還是固守傳統方法。他為了傳宗接代而娶妻，是一位美麗而樸實的女子。陳太太與小陳榮今晚都在

上海與史密斯共進晚餐，但她對這位美國執行長沒有多大興趣，因為她一直抱著動個不停的小陳榮。小男生吸引了所有賓客的注意，因此餐桌上的話題很快就開始繞著孩子打轉。在一個重視子嗣的國家，這是司空見慣的事。

小陳榮將來如果能繼承家業，必然能進入中國最富有的階層，不過這還要看國家對遺產繼承的政策。在每個人都是「一窮二白」的年代，課徵遺產稅毫無意義。今天情勢已經不一樣，「讓一部份人、一部份地區先富起來」是鄧小平的名言，陳榮與其他人在鄧小平的寬宏大量之下應運而生，他們累積的財富是十年前人們無法想像的。

因此江澤民的黨決定要縮小社會差距。2000年4月1日，他們對小陳榮發動第一道攻勢，下令銀行業實施「真名」制度，要求存款人必須以個人真名開戶。以往中國的存款人在銀行開戶時可以隨意登記姓名，不必提供身份證件；對一個嚴格監控的社會而言，這實在是一件奇事。「真名」制度是為徵收遺產稅鋪路，國家如果無法鎮定人民資產，遺產稅將無從徵收。

不過稅制問題有其更深一層的意涵。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約翰·馬歇爾（John Marshall）曾說：「徵稅的力量關涉到摧毀的力量。」中國政府並無意摧毀新興的私有財產富裕階級，但遺產稅並不只是增加國家歲入的一種來源。企業家將會發現他們有了新的繼承人：國家。而國家將有新的控制工具可資運用。中國飽受詭術的高度選擇性執法，也是當局箝制新興企業家的另一項利器。在父母親辭世之後，小陳榮雖然不致於三餐沒著落，但是他無疑要交出遺產中可觀的一部份，甚至可能得交出一半。

在國家徵收遺產稅的同時，中路公司會發生什麼變化？陳榮大部份的資產都在中路，因此他的繼承人可能要賣掉部份持股來支付遺產稅。但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程度，還遠遠不足以讓當局對振興經濟的火車頭——私人企業——課徵重稅。馬歇爾大法官還說過：「摧毀的力量可能會擊敗、癱瘓創造的力量。」

不過那只是遠慮而非近憂，今天陳榮只想好好享受一番，他來自AMF的客人也十分受用。陳榮一直向賓客炫耀，這不是他慣有的作風。陳榮為中路的總部買下一整層樓，地點是在浦東，與上海證券交易所同一幢新大樓。金融時報特派員詹姆士·哈定訪問陳榮時特別提及：這幢大樓是上海的新金融中心，而中路是其中第一家私有企業。對陳榮而言，在這幢大樓工作就像回到自己的老本行——炒做股票。現在如果你想見陳榮，必須等到下午三點股市收盤之後。

中路的總部一切都非常新穎，包括陳榮辦公室的牆壁在內。淡綠色牆壁原本是不透明，但過一會就轉為透明，再過幾秒鐘又變回不透明，一切變化只需陳榮按一下手中的遙控器。他對訪客表示這項科技來自美國。藍迪·丹尼爾認為這應該是運用光線偏振原理，他留下深刻印象，但是大概不會想把自己維吉尼亞州麥坎尼斯維爾的辦公室也換上這種牆壁。

可惜的是，陳榮公司的其他部份並沒有這麼高科技，羅蘭·史密斯參觀中路位於南匯的工廠時，就察覺到這一點。在一幢大型廠房中，史密斯看到成列金屬車床都沒有電腦控制，因此生產的零件精確度不夠高。從實際層面來看，這就意謂中路的保齡球排瓶機還夠不上AMF的水平。史密斯對這些問題一目了然，不過廠房中有一

些事逃過他的法眼。史密斯不懂中文，所以沒有注意到入口處黑板上寫的共產黨訊息。雖然中共也希望中路的品質超越世界水平，但幹部最重要的任務還是要讓員工整天都能看到黨的訊息。這一點非常重要。中路是私有企業，但是黨如影隨形。

陳榮帶領賓客的參訪行程似乎永無止境，因為他的生產與組裝作業分散在廠區一幢又一幢的建築物中，令人想起萬里長城。陳榮路過時並沒有特意指出那具金屬切割機，它在暮色中顯得特別孤單。金屬切割機放置在一幢天花板很高的單層廠房中，而且是其中唯一的設備。史密斯並沒有明說他是否注意到金屬切割機，但他很快就掌握重點，他說：「全世界找不到其他地方，能夠讓我們這麼奢侈地運用空間。」陳榮並沒有告訴客人，這種作法的用意是要盡量利用政府對低科技產業有限的獎勵措施：中路使用的廠房越多，陳榮省下的稅也就越多。

情況越來越明顯，中路的表現不如以往。在史密斯造訪時，工廠活動並不頻繁，因為時間已晚，工人都已下班。不過精通行銷更勝於製造的史密斯已經感覺到，就算是在尖峰時段，中路的工廠也不會多忙碌，否則他應該會看見到處都是排瓶機與其他保齡球設備的半成品。

巡視過南匯的工廠之後，陳榮帶領史密斯與AMF主管一行人，參觀他在花木鎮新開張的保齡球館。站在繁忙十字路口中央的警察一時失神，看著陳榮的黑色勞斯萊斯向東駛過，根本沒注意擦身而過的車輛。陳榮與客人來到球館入口的巨大球瓶，他顯然非常以自己的傑作為榮。

陳榮的事業從表面上看來十分興旺，不過那只是表象。史密斯

深入內部之後，更了解陳榮與中國的實際情形。過去20年來中國在工業建設方面大有進展，但是現在卻有產品雷同、產量過剩的困擾，包括保齡球設備也是如此。原因是外國與本國投資者以及中央政府技術官僚，在投資決策上都是一窩蜂。走進陳榮的新球館，只讓人覺得死氣沉沉；光線太暗，缺乏球館應有的興奮刺激感，因為地方太空蕩蕩了。史密斯一行人參觀球館時，上門的顧客還不到12個，因此108個球道就像是報廢在陳榮構築的洞穴中。這間球館一定入不敷出，成了陳榮的心腹大患。他蓋出全世界最大的單層保齡球館，目的似乎是為了讓自己的生產事業有訂單可接。陳榮在南匯的工廠業務清淡，原因是他的產品在中國與國際市場上都銷路欠佳。2000年世界市場對新保齡球設備的需求低迷不振，賓士域、AMF、中路都是受害者。賓士域已經開始降價，中路勢必跟進，因為兩家公司在低階設備的市場上是競爭對手。

不過除了世界市場景氣低迷之外，中路還有別的困擾。中路的產品在中國原本可以賣得更好，但是政府訂出各種法規，使得保齡球設備價格居高不下，許多商品也都如此。結果使人民玩保齡球的消費能力大受影響，新設備的市場需求因此一蹶不振。除非共產黨能理解這一點，否則陳榮就得繼續想辦法，讓他南匯工廠的員工有事可忙並創造利潤。畢竟他不能一直靠著蓋球館來提振保齡球設備的銷路。

一行人走出花木鎮的保齡球館時，史密斯抬頭望著門口巨大保齡球瓶的頂端，他想知道它到底有多高，而且也想出計算方法。他站在球館前，估計自己的身高和一塊玻璃帷幕相近，丹尼爾算出球館有幾塊玻璃帷幕的高度，再估計球瓶和球館屋頂的落差，最後判

斷這座巨大的球瓶約有80呎高。史密斯告訴陳榮，這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球瓶，陳榮得意地笑了。史密斯雖然是AMF執行長，不過他當外交官一定也很稱職。陳榮就和典型的中國人一樣，對外國人的讚美特別受用。陳榮與史密斯真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從陳榮的保齡球瓶頂端，我們看到一條漫漫長路，通向另一個世界，在那裡共產黨的政策高於經濟學法則，而且農夫會咬蛇。1998年6月，陳文（音譯）透過拍賣方式買下了遼寧省會瀋陽的「瀋陽微電子公司」，陳文曾擔任這家公司的總經理，挽救了公司的營運。他的接手受到現職員工的支持，但是先前被解僱的員工則激烈反對，聲稱這項拍賣沒有保障他們的權益，發動一連串抗爭，有一次甚至封堵瀋陽的交通要道長達6個小時，過了3個月後，地方政府片面宣布撤消這項交易，工廠回歸人民所有。地方政府的做法又引發一連串爭端，癱瘓了工廠的營運。單單遼寧省就有約5000件類似的爭端。企業家方宜賓（音譯）說：「國企終究是國企。」1999年12月他被迫放棄在安陽鎮定劑製藥廠（音譯）的投資，他的辦公室被反對企業重整計畫的暴民搗毀。他說：「我不管怎麼做都沒有用，我永遠是個後娘，公司一旦有了錢就會去找親生母親。」方宜賓特別提醒我們：中國的私有企業家都是若無近憂，必有遠慮。

中國最著名的外資企業家傑克·波考斯基（Jack Perkowski）曾說：「當人們問我對中國持正面抑或負面看法，我會反問他們：哪個中國？我對新一代中國人的潛力持正面看法。」現代化且衝勁十足的中國、陳榮的中國，是我們樂於見到的。它帶給我們希望，但並不是今日唯一的中國。儘管中國過去四分之一世紀進步良多，社會主義仍然在政府高層與中國共產黨中佔據優勢，在瀋陽與安陽這

類地方也是一樣。我們聽到北京領導人大談社會主義時都不免嗤之以鼻，然而言論對莫基於意識形態的政治組織非常重要。這種由數十年毛澤東運動銘刻而成的意識形態，在今日仍然能夠打動人心。

今天中國對於私有企業綁手綁腳，視之如孤兒；斤斤計較資金、剝奪法律保障、禁止接觸商機。一位廣東省幹部說：「21世紀的世界將屬於非國企，至少在那些天高皇帝遠的地方是如此。」但是在那些皇帝——黨委書記——經常出巡的地方，世界仍屬於擁有政治優勢的國企。

北京當局借用自由市場思維，目的是要建構社會主義而非資本主義。毛澤東只肯短暫容許私有企業，他的繼任者也是一樣。在他們心中，私有企業改革只是權宜之計。陳榮認為：「江澤民與朱鎔基並沒有站在私有企業這一邊，他們不信賴私有企業。」陳榮知道，當局之所以還能容忍他與別人的公司，是因為這些公司還有利用價值。

陳榮還沒有收集到與江澤民的合照，他也知道自己沒指望拿到。陳榮指出，江澤民從來不造訪真正的私有企業。那麼陳榮與上海市委書記黃菊的合照又是怎麼來的？其中有一段波折。陳榮說：「因為我對上海有貢獻，特別是與柯林頓的對話很成功，因此他們知道我這號人物，黃菊才會過來。但他是市委書記，一進到私有企業就很不自在。」由於中國共產黨的模稜兩可，中國的私有企業將步履維艱，而中國自身的發展也將受到拖累。

從他的保齡球瓶頂端，陳榮看到了未來，但我們不確定他是否樂見自己看到的景象。羅蘭·史密斯在2000年4月結束中國之旅時，中共打壓追求快速改革人士的最新一波行動，也告消聲匿跡。乍看

之下，應該會讓陳榮和全中國數千位陳榮感到欣慰。這一波打壓行動江澤民親自喊停，因為死硬派毛澤東主義者趁機號召「一場新的階級鬥爭」，敢言的左派大將鄧力群認為私有企業與外資企業正在剝削工人。陳榮的員工似乎過得很快樂，但死硬派不幸言中，許多中國工廠的工作環境相當惡劣，國家的勞動法規也很少在私有企業中執行。官方媒體對這些事情諱莫如深，江澤民以他最具毛澤東風格的治國方式，命令媒體不得刊載毛澤東主義者對剝削工人的看法。

陳榮和無數中國人一樣，曾經在文化大革命中吃盡苦頭。他知道在表面現象之下，真正重要的核心事物其實並沒有改變。陳榮也看得出來，私有企業家一旦失去政府歡心，就會慘遭清算，這危險今天依然沒有解除。陳榮很清楚中國是如何運作，他說過去中國是「紅色經濟」，西方則是透明而公正的「白色經濟」；如今中國是已經開始施行法律的「灰色經濟」。陳榮解釋為何是灰色：「中國的法律會隨著情況、時間、對象而改變。」

陳榮也察覺到中共有意進一步滲透私有企業。中路的規模夠大，已經建立了黨組織，陳榮還得支付負責幹部的薪水。現在是2000年5月，其他企業也準備步上中路的後塵。江澤民號召在私有企業中建立黨的組織來「保障私有企業的健全發展」，這些組織應該「團結並教育企業家，宣揚黨的各種政策，依法經營企業，保障員工權益」。江澤民似乎認為農夫和蛇應該同睡在一張床上。

現在陳榮實力雄厚，但可能只是曇花一現，他自己也知道，因為他看過中國以往的經驗。陳榮說：「黨可以為所欲為，好事做盡或者壞事做絕。」在將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改革之後，中國的情況並沒有改變，共產黨仍然掌握著生殺大權。

第八章

公路女郎

中國經濟滯滯不前

浪潮退去之前，不知道誰在裸泳。

——華倫·巴菲特

中國主要交通幹道再也看不到阻街女郎的身影。當然，整體來說，這是進步的象徵，不過這也透露出中國面臨經濟問題的原因。我們並不懷念這些阻街女郎，至少大多數人是如此，可是中國的技術官僚可能渴望回到馬路上有妓女阻街拉客的日子。那段時間的生活，對北京的計畫幹部是容易些。

回到1995年尾，場景在中國東岸繁榮的浙江省省會杭州往東行的主要道路。中國曾多次以杭州為首都，在西元1100年代，杭州是地球上人口最稠密的城市。馬可波羅曾形容杭州是世上最優雅的地方，不過到1995年杭州只是中國的一個大都會，就像中國其他城市

一樣，有點骯髒與破舊。不過因為它位於西湖畔，觀光事業發達。西湖風景如畫，但高聳的飯店現在已經侵入岸邊，大自然的魅力削減不少。可是中國人仍到西湖旅遊，許多中國遊客搭車前往。

這條杭州以東的主要幹道是兩線道，而且沒有分隔島。南端數哩的一個緩緩的斜坡上，坐落著一些白瓦、水泥蓋成的小餐廳。這些餐廳年久失修，就像當地大多數的房子一樣。在這條東向的車道中間站著兩名十八、九歲，也許廿歲出頭的女郎。她們的皮爾白哲，是當地卡車司機喜歡的那種。當然，她們的嘴唇紅潤，雖然不是特別迷人，但對這一行來說已經足夠。不論她們是否令人覺得愉快，起碼勇氣十足。面對川流不息的車輛，她們面帶笑容，好像參與好玩的遊戲。如果拉客成功，就回到其中一間白瓦建築快速提供服務。不願停下的車輛勢必得轉向，因為這些女郎絕對不會放棄她們那塊地盤。

如今連接杭州與其東部地區的這條交通動脈看似美國的州際公路，與其他國家的現代化道路沒什麼兩樣。杭州與上海之間90哩的距離以前要7小時車程，現在不到兩小時就可抵達。路上沒有紅綠燈、沒有直角轉彎，也沒有女郎站在路中間拉客。柏油與水泥似是無盡的線把中國連結在一起。因此中國才能破天荒的思考全國性產品配銷的問題。

中國正創造一個全國性的經濟，而造成的結果是產業與社會大幅且痛苦的調整。強者驅逐弱者，有效率的生產者能夠持續不斷降低產品價格。跨省分的競爭逐漸變成常態。結果出現通貨緊縮的現象，物價節節下滑。

物價走低，經濟也停滯不前。中國投資資本的亮麗數字掩蓋了

根本的問題。北京的薄弱方案並不能重新啟動中國經濟或緩和通貨緊縮，因為技術官僚誤解了問題，選擇了錯誤的方案。中國需要健全的成長，以吸納失業和未充分就業人口，並讓進入就業市場的人有工作做。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辦不到，就有經濟破產的危險。

我們認為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場」，但事實上，中國一直是許多個小市場。以前每個中國城市大多是自給自足；一個汽車製造商，一個鋼鐵廠，什麼都一個就夠了。相對來說，每個城市的要求都小，因此以自給自足為上，效率就被捨棄。毛澤東曾創立了一個以公社（the commune）為主的發展模式。他把這個模式移植到城市地區，創立了國企。在毛澤東的思想裡，城市是集體公社（collections of industrial communes）。

因為從前長途運銷貨物行不通，東北方遼寧省的一家鋼鐵廠就無法與西南方的四川鋼鐵廠競爭。因此就經濟生產來說，每一個省分好比一個小國。每個省分都會設法保護自己的產業，在經濟上多處於孤立狀態。這就是為什麼全世界9500家水泥廠，中國就佔了大約8000家的原因。

現在中國擁有良好道路、鐵路和機場，所以中國首度可以進行大量的跨城市和跨省分的商業往來，連食物和其他容易腐敗的物品都可運銷。有效率的製造商可以和別的城市較差的同業競爭。結果我們最近看到全國性的國內品牌崛起。廣東的科龍集團從南方地把電器賣到全國各地，四川長虹電子公司製造的電視機在國內各地可見。這些也影響到外資。第一批勇敢投入大陸市場的外資受到運銷遠地困難重重的限制，只建立小規模業務。未來的外資將可大展拳腳，控制新興的全國市場。因此早先進入中國市場的外資在中國變

化的市場環境中可能因規模太小而落得無法生存。所謂「卡位的優勢」也不過爾爾。

有效率廠商能夠調降產品價格，而中國正在結構調整中往前進。中國的企業逐漸變得更具競爭力，國家也更現代化。良好的運輸條件使得這一切成為可能。當公路從兩線道擴展成四線道，進而到八線道時，阻街女郎只能在小馬路拉客。無論她們如何迷人，再也不能妨礙主幹道的交通。唯一能會造成交通混亂的是兔子。1999年是兔年，一群白兔趁機作亂。這群兔子剛從一輛大遊覽車脫逃，現在在滬寧高速公路上往蘇州方向的路上亂跑。載著牠們的遊覽車橫跨著兩線甚至三線的車道。當兔子在馬路上亂竄時，遊覽車司機的來自收費站的看熱鬧民眾正想辦法把牠們抓回籠內。現在的中國看似現代化，但決策者仍冥頑不靈，就像當初那些決定把兔子放到車上，和放牠們出來的人一樣。

這些兔子不管再怎麼精力充沛，妨礙國家進步的程度仍然有限。在中國，真正能夠阻擋進步動力的人仍是共黨領導幹部。1994年中國通貨膨脹率高達21.7%，朱鎔基因有效控制通貨膨脹而平步青雲。在泛政治化的中國，通貨膨脹帶有負面的聯想，所以在許多高幹的眼中，朱鎔基是救黨的功臣。1994年的通貨膨脹率甚至比天安門事件之前的那一段民眾收入縮水導致民怨更加沸騰的時期更高。朱鎔基解決了通膨問題，不久後他也被拔擢為總理。

朱鎔基解決了通膨問題，可是他做過頭了。在他的控管下，出現了通貨緊縮現象，現在變成「他的」問題，而他也心生恐慌。1997年10月消費者物價開始下滑的趨勢，這是中國25年來首見（與上一年同期作比較）。1998年消費者物價下跌0.8%，次年跌幅達

1.4%。在他的帶領下，經濟成長也走下坡：1999年是連續第7年成長率下降。那一年中國經濟成長百7.1%，只有1992年成長14.2%的一半。這些令人憂心趨勢說明了朱鎔基未來必須全力拚經濟的必要。

中國遭逢通貨緊縮的困境，共黨幹部則急於修正黨過去所犯的錯誤。先舉一個例子來說，中國結構調整的過程本身就是會導致通貨緊縮。毛澤東的城市公社化制度要為效率不章因而導致消費者物價居高不下負大部份的責任。透過全國性競爭來修正此一結構缺失自然會導致物價下跌。銀行為拯救國企被拖累，要改善銀行的體質勢必限制其放款，那也會造成通貨緊縮，尤其在經濟成長減緩的年代更會如此。

還有另一個問題。在鄧小平時代，中國的經濟成長率高居世界之冠，但現在，過去25年的投資大多不具經濟效益。那個繁榮的年代的結果在今天來說一切都是多餘的。在美國內戰中聲名大噪的薛爾曼將軍（William Tecumseh Sherman）曾說過：「戰爭是地獄。」但在中國，對啤酒業的競爭現狀絕對不適用。中國有句俗話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杭州剛剛我們已經說過，在中國東部另一個觀光點—蘇州，有一條喧囂的鳳凰街。寒冷一月一個週二的夜晚，這時中國準備揮別兔年迎接龍年。

鳳凰街上忙碌的「萬家燈火餐廳」內一樓入口附近，有一隻近3呎長的巨龜，它不太動，但周遭的一切十分熱鬧，尤其是那些販賣外國啤酒的女孩。有一位嬌小的「Steinlager小姐」，穿著一套代表Steinlager啤酒顏色的墨綠色絲絨褲裝，在餐廳各樓層間奔跑，推銷紐西蘭在中國最有名的啤酒。不過她得加油，因為還有兩位看來很有精神的少女，也另著紅洋裝外罩白色短上衣在叫賣日本朝日啤

酒。

誰賣的啤酒成績最好呢？就要看晚上的情況而定。誠如Steinlager小姐所說：「民眾對啤酒是有品牌忠誠度的。」如果她的顧客來光顧，她將會跑斷腿。如果顧客沒有現身，朝日啤酒的銷量會較大。她現在沒有時間解釋，她要一桌桌去推銷了。

顯然外國品牌啤酒已經打入鳳凰街。在中國大約有五十多種啤酒品牌，似乎大部份在鳳凰街都可找到。萬家燈火餐廳誇稱有一個Steinlager的冷藏展示箱，也有朝日啤酒冷藏箱。餐廳菜單的封套印有金色的貝克啤酒和健力士啤酒的標誌，而封套內有一整頁貝克啤酒的廣告（以太空時代為主題，瓶裝啤酒繞軌道運行）。令人訝異的是，這些品牌都沒有列在菜單上。菜單上保留給札幌、海尼根和百威啤酒。煙灰缸由百威提供，玻璃窗有朝日啤酒標誌，朝日啤酒的三角旗徽飾著通往二樓的螺旋梯。這是業者以啤酒為主題所做的裝潢，或者可稱為世界上商業競爭最激烈的戰場之一。

商場的斷裂已經造成傷亡，將來會更慘烈。英國的Bass啤酒已在2000年退出中國市場，健力士正撤回其特許執照安排，澳洲的Fosters啤酒在中國的3種產品已經停售其中兩種。其他的品牌也削減營業規模。只有一兩家外國品牌賺錢。在中國的外國啤酒品牌如今只有一個選擇：擴大規模，成為全國性品牌，不然只好關門大吉。國產的領導品牌青島啤酒並不看好外國啤酒的前景。青島啤酒副董事長彭作義（譯按：2001年去世）說：「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外國啤酒商退出中國市場是無法扭轉的命運。」

對外國啤酒商來說，這是悲慘的，因為不久之後中國本地生產的啤酒將凌駕他國之上。中國的啤酒產值只略遜美國，近10年來以

平均每年25%的驚人速度成長，成長速度之快居全球之冠。不過啤酒業的獲利狀況不明，不只是外國品牌而已。削價競爭已經使近乎550家本土啤酒廠商的毛利下滑，當然啤酒業只是眾多供過於求的產業之一。

在萬家燈火餐廳喝太多酒的人可能會在附近找飯店休息。有人說：「蘇州出美女」，蘇州女子的美好身材和白淨皮膚深受中國男人的喜愛。與嘈雜的鳳凰街有一街之隔的草橋賓館，櫃檯後面就站著兩位標緻的美女。

1997年開業的草橋賓館樓高5層。外表看來並無獨特之處，與中國其他數萬白瓦屋沒有什麼分別，但是裡面卻別有洞天。顯然有人刻意大手筆裝潢這間三星級飯店。賓館的接待區寬敞，主要是一個中庭，盡頭有一個大天窗。大理石地板有一個精巧、顯眼的指南針設計。木頭和石材的外觀看得出設計者的品味與用心。草橋賓館擁有所有標準的設施，可說是一應俱全，但是獨缺顧客。

賓館內102間房間幾乎空蕩蕩。一個樓層已經關閉，其他的樓層也看不到客人。浴室的水龍頭顯然多年沒有用過，水龍頭流出的水帶有鐵鏽色。禮品店很大，但只有一個極度無聊的女孩在櫃檯後面。她記得住每一個進店內的人的面孔，因為顧客實在太少了。如果你想到「東方的威尼斯」蘇州住一晚，而又忘了預訂賓館，不妨試試草橋賓館，整間賓館任你挑選。

如果草橋賓館不能讓你滿意，在蘇州和中國東岸其他地方還有成千上萬閒置的賓館房間供你選擇。在20世紀一場最不理性的建築競賽中，你是主要受害者。從蘇州開始，到兔子從巴士脫逃的那條馬路，沿路你會在中國最偉大的城市發現中國的經濟繁榮是虛幻

的。

上海的人口是紐約的兩倍，紙醉金迷的程度也更勝紐約，上海堪稱「頂級的城市」。住在上海的人會告訴你，「東方的巴黎」上海是中國首屈一指的城市。其他的中國人並不認同，不過上海確實是世上人口最大國的最擁擠城市。赫胥黎（Aldous Huxley）提到上海時說：「想不到還會有其他居住更緊密的地方。」

上海以其獨特的形式過度擴張，在1990年代8年內建造了相當於香港的辦公室空間。這種作法可能愚蠢，但不得不佩服這個城市雄心萬丈。它已經擁有世上第三高的建築物，可以預見，上海即將建造世上最高的大樓。數年前，上海人喜歡吹噓，世上建築工地用的起重機有20%甚至80%在上海市工作。現在他們自誇市內的摩天大樓比紐約多。這種說法令人半信半疑，不過這足以說明他們對未來的展望。

一位外商提到上海時說：「文化是明天的事。」上海人一定會拚命蓋房子，就像沒有明天一樣。上海市政府幹部阮揚華（音譯）說：「上海人可是又精又聰明的。」那可不，因為爭相蓋樓的結果導致上海有「東方曼哈頓」之稱的浦東陸家嘴區等等這些地區，空屋率卻將近七成！上海市長徐匡迪為上海的建築熱潮提出一番諷詞，他說：「衣服做長一點，明年可能穿起來就合身了。」

上海的情況惡劣，中國其他地區的狀況更糟糕。整體來說，共黨依循「耐吉」運動用品的口號。幹部不只去做，還做過頭了。時間將修正共黨毫無克制的熱情造成的結果。隨著中國的調整，過去過度的總投資無可避免地會造成未來成長率下降。中國突然從置之往過剩傾斜，現在傾向經濟失敗。那就是一窩蜂開盤的結果。

中共幹部若要矯正另一個導致通貨緊縮的原因將會更困難，即使北京下令也無法解決。只要想像一下，中國人民環顧四週的不安全感。他們看到國家正從毛澤東的計畫經濟痛苦轉型到半市場經濟，從農業社會轉變成都市中心，舊的「鐵飯碗」制度正在瓦解。以前國家提供勞動者大多數生活必需品，譬如，如果你需要一塊肥皂或一條毛巾，你的雇主除了會提供住宿、就學、醫療等種種生活所需之外，肥皂、毛巾也不會少。毛澤東思想可能壓得中國人民透不過氣來，但他們在毛澤東思想的懷抱中有安全感。

隨著共黨逐漸轉向更自由的經濟制度，情況似乎不是那樣。改革帶來的痛苦使數百萬中國人相信他們必須靠自己。如今他們拚命儲蓄。美國人討厭儲蓄，中國人則是世上最會儲蓄的民族，每年的儲蓄金額佔了大約國內生產毛額的40%。那是對國家照顧人民的能力投下大大的不信任票。

北京的技術官僚試圖改革中國的經濟制度的行動應該讚許，不過他們可以而且應該事先設好保障勞工的安全網。如果做好安全網，當然就可避免調整過程中的痛苦。此外中央政府應該加快推動改革。現在北京優柔寡斷，只是延長人民的痛苦。如果做好安全網，改革的進度可能會快些，因為勞工不安是延緩必要改革的一大因素。有了安全網的話，勞工的支出會提高，而通貨緊縮就較不成問題。朱鎔基希望中國擁有「完美」的社會福利制度，也許那就是社福制度遲遲無法成形的原因。但是重點仍是，照顧無產階級的政府應該早些打好此一基礎。

所以無產階級必須自己照顧自己，他們現在也有自己的想法。中國人民已經斷定，激烈的價格戰將會持續下去，這種思考方向是

正確。入世之後只會強化「明天東西會更便宜」的心理。國內傳播媒體試圖灌輸民眾入世不會導致物價下跌的印象，可是從進口關稅預定調降以及入世擴大貿易將使物價下滑的諸多理由來看，那根本是違反常理的。

也許因為如此，廠商才必須要花招來刺激買氣。以天津汽車為例，它生產一種名為「祥瑞」(The Charade)的小型汽車，這個名字取得相當貼切(譯按，它也有比手畫腳玩猜字之義)。這家汽車製造商在2000年元月宣布，某些行業人士購車可享優惠，但堅稱這不是減價，而是「回饋」以往大家的支持。可是沒多久民眾發現，其實即使不是警察、記者、軍人、醫生或老師，也能以優惠價格買到祥瑞汽車，每一個人都享有買車的折扣。

由於經濟問題根深蒂固，現在連打折也發揮不了作用。由於通貨緊縮是經濟決策錯誤的結果，官方媒體稱此一現象無法避免的說法並不令人訝異。官方媒體的說詞好像共黨這些年一直是個旁觀者，並要求政府加強控制經濟來解決問題。不過政府的方法並未奏效。以朱鎔基總理為首的中央政府幹部幾乎已經用盡各種辦法，但無濟於事。他們連續降息、大幅調降銀行存款準備要求，以及其他策略，都沒有達到什麼效果，貨幣政策已經失敗。但失敗並不表示技術官僚不會再把同樣的辦法再派上用場。2002年1月，朱鎔基又重提降息，這會是96年5月以來的第8次。

接著財政振興方案出籠。自古以來，中國人總是想著整治四川。在這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與前人很像。如果你到四川省會成都市西北的都江堰市的伏龍觀，會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前人的差異。伏龍觀因為水利工程大師李冰降伏孽龍而得名，至少

傳說是如此。這是紀念李冰在西元前三世紀整治岷江留下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廟宇。在都江堰，他們誇耀李冰巧妙地利用地形和水文來抑制洪水，並稱這是世上絕無僅有的無壩引水計畫。下崗工人陳中理(音譯)參觀李冰的水利工程奇景，令他感到興奮的不在於工程浩大，而是這位古代的工程師如何在河道巧妙堆放石頭，讓河川至今仍不被淤泥堆積。這位中年男子驕傲的說：「這些石頭這樣擺一擺，不需要用到混凝土。」

如今有另一位知名的李姓水力工程師，忠貞的中國共產黨黨員李鵬。他也誇耀，不過他炫耀的是三峽大壩工程的浩大。中國的媒體詳細列舉興建三峽大壩即將澆築的混凝土數量、水庫蓄積的水量和人員遷徙的數目以及淹沒的土地面積，尤其是耗費鉅資。這是世上目前正在進行的最浩大的水力工程計畫。中國在新的千禧年的頭十年大興土木，並以三峽大壩為榮。他們對李冰在都江堰的經濟實惠作法不感興趣，他們重視的是數字而不是效率。北京的領導人要做計畫，而且喜歡大計畫。

計畫愈大愈好，因為他們可以花大錢。北京寄望大手筆的財政振興計畫可以結束通貨緊縮現象。中央政府計畫人員奉行數十年來所接受的訓練：中央規劃經濟，把錢送往國企。技術官僚修建道路、公務員加薪、改善武裝部隊軍備。他們在全國其他數千個計畫撒錢，讓錢流向國企，藉此擴大國企的規模。伴隨而來的是中國現在擁有更多的公路、更多的武器和更有錢的公僕。政府的支出成就了許多事，但沒有終止通貨緊縮。在這方面他們失敗了。財政的刺激沒有奏效。

花錢解決不了問題，所以他們運用別的策略。因為供給已經大

於需求，中央政府於是限制供給並提振需求雙管齊下。專家說，中國不再是控制型經濟，不過幹部盡力控制他們所能控制的範圍。為了減少供給，北京下達行政命令，停止各地的生產活動。官方的《中國日報》說，超過3萬個礦坑和5600個煉油廠已經關閉，甚至有更多產業走上相同命運。諸如：水泥、玻璃、砂糖和糖精等許多工業都成為關廠的目標。不過中央政府技術官僚不應該沾沾自喜。減產命令實際的執行成效不如紙上作業。當地幹部似乎能保護本地的企業不受中央政府命令影響，常常出了北京市，命令就執行不了。對於一個共產國家，已經到了十分矛盾的地步。

此外，北京方面還擬定了十多種方法來防止市場決定價格。沒有關閉的工廠也受到產量上限等等行政措施的限制，進口商品也受限或完全禁止，而且不准在某些領域進行新的投資。這些技術官僚只不過宣布通貨緊縮是非法的，就運用「價格法」賦予他們的新權力來制定價格。他們也讓廠家壟斷價格。譬如，2000年3月在中國冶金工業部的安排下，中國九大鋼鐵廠在北京召開一次秘密會議，會後宣布聯合漲價大約5%。這是仿效1999年夏天中國所有的八家電視機映像管廠商的類似協議。然後中國信息產業部在2001年宣布將下令減產電視機，從而使前一年宣告失敗的一項業者聯合壟斷協議起死回生。誰說共黨領袖不能向民間企業學習？如今北京方面對於私人企業財團化的適當性正反雙方爭辯激烈不相上下，這正足以說明中國共產黨已經墮落到什麼樣的程度。

技術官僚正千方百計設法對抗通貨緊縮。除了上述種種，他們也忙於增加需求，至少他們設法刺激需求。不過並非易事，因為大約有9億人口住在鄉村，一半以上的農民每天填飽肚子的用度大約僅

折合0.73美元。自1997年起，人民收入逐漸減少，而且沒有止跌跡象。這意謂著居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和農工沒有多餘的錢可供花用。雖然許多城市居民有閒錢可用，但北京的政治龍頭無法命令消費者去消費，即使在威權社會也是如此。結果，中央政府計畫人員正在改變數十年來有礙消費的規畫方向。他們勢必得在北京以外的地方採行新的策略。

不久前，你需要一張地圖，也許一位嚮導的協助才能找到上海證券交易所。走過知名的外灘和歷史老店和平飯店來到外白渡橋，跨越污濁的蘇州河，然後右轉進入狹窄、彎曲的黃浦路。在一個彎口的左手邊，矗立著一棟經過風吹雨打的一棟灰色石材的老舊建築。裡面大廳昏暗陰冷，木頭長椅沿著斑駁的圍牆排放。不過在一間間有如迷宮的房間內，放置了成排照明良好的終端機和固定在牆上的看板，全部都用當時最現代的交易系統連接。1990年代中期，證交所人員會熱情地告訴你，他們的電子撮合系統如何比紐約證券交易所的舊式系統先進——這些故事絕無半點虛假。

現在這棟舊樓成為一家旅店，上海證交所在國務院的總體規畫下，搬進浦東的十字路口另一棟灰色建築內。這棟現代化的建築還設計了一個大洞穿越中間，裡面取代黃浦路上養兔場的是世上最大的交易所。1999年初朱鎔基總理就計畫就在這裡和深圳證券交易所打擊通貨緊縮。由於浦東的空屋率居世界前列，因此助長了中國通貨緊縮的環境，朱鎔基挑選的地點很適當。

1990年代末期，朱鎔基總理可能看到美國人在股市上漲的激勵下勇於消費，使國家經濟持續繁榮。朱鎔基認為，美國人可以，中國人也可以。1999年初，他決定拉抬股市，使國內投資人覺得自己

變富有。他心想，這種「財富效應」會再度刺激民眾購買慾。朱鎔基在其他策略失敗後開始認同股票交易可以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制度不可缺少的一部份。

透過舊式的勸導，並在法規上動些手腳，朱鎔基從1999年5月中旬開始創造了一波股市行情。股市上漲成功的吸引了民眾的注意。周曉儀（音譯）坐在廚房的矮凳上。她在上海的外國人家中當阿姨（管家），當天該做的事大多已經做好，只等衣服乾洗結束。這時她用耳機收聽收音機播報的股市行情，以免吵到雇主。她拿錢買股票，這正符合國家偉大領導人的期望。周阿姨運氣不錯，她在1999年賺了大約2000元人民幣。雖然那一年上海和深圳交易所牛氣冲天，但只有三分之一的中國投資人賺錢。可是周阿姨沒有把從股市賺來的錢拿來消費，那些錢她留在股市裡，次年人為炒作的多頭波段結束，她斬掉她的獲利（甚至更多的錢）。放大規模來看，消費程度大多不會受到股市短暫的上漲影響，而且零售物價繼續向下探底。

中央政府計畫人員竭盡所能的操控股價，甚至不惜在改革路上開倒車。舉例來說，1999年7月，中國證券管理機關中國證監會宣布准許國企申購新掛牌的上市公司股票。兩個月後，證監會宣布將允許國企買賣次級市場的股票，一改1997年5月禁止國企投機買賣股票的政策。這顯示北京已經技窮，才讓國企再涉足股市。銀行團也被要求拉抬股市。1999年，券商獲准參與銀行同業拆款市場（因此他們得以從銀行借錢）。這對市場是好事，但銀行團不是那麼熱中。兩年前才被迫退出的銀行在政府的壓力下才接下一高風險的業務。

從1999年開始，中國官員就設法改進市場的運作，並拉抬股

價，每週都會發布一次法令增修條文。可是等到所有法規修改完畢，搖旗吶喊結束之後，努力結果不見起色。市場已經建立了一套模式，法規修改的消息傳出時股票上漲，沒有多久又跌回來。投資人知道股市反覆無常，往往他們賺了大錢，然後又賠光了。可是他們有一件事沒有做，那就是拿股市賺來的錢來消費，這也是政府動作不斷的主要目的。

從頂點下滑的時刻

1999年一整年，中央政府的經濟政策不見成效，而且每況愈下的趨勢看來愈來愈不妙。但是進入2000年千禧年，奇妙的事情發生了，中國的經濟重現生機。經濟成長加速，通貨緊縮狀況減緩。一位外國經濟學家在2000年年中時說：「中國的運勢從沒有這麼好過。現在是中國的時代。」

究竟是什麼促使中國經濟轉危為安？也許它以前就沒有發生過，也許是法輪功創辦人李洪志創造了這次奇蹟。他吹噓說：「我的氣功到達登峰造極的階段；而且我了解宇宙的真理，看透人生，能夠算出和預知人類的過去與未來。」沒錯，一定是這個原因：天意。

也許是技術官僚在說謊。在國有銀行工作的一位中國經濟學家說：「公布的經濟數字好得讓我無法相信。事情怎麼會轉變得如此快速？」連擁有神力的李大師可能都沒有自個兒拉起中國整體經濟的本領。他勢必得獲得中國統計學家的幫忙。中國統計學家就像中國的其他幹部一樣，他們都說，一切都是上面的要求。

官方的統計數字可能顯示，物價已經在2000年初止跌回升，不

過一些分析家不以為然，而且很少人真的認為物價回升。上海市民米勒（Matt Miller）說：「什麼東西漲價了？」這位資深的報社記者知道，在中國的最大城、中國最繁榮的城市上海，所有物價都走低。真實的情況是中央政府的政策完全沒有對遏阻通貨緊縮產生持續的效果，因為現在的中國大陸廉價出售的東西多的令人受不了；國家的經濟奇蹟並不如表面上看來那麼神奇。時至今日，中國的經濟官僚依然在為通貨緊縮擔憂。

中央計畫人員做錯了幾十件事，最大的錯是赤字支出，使國家資源逐漸耗竭。官僚可以花錢，但不能沒有效率的亂花錢，因為他們胡亂花錢，財政刺激不管用。北京浪費公帑已經不是新鮮事。可是現在問題更複雜：國家的經濟與政府支出息息相關，而中國目前的支出步調不能維持太久。乍看之下，情況似乎可能控制。官方的數字顯示，中央政府2000年314億美元的預算赤字佔同年公布的國內生產毛額（GDP）的2.9%。總公債2466億美元佔2000年GDP的22.9%。這兩個百分比都在國際認可的安全範圍內（年度赤字的安全值為3%，總公債的安全值為60%），可是這些統計數字嚴重低估情況的嚴重性。

如果把中央政府的隱藏性債務加到帳面上的話，中國的總負債將比官方數字超出許多。以國家的間接貸款為例，基本上北京逼迫國內銀行貸款給國企和其他國家控制的組織機構，就是向存款人拿錢。除非準備讓銀行倒閉，不然中央政府將來勢必得負起償債責任。這些間接貸款在2000年累積到大約8608億美元，這就佔了那一年GDP的79.7%。官方也沒有把急速增加的軍費列入，因為軍事支出是高度秘密。有些人認為，大約有三分之二編列給人民解放軍的預

算沒有曝光；另外一種說法是90%的預算沒有揭露。然後還有沒有編列經費的退休金給付（估計約有8500億美元，佔GDP的79.4%），以及國企的虧損，如果要真正評估中國的財務狀況，這兩項應該納入預算中。

此外，中國公布的產值數字並不可信賴。1999年和2001年的GDP數字都是在年底之前發布，在任何一个國家這都是很大的本事，更何況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中國的統計人員在宣布2000年的GDP就慎重得多，他們等到2001年元月一日公布。因為許多理由，他們一向高估了GDP的數值。捏造依然是嚴重的問題，中國的GDP成長可能只有官方統計的四分之一。說謊並不是數字被扭曲的主因。由於有大部份的實質成長不具經濟效益，所以如果我們要依數字來衡量中國赤字支出持續的能力，不應該將這些部分列入，不然GDP數字便會失去意義。上海閒置大樓林立，三峽大壩華而不實，倉庫現在堆滿存貨，這些全都使GDP增加，可是它們大多不具經濟效益。結果傳統上利用官方數字來計算赤字支出和總公債佔GDP比例的方式大大高估了中國承受負債來拉抬經濟的能力。北京官僚公布的數字掩蓋了事實真相時，他們怎麼知道自己做了些什麼？

所以也沒有人知道中央政府還能承擔多少債務，因為沒有人實事求是。可是現在讓我們對官方數字做些調整，以釐清中國真正的財政狀況。首先，必須把中國銀行體系無法收回的貸款（約4900億美元）和前面提到的未編列經費的退休金納入，就像政府的直接債務。列入計算之後，中國累積的總負債1兆6000億美元，佔GDP的146.7%，超出國際認可的安全值兩倍以上。只調整這些數字，仍低

估問題的嚴重性，不過至少開始比較了解狀況。如果再做所有其他有必要的調整，中國的財政狀況顯然不穩，也許岌岌可危。在中國公布可靠的GDP統計數字並透露其真正的支出和負債狀況之前，無從得知中國的實際狀況。即使以前那些樂觀的統計數字是正確的一一其實並不是——觀察家也說，中國必須趕快停止任意揮霍，這點連北京官僚也心知肚明。他們一定知道北京方面有問題，因為履行這些債務需要愈來愈多的中央政府稅收，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稱這種情況「令人膽戰心驚」。中國主權公債在1999年大增25.7%，2000年又增加16.2%，急劇增加的速度也令人害怕。即使中央幹部知道不能無止境的揮霍，他們也無法說停就停：中國2001年的預算赤字將創新高。財政部長項懷誠說，中國的經濟在2001年將「進入良性循環」，但後來並沒有，中央政府增加赤字預算依舊如故。如今政府的刺激方案是無止無休，他知道必須動用所有可用的經費，才不會讓經濟停滯。

中國的財政狀況不穩還有另一層原因，那就是中央政府的稅收不足。雖然中國2001年增加19.8%，但比起其他國家，中國徵稅能力明顯落後。況且，這些稅收數字有點虛幻，像事先課稅等狡詐的手段都使數字虛胖。無論改善多少，最近稅收的增加都只是短暫的，中央幹部也承認這點。這些增加的稅收許多都是最近查緝走私導致關稅一時增加的結果。更重要的是，入世將會使關稅降低，至少剛開始是如此。此外，加強課稅將壓制企業的復甦，尤其是無償付能力的銀行，還會引發大規模的農民暴動。江澤民本人無意中透露國企的獲利和收稅佔國家財政收入的50%，由此可見中國財政有多危險。一旦扣除國家給予國企的補助，國企的獲利根本寥寥無幾。

我們姑且相信所有北京官僚所說的經濟奇蹟。可是我們看到中國的經濟成長並不夠好。朱鎔基設定2001至2005年期間的經濟成長目標在7.0%左右，比2000年的8.0%少了一整個百分點。只有經濟成長持續增加而非減少。經濟成長趨緩對逐漸增多的失業人口不利。穩健的成長才能吸收流落街頭失業工人，可是這些統計數字顯示經濟成長無力。然後還有數千萬未充份就業和剛進就業市場找工作的人。簡單一句話，創造工作機會是共黨幹部的首要工作。

重新啟動經濟成為當務之急。構思拙劣的股市操縱計畫失敗之後，北京高幹嘗試較為簡單的方法，威逼利誘雙管齊下。首先，他們下令從1999年11月1日起，存款利息所得課徵20%的稅率。同時，讓勞工多放假，這種理論被稱為「假日經濟學」，而在中央政府使出的所有招數當中，這個措施可能發揮過最明顯的效果。北京重新規劃國定假日，安排人民從1999年十月國慶日開始放一週的長假。這段期間果然旅遊、消費的人數創紀錄，北京中央計畫人員熱烈慶功。此一措施的理念是人民努力消費可促使中國走出經濟停滯。可是這對全球最會儲蓄的中國人來說是過度苛求。

官方媒體在2000年5月引述一位中國教授的話說：「這種長假效應將不會持續。」他的觀察正確無誤，2000年10月的一週長假期間民眾消費的狀況令人失望，連官方媒體都暗示政府在數字上動手腳以掩飾消費減少的事實。長假政策看來無效，現在的中國人民正大舉增加儲蓄。一位西方外交官稱假期消費是「經濟美夢」(economic sugar-high)，因為效果很快就消失。真的是很快！北京大學一所智庫的教授說：「長假政策有刺激消費嗎？答案是沒有。」

另一個權宜之計是增加出口，北京以大量的稅負扞抵和補助來

提振出口。如今中國幾乎完全依賴出口來提升GDP，可是這不是長久之計。政府提供的所有誘因對國家都是昂貴的成本，而且入世將使一些差別待遇終止。此外，中國的外銷市場預期成長將趨緩，中國產品需求減少在所難免。出口的動力會像所有其他暫時性措施，不久將耗竭。而這種情況已經發生，中國從1999年起，貿易順差都在減少。出口成長率正直直落，從2000年亮麗的27.7%，跌到2001年平庸的6.8%，這股趨勢明顯到連中央政府官員都明白出了問題，而且入世最終將使中國從貿易順差轉為貿易逆差，因為入世會使北京喪失嚴密管制貿易進出的能力。

讓經濟重新啟動並非易事，對技術官僚有許多不利因素。譬如：人民對政府的能力沒有什麼信心。國企和有錢人紛紛把錢偷偷移往海外，人民也出走。許多人合法出境，也有人非法偷渡。2000年6月，58名中國大陸偷渡客被發現悶死在英格蘭多佛市的一輛卡車裡面。中國大陸偷渡客之多，「沒有一個國家比得上」。

為什麼中國人民應該相信未來會更好？如果中國要有明天，就必須持續進行結構調整，可是中央政府在解決影響目前經濟的根本問題方面做得不多。所有容易做的改革都已執行，現在北京不知道下一步該做什麼。國企是隻手山芋：它們慢吞吞、缺乏效率，而且在現行的政治制度中無法改革。它們吞噬龐大的資源，現在威脅到銀行。一如我們所了解，因為政府不敢讓它們倒閉，這些無力償債的銀行才苟延殘喘下去。中央計畫人員千方百計的努力挽救現行制度，把更多的資源用公營企業上，相對的壓制有效率的私有企業和外資。中國需要更多的競爭與開放，可是正在壓制這些改革力量。

除了結構性問題持續之外，還有其他妨害未來成長的障礙。舉

例來說，中國醒目的經濟成長是犧牲生態環境換來的。中國誇稱（如果用詞無誤的話），世上十大污染城市，有九個位在中國，包括污染最嚴重的甘肅省會蘭州。中國的水土承受不了多久，最近的水患、乾旱和森林砍伐都足資證明。約有4%到8%的GDP在環境破壞的過程流失。中國超過四分之一的人口，大約3億5000萬人仍然一貧如洗，看不到改善的跡象。中國沒有提供農村和都市數千萬人教育或健保的照顧。中國以派遣醫生到幾內亞為榮，殊不知廣西自治區最需要他們，當地的保健醫療「比非洲還差」。北京總有一天必須負擔這些社會福利經費，尤其因為國企正設法擺脫這些負擔。在人口快速老化的中國，這將是龐大的費用，可是沒有任何國家可以在不提供人民基本照顧的情況下有長足的進步。而且還有貪污日漸猖獗的問題，貪污難免會拖慢成長速度。北京知名的經濟學家胡鞍鋼說，近十年來，貪污耗損了中國大約1500億美元。

在諸多根本問題待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決之時，北京卻不肯面對現實。中央政府浪費國家資源在為自己建立紀念碑。在北京市中心興建國家劇院將耗資近3億2300萬美元，這只是其中之一，與申辦2008年奧運動輒數十億美元（中國已經承諾一旦獲得主辦權，將斥資逾200億美元興建相關設施）相比，只是九牛一毛。北京在1999年耗資大約40億美元慶祝建國五十週年，而且中國派人登陸月球的計畫也所費不貲。這些浪費的金錢對經濟有何價值令人質疑，然而江澤民政府始終不加聞問。我們看到，即使在打擊通貨緊縮時期，亦是如此。北京技術官僚祭出最後的法寶來維持物價：修訂法規，強化「價格法」。新的法令讓消費者檢舉訂價太低的人。難怪中國共產黨遲遲無法解決中國經濟問題。

盱衡這所有趨勢，未來成長將減緩、消費者物價將下滑、出口將停滯、外資將減少投資，經濟將動盪。北京只能以政令延緩症狀的發生，但是最後還是得回歸經濟學法則：中央政府總有錢用盡的一天。到時候，中國同樣是半改革的經濟，而且還是得處理大致和現在一樣的問題。唯一的不同點是屆時的財政狀況並不妙。現在距離那時候只剩下幾年光景，也許五年而已。

雖然外國專家說，中國一切美好，但中國本地的分析家卻愈來愈擔心。中國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的林毅夫警告說，經濟可能瓦解。他近距離觀察這所有趨勢，並告訴我們，根深蒂固的問題可能造成中央政府經濟政策失敗。儘管中央政府要求專家發言著重光明面，但他表示最近的成長不能掩飾中國結構上的缺點。中國社科院的楊凡（音譯）說，北京領導人擔憂的時刻到了，「由於過去十年的政府政策，我們已經面臨收入相差懸殊、貪污和資本外移的重大危機。」他預測，如果中央政府不採取行動，這些問題「將在五年內爆發，而且可能搞垮一切。」

另一方面，中國皇帝起碼還有新泳褲。美國投資大師華倫巴菲特說：「在浪潮退去之前，不會知道誰在裸泳」。現在浪潮逐漸消退，誰在沒有準備好就下水不久將會揭曉。當然我們已經知道答案。

第九章

WTO的駝鳥

入世將引發全面崩盤

歷史是一場噩夢，我想醒卻醒不過來。

——詹姆士·喬伊斯 (James Joyce)

王彼得的工作是向全世界報導真相，但是這一次他必須說謊。他靈機一動想到了一個毫無破綻的答覆：「我是瑞士人。」這個高高瘦瘦的美國人現在安全了，不過這只是眼下安全罷了。

道瓊通訊社中國分社社長王彼得今晚已經被一名怒氣沖沖的抗議者挨了一拳，現在又有一個火爆的年輕人追問他是哪一國人，幸虧他想到了這個巧妙的回答，讓他逃過一劫。不過，這會兒王彼得發現他陷身在大批警察和暴民之間，面容陰沈的警察排成一長串，手挽著手力圖把抗議的群眾疏導離開美國使館區，憤怒的群眾則以一種有規律的節奏前後推湧，前進後退著。擁擠的人潮讓這個「瑞

士」記者插翅也難飛。

那是1999年5月9日星期天，王彼得正置身於北京名聞遐邇的秀水街的北端。大多數日子裡，來自世界各地的觀光購物客會擠到此地數百個鐵皮搭建的攤位上選購東西，街頭小販會公然在美國領事館的圍牆邊，也就是在美國大使館所在的那條街的尾端，叫賣盜版的CD和電腦軟體。但是在那個星期天，攤位上的生意人和街頭的小販都不見了，而憤怒的群眾正瀕臨暴亂的邊緣。美國的戰機剛剛轟炸了貝爾格勒的中國大使館，大陸的學生和工人正把怒氣發洩在北京城裡的美國外交機構上。

一些抗議的人群爬到攤位的屋頂上，踩著腳踏動另一批人把燃燒著的自行車輪胎扔進美國領事館的圍牆內，希望能擊中美國國旗讓它燃燒起來。他們沒能如願，於是就放火焚燒附近的一棵樹。搖搖晃晃的攤子好似撐不住，險些要崩塌下來壓到下面的人潮似的。

示威的人潮在美國使館區周圍的街道上圍成了一堵人牆，如果不是有些人搞錯了地方跑到愛爾蘭大使館去丟石頭的話，聚在秀水街北端的人群還會更多。在美國大使館臨街的大門口，數十名年輕人正試圖爬上圍牆，但是被公安人員拉下來了，不過有個小子避過公安，進入美國大使館的草地上，而被一名陸戰隊員壓倒在地上。

仍然困在人群裡的王彼得發現有一批人排成一行整齊向外走，推來擠去的人群讓出了一條路來。王彼得於是趕緊尾隨著這批人走到了安全的地帶。一擺脫掉人群他就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不僅他熟悉，全球千百萬觀眾也都熟悉的聲音——高頭大馬的CNN北京分社主任瑪琴農(Rebecca MacKinnon)一面撥著行動電話一面問道：「裡面怎麼樣？」王彼得勸她說：「不要進去。」但是瑪琴農仍然狂

人潮堆裡擠，她即將連線做現場報導，需要一些背景氣氛。一會兒她就找到了——當她正透過電話做現場報導時，一個嘴裡罵著髒話的男子在她頭上敲了一記，她的眼鏡掉到地上。遠在美國亞特蘭大市CNN總部的柯爾白(Marina Kolbe)當著全球觀眾的面要瑪琴農趕快離開那兒找個安全的去處。

北京城裡燃燒著怒火，王彼得並不是唯一的受害者。投資經理人在中國舉行的一年一度最重要的集會眼看著就要開不成了。那是5月12日上午，法國里昂信貸集團主辦的1999年中國論壇即將召開，但是排定演講的外國貴賓不敢前往北京與會，取消了行程。也沒有人知道到底北京中央政府的大員會不會出席這個會議。在中國大飯店(China World Hotel)會議廳等候的人只有百來個，遠比往年出席的人數少。李晶(Jing Ulrich)的重責大任能否完成看來岌岌可危，她的心情沉重得很。這個誕生於大陸的高大女子以跑百米的速度在電話之間衝來衝去，她知道此事關係重大；每年她都獲選為中國最佳分析師，部分原因在於她能夠吸引中國商界菁英和政壇顯貴共襄盛舉參加論壇，並和她的許多投顧客戶打成一片。

不過看來中央的大人物無法出席這場盛會了，那些來自世界各地的客戶鐵定會很失望的。

噢，謝天謝地！李晶終於聽說中央大員將會蒞臨，但會遲些時候才到，因為他們必須參加一些緊急會議。這下子她必須重排會議時間表了。一向泰然自若的大通銀行(Chase Manhattan Bank)總經理莫克(Chris Murck)必須改到上午發表演說，以便把下午的時段挪出來給中國的官員，而且他的討論小組的一個成員，原本要從香港飛來的國際清算銀行一個膽小的傢伙，臨時找了個藉口不來了。

在飯店等待的人們期待著聽到有關中國財經風險的評估，但是他們最先聽到的卻是莫克字斟句酌的個人聲明：「身為美國公民，我只能再次向貴國友人深表歉意，一如柯林頓總統和其他北約組織領袖向貴國政府與人民表示的遺憾與慰問之意。」莫克說：「貴國人民的憤怒與悲痛我完全能了解。」他的道歉之舉不經意的透露出，在中國投資真正的風險不在於財經問題，而在於政治問題。

風險在於政治層面是因為近代中國與外國的關係並不和諧。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外國強權對中國的欺凌所帶來的恥辱，仍然令中國政府與人民憤恨難消，這種感受也伴隨著他們邁入21世紀。執著於過往的中國未能迅速的調適到現代，但藉著入世，中國終於進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向未來跨出了極重大的一步，這一步將改變這個古老國家的面貌。然而被憤怒與悲痛所禁錮的中國人卻對等在前頭的挑戰毫無準備。這些挑戰將會動搖政府的根本。

毛澤東在與世隔絕中建立了中國共產黨，這個黨也許可以永遠延續下去，可是就在中共把中國推上世界舞台時，它也把自己推入了險境。富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曾經說：「貿易不曾摧毀過任何國家。」這倒是真的。不過這位睿智的美國先賢從來不曾提到過貿易對政黨的影響。貿易不會毀掉中國，但是貿易對外表看來強大無敵的中共會有甚麼影響？

難忘圓明園

外國入侵者劫掠過她的國土，征服過她的祖先，陳燕可不曾忘記這些。她是大陸一家國營貿易公司設在紐約分支機構的主管，而商務律師豪森 (Nicholas Howson) 正向著可能成為他客戶的陳燕暢談

豪森家族在中國的長遠歷史，從他祖父談起。陳燕一面微笑一面禮貌的應和著。豪森一離開那俯臨無線電城音樂廳的會議室後，陳燕就轉身向她同事說：「放火燒我們圓明園的，他祖父鐵定有份。」其實豪森的祖父是個飛行教練，在中國不曾拿過火炬，至少是不曾在暴怒的情況下拿過火炬。這場對話發生於1996年底的紐約，距離狂瀾的英法聯軍襲擊並焚毀北京著名的圓明園，整整是136年。

歷經兩世紀和外國的接觸往來後所帶給中國人的，套一句中國人常用的話來說，就是恥辱，而且那些前塵往事依然蝕刻在他們的心田中。歷史從來不曾退隱，發生在中國的任何事件於日後的省思中都可能被解讀成最不堪的樣貌。東芝的手提電腦有瑕疵？揚言不再出售東芝牌電腦的一家電子公司高聲疾呼：「中國人對日抗戰八年以扭轉不平等待遇，這不僅是單純的商業糾紛，它還直接關係到中國人的榮譽！」一旦和歷史的陰魂扯上關係，任何事情都可以訴諸情緒。

歷史的陰魂折磨著這個偉大的民族，歷史從來不曾和顏悅色過。《時代》雜誌把中國貼上「全球化中最大受害者」的標籤，因為在1840年代英國憑著鴉片貿易強迫中國打開市場。不過這不是重點。的確，英國焚毀了圓明園，中國人有權為此義憤填膺，但是你可曾聽過有人抱怨1812年的戰爭？中國人談論起久遠的往事有如發生於昨日，而且把焦點放在他們的吃的苦受的罪上，卻因而被世界其他國家拋在後面，這些國家大部分都沒有歷史的包袱。毛澤東喜歡他的人民「一窮二白」，或許有他的道理。

談談你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吧，這是一段沒有人能為之辯護說它好話的時期，但是平心而論，如果當年紅衛兵徹底清除了中國的

歷史記憶，新中國可能早就繁榮興盛了。不幸的是，紅衛兵要完全抹殺過去的種種，這是辦不到的，以致1960年代的狂熱青年到頭來只是平添了歷史的重擔罷了。

美國總統柯林頓在2000年的國情咨文中說：「我們依然是個新的國家，只要我們的夢想超過回憶，美國將永遠年輕。」中國人也對未來懷抱夢想，所以絕不能再老態龍鍾下去。中國的文化綿延好幾千年，而且無從改變歷史，不過如果他們想再度強盛起來，就應該只保留長遠傳統中最精華的部分。卡萊爾(Thomas Carlyle)說：「歷史紀錄一片空白的人是幸福的。」他的看法和把歷史比擬成噩夢的詹姆士·喬伊斯(James Joyce)相同。「歷史不斷重演」，古今中外皆然。在中國，歷史不但重演，還會毀掉未來。

王彼得現在安全了，第二天，也就是五月十二日，他在大使館附近一家小餐廳等候同事雷吉德(Karby Leggett)。抗議的人潮暫時散去了，但是他左等右等等不到雷吉德。原來雷吉德那時候正在一家旅館電梯內，有個大聲咆哮的中國青年逼問他是不是美國人。但是高大壯碩的雷吉德並不需要尋找靈感來幫他解圍，他直截了當答稱「是」，然後就聽到和攻擊瑪琴農等人相同的怒吼聲。王彼得和雷吉德都擔心接下來情況會更糟，因為在南斯拉夫首都被北約戰機炸死的三名中國記者的遺體翌日將運抵北京機場，當地人的情緒可能會更加火爆。他們得趕緊回去工作才行。

如果換個時間，「你是美國人嗎？」會是一個友善的問題，但是在5月的那些日子裡，為患中國數百年的民族主義正在展現它醜惡的容貌。美國人以繼承的傳統為榮，以國家的象徵為傲，但是遠比美國人有更多歷史可以自豪的中國人卻鮮少有此感受。「中央王國」

(Middle Kingdom)的兒女表現出來的民族主義是近兩百年來被殖民侵略的屈辱，而非五千年來的偉大成就。他們會暢談遭到外國軍隊侵略的不堪情狀，但鮮少提及其他。難道這個國家的歷史只有兩百年嗎？

正如莫克所說，中國人的憤怒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能夠較為宏觀的來看中國的人卻知道，王彼得與瑪琴農所見識到的尖銳情緒表現，阻礙了這個古老國家的進步。短期而言，貝爾格勒事件後的強烈抗議行動減緩了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時程；長期來看，則民族主義者的態度封閉了他們的心，阻礙了開放與包容所帶來的進步。

中國現在談起未來，就宛如它將再度強盛偉大起來一般，然而對背負著歷史重擔的民族來說，這只是幻想罷了。江澤民說：「只有把過去看得更真切，我們才能邁向未來。」其實前進到未來的最好方法就是期待未來。對中國來說，昨日毒害了今日，也搶走了明日。偉大的國家若是歷史悠久的話，莫不受到其歷史所激盪鼓舞，中國卻是受其歷史所困擾。

煩擾中國人的不僅是恥辱問題而已，他們同時也受到「偉大」這個問題的困擾。印度聖雄甘地曾說：「沒有一種文化能夠自外於世界而存活。」自外於世界正是中國過去曾經採取的做法。在15世紀中葉，這個泱泱大國雄據東亞睥睨四鄰，咸認比當代任何文化都來得優秀，在那時候，中國如同所有偉大的強權一般，放眼世界。三保太監鄭和率領三百多艘船隻組成的船隊出海，其中數艘是空前的繅繃巨艦。自1405年到1433年大約30年間，他以明朝皇室的名義遠征他國，最遠達到阿拉伯半島的亞丁港。一路上，鄭和弭平了地

方上的戰爭，探勘了附近的土地，降服了海盜，還征服了好幾個國家；貢品源源不絕的從周邊的小國送往明朝的皇宮。但是突然之間，中國意興闌珊了。1440年代的明朝皇帝聽從了儒家學者的建議，下令停止與不如它的海外國家接觸。結果這支「寶船」艦隊解體了，七次出洋紀錄和船隻設計圖都摧毀了，造船場被改做其他用途，從此以後中國不再建造如許宏偉的船艦。

有人推測，原因在於派遣船隊出海遠航對明朝皇室的財政造成了負擔。這一點有可能，因為明朝大致上禁止通商貿易，而所費不貲的海外探險活動，若不要貿易來挹注是不易進行的。那時，中國與外國間最多的往來型態是收受貢物與回贈禮品，然而貢物交易是養不起一支偉大艦隊的，再者，一個禁止民間貿易的國家也等於禁止本身接觸新事物新觀念，這樣的國家就再也不會進步或創新了。

史家對於明朝轉而閉關自守有不同的看法，然而有一點是明確的：自從明朝決定解散船隊後，中國就開始走上了衰頹的道路，迄今已有數百年。人類歷史上第二個登上月球土地的艾德林(Buzz Aldrin)說：「文化不能保持靜止不動，它會進化開展或是絕滅終止，往前探索或是衰退不振。」的確，中國衰頹了，起初並不明顯，但故步自封的社會停滯不前，面臨入侵者時很快就無力自保，而這些入侵者可是比明朝安穩的統治者更強悍的。來自東北的滿洲人衝破了長城的防線，並且迅速融入中國社會，在1644年推翻明朝建立了大清帝國。但又有一批外國人卻無意被中國社會所同化，富於冒險精神的歐洲人自海路抵達中國，沒有海軍的中國這才發現自己無力自保。外國軍隊把圓明園等大約一千個處所劫掠一空，在中國各地恣意橫行。這些歐洲人讚歎中國的古老文化，卻拒絕向皇帝

下跪，也無意歸化為中國人。

就如陳燕一般，中國人到今天都還記得國勢衰頹的恥辱。不錯，中國的確曾經遭受欺凌，而且外國強權在中國的行徑是難以寬恕的。然而中國確實如同《時代》雜誌（以及中國本身）所稱，是全球化最大的受害者嗎？不，並非如此。長遠來看，不論中國的開放會有多麼痛苦，這是不可避免的，對中國人民有益，有些中國人也聲稱的確如此。畢竟，他們衷心認為，把落後的西藏人民帶進現代世界，是中國給予西藏的恩惠，如果這個看法屬實，那麼當年入侵中國的外國列強也是有恩於中國了。

中國人並非都是抱持這種看法的。不過他們應該瞧瞧在東海對岸的島國鄰邦日本。不論日本人民對當年打破日本鎖國政策的裴里將軍(Mathew Perry)感受如何，他們真心接納現代化，並且在很短的時間內建設成一個強盛的國家。日本在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中打敗了中國，其時距離裴里於1853年率艦進入東京灣（江戶）、強迫日本打開門戶，約莫只有40年而已。中國人應該注意的是，裴里之入侵日本，是遠在西方人首次進犯中國之後才發生的。現在有許多人鑑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78年以後有了可觀的進步而對中國在新世紀的發展充滿信心。我們忘記了中國人努力要現代化，進行了大約150年，到現在還沒有成功。對他們來說這是不幸的，因為在跨入新世紀的現在，中國人正站在歷史的轉捩點上，不論是否已經做好準備，WTO的會籍已經落在他們頭上了。

通往WTO的漫漫長途

權勢之大不輸明朝皇帝的毛澤東禁止了中國和外國人大部分貿

易，他所搭建的「竹幕」讓中國與世隔絕數十年之久。他的後繼者鄧小平以及鄧之後的江澤民採行了不同的路線，讓外國人為中國服務，同時也讓中國人為外國人服務。不過外國人在中國的投資事宜受到嚴格的控制，結果是外國人只在有限的產業中構成競爭威脅。

在毛澤東過世十年之後，中國才申請恢復它於1950年退出的「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簡稱GATT）的會籍。對中國人來說，在鄧小平的時代要重新加入這個組織是辦不到的，不過在鄧小平務實的政權下，中國憑藉自己的力量逐漸自由化，「改革開放」日漸侵蝕著竹幕。取得了前身為GATT的WTO的會籍後，比歐洲的「鐵幕」撐得更久的毛澤東的竹幕，將只餘下微不足道的陰影了。中國大陸的邊界在加入WTO前仍然受到嚴格的管制，商品的流通或人民的往來都有限制。但是趨勢是很清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將破天荒的根據外國人訂定的規則，對全世界開放。

中國的經濟奇蹟泰半是建立在與外國的單向貿易上。鄧小平要使中國「富強」，此一意願轉化成不斷增加的貿易盈餘。損人利己的貿易創造了2001年年底時高達2122億美元的外匯存底，在全世界僅次於強大的日本。不論從任何標準來看，這都是很驚人的，而中國與美國的貿易順差也同樣可觀，在2000年，沒有任何國家在對美貿易上占到像中國那麼大的便宜，連日本都望塵莫及。然而不平等貿易的時代要結束了，中國將需要用到它龐大的外匯存底來支應未來勢必會發生的貿易逆差。這正是為何全球那麼多國家催促著要中國加入WTO的緣故。

世界各國為了中國即將加入WTO而興奮得樂陶陶。如果不靠服用興奮劑的話，談論中國加入WTO倒是通往狂喜迷醉的捷徑。

2000年5月在上海，也就是李晶籌辦的中國論壇上，有一千兩百多人齊聚一堂，聆聽中國總理朱鎔基暢談他對WTO的看法。7個月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在同一場地為「《財富》全球論壇」做過一場演說，如果不是依中共的規矩，出席的人數不得多過江澤民的場子，朱鎔基的聽眾還會更多。

等到所有貴賓演說完畢，輪到李晶的上司古爾（古爾）致閉幕辭時，已沒有人專心聽了。他們真該聽聽的。古爾用他平板單調的聲音說：「我們深信，在今後四或五年之內，不論是經濟型態或資本市場，將會出現不下於過去二十年那般重大的改變。」但是焦躁不安的聽眾幾乎沒有聽到他的評估。

這樣的評估是非常驚人的。怎麼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出現如此重大的變革？有兩個理由。首先，加入WTO將對貿易規則帶來徹頭徹尾的自由化。中國必須大幅降低或全面取消工業製品或農產品的關稅。這還不是大新聞。最重大的轉變在於必須將現有的涉及貿易與投資的成規完全自由化。在入世的最初五年內，大部分的配額與其他非關稅障礙必須取消，其中有許多項目必須在兩年內逐步刪除。舉例來說，外國公司將獲准進出口大多數產品，不再需要透過國營的中間公司居間運作。此外外國公司也可自行作大宗物資的買賣或零售業務。有更多的產業諸如證券業、通訊業等，股權的限制將會放寬。同時農產品等等的出口補貼將會取消。更有甚者，各省與市之間彼此樹立的地方性貿易障礙皆須廢除。種種這些改變，單項而論即很重要，整體言之則是革命性的大變革，對中國的經濟將有難以估量的影響。

其次，問問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會長柯白（Robert Kapp）就知道

何以入世後會有驚人的大變動。他的言辭也許欠缺優雅，但他的解釋可能是正確的：「重點在於WTO把中國推上了一個軌道，在這個軌道上運行的中國必須承諾依照國際的標準和普世遵守的貿易規則與經濟行為來運作，同時它也必須承諾要重新建構經濟運作的方式。」

中國藉著巧妙處理私人企業與外國企業的手法創造了經濟奇蹟，此一重任北京責無旁貸，它既訂定規則也兼任裁判，多少取得了它想要的成果，只是那樣的日子不會再來了。愛情的意義是你永遠不必說你很抱歉，而加入WTO的意義是你再也不必理會北京的官僚了。大家按照規則來進行貿易和投資，對中國人來說是新觀念，也引領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新時代。

看來中國對於「水瓶世」新時代的來臨已有準備。最近在北京有個顧客說：「我到長安大街的書店要買本毛澤東選集買不到，書店裡倒是有70本講WTO的書。」學者紛紛就WTO議題大作文章，消費者則熱烈期待加入後的開放和競爭將使物價大為減低。江澤民等著要聽歷史對他決定入世所給予的掌聲，朱鎔基看來也已準備就緒，打從他1998年當上總理以來就一直在整頓百病叢生的國企，努力要使國企作好準備迎接未來的挑戰。在2000年中國論壇上，朱鎔基對他的作為做了一個總結：「所有這些措施將協助許多虧損的大型和中型國企在今年脫離困境。」

他說完後，接著上台的道瓊社的那絲絲(Karen Elliot House)用她清脆的聲音感謝朱總理的「特出見解」和「他今晚註冊標式的坦率評論」。乍看之下，好像朱總理那天晚上的坦白陳辭唯一特出之處是在於它並不特出，因為國企仍然弊端叢生是人人皆知的事。然而郝

絲也沒有說錯，朱總理在評估國企時十分真誠，而他能夠同時既坦白又偏離事實，顯示中國領導人對其所創建的非常體制在觀感與現實之間有落差。正如朱所言，多數大型國企的報告顯示有盈餘，但是那些盈餘是以作帳手法以及寬鬆的中國會計標準來衡量的結果，並未把政府的補貼等等計算在內。如今，他以3年為期重整國企的限期已屆，成績有目共睹。雖然那些企業已然改頭換面，但是他還未能根本改造它們，大多數企業都尚未具備在來日與人競爭的能力。

在毛澤東實施「大躍進」期間，北京的高幹責成底下的人要有好消息往上報，從而他們接到的都是好消息，結果是有好幾千萬的人淪為餓殍。40年後的今日，中國領導階層認為他們已準備好加入WTO了。江澤民說：「中國已有充分能力參與全球競爭。」這是中共的指導綱領，難怪朱鎔基會說入世後國企禁不起外國的挑戰。根據此一共識，中華人民共和國願意依照國際社會的條件來加入絕不寬貸的世界貿易體制。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未能成功，這並不是中國領導班子第一次落入過度高估自身成就的陷阱中。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魯志強說，還有另一個問題，就是很少人做腳踏實地的紮實準備工作。儘管高層領導很樂觀，但是北京較低層級的技術官僚對於國企和政府部門為加入WTO須做的準備工作，並不積極任事。這也難怪他們。北京領導班子起初對於入世一事意見相當分歧，一直未就應採何種策略達成共識，因此技術官僚並無太多著力點。結果是，政府部門與國企相關單位的入世準備工作進度慢得令人著急。這些單位攸關入世之戰的成敗，也是先前對於入世議題反對最力者。舉例來說，曾有報告指出大多數的國企對

於入世的工作毫無準備，只是抱著船到橋頭自然直的心態，認為到時候政府定會保護他們。香港一家大型基金的經理人預測，大陸入世後只有數千家的公開上市公司能夠存活下去，即使是國內企業的佼佼者都可能在入世後因不堪壓力而垮掉。

有點荒謬的是，如果說中國有人確實明白加入WTO的真正意義何在，對未來有何衝擊的話，應該就是政府相關部門和國企的那些人了。他們一直聲稱，入世就是允許外國人來操控中國經濟的重要層面；如今入世是勢在必行，他們反而最缺乏準備來面對自己先期所警告的情況。

改變觀念需要時間，這一點在秉持毛澤東思想的政府部會尤其真切。然而得到「動脈硬化症」的不僅是舊官僚而已，新官僚也有同樣毛病。舉例來說，「中國保險管理委員會」是一九九八年設立來取代人民銀行的監督功能的。人民銀行派了一些有前瞻眼光的人到該委員會來協助管理一直被「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所掌控的保險業。在該委員會的內部，有一批效忠人民保險公司的人，這批人無意開放保險業，一直在排擠、整肅那些從人民銀行派來的思想開通的同事，這個排擠現象由北京展開，後來擴散至上海，意味著一旦入世後外國公司蜂擁而入，中國本土的保險公司仍然缺乏競爭力。

不過有些時候那些充滿僚氣的官員不做準備倒是好的，因為他們往往把事情搞得每況愈下。舉例來說，中國人民銀行正在開倒車，要進一步限制外國銀行，如此一來中國本土銀行將變得更無競爭力。這還只是最短期的應急措施而已，有些限制措施在中國加入WTO後的初期可能還不會被廢除，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由於中國人民銀行逐漸的停止激勵地方機構自我改革，因此國內的銀行將

不會做好入世的準備。對銀行來說，入世就如同震盪療法，而中國人民銀行正在加大電壓。中國根據WTO協議須自某個時候起開放銀行業，一位外國銀行家在談到中國開放銀行業之前的這段時期時說：「我覺得這段時間並不够長，不足以讓它的銀行體系脫胎換骨。」

一個又一個的部會都在仿效中央銀行。即使到了入世的前夕，高層領導仍然認為，以開放競爭來強化國內企業因應外來的衝擊，還不到時候，而且許多官僚仍然在嘲諷自由貿易的精神。

就在中共幹部為入世做準備時，他們仍然不願放棄五年計畫和毛澤東時代的教條。顯然他們看不出過去50年的失敗成績，所以還堅持在經濟上發號司令。在鋼鐵、行動電話等等一百種產品方面，中國的公司都有政府的補貼或其他優惠，儘管這些辦法一開始實施就搞得一團糟。中國的另一個重大的產業策略是，藉著強制合併，讓大企業更加擴大。然而，在試圖建立世界級的大公司之際，中國卻扼殺了競爭力，這是官僚指揮進行的合併無可避免的結果。北京拖拖拉拉不願建立較自由的市場，也就延緩了強化國內企業以便與外國公司競逐的時機。的確，整體而言中國公司應該更大一些，但是以人為方式刻意促使其變大，往往適得其反使之降低競爭力，比如說，原本早就負荷過重的經營管理部門負擔會更重，財務資源也會被分散到不賺錢的活動上。

江澤民曾訓令黨內幹部要「充分了解中國取得WTO會籍的意義」，如果他真的希望他們了解，他應該讓那些幹部去和外國記者談談，記者會一直追問失業問題。相關專家在被問到這件事時就閉口不談，擺明了迴避這個問題。有時候他們雖遲疑不答，但答案其實

許小年說：「你不能就把一個農人擺在工廠裡，叫他組裝電腦。」

大家普遍認為中國國內加入WTO的最大贏家是紡織業，不過紡織品擴大出口後所增加的就業機會數額並不如原先所預期的情形。在目前封閉的局面下，紡織公司是向國內的生產商購買原料，然而在WTO的世界中，他們將會向外國的供應商購買更便宜的貨色。例如中國最大的廠商宗佰集團（音譯）就打算這麼做。所以在中國加入WTO以後，獲利的是南韓、台灣和日本的製造合成纖維工人，吃虧的是中國無產階級工人，即使紡織業是中國之光也是枉然。

入世將會帶來另一個轉變，會重塑中國工業的面貌。摩根史坦利公司的經濟專家謝國忠指出，北京當局現在才剛剛開始了解，到2005年左右，外國企業可能已取得中國經濟大部分的所有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封閉的制度裡，北京可以制訂能夠阻撓外國強大競爭者的規則並強制施行；在加入WTO後那樣的特權將大大受到限制。中國有好幾千條的法令、規章、定則等等有待取消或放寬，以便它那已有50年歷史的操控機制能夠符合WTO的規範。而且依照入世的條件，許多所有權的限制必須逐漸廢除。

失業人口增加的問題會惡化，外國企業控制中國企業的情況也會更加普遍，但是不論如何，這些都不會對北京政權構成真正的威脅。北京當局真正應該恐懼的是民族主義醜陋的那一面——仇外症候群。入世將使得中國無法再如目前般在經濟上占便宜，特權與特殊地位將攤開在陽光下，隨著入世而消失，但是有形的東西不會消失太多。起初，得到好處的將是外國人，所以一旦入世後工人喪失工作，誰來保衛中國共產黨？當憤怒的群眾向中共領導高層所在地中海進發時，北京大學的經濟學者會出面向他們解釋貿易赤字

和相對優勢的觀念嗎？

王彼得和瑪琴農所遭遇到的民族主義怒潮也有可能波及到其他的人。中國人從前就推翻過不護衛本國領土政府，遭到外國軍隊侵略的清朝就是被孫中山的同盟會所推翻的。繼承同盟會的國民黨由於對曾經掠奪中國的日本太過於軟弱，後來被共產黨推翻。而今共產黨允許外國人進入中國並讓他們以一種不同的方式在中國土地上橫行無阻，也是有風險的。共黨高幹將被困在自己的國家內，被他們過去所鼓勵並利用的民族主義逼到牆角。

除非他們能夠讓經濟繼續運轉。入世後他們可以採取的唯一務實辦法是讓外國人增加控制權。許多人預測說，一旦所有權的限制放寬了，外來的投資將會激增。高盛公司的分析家胡祖六認為，在大約五年的時間內，外資的金額每年將會增加一倍以上。有個理論指稱，由於增加的投資係來自外國，所以它將會雇用那些因為外國的競爭而受害的人。目前正在發生的正是這種情況；有人預測說，由於所有權等等的限制將會放寬，前述的現象未來將會加速發生。

甚至會有更多外國人來到中國？正在努力要建立一個私人的人才培育所的丁崖、拉卡卡和好幾百個像他這樣的人，將會找到門路到上海和深圳發展，從事互聯網和高新科技產業的投資。有些外國公司將發展出更大的產能，以便在新興的中國市場上分得一杯羹。不過這些解決之道將只是例外情形。認為新的外資將湧進中國的論調忽視了中國以及今日國際間的現實情況。首先，中國幾乎已經樣樣齊備，誰會想要去投資一個已經苦於產能過剩的國家？其次，世界上大部分國家也都有產品過剩的問題，隨著中國貿易障礙的消除，顯而易見的解決辦法就是利用現有的外國工廠，把貨物銷到中

國去。柯林頓總統在談到中國入世所帶來的改變時說：「結果是我們可以把貨物從家鄉外銷到中國，而不是看著（美國）公司為了把產品賣到中國去而被迫到中國去設廠。」通用汽車公司正是打算要這麼做，雖然它在中國早已設有生產基地。

入世也意味著中國必須購買外國工廠製造的產品。入世後，汽車進口關稅從80%大幅調降到25%，再來會怎樣？我們可以鑑往知來：2001年初中國曾小幅調降汽車關稅，當年1月進口汽車自上海進口的汽車激增了將近1.5倍。入世後進口產品的增加將會更為驚人。浙江省紹興市一名計程車司機說：「加入WTO我就可以甩掉這輛差勁的SANTANA，去買輛日本車，我想要一輛本田的。」對於出售劣等SANTANA的福斯汽車公司在上海的合資企業來說，這可是個壞消息。這家德國汽車製造商預期，中國入世後它會招致巨額的虧損，因為它在中國的生產品成本比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高出三成。因此中國關稅調降意謂福斯的價格無法和進口車競爭。全世界最有效率的汽車工廠就在日本，其產品經由海運只要兩天的時間就到達中國。這就是為甚麼福斯公司最近千方百計努力促銷在中國產製的汽車的緣故。在福斯的展示會上，那兩名德國女子看起來很欣賞對方的樣子。有一頭烏黑短髮的女子把一隻柔荑放在金髮美女的肚子上，兩人的秀腿相互交纏著。金髮美女一手放在黑髮女子的胸前，另一手撥弄著她的頭巾。黑髮女子雙目閉著，櫻唇微張，你很容易猜到她在想些甚麼。也許這兩個人會亢奮起來，但不會是此時此刻——兩個年輕的模特兒正站在一輛嶄新的福斯製造的AUDI轎車前。此刻是2000年北京中國汽車大展期間。周遭的人心跳加劇脈搏加速，但沒有人去注意那輛新車。近日以來不論廠家使出多少渾身解

數，還是沒有甚麼效果，大家都在等待入世後價格大降——當關稅從目前的80% — 100%調降到25%時，進口商品價格降低是必然的結果。

丹尼爾（Patrician Randy Daniel）不會去請女同性戀來表演，但是這位經營保齡球產品的美國AMF公司總裁想要在中國促銷產品的心思和福斯公司一樣熱切。他是中路實業老闆陳榮的晚宴賓客，而陳榮總是有辦法弄到視野最好的邊間。在上海浦東的鷺鷥酒店，自V7室的大玻璃窗看出去可以看到全世界最高的兩座建築物，但是丹尼爾今晚——1999年12月的一個晚上，沒有心思觀賞。AMF公司錯過了在中國生產保齡球球道和相關設備的時機，丹尼爾一直在想著關稅和WTO的事情。1997年當中國提高關稅時，AMF外銷中國的數量銳減；現在丹尼爾看到了未來的商機，中國入世後，AMF將會有「足供長期挖掘的豐富礦藏」。在這座永遠建個不停的城市裡，他止不住想到未來，所以在晚宴中他問陳榮有關入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AMF公司的人可能永遠都不知道陳榮對中國入世有甚麼看法。他東拉西扯了一大堆，但是說完後房間內沒有人知道該如何接腔，因為大家都不明白他到底說了些甚麼。不過如果陳榮有心幫忙的話，丹尼爾應該會聽到有關來者不善的環境下削價競爭的情事。AMF的主要競爭者賓士域公司已經在全球各地壓低售價，從而縮小了其產品和陳榮的產品之間的成本差距。加上中國對於保齡球產品課徵的關稅將大幅降低（調降50%以上），而且以後AMF和賓士域不必再像現在一樣需支付昂貴的中間商費用，所以對陳榮而言一場惡性的削價戰爭已山雨欲來。不過陳榮曾經從這兩家外商公司手中

奪走保齡球產品市場，他和其他私有企業在入世後仍有能力對外商公司選以顏色，他們是不會因為入世改變了原有的優勢而舉手投降的。而全中國許多像陳榮這樣的私有企業都很機靈善變的。

另一方面，國企的經理人卻並非如此。背負著黨的指示和官僚政治的常規，他們無法在高度競爭的環境下迅速作成攸關存續的決定。省級幹部想要自治權以處理入世帶來的變化，但是黨中央領導階層在重新調整經濟重心之際，仍然堅持北京須有較大的控制權。他們低估了入世帶來的痛苦，不願放鬆那勒著國企的韁繩。除非國企的經理人在經濟問題上能夠不受拘束的以理性的態度來執行，否則入世的震撼療法不會起甚麼作用。北京的政治當權者似乎並未體會到自由貿易的環境是冷酷無情的。經濟回春有可能發生，但只有在中共讓四季按時變化時春天才有可能到來。

所以如果北京的高幹漠視入世可能帶來的衝擊，那麼這項震撼療法將令人特別痛苦。諷刺入世的人說，加入WTO將促使中國的經濟加速成長，但並非人人同意這個看法，尤其是有關今後數年的發展方面。香港經濟學家何戴端（音譯）估計，入世後最初數年由於外商公司外銷到中國的產品增加，中國的經濟產值每年將減少0.8%。這個看法也許稍嫌保守，但不論真正的數據為何，何氏有一項判斷是完全正確的：今後數年將是艱困時期。對中國未來的看法總是宣傳的多，預測的少，畢竟，要治療積累半世紀的總體經濟弊病，有誰會預期將毫無痛苦？

如果中國要許不履行入世承諾，這些痛楚都可避免。不過高層領導人並不作此打算。他們一個個向大家保證，中國將遵守入世的義務。中國領導人也許短視執拗不討人喜歡，但有其自豪之處：他

們言出必行。不過執行上仍然有問題。毛澤東曾經引述古諺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成千上萬的中國官員各自解讀入世規章的意義所呈現出來的正是這種情況。讓十二位部長來訂定新規則的話，將出現一百種挫敗外國人的新方法，然後在明天引發一千宗新糾紛。中國官員在履行義務方面有特殊天份，但他們只按照自己的解讀去履行。北京的每個部會、地方的各省，幹部的行事都逾越北京高層領導人的有效監督範圍，今日如此，明日亦然。貿易承諾對於努力保護鄉民的地方幹部而言只是一紙虛文，同意加入WTO的一張協議書並不會改變有數千年之久的歷史和文化。

然則自由貿易的實施將只是一場騙局嗎？不會的。這一次外國人會反擊帝國，他們已經又厭又煩不會再忍受下去了。在全球各地大力鼓吹WTO的諸國人士是不甘受到拒絕的。現在他們有了可強制執行的權力為護身武器，必要時會對簿公堂。當然中央政府的官僚和省級幹部可以（而且肯定會）採取拖延戰術、爭辯與奮戰，但是外國人終將占得上風，因為中國領導高層明白，在WTO糾紛中獲勝的國家可以片面報復不履行貿易義務的國家。

還有，大家都以為外資企業會在作弊文化中吃虧，卻不知外資其實也有佔便宜的。舉例：法國的大型超市加樂福（Carrefour）短短幾年，就從無到有，建立了全中國第二大的零售網，憑的正是一種伎倆：不理北京的規則。作弊的外商是否會做不過中國人？絕對會。但我們不該低估整體的效應。

今天，WTO會員國如日本、南韓尚保留部分經濟未開放，顯示入世並非得全面開放市場，但我們必須牢記，比起這兩國，中國的入世條件影響範圍更廣許多。所以日韓的作法對中國而言並不可

取，入世後若半開放半封閉將會把中國領導人一直努力追求的利益排除在外。更具體的說，如此一來將延長中國目前正在承受的痛苦。北京領導人利用WTO來強迫僱用了大約40%都市勞動力的國企進行改造。選擇加入WTO的一個理由是今天中共尚能控制無可避免的失業問題帶來的日益嚴重的後果。再過個幾年，一旦數千萬人失業了，恐怕中共就無法維持社會秩序了。簡單的說，是有一個有限的機會之窗來平抑入世帶來的痛苦。歐盟執委會駐北京大使衛金森(Eendymion Wilkinson)在李晶的「中國論壇」上指出：「照章辦事符合中國自身的利益。」這位身材碩長的外交官說的不僅是外交詞令而已，公平的貿易終將降臨中國。

而中國最好是作好準備。自王彼得被困在「敵境」時算來，匆匆一年已逝，此刻是2000年5月。愛國的中國人總是記得各種周年紀念日，北京的學生準備上街遊行，以提醒美國人他們並未忘懷貝爾格勒三個中國記者之死，不過這一次中共當局制止了他們。以貿易促進和平的力量已經開始發揮作用：美國國會即將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法案進行投票，中南海高層不希望北京年輕人的熱情危害到這項投票結果。黨的領導高層要學生努力讀書以建立強盛的國家，愛國的表現就留給他們好了。

黨的立場雖然不受歡迎卻是強而有力的，學生果然沒有上街遊行。一年之前的1999年，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受到攻擊後，尚慕杰(James Sasser)大使自受損使館向外探頭的影像激怒了美國人。如今尚慕杰已離任，取而代之的是曾經在1996年3月把美國航空母艦開到台灣附近水域以警告北京勿輕舉妄動的普魯赫上將(Joseph Prueher)。中國駐貝爾格勒使館挨炸的第一個周年紀念日，普魯赫與

其夫人刻意不帶隨員從官邸走了三個街口到大使館，只有少數還記得那天是甚麼日子的記者伴著他們。然而中共當局並未能完全禁絕第一個周年紀念日的示威活動，憤怒的北京大學學生在數天之後找了其他的理由上街遊行。

王彼得已獲升遷並調職香港，他沒有報導新大使散步去上班或學生抗議情事。這位王牌記者已脫離險境，但是中共並未如此。它可能很快就被過去它所鼓勵但現今試圖抑制的愛國之火所包圍。《中國日報》(China Daily)一篇評論文章寫道：「大約150年前，衰弱的中國在西方帝國主義的槍炮逼迫下對外開放……如今中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站立起來了，贏得舉世的尊敬。」官方媒體希望人民對入世抱持這種看法，但是他們會這樣看待入世嗎？江澤民和朱鎔基倡議加入WTO需要勇氣甚至是不顧一切的氣概，而要在未來這些年把國家穩住使它不致分崩離析，則需要技巧和運氣。那些宣稱入世將導致主權喪失的人勢必會在環境變得艱難時指責黨犯了錯。曾在1999年5月到美國大使館示威的一名大學生說：「如果政府的對內政策傷害了人民，人民可能會逆來順受，但是如果政府背棄了我們，和外國政府從事邪惡的交易，我們絕不會容忍。」

所以WTO最好會起到作用。如果不起作用的話，就被古爾說對了：今後數年的變化將是難以想像的，對中共造成的衝擊也是難以臆測的。對高幹來說，問題在於入世「將奪走共產主義政權的指揮控制權」。今天，中共的存續是藉著千方百計延緩經濟問題的爆發，例如提供寬厚的補貼給生產者和外銷者。加入WTO後中共的行事自由將大幅度受到WTO一般規則與中共為入世而應允的特殊承諾的限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北京領導高層將首次不能無限期

的推選社會主義招牌下固有的問題。

《商業周刊》(Business Weekly)一篇社論寫道：「從末有一個共產國家成功實現中國正在進行的那樣大規模的經濟轉型，而未激發大幅度政治動盪的。」北京青年日報則指出：「WTO的134個會員國中，沒有一個在入會後發生經濟解體的情形。」這個看法忽視了中國特殊且嚴重的經濟與政治問題。也許這家具具有影響力的報紙認為，中國正在進一步的武裝自己，所以它的這個觀點是正確的。每個省市都在入世前提升它維持治安的能力。不論如何，我們很快就會發現，究竟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存續下去，或是古爾有先見之明？

同時，古爾僱用的員工不再感到不安。中國大使館換炸事件發生一年後，李晶甚至看起來很從容，她現在悠然自得，她主辦的「2000年中國論壇」正在繁忙的上海舉行，討論的主題是網路，而且今年有許多人開始使用網路，人數比一年前多出一倍以上。出現在北京的抗議活動使得一些原訂要發表演說者取消行程，造成一些混亂。這次論壇在全世界第三高的建築物內舉行，那是一座未來式的高塔，頂端呈現裝飾藝術的尖塔狀。經貿大樓聳立在通往浦東的主要入口處，有如現代主義的燈塔般在一座努力要現代化的城市裡發出光輝。

✓「樂觀」還未被拿來形容參加李晶的論壇者的心情，但是愉悅的氣氛瀰漫著。一個年輕人誇耀說：「我們是驅動經濟運轉的電力。」他的公司其實和電力業毫無關係。看起來似乎每個在麥克風前的人都必須說出一些比先前發言者更聳人聽聞的言論，不過直到第一天下這種扭曲（或稱自我欺騙）才真正達到具有歷史意義的程度，那是在全球最受青睞的共黨領導人朱銘基發表演說時，他稱

讚自己成功改造了國企。

但是仍然有，也僅有一些些微肅反省的時刻。這一天的討論主題一再轉到WTO會籍上，而當李晶上台再提到這個問題時，出現了不一樣的氣氛。她停頓了片刻後說：「國企的改造過程將很漫長。」

祕密的旅程

這個男子痛恨旅行，但是支持他的中國領導人要他前往北京以便面授機宜時，他不得不展開這趟祕密行程。所以在2000年5月，北韓領導人金正日17年來首度踏出國門，如同附庸般的奉召前往中國的首都。

中國領導人不願看到南北韓統一，統一後的韓國將是由富裕繁榮的南韓所掌控的。中國要的是一個毗鄰的附庸國，做為它與不友善的世界之間的緩衝。但是做為緩衝國的北韓相當孤立，現今無法自立更生，北京統治者要北韓開展貿易以取得穩定，但卻不得過度開展以致成為外國強權的盟友。所以一向隱遁不出的金正日前往北京，在兩韓高峰會前，聽取他唯一盟友的忠告。

北韓應該與外界有多少接觸？對北京領導人來說，這個問題恰恰和他們在國內面臨的一樣，是個令人左右為難的問題。他們知道中國若要進步就必須發展貿易，但也知道有一個不能逾越的點，一旦越過這一點，就再也控制不了局面了。江澤民一定天天在問自己，「到底我們可以有多少貿易？」他連自己的問題都無法處理，又怎能對北韓盟友提出忠告？由於中國領導人不知界限在那裡，他們為入世做了特別的準備：負責意識形態、文化與媒體的政府部門已擬定計畫來反制入世將招致的「西方的影響」，而且改革派的學者

正受到整肅或訓誡以為警惕。每往經濟層面邁進一步，就在政治層面後退一步。

毛澤東要他的人民一窮二白，也要他們孤立於世，當人民與外在世界的聯繫切斷後，高幹就可以永遠把持政權。但是在日漸相互依存、全球化與貿易掛帥的世界上，他們已掌控不了了。《經濟學人》指出，由於中國和貿易夥伴之間的經濟整合程度愈來愈深，它那不正常的制度將逐漸和「全球的規範」產生衝突，這會對它的政治制度造成「空前的壓力」。一家半官方的通訊社在2000年元月間引述自由派經濟學者的言論指出：「政府制度的改革必須隨著入世的到來而加速進行」，尚且不敢使用「政治改革」這個字眼。中共一些務實的幹部也有同樣的看法，但是北京的高層領導人卻不作此想。他們在開倒車，就好像這樣做在今日世界上行得通一樣。

中國領導當局對明顯的跡象視若無睹，仍然緊抓住統治權，也就是說，一旦面臨要求改革的力量，就鎮壓幾乎所有異議的聲音。創立「世界經濟論壇」的克勞斯·史華柏(Klaus Schwab)問道：「你如何確保人權受到保障，如何確保違反人權的行為受到懲處？」由於中共一則是中國人，一則是共產黨，鮮有能力就如何治理它的國家接受外界的忠告。史華柏可以提出忠告，但是江澤民不會領情。

來自美國南加州的共和黨籍眾議員達納·羅拉巴雪(Dana Rohrabacher)了解關鍵點何在。直言不諱的羅拉巴雪提到中國領導人時說：「我們不能藉著擁抱納粹分子而把他變成自由派。」你說對了，羅拉巴雪眾議員。即使世界上所有國家與中共交往也無法把江澤民變成民主主義者，而是會讓他變得自豪，甚至是自大，但不會讓他放心胸。不過眾議員你搞錯了一點：與外界的往來讓中國人

對你富裕的橘郡選民的生活心嚮往焉，這是何以美國人藉著貿易與他國往來。江澤民可以壓制人民，但是消費者會獲勝。

這也是何以史華柏所說的，在一個相互依存的世界上「人人都贏家」，這個看法是錯誤的緣故。你不必到北京去就可以知道中共領導人不會一直是贏家。即使他們手中掌握了所有的權柄，也無法長久受到保障。前美國總統柯林頓曾經撰文指出：「中國人將變得更有機靈、更富裕而且了解有各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可供選擇，在攸關生活的決策上，他們會尋求更大的發言權。」一旦人人都想要有更多自由，中共怎麼能夠繼續大權在握？抱歉，史華柏，是會有一些輸家的。

對於淪為輸家這種事情尼克森(Richard Nixon)知之甚詳，他也知道當今世界上是沒有所謂一些自由這種事情的。今天，沒有政治自由就沒有經濟自由。他曾經解釋說：「自由是不可分割的。」而且也沒有只和外界作一些些整合這碼子事。尼克森在1972年結束訪問離開中國時，白宮並未取消為他的歷史性訪問所做的通訊和衛星系統。後來他特別指出這一點：「那就像是(在北京)留下一隻特洛伊木馬，因為結果是中國看見了外在世界，而世界也看見了中國人民。舉例來說，電視上的天安門廣場是色彩鮮明的，如果它不是色彩鮮明的，就不會出現與它對立的反應。」

也由於發生了天安門事件，鄧小平才決定加速對世界開放。老鄧的繼承人延續了這項政策，而且隨著入世的到來，繼承人也在加速這個進程。不過江澤民和鄧小平不同，他不是務實派。今日的領導人會竭盡所能去對抗政治變局。江曾告訴造訪北京的金正日說：「要趁造反還在初期時加以驅除。」著名的美國政治史家史文生不是

獨裁者的朋友，但他有一點看法倒是和江澤民相同：「遏止革命的時機是在革命初期，而不是末期。」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絕不是在革命的初期，加入WTO後它的領導人將逾越那道界線，而很快的事情就會脫離他們的掌控了。

第十章

荒陸走板

意識形態與政治阻礙進步

堪薩斯城一切都在向上提升，
只有他們能走多遠就走多遠！

——奧斯卡·漢默斯坦二世 (OSCAR HAMMERSTEIN II)

深植在全世界各民族心目中的毛澤東思想，正勢如破竹地前進，將主導世界新一波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浪潮。」這句話出自毛派人士的口中，但他們不是中國人。秘魯左派游擊隊「光明之路」領袖古茲曼 (Abimael Guzman Reynoso, 秘魯人稱他為龔札羅主席)，喊出了這樣的口號。儘管他的游擊行動已被擊潰，但其殘餘勢力在意識形態方面仍比毛澤東的家鄉更具活力。

在中國，共產黨人已不再像龔札羅那樣講話，他們說的話已不像過去那般輝煌燦爛。我們再也聽不到「毛澤東思想勝利前進」或任何能領導「偉大浪潮」的事物。今天他們的言詞不再振奮人心。

共產黨在談及思想原則時輕聲細語，且大部份是說給自己聽的。當他們非得講給中國民眾聽時，會將它口號化，希望人們不去注意它。中共知道它的意識形態早已失去動力，只剩下「我們必能成功」這類說詞。這誠然不是件令人高興的事，特別是對一個自詡為革命的組織來說。中共已耗盡的政治理論必須涵蓋從民主到私有化等每件事，但它卻沒辦法提供現有幹部應有的答案。

毛澤東立下了規範，其繼承者只能針對他留傳下來的進行修改，卻不能改變其架構。黨內高層幹部沒有自己的想法，只能重述他們過去所聽到的。這就是中國目前的意識形態，過去已對未來拿定了主意。這也是為什麼中共領導人會抓住一切能保全意識形態的東西。今天提出這個口號，明天提出另一個口號。然而高層領導人不肯面對一項事實：黨已經沒有新鮮事可說。

前往中國訪問的人對中國過去十年所發生的變化感到驚訝，他們理應如此。中共，事實上是鄧小平，了解在天安門廣場屠殺過後必須做哪些事以保有政權，非常時期帶來了非常的改變。鄧小平用經濟繁榮換取政治上的服從，他不理會毛澤東留下的意識形態傳統，用帶有活力思維的生動詞藻激勵中國民眾。

今天，江澤民繼續執行鄧小平與人民訂下的合約。由於緊急情況已經過去，作為一個審慎的共產黨政治人物，江澤民正固守著一些舊思維。就像鄧小平一樣，他告訴大家他已把社會主義思想帶到一個新的水平，但他講的話了無新意。江澤民當然不會拋棄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然而在中國準備和世界接軌，面對情勢不斷變化，拋棄意識形態顯然是正確該做的事。在中國扔掉它承襲自孤立時期的舊思維之前，需要的是一位更大刀闊斧的領導人。

宿命

撇開中共所有過去意識形態的歷史不說，中共是否有可能達到民主的地步？鄧小平生前所說過最具革命性的一句話是，中國會在五十年內舉行全國選舉。他講這話時是在1987年，中國真的會在2037年實行民主政治嗎？

有人或許認為會有這麼一天。中共現在也談「不同形式的民主」，這無所謂，民主並非「一個尺碼一體適用」的觀念。中共高幹正在學習傾聽來自基層的聲音。朱鎔基說過，江澤民經常閱讀寄給「信訪局」的信件。朱鎔基指這是「中國式民主」很重要的一部份。中共甚至運用高科技來徵求民眾的意見。他們利用國家設置的網站對某些政策問題進行民意調查。此外，還有所謂的「黨內民主」，即推動和黨內幹部選舉相關的一些改革，更重要是「草模式」民主，這指的是農民可以選舉他們的代表的村級選舉。這類選舉甚至已開始擴散到鄉鎮和城市。

門一旦打開，所有改革都能拿來嘗試。為什麼中共不能讓兩個以上的黨員在公開選舉中角逐同一個職位？也許有一天中共會分裂成競逐權力的多個不同派系，很類似日本的自民黨。屆時有可能出現更大膽的改革。就技術上來說，中國並非只有一個黨的國家。除了執政的共產黨，還有八個「民主黨派」。今天，這些政黨都由共產黨資助和控制，透過政治協商會議參與中國的政治體系。政協會議基本上是個沒什麼意義的機構，其存在的目的是為顯示中共政權獲得廣大的支持。但在未來，若情況許可，這些政黨可能成為改革的真正力量。

另一個改革的動力來自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即將跨入2000年之前不到五小時，香港市中心遮打道上，三個女孩在一個大型舞台上唱著「小小世界」。就像這首歌一樣，三個女孩都很俏皮，不過這天晚上她們似乎想調試一下官方所能容忍的底線。

三個女孩所穿的黑色運動衫上，在胸前有用白色所書寫的字，她們選用了露骨的、即使以當地標準也算褻瀆的圖樣。而在三人後方牆面上所寫的，是對中國意識形態充滿挑戰意味的「民主人權2000」等字樣。隨後，香港一些最出名的民運人士上了台，此外還播放了世界上幾位最著名異議人士的錄影談話。

然而，這三個女孩和她們的歌聲在1999年的最後幾個小時卻沒有引起多大注意，那天晚上主辦單位只招聚到三百多人。南邊幾條街外的蘭桂坊，則有八千多名狂歡慶祝人士在那裡迎接新千禧年的到來。

這並不意味香港人不要民主。八九民運期間，香港全部人口中有六分之一，大約一百萬人，走上街頭聲援民主。然而天安門那段時日終究已過去。今天的香港人只是變得很務實。中國在這個前英國的殖民地上和藏地消除了政治上的爭辯；目前很明顯只聽得見親北京黨派的聲音。北京在香港的力量日漸增加，臉皮也跟著變厚。從1999年起，大陸領導人公然對香港民眾發出指令，要限制他們言論和集會結社的自由，新聞自由也遭到攻擊。從那時開始，中央政府不放過任何干涉的機會。

香港回歸中國之後，其脆弱的自治基礎勢必會受到傷害。中國可不願意自家門口有個運作正常的民主體系；兩相對照下差距太大。因此在北京要求下，香港政府不理會香港《基本法》的有關規

定，反而力圖遏止更多民眾參與政治。民運人士可以唱唱歌，但他們可別把這種行徑帶到北邊的深圳，在那裡，政治可不像在香港那樣微妙，而是由國家的高壓力量在操縱。

距離三個女孩唱歌的遮打道只有幾公里遠的中國大陸，曾出現過「帝王」、「軍閥」和「總書記」，但幾個世紀以來，模式都差不多。政治權威被認為應該是屬於一個人的。誠然，某些過渡時期會出現權力由幾個看管者分享的局面，有時有些領導者軟弱不堪，但整個社會只仰望一個人，有時他會被當作神明一樣膜拜，有時他又成了一位凡人，但不管怎樣就是會有一位。從這個角度來看，今天的中國權力雖然有點分散，但仍是過去的直接延續。

中共並未對中國傳統的統治概念做出太多的改變，其結果對中國人民來說更為不幸。在中共獨裁統治期間，天安門事件既不是最後一個，也不是最悲慘的一個。1989年北京之春那段重大的日子距今已超過十年，但中共卻沒有一丁點懺悔的意思。

在北京，當權意味著永不說抱歉。下令在天安門進行鎮壓的鄧小平當然不會表達任何悔意。但全世界都期待江澤民會有所表示。江澤民是第一位非長征世代的領導人，他也未介入1989年的殺戮。沒有過去這些包袱，他可以放手去推翻對天安門事件的評斷，並將中國的政治體系現代化。然而這種情況並未出現，那段直鬧的日子已過去，但中國的政治發展基本上仍處於凍結狀態。

人們必定會懷疑為何如此。也許是因為中共要比1949年以來任時期都更衰弱、更不穩，致使它承擔不起污損鄧小平記憶的代價。再者，中共之所以還能保有政權，是因為鄧小平和人民達成的約定，中共對鄧小平在那段黑暗歲月所犯罪行能夠做出的補償不多。

除非中共坦然面對六四事件，否則中國的民主不會有進展，這是很實際的問題。由於中共既不願意也做不到，今天的中國距離2037年民主落實的日子，並未比1987年更接近。然而中共這種不妥協的態度無關緊要。中國政治改革的重要鼓吹者、著名異議人士曹思源說：「歷史會做出評斷。」曹的說詞太客氣了，顯然他並不願浪費更多時間在監獄裡。他真正想說的可能是：中國人民會做出他們的審判。

乍看之下，人民對八九民運的裁決是應該把這件事忘掉。一位受害人士說：「看吧，天安門事件已成了過去。」中國現在的氣氛已不一樣。對大部份民眾來說，達到某種程度的經濟安康是最首要和優先的事。在沿海大都市，要求政治改革的壓力不大，而這些地區對中國的影響力最大。非法的中國民主黨，既弱小而缺乏效力，還不成氣候。

由此看來，中國人真的想要一個更自由的政治體制嗎？儘管從外表似乎並不如此，但他們真的想要。拉丁美洲左翼革命家契·蓋瓦拉 (Che Guevara) 說過：「沉默，是另一種形式的抗辯。」中共非常不受歡迎。一位人士說道：「我不知道現在還有誰仍然相信共產黨。」這位仁兄的工作就是在留意這類事情。更糟的是，許多人，如果不是大部份，認為共產黨趕不上時代。共黨幹部不會把事情交付選舉，或甚至讓「百花齊放」，聽取民眾的想法。任何有組織或無組織的反抗，都會受到鎮壓。如果中國民主黨無法發芽茁壯，那只是因為在它短暫的壽命裡，大部份時間受到安全單位監視。在東部沿岸大都市以外的地區，不滿的情緒正在民間逐漸沸騰。積極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的美國商人卡姆 (John Kamm) 說：「我偶而經

過四川的一個縣，當地在5年內出現了15個曇花一現的政黨，一個縣哩！」近來，中國各地不斷出現騷亂，由於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也就是政府的政策，這些抗爭行動等於是對共產黨的挑戰。

中國人勢必會推翻中共對天安門廣場的裁決；唯一的問題是在什麼時候。雖然大部份民眾不會終日去思索這場悲劇，但有些人不會忘記這件事。如果人民不忘卻此事，中共會嗎？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曾說過：

「朕即國家。」一旦您從這個角度出發，就不可能允許民主的存在。路易十四不是中國人，而中共也沒有人說過這樣的話。但中共所表現的，就是路易十四說這番話時的高傲態度。中國五星紅旗上的五顆星，其中一顆比另外四顆都大，那一顆就是中國共產黨。

中共自有一套「朕即國家」的說法，這一點也不奇怪。中共自認為有其歷史使命。《毛主席語錄》開宗明義寫道：「領導我們前進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毛澤東直稱，沒有黨，就沒有社會主義。因為必須要有社會主義，所以人民必須讓黨完成它領導中國的歷史任務，就是這麼簡單。如果你有自己的角色，你就必須去實踐它，即便可能對被統治者帶來不便，也是如此。中國憲法提到「人民民主專政是由勞動階級所領導」以及「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但起草人其實可以簡單地使用「宿命」這兩個字，這樣會更清楚。中共認為換一個燈泡需要多少人？大約6350萬人，也就是它的黨員人數。

當毛澤東發言時，中國人民都聽從了，並且真心地回應他的指揮。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就是明證。歷史鮮少，也許沒有一個人，能像他這樣支配一個國家的心靈。江澤民沒有毛澤東那樣的魅力，

將來也不可能被供奉在天安門廣場上，他沒辦法像毛一樣掌握民心，因為黨的理念已無法再鼓舞和振奮人心。

在黨的影響力被削弱的情況下，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會進化或為一個民主國家？中國國內外許多人都這麼預期。也因此他們的評估有些極端，他們的判斷也太過簡單。一位中共幹部說：「網際網路已敲響了中國當前一黨統治的喪鐘。」當前人們的想法是，中國擁抱現代化的過程，從股市到網際網路，終將改變中國的共產主義。

人們預期中共也會跟著進化，但這不可能發生。中共若要進化，必須放棄它最重要的教條信念，這些東西讓毛澤東的農民軍隊打敗佔有巨大優勢的強敵。中共的高幹知道黨的意識形態的力量，他們現在不會輕易放棄。在他們眼裡，這是政權合法性的基礎，因此絕不會，也不能拋棄。中共基於權宜考量，可以暫時做出一些退讓，好比在農村進行選舉，但它不會放棄在社會的領導角色，那是它的宿命。

就因為這一宿命，中國大陸不會跟隨台灣腳步。在台灣，一些具有遠見的人運用手裡的力量，對國民黨所建立的高壓統治展開改革。蔣經國在繼承其父蔣介石的權力之後就這麼做了。不幸的是，自認為是中國領導「核心」的江澤民，因為太過軟弱也太過堅守教條，以致不敢做出類似的嘗試。而就算他再堅強和再有創意，黨的宿命理論也會構成阻礙。當一個黨有其歷史任務去領導社會，它就必須去加以實踐。這種宿命和馬克思所觀察到的歷史不變法則一樣不容改變。國民黨沒有這種宿命，所以它能進化。共產黨背負著歷史賦予它的角色，根本不可能改變。

贊同理論的人會提到村落的選舉。然而這類選舉，其表面意義要大於實際意義。這類選舉經常受到操控，選出的代表縱使與共黨幹部意見不合，這些佯裝成民主捍衛者的共黨幹部仍握有實質的權力。如此一來在改革的路上又有了另一項障礙。天安門異議分子王丹的母親王凌雲表示：「這些人說他們只是來跟你談談，但他們的態度非常惡劣。」1999年諾貝爾和平獎公布前數小時，王凌雲遭到公安逮捕，只因為王丹是人選之一，他們不讓她對新聞界發言。王凌雲的說法顯示，中國這個警察國家隨時保持高度警戒。江澤民上台後，高壓的官僚作風只有增加不見減少。在他的領導下，中國在民主方面也不見任何長進。最後，還有國民黨的因素。國民黨輸掉2000年3月在台灣舉行的總統大選後，中共學到了錯誤的教訓，認定改革只會走向毀滅。從那時起，中共反對變更中國政治體系的立場更趨強硬。

由於中共不容任何反對勢力存在，在沒人監督的情況下，可以料想得到它變得高傲自大、貪污腐敗且令人憎惡。只要走訪中國各地大小村鎮，您會發現數以千計的地方幹部表現得彷彿是絕對權力的化身，他們自行徵稅，按己意執法，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有些還發行自己的貨幣。您只要在北京，就可以看到這一切，只是作法上會比較體面一些。從所有角度來看，中共整個黨都已經失控。

人民共和國會如此快速地陷入這種混亂不難理解。毛澤東和鄧小平權力太大，現在的江澤民也一樣。中共中央領導人大談自律和警惕是改革的重要手段，但他們都曾嘗試過，也都失敗了。有一種更好的解決良方，就是透過民主競爭——中國和北韓不了解民主，但世界其他國家都知道這個名詞。我們都知道絕對的權力會帶

來什麼結果。

治療中共的疾病跟診斷一樣容易。然而病人卻不接受治療，彷彿它唯一需要的是意識形態。朱鎔基在2000年3月曾說過：「我看不出中國的一黨專政和腐敗有明顯的關聯。」朱鎔基若看不出來，他應該問問北京的計程車司機。一名司機告訴我：「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人管得了的黨的獨裁統治下。官做得越大，越腐敗。」朱鎔基說話誠不誠懇不重要，重要的是領導階層不能坦然面對造成遍地貪污腐敗的根本原因，中共可以自以為是、毫不妥協、高傲自大，但歸根究底，它不能認識自己。

就這樣，貪污腐敗打從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的那一刻起就跟它長相左右。中共頭一次針對這項痼疾採取的行動是1951年發動的「三反運動」。已故中共元老陳雲曾說過：「不嚴懲貪污，會毀了國家。但是，嚴辦貪污，會毀了黨。」鄧小平則和魔鬼達成交易，他允許南方的廣東省貪污，以換取該省領導人支持他的改革。有關他這麼做從歷史角度來看是否正確的爭辯已經沒有意義。現在的問題是中共要如何降低日益高漲的貪污浪潮，這股浪潮正對中共政權帶來空前的威脅。就像江澤民在談到國民黨輸掉大選時說的，一個腐敗的黨將很快丟掉它的政權。

因此，中共近年來在其週期性的肅貪反腐運動中，嚴厲懲處貪贓枉法的幹部，每天都有官員被判刑入獄或被處決。然而情況沒有多大改善。今天，這類肅貪行動的性質仍屬政治性的，因為中國依舊充滿政治色彩。1998年，江澤民將北京市委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陳希同依貪污罪判刑下獄。陳希同是該被關，但他之所以被整肅是因為他膽敢在政治上反對江澤民，這才是他真正的罪行。兩年

後，廈門爆發「中國最大的貪污醜聞」（譯按，遠華案），北京市委書記賈慶林和他的妻子皆牽涉其中，但賈慶林卻沒有受到任何懲處，因為他的江澤民的親信。中共領導層意圖藉口號和規勸手段對黨進行改革，但幹部們知道當今政治體系運作的真實狀況。這套體系從1949年存在至今，實質上都沒有改變。這就難怪江澤民最近會說：「我們迫切需要打擊腐敗，但同樣重要的是要維持穩定。」他這句話的真正意思是，高層忠貞黨員不會受到整肅。

唯有將肅貪行動與政治分開，中國打擊腐敗才會取得真正進展，中共也才能真正擁抱法治。1999年3月，中國憲法增列了依法治國一項，當時曾引起世界新聞界一陣騷動。許多人盛讚這項修正措施具有歷史意義，但這一改變既含糊也無足輕重。事實上，在這項修正提出之前，中國憲法已清楚載明要實行法治。不管怎樣，這項措施雖受到大肆吹捧，中共仍視自己的意向為法律，彷彿什麼也沒改變。惡名昭著的「北京屠夫」、人大委員長的李鵬在2000年舉行的全國人大會議上，無視憲法和二十年來落實法治的努力，仍把黨的決議和法律畫上等號。其他領導人也許沒有重覆李鵬所說的話，但他們也相信黨高高在上。事情的真相是，沒有法律可以約束黨，黨不受任何規範。

鄧小平因大膽改革而在歷史留名，但他的改革無論多麼激動人心，都還是在毛澤東所設置的系統架構下完成的。鄧的改革本質上還是相當笨拙的。有人說神聖羅馬帝國，既不神聖，也不羅馬，更不算是個帝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當然是中國的，但它是否真是屬於人民的共和國？沒有民主，那就不是。

社會主義的初期階段

毛澤東的國企正在掙扎求存，其實只要採行私有化這一簡單的辦法，便能解決問題。然而這項對策卻犯了意識形態上的錯誤：中共的一項基本信條是生產工具國家化，如果所有公共資產都掌握在私人手裡，那麼「共產」黨會落得何種下場？這就難怪中共官方媒體視私有化為「自殺」。

因此，中共領導人迄今仍峻拒這一明確的解決之道。中共最為人所熟知的馬列主義理論家鄧力群曾寫道：「唯有國企掌握在馬列主義者手中，廣大人民群眾的權利才能獲得保障。」曾擔任中共宣傳首腦的鄧力群雖非大權在握，但那些當權者對這位深具影響力的黨內元老卻言聽計從。江澤民1999年間說過：「我們必須積極開發新的契機，鼓起勇氣奮力前進，但絕不採行私有化。」這一看似振奮的清楚聲明，顯然是對私有化所下的最後定論。聲明既來自權當當局，中國似乎是不會將國企私有化了。

如果情況是這樣，有人該告訴中共，北京以及各地的幹部事實上正在國內和全球金融市場上，透過股票上市的方式變賣中國的產業。在世界其他地方，這就叫「私有化」，在中國，至少在黨內高層間，這不算私有化。

為什麼成年人還要玩這種文字遊戲？中共幹部們在拋棄過去史達林式統治期間的高傲時，面對的是中國致力調和當今世界經濟現實和黨意識形態所帶來的「矛盾」。黨內高層一個又一個派系試圖尋找出「正確的」社會主義立場。隨著經濟情勢的衰退，這類辯論仍舊持續激烈地進行著。當然，地球還是繞著太陽轉，只是在北京，許多人仍生活在一個由理論架構而成、自有一套獨特法則的世界

裡。

外國評論家經常提到，雖然中國有其社會主義基礎，但已擁抱資本主義。他們通常還會用「時光無法倒流」來描述這種變化。這些評論家也像馬列主義理論家一樣，談到「必然性」。假如中共政治局休長假，中國當然能把所有企業私有化。這是顯而易見的解決之道。但即使答案再明確不過，中共也不能採納這樣的答案。雖然中共開始接受與其理念相反的經濟法則，但在今天的中國，經濟的考量不是那麼重要。

江澤民既然是「共產」黨領袖，他為什麼會允許股票出售？出售股票的大型企業屬「共有資產」，站在黨的意識形態立場，這是非常的作法。一個馬列主義政黨怎能讓這種事發生？中共的答案倒真是很機智，就像江澤民說的，中國仍處在「社會主義初期階段」。

江澤民指出，在這個初期階段，黨必須強調經濟發展，即便這意味著容許私有制度存在。1999年3月，中共透過人民代表大會修改憲法，以促進私有制度。在這之前，私有制度被視為社會主義公有經濟的「補充」，修憲之後，私有制度成為「重要成份」。儘管如此，憲法仍遵奉社會主義，而非資本主義。在西方，許多人似乎無法想像中國有朝一日會回歸真正的社會主義，但對中共領導人而言，這並非完全不可能。江澤民很顯然視私有制度存在是一種過渡的作法。

馬克思相信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先決條件；換句話說，社會必須經歷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正確條件才存在。這不是毛澤東和其他落後社會革命分子希望聽到的訊息。他們想盡可能避免資本主義最糟的情勢出現。毛澤東也沒有耐性，他只等了四年，就野心勃

勃，試圖在一夕間把一個封建農業社會轉型成為社會主義工業化國家。

只要用一些19世紀過時的哲學理論，加上中國人的一些小聰明，可以解釋為什麼中國在社會主義獲得勝利之後，資本主義卻又開始竄升，其中一項解釋，是中國在50年代實行社會主義是不成熟的作法，這符合馬克思的信念。中國的馬列主義者現在相信毛澤東試圖抄歷史法則的捷徑，所以註定要失敗。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李君如說：「在中國，國家控制了太多東西，所以當前的工作是要減少國家的角色。」如此一來，就連度誠的共產黨人，即使不在名義上，在實質上也都支持私有化。在這種狀況下，今天中國的私有化只是朝資本主義退回了一步，好讓中國能循著更傳統的馬列主義模式，最終達成共產主義。一個包含私有企業的經濟，就像一個人的青春期一樣，不過是必經之途。

資本主義階段會延續多久？鄧小平說社會主義需要「許多世代，可能十幾代或甚至幾十代，不懈地鬥爭」才能完成。江澤民雖然也曾說過需要幾十個世代，但他提出了一個更具雄心的時間表，認為經過「一百年努力和積極的工作」，便能大體上完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人民大學的方竹蘭博士說：「未來，國家控制經濟將會像龍頭一樣帶動整個身體。」若是這樣，那麼無論資本主義階段延續多久，按中國的馬列主義者對階級鬥爭史的正解讀，都將只是暫時的。

真正的實踐主義人士和中國之外的馬列主義者把所有這一切都看作是意識形態的門面裝飾。李君如指出，歐洲的馬列主義者「不了解為什麼我們仍自稱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許多人會同意新加

坡資政李光耀所說：「如果您想要社會主義，那麼按照原則，您就不能有自由市場。」

中國的馬列主義者們並沒有記取過去的教訓，仍相信他們應該掌管明天。中國各地培訓幹部的黨校，仍教導忠誠的黨員他們的終極目標是共產主義。外國人也許認為中國沒有人真的那麼理想主義（不切實際），但是中共高層領導人，或至少看得見的任何一位，沒有人支持採取下一步行動，揚棄毛澤東（甚至鄧小平）加諸中國的意識形態包袱。他們若這麼做，數以千計像李君如和方竹蘭那樣的馬列主義學者便可以用他們的生命做些有意義的事。在中國，研究馬列主義的人比世界任何其他國家都多（除了學生以外，有二十四萬人研究馬列主義）。儘管中國缺乏科學家、經濟學家、醫生、教師……等，除了印第安酋長以外幾乎所有各種人才，但中國卻僱用最優秀的一批人來為其信念體系補充新資料。浪費才智可說是最可怕的事。

數以千計的人把他們的時間用來調和馬列主義和當今中國的現實。對大部份中國民眾來說，意識形態可能沒什麼，但對北京的領導人來說卻很重要。一個國家的大學捲入無止境的理論辯論已經夠糟了，更糟的是這個國家的領導階層也參與了這種辯論。中國在每個層面都遭遇嚴重問題，甚至在理念的世界裡，要即時找到可行的解決之道並付諸實行相當困難。要讓每件事都通過狹隘的意識形態考驗（或中共今天常用的手法，就是把意識形態融入解決方案）更是不可能。中國顯然認為它有時間把每件事都做到合乎意識的規範，彷彿世界會停下來等它。然而在今天，時間不會等任何國家，無論這個國家重不重要。當年羅馬帝國的尼祿在那邊瞎扯，今天江

澤民則空談理論。

不管北京這陣子流行什麼詞彙或觀念，中央政府實際上正想方設法把較大型的國企私有化。對這項最不符合馬列主義的發展，意識形態上的解釋是：股票所有權只是另一種形式的「公有」制度。江澤民在1996年說過，生產若是為了許多人的利益，那也算是公有制。

人們不得不佩服共產黨幹部的機智，他們能在不承認違反社會主義的情況下進行私有化。拿前瀋陽市長慕綏新為例，他宣稱瀋陽市把大量公營企業賣給私有企業，不算私有化，因為買主是公司，不是個人。

按這項定義，自由企業的堡壘，擁有微軟、奇異等大企業的美國，已然採行，甚至已經擁有完美的社會主義。當然也有少數人不願接受這種頗具創意的觀念性突破思考方式。

「社會主義公有制」概念聽起來像是一套合理化制度。政府所有制就是公有制，個人所有制就不是。從理論角度來看，事情就是這樣。但在中國，所有事物，包括理論，都必須為黨及其觀點效命，就算再怎麼牽強也一樣。如果廣大群眾透過公開市場取得生產工具的所有權，那麼社會主義公有制便有了實際的正當性。很不幸，事實並非如此，中國股市有大約5500萬股票持有人，約佔總人口的4.2%，但活躍的股票族不到500萬人。按中國的標準，股票族大體上屬於富裕的一群，他們外表一點也不像無產階級。有些工人擁有公司的股票，但這種人不多。只有在退休基金控制了中國的市場之後（未來可能會實現），社會主義公有制概念才会有實際的基礎。另一方面，社會主義正統派人士對此顯然也持否定態度。

江澤民曾說：「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新加坡的李光耀曾私下對江說：「我覺得那句話有點不對勁。」在經過二十年的經濟改革，江澤民還會講出那麼荒謬可笑的話來，許多人認為他言不由衷。只有江澤民知道自己真正在想什麼。還好，我們不必知道。問題不在於他是否試圖愚弄我們，實際上發生了什麼才重要。

所有這些有關社會主義的談話，無論是否出自真誠，都會使中國工業振興的速度放慢。這很重要。中國不能再浪費時間。已故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說：「人們不會在乎這是個社會主義國家或資本主義國家。他們甚至不想辯論這個問題。」既然中國民眾不在乎，黨為什麼要在乎？就在世界其他地方在加快進步的速度時，江澤民及其一夥卻回到毛澤東理論結構的世界裡。

中共的幹部們應該拋開理論的辯論，集中全力讓私有化（或不管他們用什麼其他的稱呼）順利運作。如果他們能將較小型的國企賣掉，事情會有好的發展。他們若堅持保有控制權，那麼中國式的私有制將一敗塗地。中共不肯放棄較大型的企業，他們頂多賣掉一小部份股票，其結果可以預料：這種作法對企業運作的現代化沒什麼太大效用。1999年中共召開的四中全會上，鄧力群的保守派拿著統計數據辯說，國企在私有化之後，效率不見得改善。保守派為了證明其論點時或許言過其實，但鄧力群所傳達的要點卻也屬實。中國在私有化一事上的膽小作為，不怎麼有效。

理論上，私人投資者出現會對國企產生一些革新效果，但只有少數因為策略投資者取得經營地位，才使狀況得到改善。被動的投資人對他們所購買股票的公司日常如何運作不那麼在意。此外，堅守意識形態的中共得確保國企能在符合教條的情況下照顧到國家和

工人的利益，而不是少數股民的利益。大多數部份私有化的國企所出現的情況是，企業把從公開市場上得到的錢用來更新設備，然而

現代化的設備不代表就能建立現代化的企業。國企最迫切需要的是現代化的管理，少了這個，投資人的錢可能浪費在一些沒有結果的計劃上，或被貪官拿去存在瑞士的銀行帳戶裡。

還有，中國瘋了腿的法院也無法保障少數投資人僅有的一些權益。看看中國第一樁股票詐欺訴訟案的結果就知道了。1998年，一名投資人向法院控告成都紅光實業公司在其上市公開說明書中引用錯誤的財務報表。製造電話零件的紅光公司宣稱其1996年的淨利為5400萬元人民幣。但中國證監會核定該公司實際上虧損了1億零300萬元人民幣。儘管如此，原告要求紅光賠償3136元股票交易損失，卻在1999年5月被上海法院駁回。儘管紅光宣布先前發佈的財務報表錯誤後，該公司股價明顯下跌，但法院的判決卻認為財務報表錯誤和原告的損失沒有關聯。更重要的是，法院裁定財務報表錯誤是證監會（換言之錯在中央政府）的事，非法院管轄的範圍。上海法院的判決，使其他紅光投資人的賠償要求都被拒絕。

2002年1月，人民最高法院解除了股市交易訴訟免審的暫時禁令。股民現在可以給法院遞狀子，但前提是該企業必須先受到證監會的懲處。換句話說，中央政府還是不准一般股民主動伸張權利。而且，股民只可以申訴做假帳，其他形式的詐欺，如哄抬股價、內線交易等，依然是無法申訴。所以紅光案說明散戶投資人的處境，他們因國企主管們不正常甚至犯罪的行為而導致損失，卻經常得不到賠償。中國要發展出保障投資人的法律，還需要好幾年。就這一點來說，中國為健全法令而頒布的新證券法是令人失望的。它道出

股民權利的存在，卻沒有清楚地訴諸文字。未來，中國的法院不太可能對這項法規所隱含的內容做出回應，或創造出那些權利。法院無能為力是因為黨沒有賦予它們足夠的權力。江澤民抗拒任何可能削弱黨對國企控制的改革。這麼一來，他真的會授權給私人投資者？

情況並非都那麼黯淡，中國的法院不能插手的事，中國證券監督委員會卻介入了。證監會採取了一系列強制措施，對包括紅光公司在內的企業管理進行了懲處。證監會祭出了中國政府首次對股市進行的整頓措施，重罰了一些企業，扣押了它們的資產，並懲罰了一些人。然而也不要因此就抱太大希望。中國股市有超過1100家公司，證監會卻只有約20名調查人員。但就算有兩萬名調查人員，證監會能作的仍然有限。因為黨不會允許私人股東控告企業差勁的管理。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全面私有化。曹思源針對國有制以水龍頭漏水作比方：「您怎麼辦？迅速修好以免浪費更多的水呢？還是慢條斯理地修它？」

這裡，我們得引用中共方面所說的話。官方媒體曾表示：「事情很清楚，那些期待中國全面私有化的人將持續失望。我國的憲法保障了公有制經濟的主宰地位。」類似這種意識形態的陳述可以不予理會，但無可否認，那些預期私有化步調會加快速度的人都錯了。這類預言有些荒謬可笑，其他則只是生動有趣。而那些悲觀的人所作的預言往往比較貼近事實。

要了解到底怎麼一回事不難。北京到現在一直活在一個「坐擁一切的時代」(the Age of All, 出自德意志銀行最近的一個廣告)。投資人買了國企的股票，卻不監督鞭策管理人員。站在北京的觀點，

賣股票不會造成任何損害，因為它並未交出它認為很重要的控制權。北京一家顧問公司的股東鄧肯·克拉克（Duncan Clark）說：「他們的想法是投資人的錢算不得什麼。」

您不必是個占卜專家也能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股票上市的步調仍會不慌不忙地持續著。在降低國有權方面會有些進展，中共將透過減少它認為應屬於策略性工業的數量，以及限制這類工業中國企的數目，以繼續推動私有化。有些事可以料想得到：意識形態仍將繼續破壞中國對現代化所做的努力。江澤民為避免爭議，將持續主持辯論，導致創新的主張遭到延遲。而幹部們推三阻四，使情況變得更糟。由於交易速度緩慢，等到中國走到它必須考慮交出控制權的時刻，恐怕是幾十年後的事。然而北京無法了解，它對大型國企展開必要的振興措施，也是幾十年後的事。最好的處方是現在就吃藥：國企需要股東們嚴格的監督。

德意志銀行的廣告說：「所有這些可以成為您的。」對德意志銀行的顧客來說，這可能成真，但對中共來說當然不行。中共認為坐擁一切的時代已經結束。中國可以擁有意識形態，或擁有一個未來，但不能同時擁有兩者。請問江澤民同志，中國要哪一個？

中國在現代化的道路上按照自己的速度已走了一百五十年。清朝因為不明白它所面臨問題的嚴重性，在還沒來得及趕上西方列強和日本之前便宣告垮台。一個世紀以後，中國共產黨發現自己基本上處在同樣的處境。它相信中國會逐漸改革，彷彿世界其他國家都靜止不前或算不得什麼。與此同時，黨內幹部也擔心面子問題。中共自己估算，如果它放棄對國企的控制，等於公開承認它的意識形態在21世紀不具實用價值。而在眼前這一階段，中共的幹部們沒有

本錢去擔心面子問題，他們應該做正確的事，讓中國人民對他們的治國方式進行評斷。否則，他們將步上清朝的後塵。

能走多遠就走多遠

一名中年男子挨近天安門廣場，他沒有太多選擇。曾經歷經過許多歷史事件的這個廣場，本身是個禁區，由一道七呎高的波狀金屬圍籬圍繞起來，每隔幾公尺便有一個公安武警站崗。他必須夠機敏、夠迅速才能成功。所以，他走過毛澤東遺像底下的一座古老石橋，往天安門廣場走去。接著他撐開他的傘。那是一支白色的傘，白色是中國喪葬用的顏色。那些表情嚴肅的武警顯然沒有意會這當中的象徵意義。然而，傘上的字寫得清清楚楚：「把國有財產歸還廣大人民」以及「紀念學運十週年」。

那些警察花了一分鐘才意識到發生了甚麼事，但那時候人民共和國已回復安全狀態了。一名穿著制服的官員用手臂圍住這名抗議者的腰，連同一些便服人員把他架到等候一旁以防發生這類事件的车子上帶走了。在1999年6月4日那一天，前後只有幾分鐘，事件結束了。

乍看之下，在中國紀念民主與自由那一天，那把傘上的訊息似乎有點奇怪。1989年時，學生和工人在爭取的東西很多，但是國家產業私有化並非他們關切的事項。可是對許多中共黨員來說，所謂民主和私有化幾乎沒有兩樣。他們是這樣推論的：把樣樣東西私有化，黨就喪失了它對人民的控制，其結果就是自由與民主將隨之而來。因此，曹思源所警喻的漏水的水龍頭是慢條斯理修理的。

正當中國需要切實可行的辦法來解決迫在眉睫的問題時，其領

導人提出了讓人憶起建國初期的意識形態上的答覆。人民共和國畢竟是靠政治才誕生的。若把時鐘撥回到數十年前，正在和日本人打仗的中共游擊隊剛剛撞破了一次突擊火車的行動。隨同毛澤東軍隊打仗的英國學者林邁可(Michael Lindsay)向一個將軍建議說，他的士兵需要更多軍事訓練。這個將軍回答說：「你完全不懂我們的作法，首要之務是政治組織。」當戰爭是在一個住了許多百姓的地帶進行時，毛澤東的作法有他的道理。今天，中國面臨的是不一樣的鬥爭。

但是江澤民還記得毛的作風。江說要「講政治」，讓人們回想起共和國創始的時期。1999年夏天，江澤民簡直就是關閉了中央政府，以便黨員可以參加他的「三講」運動：講學習（馬列主義）、講正氣和講政治。全國各地都在學習「三講」，團體和個人必須自我批判，結果政府重要的工作都擱到周末、午餐時間甚或晚間才去做，也可能根本就不做了。在河南的經營已出現嚴重問題的交通銀行行長一整個夏天參加了118次學習「三講」的毛澤東式運動。各省都有其學習「三講」的活動，和工廠與大學的情況一樣。有個已退休的男子注意到1999年夏天北京附近的度假地區空無一人，他點出原因：「大人都去學習『三講』了，小孩則去預演國慶遊行了。」

江澤民發起另一個運動後，「三講」即後繼無力了。2000年5月，他開始推行「三個代表」運動，指示中共必須「始終代表著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再一次，黨和政府的所有單位奉命要舉辦學習活動。

如此這般，江澤民使人民共和國退回到建國初期。生活在現代

的江澤民已經比毛澤東更現代化了，但是他卻去模仿這位人民共和國創立者的作風，有時也模仿其作法。這樣的模仿減損了江對未來的承諾；他對中國面對的難題的答覆是強化共產黨，這是他的「當務之急」。他一再堅定的強調：「追隨黨的領導是基本的政治原則，也是確保所有任務獲得成功的政治保證」，「國際情勢愈是複雜，改革發展的工作愈是繁重艱鉅，就愈需要深化黨的領導。」這不只是說說而已，中共正在散布其細胞到幾乎所有中國的組織，而且「三個代表」代表的是，黨又想加強管轄。江澤民希望吸收更多的企業家入黨，才能將黨的勢力伸入生氣蓬勃的私營企業之中。有人說「三個代表」意謂黨可以迎向未來，其實，這個運動也是脫胎自過去。

中共過去發動的運動與目前的新運動之間有所不同。在從前，毛澤東的運動能煽動人民；如今，江澤民的運動卻遭人民嘲笑。一位厭惡江澤民發起的所有運動的政府官員問道：「這些傢伙以為他們是誰？」當江澤民「講政治」的時候，他談話的對象是共產黨裡的所有男男女女，而且他發出的訊息是要底下人服從的。但在目前人人疏離且社會動盪的狀況下，高幹最不想談的就是政治，遑論一般百姓。

會關心注意這些事情的外國人往往以為中國退回到過去的現象，只是喊喊罷了，頂多也只是段時期而已。他們沒有抓到重點。會出現這麼多的政治辭令，正突顯出中共統治下根深柢固的意識形態與政治掛帥的本質。但是時至今日意識形態是沒有效用的，在中國即將加入WTO的今日更是如此。入世意味著必須加速改革，如此一來將會腐蝕中共的權勢，所以衰退將是今後的特徵。北京恐

嚇學者，限制媒體報導並加強各級學校的教條學習；它檢查、管制甚至任意關閉互聯網的網站；此外還繼續逮捕監禁人民。

人民並不太在意。搖滾歌手何勇唱道：

在這裏邊你爭我搶

吃的都是良心

拉出來的都是思想

江澤民回答：「講政治」，提醒人民勿忘毛澤東的指示「政治掛帥」。何勇和江澤民兩人來自同樣的地區，但是其中一個與現實脫節了。

今天的中共不論與現實如何脫節，仍然把焦點集中在理論上，就宛如黨的幹部一直在閱讀另一位偉大思想家的著作一般。馬克吐溫曾說：「不要失去你的幻想，失去了幻想，你可能變成行屍走肉了。」然而中共對於幻想的能力是有限制的。1992年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說：「意識形態無法供應稻米。」南巡後來激起中國在90年代前期出現了爆炸性的成長。既然現在中共已出產了稻米，它需要意識形態來維繫其命脈，不幸的是，稻米無法提供意識形態。供應稻米並非意識形態，雖然中共的理論家一直努力把它變成如此。除非中共有勇氣重新來過，否則它會緊緊抓住舊有的觀念不放，而不管它可能跟不上世界的腳步。意識形態本身在現代化的各方面拖住中國，政治和經濟層面都是如此。幹部已不再使用毛澤東的言詞，那為甚麼他們必須保留他的觀念？

為甚麼他們也須保留他的體制？楊瑞（Rae Yang）曾經是一名紅衛兵，目前是狄金森學院（Dickinson College）的教授。她說：

「我相信我那一代有許多人對文化大革命的幻想已經完全幻滅了，我們開始去想，誰應該為我們國家那個悲慘的災難負責？」楊教授，是「甚麼」應該為文化大革命負責，而不是「誰」應該負責，而這無疑是你現今會在美國賓州卡萊爾（Carlisle）教書的原因。必須為那個最荒謬的動亂負責的人們已經離世了，而你在事過境遷後並未回到中國。如果那僅僅是一個人犯下的錯誤，你應該在多年前就回到祖國了。毛澤東固然不是正常人，但為甚麼當初他會得到廣大的支持去發動文化大革命？再者，何以在中國已經如此改革後的今天，中國當局還要監禁你的同事宋永毅？他只不過想要研究那一段動盪不安的歲月罷了。

的確，在堪薩斯市他們已經「能走多遠就走多遠」了，在世紀之交的中國也是如此。而這也是中共目前面臨的重大問題。毛澤東的軍隊攫取了一個半封建的零散的社會後，從根本把它搖撼震動了，但是他們必須利用意識形態來把它整合起來。今日共黨幹部固然能夠把一個馬列主義國家現代化，但他們能做的也僅止於此。如今中共已經把它的體制做了最大的改革，再進一步就會違背其理念了。不要做足了，否則體制會崩潰。不論如何，人民共和國都將無法存續下去，唯一的問題只是它會如何死亡而已。

江澤民的指定接班人胡錦濤說：「當然我們的黨會致力於經濟建設和改革。」但是他接著說：「然而，經濟的發展不應以犧牲意識形態來達成。」當中共的意識形態阻擋住它回復青春的路徑時，胡錦濤的話只有一個含義：人民共和國總有一天會耗盡它的光陰。

第十一章

自東方崛起

中國能再向上提昇嗎

歷史的規律是：舊的不去，新的不來。

——魏京生

▲ 輛小巴士駛近濱海的江蘇省省界檢查站，穿著象徵國家權威的草綠色制服的一名軍官，打手勢要車子開到一條巷子裡他左手指著的空地上停下來。不難理解為甚麼這輛車子和當天數千輛其他車子一樣在路邊被攔下來：它超載了太多人，已到危險程度。坐在前頭的年輕車掌皮笑肉不笑，顯得很冷漠，那雙細長的眼睛更強化了這個效果。他的眼睛總是在逡巡，看看有沒有更多人要搭車，有時候車子在開了，他的頭甚至身軀還伸到右側一個車窗外頭去。「快一點！」他對著可憐的鄉親大喊；這些人想到江蘇西北去，願意付錢給他。他們跑著趕上行進中的小巴士跳了上去，卻只

能站在車中走道上，這是違法的，所以司機在檢查站被罰了款。不過進入江蘇省後這輛小巴士繼續搭載更多人。那個車掌把他的位子讓給一名剛上車的乘客，自己坐到門口的一張凳子上。後來他站起來把凳子讓給另一名乘客。小巴士在江蘇的農村中前進著。中國的新經濟也在前進著。

這個國家加快節奏在成長運轉中。有好幾個中國肩並肩同時存在著。一個是根據五年計畫和意識形態在運作，其餘都是靠著企業精神的驅使以及對五年計畫的違抗來提供動能。一天又一天我們看著它們，驚訝它們竟然能在同一塊土地上共存。突然之間中國人從這麼多的面向一齊動起來，光是看看就令人很開心了，誰能預測他們結果會怎麼樣？

難怪有許多人會堅稱中國將和平演變到一個較好的社會。這種論調的主張著眼於中國人民精力充沛，他們另闢蹊徑，政府只好追隨於後。中國向前邁進之際，這個現象早已存在。誠如新加坡資政李光耀所言：「這個中國比從前的那個好多了。」也如同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會長柯白（Robert Kapp）提醒我們的：我們不應該被中國近代歷史的悲劇所「催眠」，以致看不出中國人已經進步了多少。柯白當然也是對的。

許多人試圖藉著觀察近期發生的許多事情來推演、預測未來，甚至由此想像龐大的中國將恢復它的地位、睥睨全球。正如頗受推崇的作家紀思道（Nicholas D. Kristof）與伍潔芳（Sheryl WuDunn）所稱，有些觀察家必須受到約束，「這樣他們才不會懷著滿腔熱誠被漂走」。然而即使是認真審慎的人也認為中國這個一黨專政的國家將會有好的結局。紀思道與伍潔芳寫道：「中國未來最有可能的情

景，也是許多中國人最美好的盼望是，沿著中國現在走的道路繼續前進，就像南韓、台灣、智利和西班牙等半法西斯國家一樣。」中國政府大致認同這個評估，北京當局已向世界保證：「一個強大、民主且文明的社會主義中國將自東方崛起。」所以這個偉大的國家終於甩開了所有的動亂了嗎？就這一次，改變會是積極、和平的嗎？

中國人民是我們可以樂觀的最大因素，但是他們同時也可能是帶來更多悲劇的最大源頭。正是因為人民已經很成功，以致這個專制的政府不可能再有多少發展。未來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這兩股力量將會起正面衝突。民主政體的人民會順從屈服，但是改革了一半的獨裁政權下的人民會起來抗爭。魏京生在《第五個現代化》中寫道：「歷史的規律是：舊的不去，新的不來。」這位中國最重要的異議人士真正想說的是，新一代必須把老一輩推到旁邊，自己才有立足之地。換句話說，改變將不會是漸進的。

自1978年以來的進展是人民的進步，不是政府的。的確，政府有先見之明，逐漸縮減它對社會的管控，但是這是基於要防止人民作更多要求。在政府退縮下，受益的是人民，他們展現出真正的天才，藉機迫使政府作進一步的改革。結果中國經濟呈現爆炸性的成長，中國人無視政府的限制，在社會上到處鑽營，現在他們不想停下來了。

中國最富有女性楊瀾說：「當我們審視有十億人口的中國的歷史，我們不能不問自己『為甚麼』？但是當我們望向他們的未來，我們要向全世界說『為甚麼不會？』」正如楊瀾告訴我們的，中國人民對未來有遠大的期許。不過她應該知道在目前的統治制度下，中

國人將無法達到目標。李光耀談到中國時曾經指出：「潛力就在那兒，人人都看得見，但是潛力還沒有發揮到極致，因為有太多的障礙了。」李光耀身為新加坡的創立者，對於國家的發展頗有信心，他已向我們點出中國的真相。

「偉大、光榮而且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對它所統治的中國了解得太少，中國發生了大變革，但是中共的改變極少，從幹部在慶典中的表現就看得出來。他們在1999年慶祝人民共和國建立五十周年紀念時，真是威風凜凜，橫行無阻。他們片面廢止廣告合約，接著拆除閱兵路線的所有招牌。幹部下令附近的工商活動禁止兩星期以潔淨空氣，並在慶典舉行當天中止所有行動電話和傳呼機的通訊。他們檢查新聞報導，並多次封鎖北京心臟地帶以操演閱兵，而且是事前數小時才發出警告。數百萬名外來人口被聚集起來遣回原居省分，總共花費了數十億元。整個國家被政府關閉了一星期，而且只提前一星期告知民眾。首都實施戒嚴。黨員在毛派國家可以為所欲為，不過有件事情是他們辦不到的，那就是管制措施的執行。

管制措施是現代統治的精髓。一個能夠自制的政府允許它的人民創新、探索和發現，從而容許國家進步。可是在中國，幹部限制人民發展而不敢放手，因為他們沒有安全感。20世紀中國國慶最盛大的慶典是一個令人難以忘懷的壯觀場面：1萬1千名士兵和50萬名與會者參與在北京的50周年慶典，但是幾乎沒有觀眾！基於安全理由旅館的客人被趕出可以俯瞰閱兵路線的房間，另外為他們安排了可觀看閱兵的座位。黨的顯要人物在天安門廣場當然有特別尊貴的座席，他們是唯一在現場觀看那盛大場面的人。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是不受歡迎的，他們看的是電視轉播，如果他們有看的話。北京一

名司機張凌談到世界各地的千禧年活動時說：「在中國，凡事以領導為中心，但是在外國，我們看到是一般人民在慶祝。」黨的成員可以安排50周年閱兵大典，巨細靡遺到士兵踢的最後一個正步，但是他們無法複製人民自發的慶祝活動或欣喜之情。真實情況是統治者害怕被統治者。

在舉國哀悼時他們的恐懼是很明顯的。1997年2月鄧小平纏綿病榻多年後去世時，一名男子帶了個花圈到天安門廣場的烈士紀念碑，旋即被二、三十名便衣人員架上一輛車子帶走。人民是不得在中國首都或其他地方哀悼的，除非是在警方嚴密的戒備下，因為有一道通行全國的禁令，不准人民在未受監督的情況下悲哀致唁。中國人民往往是在偉大人物去世時表現他們對死者的尊敬和對生者的憤怒。而還在世的領導人可不願冒任何風險，但是他們應該知道中國人在這麼重要的場合是不甘被排除在外的。1997年鄧小平去世後不久，在鄧的家鄉四川省和中國各地，數以萬計的哀悼者湧上街頭自動自發舉行守夜活動。在四川，他們甚至把一個繪著鄧小平的看板轉變成有如一處祭壇。2000年2月鄧去世三周年時，中共當局提醒人民不要舉行追悼活動。經過了這些時日執政當局仍然有受到威脅之感。

所以他們奉令不得參與慶典，也不能哀悼亡者，但是一旦中國人想要抗議時，他們自有辦法，能夠展現出對千百年來受到壓抑的憤懣，令北京領導人無計可施。1999年5月，北京當局默許而且支持人民抗議中國駐貝爾格勒大使館遭北約戰機轟炸事件。在局勢混亂的頭兩天，在北京美國使館區守衛的中國公安人員穿著制服指揮交通，但被示威群眾所衝散，直到後來幾天他們才獲得鎮壓裝備。人

民的不滿情緒直洩而出，以致一向習於管控一切政府面對人民的激烈情緒也無所是從。

一年之後，也就是2000年5月，中央政府官員希望在大使館接炸一周年時民眾不要有示威活動，學生聽從了，待在校園裡。不過人民是否遵從幹部的旨意，要到數星期後才見分曉，因為在多所知名大學所在地的北京北區，局勢並不平靜。接炸事件滿一周年過後僅僅兩星期，數千名學生向北京大學抗議，也間接向中共抗議。一名叫做邱青鳳（音譯）的北大一年級學生被姦殺了，校方顯然是奉黨的指示要壓下這個消息，令學生非常憤怒。在從前，校園內發生凶殺案的消息一向祕而不宣，但是這一次有人在網路上的布告欄貼出公告，布告欄旋即被當局勒令關閉，可是網路聊天室取而代之，加上學生口耳相傳，很快的人人都知道有個同學「殞落」了。同時，學生張貼支持民主的海報，幾乎每件事情都會惹得學生噴發怒火，任何藉口都可招來大批的抗議者。中央政府無法防止直洩憤怒與反抗的示威行動，只能延緩其發生。學生就像這塊大地上的其他人一樣，情緒愈來愈激動；他們正在等待下一次機會來展現他們的感受。

中國人會把半驅抱怨藏在心裡，但是大多數是受到政府脅迫而不敢聲張。所以當他們發出抗議之聲時，往往會讓矛頭偏離一黨專政的政府，而這個政府其實才是他們真正的目標。觀察學生示威的政論家卡洛琳·庫柏(Caroline Cooper)評論道：「這件事也可能有不同的發展的。」這次中共當局很幸運，年輕的邱青鳳的同學沒有到天安門廣場去示威遊行。不過他們悼念她，也表達對代表官方的北京大學的不滿。抗議行動因這名19歲學生之死而爆發時，正值天安

門大屠殺事件屆滿11周年前夕。1989年示威活動的重鎮北京大學在2000年6月3日夜間相當平靜。學生私下談論從前的事，但仍然有一些人公開散播他們的看法。那天晚上在北大校園內，你可以聽到學生寢室裡有人播放1989年春天的頌歌，那是崔健唱的《一無所有》，他是中國第一個、也是最有名的搖滾歌星。當議題碰觸到最敏感的天安門事件時，這已經是中共當局所能容許的最大抗議行動了。

在這個衰頹的國家裡，政府是不會妥協的。今天，這個政權已經不懂得如何說話了，只會咆哮，而且它咆哮時還振振有辭。但是香儂·納若德(Sharon Narrod)認為，大清早這麼做實在過分了。香儂是來自芝加哥附近高地公園市的中年教師，有一名穿著制服的公安對她大叫，只會說英語和西班牙語的香儂聽不懂他在叫喊甚麼。由78名學生組成的高中樂團全員穿著藍白外套，他們在香儂等12名婦女的陪伴下前來中國，大家都像香儂一樣困惑不解，不過他們沒有看錯的是，這名公安對某件事情非常在意。

這就是現代中國對待觀光客之道嗎？香儂等一行剛剛展開印有校名的一匹橫幅，在天安門廣場拍了照。這一夥人到北京和上海作了一星期的演出，這一天難得偷閒出外遊玩。香儂實在想不透他們在中國首都市中心觀光，到底出了甚麼差錯？

當地地陪倒是知道問題出在哪裡。他說，他們必須立即拿走那匹橫幅，因為那是違禁品。這些不慣於盲目接受指令的學生想知道原因，但是陪伴他們的大人對於警察國家裡的公安勢力有較多了解，所以他們叫學生聽命行事就是了。結果那匹橫幅在2000年3月的這一天被拿走了，所以來自NBA天王巨星麥可喬登(Michael Jordan)家鄉的這群人沒有一個被拘留，但對香儂等一行人來說，當時是緊

發出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然而，中關村是在一個比以往更自由的世界中決定其命運。理論上，中國共產黨可以一方面容許科學創新所需的開放性，一方面維持封閉的政治體制。但是，中關村亟需的科學與財務菁英恐怕不願接受這樣的條件。人們總是想呼吸自由空氣，而且只要能夠做選擇，他們會離開不自由的環境。不過江澤民仍然深信，社會主義中國一定可以成為一個科技領先的大國。在2000年6月一場鼓勵科學發展與工業化的演講中，他談到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思想體系，因此支持創新發明。

當然，拿北京中關村與加州矽谷來相比是不公平的，雖然中國官方媒體就是用「中國的硅谷」當做中關村的標籤。但是如果拿印度的邦加羅爾（Bangalore）來比較，中關村將黯然失色。印度政府對邦加羅爾的開發計畫約與中關村同時展開，今天邦加羅爾已經在生產原創性的產品，讓中關村的本土企業望塵莫及，而且中關村的產值遠遠落後邦加羅爾。印度出口的軟體是中國的六倍。這些差異反映了更基本的問題：在資訊產業方面，「現代化」的中國追不上「落後」的印度。

今天你在中關村還是買得到偽造的身份證件與盜版軟體，而中國本土的科技更是鳳毛麟角。中關村裡仍然找到破舊的街巷，在許多方面都像是一個貧民窟。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中關村已成了不肖企業的避風港，以其優惠稅制招徠根本沒有在園區設廠的公司。中國政府企業政策從過去到現在所犯的錯誤越來越明顯，許多方面的實質進展都少得可憐。當然，事情在2010年之前還是有可能發生變化，中國政府訂出雄心萬丈的計畫，要讓中關村在2010年稱霸全球。然而，如果參照過去的紀錄，中國政府屆時恐怕要開始設法挽

救中國的高新科技業與科技園區。因為政府的強力介入，中國今日創建的高新科技公司，將會淪為明日的錯誤。北京當局抱持著史達林年代的老舊觀念，它發展高新科技業的方法仍然是50年前建立重工業時用的那一套。

政府激勵產業的措施在本質上並沒有麼不對，而且幾乎每個國家都會施行，只是方式不同。例如美國的矽谷就是在聯邦政府的優惠措施中發展，不過美國政府只提供原始資本，後來矽谷的企業逐漸自立，整個矽谷地區與資訊產業也是如此。相較之下，中國於鄧小平時代建立的「經濟特區」，在廿餘年後巍然獨存，而且目前還在為往後的卅年做規畫。當年建立特區的目的是要刺激廣東省的經濟發展，這個目的早已達成，特區多年前就不再有存在的必要，但是它們至今仍享有諸多特權。今天中國存在近12000個特區，數量多到讓北京中央政府難以掌握。特區在中國已經體制化；只想控制一切的中共中央不願意採取必要步驟，建立一個更自由，更健全的體制。為什麼不能讓整個中國變成一個大特區？

因為中國不能，所以政府的高新科技產業計畫將難逃失敗的命運。中央經濟計畫人員面對經濟發展的觀念理論時，已經江郎才盡。高新科技園區很類似毛澤東的人民公社與國企：它們與社會其他領域隔絕，需要國家的強力支援才能夠發展。我們不難了解，為什麼每當技術官僚想要有所成就時，他們就會把一塊土地圍起來畫定為發展特區。中國的經濟體系充滿了禁令與限制，非常不利於成長與發展。對一個有限的地區授予特權，遠比改變整體經濟的基礎架構來得容易，儘管後者才是當務之急。特區讓計畫人員可以進行小規模實驗，而且這種作法比較符合一個謹慎體系的本能反應。不

張時刻。誰知道為甚麼那條橫幅會是違禁品？法輪功信徒進行抗爭時也使用橫幅布條，也許是這個緣故。為甚麼這個貌似無敵的政府會這麼敏感？莫非是它覺得自己的存在正受到威脅？

這些日子以來當局不容許異議之音，至少是不容許政治、宗教和種族方面的異議。工人和農人有時候會發出不滿的心聲，但那是當局已不能迫使他們保持沉默時。而在政府對人民的苦難變得無動於衷時，政府的軟弱也就益發明顯了。那個在天安門哀悼鄧小平而被公安帶走的人想必了解，這個政權可以在人數上壓過與它為敵的人，但是一旦哀悼或抗議的人潮太多時會如何？而且在它鎮壓心目中敵人的熱頭上，它已忘記了要如何了解人民的心聲。美國「高地公園中學樂團」怎麼會被認為會對任何國家造成傷害呢？尤其是對強大的人民共和國。也許是沒落中的政權不再思考了，他們只是作出回應。

而有人令他們措手不及。中國政府並不盲目，但往往視而不見。1999年4月，共黨高層領導人無法相信會有一個團體能夠，或竟然會包圍中南海——位於北京市中心的中共權力中樞。法輪功在那年7月被禁止，理由是它已對社會全體構成威脅。中國歷史上，奇特的宗教門派曾經招募軍隊，危及皇權；法輪功旗下沒有分支機構，至少沒有武裝的分支機構，然而它以一种隱密得多的方式威脅到這個國家。

法輪功的信徒信念堅定，也因而頗為堅強。和多數中國人不同的是，他們不懼政府的威嚇，所以他們勇於挺身而出對抗政府，而且前仆後繼。雖然北京當局認為抗命本身就是一種罪過，但法輪功的罪行倒不在於他們敢抗命，而在於它激勵了一群對政府而言更為

危險的人。當人民不再害怕而且知道自己不再孤獨時，政權就會崩潰。勇於反抗看似半不可破政府的那些人，若不被殲滅就會長留在人們的記憶中。我們不知道法輪功今後的命運會怎樣，但抗爭行動持續著，共產黨的風險也升高了。如法輪功修行者這種弱者的公開抗爭，會鼓勵社會上較強悍的那些人站出來，他們也有不平之鳴。

當然，事情本來可以有不同發展的。法輪功的第一個抗議事件並不是那個著名的中南海事件。如果當初省級幹部處理了這個團體輕微的抗議事件，我們今天可能聽都沒聽過法輪功的名字。中國當局可以建造全世界最大的無線電望遠鏡來探索星球的聲音，但卻聽不見人民的心聲。中共在長期的一黨專政後，已經喪失了許多政治技巧，現在除了靠堅不妥協與武力外，它已不知道如何取得勝利。當它動用武力時，往往又製造了來日的新敵人，例如拒絕接受政府干預的所有教派和信仰團體。很明顯的，中共的戰術並未奏效，江澤民談到法輪功的威脅就像波蘭的團結工聯時，就透露了這一點。他的評估看起來荒謬可笑，但卻可看出中共領導人已失去了鎮定。當他們不再了解人民時，如何能獲得勝利？

也許他們之所以不了解，是因為他們一直無法正視過去，所以也無法處理今日所面對的問題。鄧小平在1989年時承認：「要說失誤，我們確實有失誤。」當時是天安門屠殺事件發生後，他概略談到中共的缺失。他知道即使是中國勢力最大的政治組織，也必須檢視過去才能繼續邁向未來。像他這樣的坦白在今日的領導階層是少之又少的，而這正是問題的根源所在。這個政權已經變得煩擾不安，因為到處都有可以為它的歷史作見證的人。

「我就要和母親見面了！」這是2000年2月《中國日報》頭版上

一張照片的圖說。在1959到61年的「大饑荒」期間，東部城市南京附近的農村家庭無法養活子女，在絕望中不得不棄養孩子。有些孩童被大人用糧票交換了，有些則被丟在街頭，有些甚至到今天都還不知道自己原名叫甚麼。依照中共的命令，嬰兒被棄養後可以任其自生自滅，但被救起來的嬰兒則須送到河北省的收養家庭。而今，在情人節這一天，一個作農婦打扮的圓臉婦人背著個嬰兒抵達南京，很快的她就要和40年來不曾見面的母親相會了。她豐腴的臉龐上愉悅的笑容令人為她感到高興。然而這家官方報紙所未說出來的是，當年這場大災難是中共全然不理會百姓的生計，幹部沒有把壞消息往上報告的直接結果。農民餓死在農地上，但中共卻宣稱大豐收創下新紀錄，並依此向人民課稅。那是「大躍進」，是一場規模之大歷來罕見的人禍，而非中國日報指稱的天災，那段期間有好幾千萬人喪生，而幹部只是袖手旁觀。當時的中共不能面對現實，今日它在這一點上也沒有改變多少。

大約在那名快樂婦人抵達南京後一個月，河北省的記者在報上專欄刊登尋人啟事，協助其他當年遭棄養的兒童和親人團圓。有些人回到南京尋找親戚，在多年前被丟棄的地點——南京一座寺廟附近的一家旅館張貼告示。這些人尋求的不過是年長的親戚和生命中已逝的一部分，但是中共覺得這些團圓事件已威脅到它。河北的幹部告訴那些記者說，他們的助人之舉是有罪的，南京的民政局宣布協助孤兒返鄉的是非法組織，擾亂了公共秩序。中共容不得任何會提醒人民近半世紀前「大躍進」的事物存在，即便是一絲絲也不行。

2000年3月，正當中共對記者和河北與南京的孤兒安上罪名的時

候，羅馬天主教教宗向全世界道歉，要求世人赦免天主教所犯的罪行。如果同樣也具有強烈意識形態且自認正派的天主教會能夠為2000年來所犯的過錯道歉，中共為何不能為50年來的所作所為道歉？

或者只為1989年人民解放軍驅逐天安門廣場示威者那一夜的作為道歉？如果為單一事件道歉實在太為難，那麼為更早前「文化大革命」那十年道歉如何？今日的中國領導人可以譴責——也確實譴責了毛澤東引發動盪的文革，到現在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了，他們仍不允許人們研究這個時期。1999年，美國學者宋永毅因為購買那個時期的資料而被監禁，顯然他的罪過是在於研究周恩來，因而會有損人們記憶中周恩來為人愛戴的形象。他獲釋後說：「整個黨都犯了錯，現在他們要忘記這一點。」的確，在過去半世紀中，有許多事情有待遺忘。活躍的民運人士、作家戴晴說：「有一長排的垃圾桶，我們不能去掀開。」對這個國家的人民來說，大部分的歷史是不能入內的禁地。

赫胥黎曾說：「事實並不會因為受到漠視而消失。」黨可以隱瞞過去，但人民會記得。在中國，悲痛和災難從來不曾真正遠離。恐懼與疑慮一代傳一代。2000年初，在江蘇省的蘇州，一名年近60的女演員扮演五代同堂家庭中曾祖母的角色，拍攝一齣電視廣告。導演對飾演曾孫但不聽指示一直看著鏡頭的那小娃兒很頭痛，整個下午的拍攝工作很不順利，大家火氣都不小。最後曾祖母把小孫兒帶到一旁說：「不要看那個鏡頭，那是公安在照你的像」，她指著攝影小組：「如果你看著他們，他們會認得你而來捉你。」這是不可能的，那個攝影師是個壯碩的澳洲人，小組裡多半是外國人，但是

這名女演員顯現出曾經歷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人根深柢固的恐懼。

在中國，老一輩的把他們這一套態度傳授給年輕一代，就像那天在蘇州的那種情況。國家可以把宋永毅關起來以保護它的過去，但卻無法贏得人心。柯白說：「中國人不在鏡頭前時會告訴你，他們知道過去50年所發生的悲劇，其中有許多人是懷恨在心的。」當然，隱瞞過去意味著年輕人被告知事情的真相，可是誠如柯白所說的，生活在這個廣播電視發達、資訊到處流通的世界上，等到有一天他們自己發現真相後，他們將會對這個政權抱持懷疑態度。陳靜芝（音譯）是在西南大城昆明郊外「石林」風景區擔任地陪的一個年輕美麗的女子，她指著林中一根灰色的石灰岩柱說，有關這個景點建立緣由的碑文在文革期間被破壞了，「教科書上說，文革是一小撮人假藉領導的名字犯下的錯誤，」但是這當然不是真的。」她是在文革結束一年後出生的，可見得中國對其年輕人說謊，也因為不肯承認過去種種而危及將來。

年輕人還聽到另一個謊言。中國的搖滾明星崔健說：「從小學一年級到高中，我們一直都有政治課程，」主題永遠是共產主義，我們滿腦子都是紅的。」崔健的歌在人民共和國是叛逆的象徵。他說的現象依然存在，而且和從前比起來現在這樣做更加錯誤，因為人類的經驗已有定論，證實了社會主義是行不通的。但是北京領導人的看法不是這樣。江澤民說：「中國人深信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高層領導人不斷宣揚已過時的意識形態的優點，恰恰顯示出人民共和國已變得多麼冥頑不靈。世人大多以為中國已經現代化了，但他們錯了。

忘掉「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和政治學習吧，只有面對現實和真相才能拯救中國。曾經向人民保證沒有一個抗議者在天安門廣場被殺害的國防部長遲浩田說：「風可能從東西南北方吹來，我們必須牢牢掌握真相，不能失去。」中共高層領導人認為他們知道真相，而其真相必然是伴隨著他們一定會獲勝的信念而來。2000年5月朱鎔基總理於中國論壇上說：「今日的中國享有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和族群和諧，人民則精力充沛、朝氣蓬勃。」

如果朱鎔基願意聽的話，真相是中國人對於統治他們的現代政府並不關心。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連大聲罵一句粗話也不行，結果是很少有人敢這麼做。但是老百姓終究有辦法表達他們在專制社會中的不滿。誠如中國的搖滾之父告訴我們的，有時候你必須略過一些歌詞來聽歌。崔健說：「音樂所傳達的訊息讓我們有很大的思考空間。」有些人自行了斷，以直率的方式表達他們的異議。全球自殺案件中，大約有44%發生在中國。那只是反映出漸漸為人所知的「精神的死亡」。四十來歲的徐昌說：「孩子可以自行決定要信甚麼，但是我再也不相信任何事物了。」他說的是同一輩人的心聲。徐氏過去是上海的銀行家，現在在北京一家製藥公司做事，但他生命中的決定性時刻是文革期間在鄉下建設「新中國」耗掉的。而今他毫不在乎女兒的宗教教育，雖然她們在他生命中占有最重要的分量。他說：「我相信毛澤東，但他辜負了我，我無法再相信另一個神了。」

許多中國人不相信毛澤東，有些人連毛的接班人也不相信。但僅有少數人敢直接、明確的表達他們的立場。北京一個計程車司機說：「你們外國人根本不了解我們中國人多麼厭惡這個社會！」他

剛剛被一名交通警員搜查過。中國人怒火中燒，因為共黨幹部讓百姓飽受折磨。一個父親說：「我們的社會徹底腐敗了。」他兒子由於不附和上司的意見而冤枉入獄，一輩子就這樣毀了。許多人純粹因為幹部行事乖張、專橫霸道而失去信心。大多數人知道共黨幹部掌有太大權力，也認為只要一黨專政繼續下去，社會就不可能改變。這是為甚麼愈來愈多的中國人期盼政治改革的緣故。

2000年3月，台灣總統大選後數日，大陸一個網站上張貼一個訊息說：「台灣可以選舉自己的領導，帥極了！」陝西內地農夫井秀虎（音譯）講得更直接：「我們要民主。」江澤民心知肚明。2000年9月他訪問紐約時，這位全球最大的獨裁政權的領導人說：「中國人熱愛民主與自由。」因為他們確是如此，所以中共的回應是支持鄉村基層選舉。但是在地方上，氣氛並不友善，農民還是不可以自行推舉候選人，在井某的家鄉子洲等地方，百姓甚至於根本就不得投票選舉。井秀虎氣憤的說：「共產黨來了以後和以前並沒有兩樣，革命只便宜了腐敗的領導人。」

革命也使得貧農雪上加霜，在子洲，如果沒有靠富裕的鄰居施捨一些食物，許多農民早就淪為餓殍了。1999年，平均每人每天淨收入只略多於一美元。政府沒有供給甚麼給農民，但是稅負卻加重了，因為共黨對於鄉間地區的稅收需求不斷增加。由於北京一直在發起新的運動，這一年是支持家庭計畫，下一年是掃蕩地下基督教會，因而農村幹部的人數也得增加。所以在中國大陸的許多農業地帶，稅負過重的農民正在反抗中共的統治，尤其是在他們發現自己所繳的稅直接進了富有官吏的口袋時。而幹部往往畏縮退卻，不敢擋人財路。一名村級幹部承認：「過去數年，我們的基層組織一直

很弱，幹部不敢採取行動，他們已經寵壞了農民。」被寵壞的農民大約有兩萬人，2000年夏天他們在江西省省會南昌南方的豐城附近展開暴動，抗議苛捐重稅和貪污腐敗的惡行。長期積累的民怨爆發開來後，暴動從一鄉蔓延到另一鄉，農民拆毀貪官污吏的房舍，就如幹部先前拆毀繳不起高得離譜稅負的農民的房舍一般。他們只有農具當武器，卻和武警搏鬥了好幾天。

井某和子洲同鄉不再畏懼大權在握的中共當局，他們要中共下台。1995年起，那個地區的幹部開始提高稅負到令人無法承受的地步，農民最後只得告進法院尋求援援。然而他們卻被駁回了，辯護律師還挨揍下獄。他說：「地方領導告訴我們『江澤民自己也貪污，所有的領導都貪污，你們要去鬥誰？』」1998年初，一群農民自行動手，把一名奉命前去安撫他們的低階幹部抓起來關了將近一個星期。中共對此事件只有一個反應：發動另一回合的逮捕、毆打和監禁。

四川省一個村子的黨委書記說：「政府一直在講發展，但是農民愈來愈窮。」而2000年正是掃除農村貧窮的七年運動的最後一年。在期限之前目標已經達成，至少中共是這麼說的，但是這個說法很可笑，因為農民受苦依舊。依據世界銀行的調查，在中國許多地區貧窮問題日甚一日，而農村貧民尚有1億6000萬人。所以難怪絕望、憤怒的農民會開始起來結夥舉事。在四川省河邊鎮號召了2200戶人家一起控告當地共黨幹部非法徵稅的趙淑楠（音譯）說：「唯有團結我們才能強大起來。」她和丈夫曾經遭到當地幹部毆打，後來不得不逃家避禍，但是她沒有屈服。在北京時她說：「我為了吃的權利奮鬥，而且會一直奮鬥下去。」這是她第四次來到北京，尋

求中央政府糾正地方幹部的錯誤。對於2000那年愈來愈頻繁的農村暴動，中央政府領導人的回應是開始談論要減輕農民的負擔，但是那些話農民從前早就聽過了。

地方幹部是鄉下地區的亂源，他們往往握有實權。除非萬中央高幹收回鄉下地區的控制權，否則中央能做的實在不多。2001年3月，江西省南部芳林鎮一家小學校舍爆炸，遇害的幼童和老師可能多達60人。早在幾年前，家長就一直向地方幹部抱怨說，孩子（有些只有八歲大而已）在學校時被迫製造爆竹。爆炸事件發生後，地方幹部不敢承認實情，就推托說是有個精神異常的村民把爆竹藏在口袋裡帶到學校去燃放。總理朱鎔基在國營電視台上把地方幹部編造的說詞重述了一遍。我們不知道朱總理是否聽信這個顯而易見的謊言，但是情況現在很清楚了，組織層級表已經倒過來了，國家領導人必須聽命於地方幹部。北京當局必須馬上謀求對策，否則悲痛的父母和其他農民將起而反抗，綜觀中國歷代皆是如此。湖北省中部棋盤鄉農民朱利說：「如果我能夠，我會殺光那些幹部，從上層到下級。他們吃我們的肉，喝我們的血。」還殺他們的子女。就如四川省一名村支書記所說：「這些日子來鄉間很不平靜。」

所以對中國農民而言新千年並沒有新氣象，除非事情有所轉變。這也是井琇虎和他九億鄉下同胞蠢蠢欲動的原因。公安部說，1998年中國發生了大約6萬宗抗議事件，1999年則有10萬件左右。從一切已知訊息看來，這些數字似乎是正確的，但無從查證。然而有一件事是明確的：抗爭事件日益增加，已從中國的一端蔓延到另一端。根據北京一位學者的說法，今日各地農村的抗爭事件是「一個朝代結束的象徵」。當中共以嚴厲手段對付社會動亂而製造出更多敵

人，例如在子洲、河邊和棋盤的情形，那麼這個朝代將會壽終正寢。如果中共政權要維持下去，那它必須了解民心向背。人民已經從黨的手中奪走了主動權，讓黨疲於應付已經發生的事情。毛澤東若還在世，也會體認到中共已經衰微。「所有的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他曾經這麼說。毛也說過，鎮壓產生革命；永遠不要阻礙於暴政之下，一定要用革命手段去推翻或改變它。

當今中共領導班子已從國家動盪不安的歷史經驗學到所有錯誤的教訓。朱鎔基說過：「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沒有穩定，一切都做不成。」但是在他們一心一意追求社會秩序時黨員並不聽從，而且他們努力遏止變革，然而變革有朝一日終會發生。這是何以士兵在1999年國慶日舉行大閱兵的原因。北京一名中共黨員說：「他們要人民看見他們的力量，那很簡單」，「窮鄉僻壤的那些絕望、困頓的貧民看見燦爛奪目的煙火，雄壯威武的戰車，玫瑰花、木蘭花、綠葉等等，一定會問：『甚麼時候我才能分沾到一點好處？』」李光耀談到1999年國慶慶典時告訴我們，炫耀國家力量得冒些風險。「所以大眾傳播媒體有它的好處，它能把全國集合在一起，也能讓中國較落後地區的人民看見他們自己是多麼落後而有感而發：『喂，甚麼時候才會輪到我？』」井琇虎當然希望有他的份，他和陝西省好幾十萬農民群起與貪腐殘暴的地方幹部抗爭，大家都很憤怒。他們對於中共所展現出來的武力似乎沒有特別深刻的印象。「鋼鐵長城」人民解放軍護衛衛隊對抗子洲和中國其他地方的農民，但是如果敵人是一個理念，那麼鋼鐵又有甚麼用？鋼鐵製的武器會贏得小規模的衝突，但是一旦太多人持有同一個想法時，武器必定會失敗。

《中國日報》曾經有一個頭條寫道：「中國是一股擋不住的力

量。」不，不是這樣的。擋不住的是中國人民的力量。當鄧小平在天安門事件後決定中共必須進一步放鬆社會控制機制時，中國老百姓的進取心促使他們前進。中共則以退讓換得苟延數年的統治，付出的代價是它長遠的未來。總有一天，中共將無法控制奔向明日的所有人民，而那一天也不遠了。在那個六月四日清晨撤出廣場的學生，於1989年那些悲哀的日子裡，無法想像他們的理念有朝一日竟然能夠蔚然成風。他們啟動了一連串的事件，而這些事件終有一天會導向一個自由繁榮的中國，比那些學生當年所想像的更好，也可能比我們今日所想像的為佳。

要達到那個境地，中國人民必須重新塑造他們的國家。誠如比利·葛拉翰牧師 (Reverend Billy Graham) 所言，一個新時代的起始是開始行事的最佳時刻。對他來說，「千禧年」有何意義？他說：「那意味著我們有機會重新去做一些事情，或是我們可以另起爐灶。」這位福音派牧師的革新訊息對於所有人，尤其是自認有權永遠存在的政府而言，是個好忠告。

然而那個領導者在歷史的這個特別時刻上，並未三思，他利用這個時機再次肯定過去的作法。跨年進入2000年之後數秒鐘，江澤民點亮了北京中華世紀壇的永恆火焰，那是中國的聖火，不應該熄滅的。中共正在慶祝中國五千年的歷史，而且期待無窮無盡的未來。

而在國家主席可以好好省思已發生的和可能發生的事情之際，他卻大談社會主義的未來，重彈我們以前已聽過多次的老調。

距離世界上最偉大的共產黨領袖舉行盛典只有數哩之遙的地方，幹部的作為顯現出農民的情況並無改變。共黨幹部忙著協助房

地產開發商建築外籍人士住宅，以供中國入世後即將搬到北京的外國人居住。農民因為自己的土地被徵收而惱怒不已。一名農場女工說：「我很火大。」但她的表情是絕望多於憤怒。「從前我有塊地，現在甚麼都沒有了。」房地產開發商和村裡幹部對農民毫不關心。「他們占據了那邊一整片土地，我們甚麼錢也沒拿到。」說話的這個農夫戴著一頂像諾星奇哥·馬克斯 (Chico Marx) 戴的那種草帽，但是他不是在說笑，而是在回想先前發生的事：「我們的意見完全沒入理」，他悲苦的說。所以村民的情緒沸騰起來，失地的人搗毀了為附近外籍住戶建造的俱樂部會所，並打破了一些住家的玻璃。

如今人民共和國看起來現代化了，有許多宏偉的建築和為外國人所蓋的高價新住宅區。它似乎比以前進步多了，但是它能進化到更好的社會，一如大家的期許嗎？不，看來不可能。套一句Jonathan Mann的話來說，中國只是「外貌上改善了」(cosmetically improved)。他說得對，因為中國在歷經二十多年形貌的進步後，其毛澤東體制的本質並未改變多少。儘管自1978年以來已有許多改革，但是幹部仍然能夠為所欲為。他們還是認為領導是他們的天命，行事舉止有如他們說的話就是法律，對於當年發動革命所要拯救的農民和窮人，毫不關心。他們空口說了許多美好的事物，並蓋了堂皇的建築外觀，但改變往往僅止於此。他們會讓體制看起來似乎與時俱進，但不會真的有所改變。中共的領導人仍然設法限制人民，彷彿人民有義務永遠接受他們的領導。

今天的中國人已不再相信他們有這個義務了。他們會接受目前的領導，是因為不得不如此。中共雖然不受歡迎，但大權在握，已

建立了一個警察國家並維持了50年以上的統治。可是人民動起來了，有一天他們會想要自治。這是他們的天命，雖然中共幹部並不這麼想。曾在中國住過的一個美國人說：「有10億人不想遵照指令行事。」可是政府還是一味發號施令，總有一天，人民和政府會再起衝突，這是無可避免的。對中國這個一黨專政的國家來說，若要前進而非崩潰，那麼它不不但得改變，而且必須在人民把它甩到一旁以前就作改變。

然而國家領導人對於展開徹底的政治改革一事並無共識。他們承認小幅的調整必須要做，但這方面的改進同樣也是外表多過實質，而且速度慢得令人焦急。不幸的是，中共從台灣2000年選舉得到的教訓就是，必須選出真正的變革，而且絕對不容許與它競爭。幹部仍然以為他們可以自行改善，不勞他人協助。但是歷史告訴我們，他們的觀念只是幻想罷了。為了維持它那統治是其永恆天命的想法，中共付出的代價是昧於現實——從來沒有一個組織，即使強大如中共者，能夠永久統治人民。

在經濟層面它同樣也不正視現實情況。在1989年，中共了解必須改善人民的日常生活，所以嘗試作了真正的改革。但是那些靈活變通、令人興奮的日子已經結束了。今天的中國領導人不願去攪動意識形態的根本概念和他們聰明的理論架構。他們談論「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可是那仍然是社會主義。而且政府堅持要維持經濟各主要層面的控制權和所有權，根本不可能做大幅改變。中共的技術官僚仍然在制訂他們的五年計畫，彷彿嚴格管控對於進步是不可或缺似的。

領導階層高聲揚揚談他們的成就，並選擇加入了WTO。他們其實

尚未準備好要接受嚴酷的全球化，但卻不管三七二十一催迫著向前進，結果將會像自欺所引發的大災難「大躍進」一樣。今日的領導就如同毛澤東時代一樣，並無自知之明。在「大躍進」時期省級幹部假造穀物產量數字，好幾千萬人因而餓死。今日的幹部假造工業產出數字，很快的他們的經濟會崩潰。

在中國必須面對現實之際，江澤民卻發布政治說詞。他已陷落到意識形態的運作，希望重彈馬克思理論能夠圍住群眾。一位長期住在中國的外國人說：「這是一直在發布命令卻發現沒有人理會的領導會作的反應。」江澤民對馬克思主義的重視，顯示出他已感到迷惑或陷入困境，也讓我們了解在他看來，變革就是要加強防禦。

高層領導可以抗拒改革的呼聲，不過他們應該知道下一步會發生甚麼事。任何政府若其制度僵化了就會垮台。一旦他們變得僵硬而無法彎曲時，離崩潰也就不遠了。這是共產政權的模式，中國也一樣。當他們不再是民之所欲時，他們不會優雅的離去，而是一直待到被推開為止。今日的中國領導人只要看看過去的一切就明白他們未來會如何。俄羅斯國會議員魯茨柯伊(Alexander Rutskoi)說：「社會在往前走，黨卻一直停留在原地。」他指的是蘇聯共產黨，而當情況演變到那個地步時，結局就無可避免了。曾經擔任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助理的雅柯夫列夫(Alexander Yakovlev)有一次提到戈氏時說：「在一條河流蓄滿洪水時，他試圖築壩攔水，可是那潮流太強大了，」它沖破了水壩，淹沒了它所流經的一切。」當然，蘇聯和中國並非完全類似，但是兩者的本質是一樣的。促成這兩個共和國誕生的馬列主義的觀點是無法改造的，戈巴契夫為重建蘇聯社會所努力的結果讓我們看得很清楚了。江澤民的黨採行另一條道

路希望能夠振興起來，但它也將會被掃到一旁，因為它無法進行必要的改革。

也許這是江澤民會問「當你不在位時，你想要留下甚麼建樹」的原因。中國的學童可以告訴我們他的答案：「毛主席建立了中國，鄧小平讓我們變富有了，江澤民領導我們走向未來。」這是12歲的李嘉說的，她把學校教的記得很熟，只不過學校教她的都不是真的：中國在毛澤東以前早就存在了，中國人現在仍然不富有，而中共呢，如果它有在動的話，它是往回頭路走的。江澤民和他的前任所遺留下來的是被白白浪費掉的50年。曾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王若水在天安門事件後思及人民共和國時說：「在40年後回顧過去，我感到非常痛心，」我有強烈的失落感，我們這些年來所努力的是為了甚麼？」王若水希望他的同胞擁有自由與民主，但現在不只50年過去了，中國人仍然兩者都沒有。

經過了這些年，中國仍然落後又貧窮，而且政府嚴苛又殘暴，那是因為幹部是對其上負責而非對底下的人民負責。所以在許多方面自清朝滅亡以來並未改變多少。近代中國的國父孫中山在其遺囑中寫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而當中國人如此做時，他們的政府卻耽擱了。捷克總統哈維爾 (Vaclav Havel) 曾經指出：「共產主義抵觸了人們的生活，抵觸了人類的根本需要，自由的需要和進取冒險的需要，以及自由結合以反抗國家意志的需要，」「抵觸人類生活的東西也許能夠維持長久的時間，但遲早會崩潰的。」

同時，幹部應該也記得他們所傳承者的話。毛澤東曾經說：「大的會被小的推翻。」有一天小老百姓會挑戰大政府，因為經過這

些歲月它已變衰弱了。時至今日幹部還能遂行統治是因為很少人公開反抗他們，然而只要有一小撮憤怒的人起而抗議，就能推翻這個制度，因為不需太費力就能成事；人們現在只是在忍受政府，會護衛它的少之又少。今日中國所犯的錯誤人民已看得太多，而改變卻是多麼的少。

你也看得中國人所看到的一切，即使是類似江蘇省東部如阜那樣落後污穢的城市你也看得到。從主要街道開始看起，那是寬度可容一條輸電線的道路，這條輸電線把電力送到這個沒落的社區。另一邊，在兩個主要十字路口其中一個的轉角處，矗立著市中心最宏偉的建築——市政府的辦公處，它和市內其他地方以一道高牆、一大片草地和警衛隔了開來。在市政府那一落雄偉建築物的另一邊，是一條無名的街道，居民沒有人知道街名是甚麼。

在白天你不會注意到那些店家，它們淹沒在那條無名街上的一大群小店面中，不易引人注意。但一到晚上你馬上就看得一清二楚了，沐浴在粉紅燈光下的這些店家，大概是太陽下山街道變暗後你唯一看得到的事物了，外表像是美髮院，但沒人進去燙頭髮。即使在寒冬中拉門也是開著的，所以你看得見裡面的年輕女孩，不工作時她們就閒聊或梳頭打發時間。招牌上寫著女孩們出身的省份，以投顧客的地理喜好。所有這些店家都位在從市政府走路十分鐘可到的範圍內。

他的名字叫章家琛，他所看見的一切一定讓他感到痛苦，所以他公開宣稱沒有注意到那些紅燈戶。那些店家就像阿姆斯特丹的任何同類場所一樣露骨招搖，也比中國南部城市的同類場所更加大膽。穿戴藍色毛裝的章家琛每天離開他祖傳農場後幾乎都會行經這

條街道。他和老婆都不承認那些店家看起來很奇怪。市政府前面的牌子上寫著服務人民的字樣，但那只是黨的口號罷了。太陽一下山，紅燈戶舉目可見，也間接說明了何以時候到來如舉的民眾將不會挺身而出捍衛地方政府。貪污蹂躪著這個城市，他們以新中國為恥，覺得和舊中國差不多。居民會告訴你他們沒看見那些紅燈戶，但我們都曉得他們其實是看見了的。

第十二章

毀滅之路

中國淪亡錄

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秦始皇

站 在世界第三高的大樓上，我父親俯瞰著上海浦東。無數盞泛光燈照映著新中國亮麗的建築，玻璃帷幕的外牆將光芒反射向天際，這又是上海一個輝煌的夜晚。大街上無數盞車燈也讓我父親知道，儘管夜色已深，這座大城還是全速運轉。父親說道：「外國人看到這幅景象，一定又驚訝又嫉妒。」這是我頭一回聽到他讚美中華人民共和國。

父親住在新澤西州，早已歸化美國，但是在2000年9月的這個夜晚，他格外感受到故國的牽絆。父親是在長江的對岸長大成人，後來就讀上海交通大學，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就離開中國。在我成

長過程中，他一直對我預言毛澤東政權將會覆亡。今天晚上，父親沒有再重覆這些預言，因為這次短程訪問讓他看到的是欣欣向榮的中國。

「明日會帶來什麼？」這是飛機製造業龍頭波音公司的廣告標語。現在我父親認為中國前途光明，但是有些人卻不以為然。住在中國的中國人急著想找到答案，國家正面臨一道一道關卡，社會上百家爭鳴，中國的前途實在很難定位。

王傳寧正在思考明日會帶來什麼，現在他暫時寄居美國紐約，可能很快就得回中國。自己的未來要歸屬於美國還是中國，他無法掌握，北京的某位高幹將會替他決定。在這段命運未卜的期間，他與家人蟬居在下曼哈頓一間公寓中。

在紐約的公寓或許小了一點，但是王家從來沒有享受過這麼美好的生活。至少現在他們可以全家團聚，自由自在過日子。王傳寧在1990年代初期被中國的國有貿易公司「中國北方工業」派往加州，但是妻子楊玉平與兒子傑森都必須留在中國，以防他一去不回。王傳寧原本住在柏佛勞（Bellflower），洛杉磯郡南部一個破落的社區，他一直没有機會認識鄰居。北方工業為駐美人員——一群穿西裝打領帶、大學畢業的中國人——買下一幢公寓，以鐵門隔絕周遭的美國勞工階層居民。後來楊玉平與傑森也獲准赴美，趕在1996年的聖誕節與王傳寧團圓。當時傑森一句英語也不會說，但現在他說英語就像是土生土長的美國孩子，還常常教爸爸「說話要像美國人一樣」。儘管楊玉平一直要教傑森中文，但他卻不想學。他和其他美國孩子一樣愛穿寬鬆的衣服，喜歡薯條勝過於米飯，只有從容貌上才看得出他可能來自外國。

如果接到返國命令，愛國的王傳寧會義無反顧地帶家人離開紐約，雖然他嘗過現代中國的苦頭，也比較喜歡美國的生活，他還是必須遵照北京當局的命令。目前王傳寧在紐約讀研究所，就像我父親在半個世紀前的歷程一樣。王傳寧希望繼續唸書能讓他再拿到簽證，也讓家人在美國再多待一段時間。傑森完全可以接受這樣的安排，他不會像他爸爸那樣舉棋不定。傑森知道自己要什麼，一心想和朋友膩在一起。現在他已經是美國人，回中國生活將使他苦不堪言。傑森或許能夠如願，因為他的爸媽很憂心中國的情勢發展。王傳寧一家人還有什麼理由非回北京不可？

很久以前我父親就說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會覆亡。儘管今日外表看來光鮮亮麗，但現代中國體制已漸瀕臨發展的盡頭。中國其實已是老態龍鍾，進入未來的關鍵時期後，隨時有可能一蹶不振。從2002年開始到2003年，中央政府與中國共產黨高層將展開權力傳承。以北京流行的講法來說就是，「第四代」領導人很快就會接下第三代領導人的棒子。

2002年底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全國代表大會中的權力交接，規模之大史無前例。最高領導機關中央委員會大約有60%的成員即將退休。22名委員組成的政治局，也會有一半以上換血。在掌握黨國實權的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七名常委中有五人將退休。退休名單中包括分坐黨內第二、第三把交椅的李鵬與朱鎔基。中國最重要的職位也將換上新面孔，依照既定計畫，江澤民將辭去總書記一職。江澤民曾暗示他有意留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繼續領導人民解放軍。當年鄧小平就是以中央軍委副主席的身份領導黨國，江澤民有意蕭規曹隨，但他恐怕得經過一番苦鬥方能如願。江澤民現在是大

權在握，不過退居第二線的黨內元老級幹部對他留任軍委主席一事很有意見。

共產黨的權力結構變化也會反映到中央政府上。2003年初，政府最高層的三位首長將換上新面孔，國家主席江澤民、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全國人大委員長李鵬都會退休。

在2002年到2003年的權力交替期間，任何事都有可能發生。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曾斷言：「沒有一個共產國家能解決權力繼承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如此，它的權力轉移是由野心而非法律決定。我們已看見權力重組的第一滴血，就是前上海市長徐匡迪。他的任期還沒到，卻在2001年12月沒來由的「辭職」。他頗得民望，與上海真正的當權派，也就是市委書記黃菊，關係卻沒搞好。但徐匆匆下台也不無其他原因。江澤民最會搞權謀，徐看來是敗在江一手策劃的權力鬥爭之下。徐匡迪下台後，有人在上海的網站上留言：「在中國，人才是搞不過權謀的。」就算我們不能理解徐匡迪下台始末，卻可以確定，他絕對不會是十六全前夕唯一的去職高官。近幾年來的權力鬥爭雖然不像毛澤東時代那麼殘酷，然而基本特質並未改變。誰知道野心家為了取代江澤民會幹出什麼事？或者江澤民會不會為了戀棧權力而不擇手段？雖然黨與中央政府的權力變化已經做了部份規畫，但未來的發展可能會使計畫翻盤。就算所有工作都按照計畫進行，權力轉移也需要數年時間才能完成，讓新領導班子鞏固權位、擴張權勢。鄧小平花了兩年時間才排擠掉毛澤東指定接班人華國鋒，江澤民需要的時間更久。

中國如果繼續維持統一，北京當局還可以做理性的抉擇。但是如果黨政高層陷入分裂，當局就可能走上錯誤的不歸路，或者同時

走上許多分歧的道路。中國領導人深知這一點，因此盡力保持穩定，但是再多的告誡也無法抑制掌權者的野心。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這段動蕩不安時期會特別脆弱，因為它所面對的艱鉅挑戰，連最穩固堅實的社會都要畏懼三分。

儘管黨的領導階層以各種方式來展現團結，其實內部已經出現分裂。2001年1月，一位共黨幹部以「張良」的化名公布《六四文件》，揭露中共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以武力鎮壓北京天安門廣場示威者的決策過程。「張良」表示，他鋌而走險的用意是要協助領導階層中的改革力量，他在書中寫道：「雖然要說中國共產主義已經走到盡頭仍言之過早，然而，中國共產黨的垮台不會來自外在力量的壓迫，而是來自黨內成員的鬥爭。」中國外交部指稱這些文件是偽造的，不過那並非重點。公布文件的行動本身就顯示出，高層幹部的舊日恩怨至今仍未消解。因此當中國進行下一回合權力轉移時，領導階層會再度陷入分裂。

在未來變動劇烈的時期中，如果王傳寧與其家人回到祖國，他們將親眼見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末日，以下是王傳寧一家人可能會看到的景象。

跨海征戰

傑森會不會上戰場？對中國而言，與台灣爆發衝突毫無意義。當我們為上海浦東的燈火炫神迷時，海峽兩岸的敵意也著實難以理解。我們知道，經濟發展是共產黨施政的當務之急，戰爭必定會使中國遭致國際孤立，大部份外國貿易與投資都將停滯。一個以經濟繁榮為合法性基礎的政府，不應該將部隊送過台灣海峽。瑞士製

藥大廠諾華 (Novartis) 中國分公司董事長泰倫斯·巴奈特 (Terrence Barnett) 說：「江澤民每天早上醒來時，最煩惱的就是如何餵飽中國的十二億人口。」江澤民照顧人民已經十分吃力，他可以選擇餵飽人民或是選擇對台開戰，但就是不可能兩者兼顧。

中國與許多鄰國都有疆界糾紛，即使中間隔著大海。但如果中國會跟人開打，最可能打的卻是自己人，也就是「叛亂省」台灣。中國不可能以傳統戰爭方式擊敗台灣，它需要好幾年時間準備，才能夠成功發動一場跨越寬廣海峽的侵略攻勢。今日人民解放軍雖然擁有俄製戰機、驅逐艦與潛艦，但仍然無法在空中、海面、水下面奪取優勢。不必等到第一艘艦艇從中國港口啟航，台灣方面就會掌握解放軍動向。拼湊而成的中國艦隊，巡邏數百哩的運補船、登陸艦與漁船，都會遭到占有空優的台灣空軍迎頭痛擊、狂轟猛炸，大部份船艦會在中途沉入大海。勉強抵達彼岸的船艦缺乏可靠的後勤支援，頂多只能在灘頭陣地苟延殘喘。解放軍的慘重傷亡，證明了台灣戰略正確：在敵軍登陸本島之前，殲敵於海上。政治忠誠度對解放軍而言，與軍事能力同樣重要；因此今日的解放軍在政治上十分可靠，作戰能力卻令人憂慮。再考量美國對台灣的情報與軍備支援，中國對台灣的攻擊行動將一敗塗地。台灣總統陳水扁曾引用老子的「以柔克剛」來詮釋他的兩岸政策，但是如果中國對台灣發動攻勢，陳水扁勢必會憑藉優勢軍力來擊退侵略者。

因此，輕啟戰端將是中國最嚴重的失策。如果上述諸項因素仍嫌不夠，還有一點足以說明中國其實有能力消弭衝突：江澤民對台灣問題的立場較為溫和，他體認到兩岸敵對態勢一觸即發，一直避免採取會激化局勢的行動。

至少到目前為止都是如此。英國政治人物艾諾克·鮑爾 (Enoch Powell) 說：「人盡皆知根本不應發生的戰爭，在歷史上卻屢見不鮮。」北京當局也不時揚言要發動這樣一場戰爭。2000年3月，當台灣人民準備投票選出下一任總統時，朱鎔基總理提醒我們：中國發動戰爭時不會考慮是否有足夠的戰機、軍艦與導彈，這根本不是軍備問題，中國將不顧一切地開戰。朱鎔基說：「中國人民一定會以鮮血和生命來捍衛祖國的統一、民族的尊嚴。」這類言論過去通常被視為虛言恫嚇，因為中國後來都退縮未採取行動。然而，無論朱鎔基的意圖是什麼，他已經把話說得非常清楚。

就算朱鎔基口是心非，我們也要探究他為何要如此放話。當年江澤民尋求並獲得解放軍高層將領的支持，鞏固他身為鄧小平接班人、但一度動搖的地位；解放軍則換得對台政策的參與權甚至決定權，因此中國才會在1996與2000年兩度揚言開戰。到了2002年與2003年的權力轉移時期，江澤民的接班人勢必也需要解放軍的支持，與那些位高權重的將領將領談條件，換取他們的效忠。毛澤東曾告誡我們：「槍桿子裡出政權。」這一點在中國領導政權換代時尤其真確。

今日中國的立場非常清楚：台灣如果逐步走向獨立，甚至只是不願意接受「一個中國原則」，都將引發戰爭。這也意味江澤民的接班人沒有多少迴旋的空間。連強勢的領導都很難避免戰爭，何況是一個受制於軍方的弱勢領導，他更不會有多少選擇。就算中國新上台的最高領導人能夠擺脫解放軍的脅制，他可能也會為了保持權位而不擇手段。等到中國經濟在加入WTO之後開始衰退，共產黨的合法性基礎將只剩下民族主義，北京當局可能唯有選擇對台灣開戰，

才能維繫政權於不墜。如果中國領導人認定他們可以兵不血刃，憑著海空封鎖或發射導彈就讓台灣就範，那麼做出開戰決定更是輕而易舉。

因此，任何挑釁行為都可能引爆下一回衝突，個性強，常不按牌理出牌的台灣副總統呂秀蓮，其支持獨立的言論或許就是導火線。陳水扁總統一直試圖約束這位副手，但他也不見得管得住她。人民日報曾告誡「台灣領導人必須面對現實」，但現實是：也許呂秀蓮的言論只代表少數人，但絕大多數台灣人民都不希望與中國統一。陳水扁說：「這就是現實，任何民主國家的領袖都必須尊重大多數人民的意願。」台灣的領袖不可能讓北京當局予取予求，因此兩岸攤牌看來勢不可免。也許就是因為這樣，解放軍將領張萬年預言情勢在2005年前會一發不可收拾，他在2000年時說：「在進行第十個五年計畫期間，戰爭會在台灣海峽爆發。」

所謂挑釁未必與台灣獨立有關，戰爭也可能從單純的意外事件中誕生。中國軍方咄咄逼人、大膽輕率的空中戰術，導致2001年4月1日的美中軍機擦撞事件。如果下回類似事件發生在台灣海峽上空，後果將更為嚴重。解放軍熱血沸騰的飛行員經常測試台灣的空防能力，總有一天他們會擦槍走火。導火線也可能在台灣內部埋下。如果陳水扁的政府無法控制局面，中國將會以恢復島內秩序為由出兵干預。在高度緊張的氛圍中，就連一般無爭議性的事件，也有可能一發不可收拾。台灣向來是其他社會問題人物的避風港。因為在外交上受到孤立，台灣與外國政府簽訂的引渡條約寥寥無幾，與中國更欠缺這層關係。中國司法當局通緝的法輪功領袖、民運人士甚或普通的罪犯，要持合法護照與中華民國多次入出境許可進入台灣都

不是難事。台灣政府為了促進旅遊，在香港免費且快速核發這種多次入出境許可。中國民運人士可以蝸居在台北的飯店中，嚴厲抨擊中共政治局，氣量狹小的北京當局恐怕難以忍受。在國民黨統治台灣時期，涉及對岸通緝犯的事務不難解決，人犯會被送上不知名的漁船，駛往台灣海峽中線，交換台北當局想要的人。然而，這種事不會發生在新興民主國家。近來台灣的領袖變得頑強而自傲，不會屈服於北京的要求。

中共領導人如果要懲罰台灣，倒也不是難事。政客與軍人都喜歡連戰連決，而台灣也有隙可乘；以投資術語來說就是，台灣提供了許多「低垂的果實」。連落伍的解放軍都可以拿下金門，那是台灣外圍最靠近中國的島嶼，距離福建東部外海一哩多。約兩萬名軍隊守在綿延數哩的地下坑道與堡壘，保衛金門人民。這支部隊能征慣戰，不過金門遲早會陷落，然後就輪到同樣也緊鄰中國大陸的馬祖。

不過對解放軍而言，金門與馬祖只是開胃小菜，流亡海外的異議人士魏京生說：「中國共產黨就像狼一樣，非要把整隻羊吞進肚子裡才會甘心。」這隻羊當然就是台灣本島。解放軍將領自以為可以吞下整個台灣，不會只滿足於征服外圍島嶼，甚至誇口一天之內就可以拿下台灣本島。這是無稽之談，他們大概不會真的這麼一廂情願。但是，軍隊會被嚴重的失算與過火的情緒驅策；當將領們無法認清現實，政治人物只謀私利，一個國家可能就這樣走上不歸路。

這一點在關涉到中共存亡時，尤其可能。2000年春天，江澤民聽取了一系列簡報，內容是關於世界各國共產黨與極權政體的崩

潰。他必定聽過一種理論：第二次世界大戰延後了蘇聯帝國的覆亡，因為戰爭抑制了貪污腐化，喚醒國民的自我犧牲精神。江澤民可以看看，美國遇到911恐怖攻擊後，是如何的不分族群，萬眾一心。北京當局近來談論戰爭時，或許就是著眼於此，而認為就算是像1979年進軍越南這樣規模較小的戰爭，也有助於延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祚。

另外一個可能是，北京當局深恐時機稍縱即逝，此時不動手，日後更無可能。台灣與中國漸行漸遠，將來總有一天，雙方會永遠分道揚鑣。有些人認為，如果戰爭勢不可免，中國應該趁著現役將領選具備實戰經驗時開打，再過幾年這些將領都將退役，包括國防部長遲浩田、中央軍委副主席張萬年在內，兩名老將預定在2002年卸任。此外解放軍也認為，必須在台灣更換新一代美式武器之前動手，而時機就是現在。

所以現在戰爭似乎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過去江澤民兩度揚言開戰，但兩次都臨陣退縮。沒有一個政府能夠第三度演出這種戲碼，特別是在一個極端重視「面子」的國家。政治嗅覺敏銳如江澤民應當清楚，打台灣不會得到舉國響應，還是有大陸人相信，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但他知道，只要挑起仇日情緒，中國人就會團結一致。他不需要理由，藉口他可以自己想。中國人已經相信，他們有權向日本討回公道。有智慧的鄧小平為了追求經濟發展，曾同意把釣魚台的爭議留待將來解決。江澤民卻有可能為了強化自己的歷史地位，與日本重啟爭端。那會是個很容易做的決定，只要他以為日本的自衛能力不佳。北京領導人相信人民會歡迎戰爭，因此啟動下一場危機時不必顧慮太多。不管是無心之過，還是刻意設計，下一

場危機都很可能會引爆兩岸衝突。如果衝突演變成戰爭，那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後一戰。

2000年5月，一位中國記者寫道：「我們需要一場戰爭，但是必敗無疑，而且會摧毀現在這個王朝的信心。」如果戰爭現在爆發，中國不僅會輸，而且將付出高昂代價。一位台北市民說：「對共產黨領導人而言，損失一萬名甚或十萬名士兵不算什麼，他們把人命看得一文不值。」解放軍在韓戰時傷亡慘重，但共產黨完全不當一回事，對於未來可能死傷更多的戰爭，他們的心態大概也不會改變。北京領導人會大談軍人捨身報國的榮耀，不過王傳寧可不這麼想，如果他的傑森在這場錯誤的戰爭充當炮灰，王傳寧與悲憤的親戚也許還不致於立刻走上街頭，但是民眾會普遍對共產黨的領導能力失去信心，到了那個時候，中國人民將開始要求統治自己的權力。

今天，在世紀之交的中國，異議人士的力量分散而微弱，牢騷怨憤雖然所在多有，但缺乏共同目標，因此當局還能勉強應付此起彼伏的事件。但是當敵人開始進行全國性的組織串聯，各個團體聲氣相通，就像法輪功信徒的作法一樣，那時中央政府將遭遇重大威脅。

當共產黨政權輸掉戰爭，慘重的傷亡或者無法取勝的事實將引發人民共同的不滿。北京當局雖然盡力而為，但還是無法封鎖消息。當局嚴格箝制本國電視台，隨時可以切斷CNN等外國頻道，但是不可能做到滴水不漏。現在有無數家庭私自安裝非法的衛星天線，當局防堵外國電視節目的努力已經出現漏洞。此外還有網際網路，中國如果想封鎖外國消息傳入，就必須關閉中國互聯網通往外

界的四個開道 (gateway)。回顧當年電視報導對越戰美國軍事行動的影響，再想像一下，一旦解放軍在戰爭中失利，網際網路會對中國民眾產生多大的衝擊。

就算北京全面封鎖外國新聞，還有一種情況比消息過多更糟糕：消息不足。當可靠的消息少之又少，謠言就會應運而生。謠言不必反映現實，只要能散播開來就夠了。近年來網際網路成了散播謠言的主要管道，因此不僅外國新聞具有顛覆性，在中國四處流竄的謠言、小道消息與虛構故事也同樣危險。當人民發現真相，並體認到彼此間有共同奮鬥的目標，一黨專政的獨裁政權將無法硬撐下去。南斯拉夫、菲律賓、秘魯，這幾個國家有何共通點？當人民齊心協力，政府會立即垮台。如果中國在戰爭中落敗，它將步上這幾個國家的後塵。

一旦中國被擊敗，會發生什麼事？首先北京的學生會再度走上天安門廣場，這是他們自1919年五四運動以來不斷重演的舉動。五四之後70年的1989年，示威者必須穿過公安在每個路口的封堵，才能向南抵達廣場。但等到戰爭失敗，沒有多少人會想擋住示威者的去路。公安還是會接到阻止群眾的命令，但是根本寡不敵眾。示威活動將完全是自發性的，令當局無從防備。此外也有許多公安會同情學生的訴求。當人群一路由北而南向北京市中心挺進，他們的信心會水漲船高，呼口號的聲音也會越來越洪亮。

「你如果不能當改變的催化劑，就會淪為改變的犧牲者。」這是投資公司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銀行 (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 的廣告詞。中國共產黨自創建以來，有很長一段時間扮演催化劑的角色，尤其是在1989年以前；然而如今它將淪為犧牲者。黨的決策過

程強調共識，就算在緊急時刻，也經常延誤時機。1989年時，群眾佔領天安門廣場數星期之久，黨的領導人卻隔岸觀火、爭議不休。戰爭之後，同樣的歷程將再度上演，而黨在高層權力轉移時期形成的分裂，會使問題更形惡化。

北京的示威者才是這場改變的催化劑，不過他們也有可能淪為犧牲者，至少有些人會巴不得情勢急轉直下。恐懼憂慮的氣氛高漲，大家擔心軍警隨時都會出動。塔蒂雅娜·普麗荷珊 (Tatiana Prikhozhan) 與其他莫斯科市民在1991年挺身而出，走上街頭，捍衛葉爾辛總統對抗死硬派份子的政變，她說：「我們手牽手，在一片死寂中等待坦克來臨。」中國人民知道政府可能不惜動用坦克，也會在寂靜中等待。但是解放軍不會出現。只要中央政府拿得出任何辦法，就可望像過去無數次一樣撐過難關，不論是和平手段或強硬鎮壓都能奏效。但是政治僵局卻使政治局常委會動彈不得。沒有人能夠鞏固自身地位，因為黨內派系四分五裂，有積極的改革派人士、殘餘的毛派份子，以及一心只想奪權的野心家。因此導致的猶豫不決會使中央政府陷入癱瘓，沒有任何團體能在亂局中樹立權威。中國發展出全世界最複雜精密的群眾操縱控制，不過屆時這個體制已無法運作，它已經搞不清楚誰才是它的主子。

在一天之內，數以萬計北京居民就會加入示威者的行列，消息四處傳播，廣場上的人數持續膨脹。1989年春天，當局想盡辦法封鎖天安門示威活動的消息，但是傳真機突破了封鎖線。消息還跨越國界，在北京與香港之間以傳真方式輸送，同時也在國內各地散播，逃過官方媒體的檢查。但是當時傳真機還不夠普遍，消息通常是片斷而模糊。挫敗之後，在內部連結日益緊密的中國，北京發生

示威抗議的消息將透過網路留言板、聊天室迅速散播，全國各地的街頭會風起雲湧。私營網站的檢查人員「聊天室媽媽」會盡力刪除顛覆性的言論，等到訊息排山倒海而來，這種自我檢查制度勢必瓦解。異議團體本身雖然力量有限，不過卻能組織串聯其他自發性的示威活動。在過去一些案例中，示威者甚至利用國企新建立的網路連線來指揮抗議活動。中國異議份子運用電子通訊的威力，是由法輪功信徒開風氣之先，其他組織也會起而效尤。

朱鎔基總理在1999年針對示威抗議運動表示：「我們絕不會以過份簡化或粗糙的方法，反而使問題變本加厲。我們應該儘量少用專斷的手法來對付人民。」這是明智的建議，但是隨著群眾持續湧入天安門廣場，焦慮的高層幹部越來越難掌控情勢，無論他們採行何種策略，這一回都大勢不妙。中共領導人最後會決定動員人民武警肅清天安門。過去政府對付個別抗議者或小團體都不費吹灰之力，然而這回群眾數目實在太過龐大，而且會抵抗武警與公安，誰都無法搖撼他們的決心。武警在幾度敷衍嘗試之後，終於放棄並撤退。這時中國人民共同的心聲就是：血已經流得夠多了。馬克思說過，抗拒不可逆進的歷史潮流，終將徒勞無功。

1989年北京之春事件中，最撼動人心的畫面可能就是周永君與另外兩名學生跪在人民大會堂的台階上，向一個充耳不聞的政府請願。多年後周永君回憶道：「我百感交集，站了起來無聲地哭泣著。」他們跪了將近一個小時，沒有任何人出面接受請願。不過在台灣海峽的慘敗之後，中國人民不會再逆來順受。他們知道事態發展已經超出高層領導的掌握，也知道這個政權來日無多。

示威者會察覺到共產黨落居下風。官方媒體不再有中南海領導人的指示可依循，只能呼籲人民趕快回家，努力鞏固社會主義，但這些空話毫無號召力可言。直到某個老人在共產黨高層佔上風之前，當局只有空洞的聲明可以運用。此時正是危急存亡之秋，向來擺出充滿自信姿態的共產黨，如今卻顯得群龍無首、領導無方。

沒有解放軍的支援，黨不可能驅散示威群眾，但是對於是否要出動軍隊，高層領導人無法達成共識。沒有人想要繼承李鵬「北京屠夫」的衣鉢，他在1989年天安門廣場大屠殺之後惡名昭彰。政治局常委會最具自覺的成員將會體認到：武力鎮壓已經行不通，因為今日的中國必須倚賴外在世界購買產品、進行投資、分享科技、提供低成本貸款。《時代》雜誌曾說中國是全球化歷程最大的受害者，但這個頭銜送給中國共產黨或許更加適合。黨已經知道，與外在世界來往雖然可以得到好處，但也要付出代價。北京的領導人終將認清，現在中國經濟有賴於外國人士的善意，但外國人士無法與一個野蠻殘暴的政權作交易。

天安門廣場上，民眾剛開始示威時需要鼓舞激動，但一時間還不會有領袖人物出現。群眾無法治理國家，甚至對自身的定位也爭執不休，唯一能確定的就是自身要抗衡的對象。如果黨的領導人與無組織的暴民長期抗戰，或是出動軍隊肅清廣場，也許還有一絲勝算，但是他們沒有機會決定自己未來的去向。

民主政治有時仍需要強人，他或者她會在緊要關頭現身。1989年5月中旬，中共總書記趙紫陽親赴天安門廣場，雖然他十分同情學生與其盟友，但是無法棄絕共產黨轉而領導革命。下一回現身的領袖將更為大膽激進，他不必許下多少承諾，可能只需保證在一年內

舉行選舉制憲會議代表的大選。對一個領導階層缺乏治國經驗的運動而言，這樣反而比較好。數百萬群眾在一位領袖引導下，浩浩蕩蕩通過長安大街，直抵中南海。1989年12月，在半個地球外的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Bucharest）的群眾親眼看到獨裁者尼可萊·希奧塞古（Nicolae Ceausescu）乘直升機逃出共產黨總部。回到中國，示威大軍不必等到通過中南海大門就已獲得勝利。群眾體現了中國兵學家孫子所說的：「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同樣的事曾發生在柏林與布加勒斯特，北京很快也會步上後塵，中國人民將收回自己的政府。

貪腐衰敗——混亂——撥亂反正

如果沒有戰爭，還有沒有別的因素會讓共產黨垮台？作家戴晴說：「貪污問題比任何事情更令中國人民憤怒，也是我們社會面臨的最大威脅。但問題是：對抗貪污的行動如何才不致於連帶摧毀共產黨？」任何政權到了末日都會出現貪污猖獗的現象，中國尤其嚴重。退伍軍人朱正元（音譯）寫道：「我對貪贓枉法的官吏恨入骨髓，我別無辦法，只能以死來捍衛國家法律。」他在2000年1月登上北京市中心一幢大樓頂端，向地面圍觀的群眾拋撒小冊子。朱正元在家鄉被拘禁他的公安毆打，已經不良於行，他威脅要跳樓自殺，但後來還是被公安抓走。如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滅亡揭開序幕的事件不是戰爭，也許就是人民對貪污的反抗。

朱正元的行動只是個人的抗議，然而中國人民有時候會數以百計走上街頭，抗議政府官員的貪污瀆職。2000年12月，河南省洛陽市就發生這樣一件案例。洛陽市東都商廈的一場大火燒死、噎死了

309人，死者大部份葬身於商廈中一家違法經營的舞廳。多年來地方當局都知道這家舞廳的存在，也很清楚那是省內最可怕的火災陷阱之一，但是當局沒有採取行動，因為舞廳業主受到地方官員的包庇。因此慘劇過後，約有四百多人走上街頭，在同樣四百多名旁觀者的注視下，抗議地方政府的傲慢與貪污。

共產黨的內部監察機關每年要處理數千件幹部瀆職案，但做的顯然還不夠，黨從上到下是百孔千瘡。高層幹部搜括數以百萬甚至千萬的贓款，然而小規模的貪污對黨的威脅更嚴重，因為那是人民每天目見耳聞的現象。像杜明祥之流的地方幹部可以為所欲為，甚至拿公家的錢喝酒喝到醉死。杜明祥是雲南省永善縣的鄉鎮企業局局長，2000年7月11日，他在強化黨內紀律的政法工作會之後，與幾名幹部到縣城飲酒作樂，一行人從下午喝到晚上，花費是這個窮縣四戶人家一年的收入，而且他們花用的是公款。杜明祥因為飲酒過量，那天深夜橫死在他最常去的杏花村酒店中。隔天早上，他的親屬要求酒家老闆賠償8萬元人民幣，才肯將屍體運走。酒店老闆先付了三千元，寫了一張借據放在縣府公安局副局長那邊，承諾第二天再交付餘款。酒店老闆其實拿不出這麼多錢，老闆娘因為無法承受壓力而服毒自殺。在中國各地鄉間，許多地方幹部與其親屬就是這樣作威作福，看在眼裡的民眾則是怒火中燒。

因此江澤民將肅貪反腐列入施政優先課題，不過他親友的貪污要另當別論。2000年9月，江澤民下令處決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克杰，罪名正是收受賄賂。成克杰曾任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主席，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史以來處決的最高層級官員。

儘管共產黨不惜動用極刑對付自己人，但是在這場反貪污戰爭

中仍然註定要失敗。官員盜用公款、巧取豪奪的事例實在太多，有些人認為這是中國人的民族性，並且怪罪到孔子頭上。孔子強調家族忠誠甚於公眾福祉的觀點或許有不當，然而今日中國的貪污現象還是要歸咎共產黨，因為它縱容貪污在社會上猖獗橫行。

黨的反貪污行動效果適得其反，因為反而加強了人民憤世疾俗的心態。近幾年來盛行的「公審」方式，坐實了民眾認定貪污無所不在的普遍信念，這也正是黨最擔心的公眾效應。更糟的是，一連串公審讓人民認為黨無力克制貪污。成克杰案顯然有意昭示社會：領導高層不能自外於法律。中國日報2000年8月1日的頭條標題就是：「嚴刑峻法顯現國家懲罰貪污的決心」。但是社會上的升斗小民卻另有看法，南華早報訪問的一位北京計程車司機說：「成克杰被逮到是因為他在北京的後台不夠硬，他應該把北京領導人或他們的子女牽扯進來。」民眾都很清楚，中國的司法審判仍然充滿政治意味。

民眾也知道黨還無法真正面對貪污。人民日報引述一位北京的法學教授說：「改進法律體系有助於避免出現第二個成克杰。」但是中國有數以萬計的成克杰，有的是大頭目，有的是小喽囉。如果黨不能面對真相，必定遭致失敗，這也是為什麼民眾要開始自救救濟。民眾這麼做是違法亂紀，因為領導行動向來是共黨幹部的專利。黨只要能控制政權，它可以推動任何計畫，但唯一不能容許的就是讓平民百姓當家作主。領導們高談反貪污，不過那只是表面文章，他們最關心的還是政權的穩定與否。因此，北京對於反貪污運動人士和貪污幹部一視同仁，不時祭出極刑處份。在高層領導人看來，兩者同樣會威脅公眾秩序。

共產黨不希望任何人公然表達不滿，無論其用意有多良善。1999年，北京當局將一位聲望崇高的檢察官派往福建廈門，調查一樁走私案醜聞，第二年更加派一千多名調查人員。中央政府全力防範消息外洩，但卻徒勞無功，非官方網站大肆報導這樁大規模貪污案。消息快速散播使黨中央勃然大怒，因此又對網際網路展開新一波鎮壓。

江澤民大可再處決一百名甚至一千名高層幹部，但是除非他開始起訴自己的親信，否則肅貪反腐運動的勝利仍然遙遙無期。因為這場運動已經轉變為爭取中國人民的感情與理智，他們深知囚禁政敵與反貪污沒有多大關係，逮捕行動不過是另一場權力鬥爭。更有甚者，將政敵送入牢獄的手法，讓人回想起大部份中國人寧可遺忘的毛澤東時代。不幸的是，中國現今的領導的不可能放手讓法律公正執行，江澤民總是對那些犯錯但效忠於他的幹部網開一面。在2002年到2003年的政權轉移時期，江澤民為了保住權力必須爭取黨內大老的支持，他不會讓肅貪反腐行動阻礙他個人的野心。再往後幾年情勢也不樂觀，因為江澤民的接班人無論是何方神聖，都必須鞏固自己在黨內的地位。新領導人會有很長一段時間投鼠忌器，不可能坐視自己的支持者受牢獄之災。

隨著黨無法克制貪污的態勢日趨明顯，懷抱理想的中國人將會挺身而出，延續歷代先賢的傳統。中國農曆五月的端午節就是要紀念戰國時代的詩人屈原，他原本是楚國官員，因愛國憂民而在西元前278年投水自殺。今天的示威者或許還不致於走上絕路，但國家當局卻可能將他們逼上梁山。共產黨如果繼續打壓肅貪反腐運動人士，自身也將陷入險境。貪污是今日中國最具爆炸性的議題，但是

當局對付肅貪反腐運動人士的行動可能更具危險性。每當幹部採取這類行動，他們就是與民意人心背道而馳。

其實共產黨也不想落到這個地步，重蹈蔣介石的覆轍。當年的蔣介石還有台灣可以落腳，但今天共黨幹部已經無處可逃，不過他們還是要鋌而走險，一心要打擊那些想肅清貪官污吏的人們，農民便是打擊對象之一。2000年8月，大約兩萬名江西省的農民發動示威，抗議稅制不公、地方官員濫用公款。江西的騷亂迅速散播，就好像所有村鎮被同時引爆，當局被迫派諸武力強硬鎮壓。現在怒火正在中國的窮鄉僻壤閃爍，農民只欠缺一位領袖來帶領他們壯大威軍。中國歷史上不時有強人崛起，總有一天強人會再度出現。

也許這一天很快就會來到，因為中國即將加入WTO。在中國的各個階層中，全球化歷程對於農民的衝擊最為嚴重。雖然目前在鄉村還看不出情勢會惡化到何種地步，但我們很清楚：中國農民無法與美國中西部或加州聖瓦金河谷（San Joaquin Valley）那些企業化經營的農民（corporate farmers）競爭。經濟衰頹帶來絕望，貪污猖獗引燃怒火，當兩者結合起來，革命動亂將不會只是蔓延村鎮，而是擴散到各個省份；參與者也不再是成百上千，而是成千上萬。國家有武裝部隊，農民手無寸鐵，不過這回佔上風的未必是武力。誰願意阻擋一股在鄉間深受支持的運動？如果省長聞風喪膽，或者軍官不願開火，革命以爆炸的態勢開展，國家的武力將兵敗如山倒。毛澤東說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未來的中國就會出現這幅景象，只不過整個鄉村地區將是同時引爆革命之火。毛澤東告誡過我們：沒有任何事物能夠阻擋人民的前進。

毛澤東也說過要以鄉村包圍城市，不過這一次中國的結局並非

如此。等到對官員憤憤不平的工人也揭竿而起，鄉村革命將與城市動亂結合。這時可能還不會出現單一的領導者與政府對決，而是群雄並起，各領風騷。今日解放軍與人民武警要對付國內任何敵對力量都綽綽有餘，但有朝一日，當所有敵對力量同時發動，解放軍與武警勢必無力應付。隨著中國各地秩序解體，許多團體都會把握時機，工人將接管工廠，城鎮將割據自立。

分離主義者也會開始行動，藏族、維吾爾人、台灣人都將伺機脫離中國。陳水扁贏得2000年大選之後說：「兩岸人民都很有耐心。」他的耐心將獲得報償。在中國動蕩不安期間，台灣會正式以「台灣共和國」之名宣布獨立。國際社會將承認台灣是個「新」國家，而分身乏術的北京領導人只能在一旁坐視。未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其說是崩潰，不如說是先分裂解體，再徹底毀滅。

魏京生說過，破舊才能立新。不斷被貪污腐蝕的中國共產黨，現在仍勉強維持局面，但它只是苟延殘喘。有朝一日，新局面將取代貪污腐化的舊勢力，中國將再度展開重建之路。

老北京中的新左派

農民積怨難平，北京當局除了原有的心腹大患之外，現在又多了一個燙手山芋，對黨的領導形成嚴酷挑戰；他們原本以為只有都市的無產階級才有能力顛覆政權。北京努力討好城市工人，認定黨的穩定性決定於工人生活的榮景。為了維持榮景，領導者對於經濟病灶的心態一直是無限期拖延，這種情形在過去五年中特別嚴重。日積月累之後，病灶日益惡化。例如國企的問題，不但強迫轉嫁到銀行身上，而且在企業股票上市賣給國內外投資者之後，股票市場

也必須共同承擔問題。

中國入世已拖到不能再拖了，對鄉村與城市而言都是如此。中央官僚與地方幹部過去大肆抱怨入世的隱憂，然而正如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所說：「過去人們總一再喊著狼來了，但這一次狼真的來了。」在2002年到2003年的權力轉移尚未展開之際，中國政府已經為了入世問題出現分裂。批判WTO基力的「新左派」認為入世的弊遠大於利；長期來看，這種觀點是錯誤的；不過短期而言，新左派不幸而言中。入世將撼動中國的經濟，引發的問題會比帶來的利益更為顯著。一如各界先前的預測，國企倒閉的風潮將不會是幾千家，而是幾萬家。屆時政府資金短絀，又受制於WTO的法規，只能眼睜睜看著國企崩潰。

情勢惡劣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因為中央政府技術官僚為了推行危險的「致富效應」政策來振興經濟，已經將無數民眾送進股市。深圳與上海這兩個新興金融中心，已經有大約1100家企業股票上市。儘管中國股市運作有10年經驗，主管官員還是無法有效監督市場，負責執法的調查人員也只有24人。中國衰弱的司法體系不能保障投資者，中央政府的審計官員也應接不暇。貓不在，老鼠就作怪，這正是中國股市千奇百怪的寫照。當個人致富被貼上愛國的標籤，法律執行又績效不彰，散戶投資人經常淪為中國新經濟秩序的犧牲品。

中國的股市已經爛到底，連賭場都不如。另一位中國頂尖經濟學者吳敬琏說：「賭場裡面也有規矩，比如你不能看別人的牌。」股市犯罪從上海的三溫暖澡堂開始，在那裡由於大家祖裡相見，身上不能暗藏任何竊聽裝置，談論各種非法炒做股價計畫都不會留下

罪證，更從來沒有人敢出面指證。在這最骯髒行業中最古老的伎倆就是：買下低價位的股票，以空穴來風的樂觀預測來哄抬股價，然後在市場高點殺出手中持股。在上海浦東那些令我父親聽羨的輝煌大樓中，股票經紀商幹的就是這類勾當。

什麼事件會引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崩潰？也許就是某個股票經紀商操縱股價的勾當出了大差錯，東窗事發，使憤怒的投資者走上街頭。這並非危言聳聽。無論在任何時刻，中國股市中都有約30%的股票受到人為操縱。不過最大的危險來自於股價操縱者的龍頭老大：中央政府。北京當局一直在上海與深圳股市出脫國企的少數持股，為了達到目的，當局必須將股價維持在高檔。

問題是：許多已上市的國企經營不善，而且有可能將整個市場拖下水。河南省鄭州市經營連鎖百貨業的「鄭州百文集團」就是一個顯例。鄭州百文在1996年偽造營收數字，在上海股票上市，後來又用同樣手法謊報獲利。但這些伎倆無濟於事，鄭州百文終於爆出中國股市歷史上金額最大的年度虧損：9億6000萬人民幣。鄭州百文野心過大，擴張速度太快，被沉重的債務壓垮，並在2000年3月成為中國歷來第一家聲請破產的股票上市公司。但是後來鄭州市、河南省與中央政府卻合力上演一齣荒謬劇，努力讓這家奄奄一息的公司維持一線生機。鄭州百文聲請破產後，股價甚至還一路攀升，因為官方媒體封鎖消息，以便哄抬股價。鄭州百文的股價在一個月內上漲了31%。

鄭州百文的員工張立說：「我們只能聽天由命。」員工能順從天意固然很好，但12萬名血本無歸的股東也會逆來順受嗎？中央政府與地方官員未能及早查出弊端，使這些股東都成為詐欺案的受害

者。那些在鄭州百文破產後才買進的股東，更是因為政府操縱股價的舉動而陷入險境。因此在2000年底，各方會商出複雜的解決方案，要鄭州百文最大的債權人勾消超過15億人民幣的債務，相當於鄭州百文負債的75%。這項計畫原意是要恢復國內證券市場的信心，但適得其反。改革派人士大力抨擊，中央政府於2001年3月知難而退，承諾讓鄭州百文下市。現在證監會官員聲稱，股市必須清理門戶，讓問題嚴重的公司下市。但真相卻是：北京高層寧可回歸「老辦法」以確保局勢穩定。在中國買賣股票的人約有三分之一是被解雇（下崗）的工人，因此股市先天就有極大風險。一位高階證券業主管官員表示，中央政府擔心，如果他們對垮台的公司見死不救，投資人會走上街頭，造成社會不安。

實例已經出現，1992年深圳就發生了數萬人的暴動。當年股市的規模還很小，但是現在隨著市場規模擴大，騷亂的可能性也與日俱增。中國人民還不熟悉金融市場的風險觀念。在毛澤東時代，中國人民將錢存進國有銀行，而銀行就像國家本身一樣穩如泰山。改革為人民帶來其他的選擇——非政府經營的集資公司。每當這類公司出問題，政府就會趕來救援存款戶，維繫社會的穩定。現在當局又鼓勵人民為國家的未來投資，在公開市場買進國企的股票。到目前為止，官員還能夠以各種方式協助投資者，但是他們不可能拯救所有問題叢生的企業。再過不久，當局就必須將問題公司下市，讓它們自生自滅。幾家股票上市公司垮台，中國還承受得起，但如果多達100家，恐怕就會吃不消。今天中國至少有100家上市公司岌岌可危，加入WTO之後會拖垮更多企業。不要指望公開市場的紀律會有助於企業改革，中國的股票交易雖然有十年歷史，但仍然「很不

規矩」。中央政府為了能在股市賣掉更多國企股票，不斷延宕真正的改革。因此我們還會看到其他企業倒閉，而且是接二連三的發生。未來會有某一件倒閉案惹出大麻煩，北京當局將無法控制事態發展。今後數年中風險尤其高，因為散戶投資人仍然期待政府伸出援手。

電子商務公司「數位島」(Digital Island)的廣告說：「革命不會上電視。」事實上，當大城市的某家大企業倒閉時，上電視恐怕勢所難免。如果有員工或股東發動示威，任何人只要拿起一部小型數位錄影機就可以記錄下整個事件，甚至散布到全世界。現在中國發生示威之後，外在世界通常要過幾天或幾個月，才能透過「香港人權與民主信息中心」得知消息。隨著科技的進步，我們能夠在電視或網路上即時看到事件發展。當全世界親眼見證中國公安痛毆示威者，血濺街頭，將會產生立即而且強烈的反應。金融市場的資金向來極為敏感，只要當局開始殘暴鎮壓，外國投資者會立刻撤離中國股市。當鎮壓的畫面不斷湧入股票交易者的電腦終端機，原本就不穩定的中國股市將更劇烈震盪。倫敦、紐約、香港、東京等金融中心也會有相同反應：專業基金經理人會從中國撤資。電視的力量比任何國家都強大，連中國也不是對手。

當外資大舉拋售中國企業的股票，本國投資人也會跟進，他們一旦血本無歸，勢必發動示威抗議。如果示威者因此取回資金，其他民眾也會有樣學樣，走上街頭。滿天謠言或許都偏離事實，但真實性已無關緊要，網際網路迅速將小道消息散布到全中國，而民眾什麼都會相信。在過去，政府化解經濟問題示威的方法是花錢消災，發給示威者積欠工資、退休金或存款。然而將來這套策略會走

進死胡同，因為街上的示威者多如牛毛，當局既沒有時間也沒有錢來收買這些示威者，他們都是50多年來中國經濟失調的受害者。

當中央政府無法拯救上市公司的情勢逐漸明朗，民眾會開始連帶懷疑銀行是否可靠。現在專家認為中國的銀行雖有償債困難，但仍相當穩定，因為民眾的存款源源不絕而來。這些專家應該明白，銀行是建立在信心之上，而民眾對償債困難金融機構的信心非常脆弱。近年來爆發的數起銀行擠兌，都是起因於在城鎮間快速散播的謠言。民眾緊張不安，一有個風吹草動就會引發恐慌；而且到目前為止，導火線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最諷刺的是，引發擠兌最合理的原因——四大銀行償債困難並擴散至整個銀行體系——目前還不是眾多投資者的顧慮，他們基本上都信任政府與政府的金融機構。當情勢惡化，這種信任感也將搖搖欲墜，引發更大規模的擠兌。沒有任何銀行體系能承受大規模擠兌，在社會全面解體時尤其是如此。此時中共必須關閉銀行，期望軍警能抵擋心急如焚的存款戶。然而等到全國都陷入恐慌，政府將會被失去信心的人民徹底擊潰。

全中國各類運動人士都將把握這歷史性時刻。今日的異議人士各自為政，力量薄弱；但是如果能夠與憤怒的人民連成一氣，他們將功力大增。北京領導人會高度戒備，但個人野心、意識形態等因素會使領導階層四分五裂。當加入WTO被歸咎為秩序解體的罪魁禍首，新左派與殘餘的毛澤東主義者結合後可能會壯大起來。特別是在權力從第三代領導人轉移至第四代領導班子的過渡時期，共產黨會因為意識形態搖搖不定，無法決定如何對付異議人士。有些領導人會認為民眾的激情最終將消褪，嚴厲鎮壓反而會摧毀中共殘餘的民

意支持。其他領導人則要求厲行傳統的強硬措施。猶豫不決的政黨會失敗，拖延時日最後將導致中共的垮台。

前蘇聯國安會（KGB）首腦克魯契可夫（Vladimir Kruichkov）回憶1991年他參與策畫的失敗政變：「我們並不是殘暴嗜血，也不打算為掌權而不惜一切代價。」等到中南海決定要為捍衛中央政府付出代價，恐怕為時已晚。全國各地的解放軍部隊會接到動員命令，但部隊人數可能不足以應付危機。在當時的情勢下，一般官兵不會想動手屠殺平民百姓。1989年天安門事件時，鄧小平調進北京的第一批部隊就不願意鎮壓學生，後來他們被撤走，換上一批更強悍的部隊。但是日後，中共政權將很難再找到願意攻擊無武裝平民的部隊。當士兵拒絕開火時，四面楚歌的政府也無法生存。

毛澤東已經不是中國的鋒頭人物，不過他曾經預言全國性鬥爭的情景：「力量小的，同人民聯繫的，強；力量大的，反人民的，弱。」因此共產政權的結局現在就可以預知，無數民眾將聯合起來對抗北京的幹部。今天有些人還很難想像中華人民共和國會有覆亡的一天，但我們要記得托洛斯基（Leon Trotsky）說過的：「當情勢進行到無可避免的階段，革命才會發生。」

中國人有句老話：「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在一個有無數諺語的國度中，這一則諺語特別真切。每逢一段歷史時代即將落幕，任何事都有可能發生。最無足輕重的事件，如果發生在錯誤的時間或地點，也有可能讓一個政府垮台。

這類事件也不必發生多少樁，捷克總統哈維爾描述1989年革命前山雨欲來的捷克：「社會充斥著各種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一顆雪球就可能引發一場雪崩。」在今日的中國，許多人無法理解一黨

專政的體制怎麼可能崩潰，但是就如哈維爾的體會，表象是靠不住的。前一刻政府還屹立不搖、人民誓死擁戴，下一刻政府就土崩魚爛、人民歡欣鼓舞；這是每一個獨裁者的夢魘。江澤民每天醒來時，他最擔心的問題是什麼？有人說他擔心如何餵飽中國人民。也許如此，不過更可能的是，江澤民早上醒來，最擔心的的是到了晚上就寢時，他是還還是中國人民的領導者！

而且江澤民的確有理由擔心，因為中國的統治者都會自欺欺人。中國第一位皇帝秦始皇曾昭告天下：「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然而他的帝系只傳了二世，秦朝在他死後兩年滅亡。秦始皇的遭遇告訴世人，極權統治者可以壓制人民，但是他們永遠無法了解人民的想法。今日中國依然是如此，因為中央領導的模式基本上並未改變。

中國政治史有一點從未改變，只是江澤民與其他北京領導一直不肯面對，但台灣的陳水扁倒是說中了：「一個政黨再怎麼努力，也不可能永遠掌權。」

自食惡果

過去日本人一度看似會永遠統治中國，他們佔領東北並建立滿洲國，攻下中國東半壁，戰機掠過西南內陸的昆明。我父親永遠記得1941年12月8日那一天，幾個小時前，從航空母艦起飛的日本戰機劃破夏威夷清晨的寧靜，偷襲珍珠港與惠勒機場（Wheeler Field）。在國際換日線的這一邊，日本戰機飛行員在昆明上空與著名的飛虎隊激戰。那天晚上，炸彈在城東落下，我父親連忙跳入灌溉溝渠中躲避。中國又像以往一樣，再度受到外國攻擊。

日本人終於被逐出中國，而我的父親至今仍無法原諒他們。但日本人其實不是中國真正的敵人。抗戰結束之後，中國隨即發動內戰，共產黨對抗國民黨。中國人就是無法和平共處，這在歷史上已是屢見不鮮。今日中國人願意和平共處，但前提是必須先掙脫將他們綁綁在一起的力量。中國現在的統治者雖然是中國人，但卻違逆人民的期望。

未來的中國會發生什麼事？在北京西區的中華世紀壇，262塊青銅板訴說著中國人的歷史，但是並沒有暗示中國的未來。最後一塊青銅板上面沒有刻字，要留給後代子孫記述。王傳寧也無法預知祖國的未來，每當碰到無法回答的問題，他總是一句老話：「很難說。」

王傳寧名字的意思是「傳播安寧」，他也很希望能這麼做。但是當我們放眼中國的未來，安寧成爲一種奢求。所有19與20世紀的鬥爭、動亂都只是21世紀的前奏。中國人在力圖恢復往日榮光、尋找未來出路的時候，遭遇太多未解決的問題。但王傳寧知道一件事：中國人不能怪罪別人。他思索著日後不確定的情勢，說道：「我們是自食惡果。」因為有這些不確定，王傳寧十分擔心返回北京後家人的遭遇，尤其是擔心他的兒子傑森。

我們還知道一件事：中國共產黨半世紀來的統治已經宣告失敗，走上窮途末路，將來中華世紀壇最後一塊青銅板上會刻下這段史實。當中華人民共和國覆亡，王傳寧不確定新領導者會不會比舊領導人來得好，但是他知道：至少傑森會擁有希望。

尾聲

中國分崩離析

思想家策劃革命，強盜實行革命。

——馬里亞諾·阿蘇埃拉 (Mariano Azuela)

四聲幾乎同時響起的爆炸，震撼了河北省石家莊市的住宅區。石家莊位於北京西南方約170哩，是一座日漸衰微的工業城。數百人在睡夢中死於這場爆炸案，有的是整家人慘死，爆炸威力最強的一幢五層公寓——棉紡三廠的宿舍，災情也最為嚴重。6歲的石元元原本住在那裡，現在已被送進醫院，情況危急。石元元的身體被炸得焦黑一片，但她是少數幸運生還者之一，她的父母親都在那天晚上罹難。

石家莊爆炸案發生在2001年3月16日，士兵戴著閃亮的綠色鋼盔，在成噸的瓦礫堆中拚命搜尋生還者，國營媒體播出的這幅畫面

似曾相識，因為十天之前，江西省萬載縣芳林村的芳林小學，另一場爆炸案奪走了四十一名學童與老師的性命。芳林村的事件是意外，但石家莊絕對不是。當地一連串的爆炸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駭人的恐怖活動。

對於芳林村事件，地方政府指稱一名精神病患李垂才是嫌犯，他拿了兩袋爆竹意圖炸毀整間學校，不過沒有什麼人相信這套說法。當地村民說出真相：芳林小學的學童被迫在教室裡做爆竹加工，不慎引燃附近的火藥桶。在石家莊，幹部很快就鎖定一名聾人靳如超涉案，他原本就因涉嫌殺害女友而遭到通緝。官方在一個星期內連審連結，宣稱靳如超在被捕後幾個小時就「坦承所有罪狀」，但他不可能只憑一己之力就以專業手法安放3300磅的炸藥。石家莊爆炸案顯然是一群專業人士所為，但當地共黨幹部和芳林村的幹部一樣，不敢承認事實，只能找尋代罪羔羊。他們捏造案情，過濾消息，並將當地社會與外界隔絕。

石家莊居民糧食不足，失業率遽升，部份居民因此認定爆炸案是失業者在搞破壞。有些人則歸咎前任市長張二辰，他在爆炸案前六天因為侵佔公款而遭起訴，許多市民相信爆炸案是張二辰的黨羽試圖顛覆市政府，破壞肅貪反腐行動。石家莊市民至今仍不知道到底是誰安放炸藥，可能永遠都沒有答案。但有一件事可以確定：石家莊的社會結構已經崩解。3月16日的爆炸案並不是震撼石家莊的第一樁，在前一年有一名青年農民遭處決，罪名是在公共場所引爆五枚炸彈。顯然嚴刑峻法未能奏效，石家莊依然動蕩不安。

整個中國都是如此。共產黨過去20年來努力跟上時代巨變，但

現在敗象已露，因為它經常無法充份供應人民基本生活所需。從小村莊到大城市，貪污瀆職腐蝕了民眾對黨的支持。50年來建立的體制搖搖欲墜，中央政府領導人一籌莫展。社會秩序日益解體，中國人民正在向未來挺進，心懷不滿者開始發聲，共黨幹部仍舊訴諸鎮壓，但最終徒勞無功。人民已經展開行動，他們的如願以償只是時間問題。

「思想家策劃革命，強盜實行革命。」墨西哥作家馬里亞諾·阿蘇埃拉（Mariano Azuela, 1873~1952）寫道。這兩句話在百年前的墨西哥或許有道理，在今日的中國則不然。中國人民的下一場革命不需要思想家策劃，而且強盜已經開始行動。

World's largest economy: See Yang Dong, "Carving Freedom for the World Economy," *Spirit of China*, November 1993. Available at: <http://www.spiritofchina.com/eng/engchina/engchina.htm> for an explanation of China's growth, see Jackson Haysom, "China's Growth Next on the US 100 Lis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ebruary 7, 2004, <http://www.scmp.com>.

China's economic growth: *China Daily*, "China's Growth Next on the US 100 List," February 7, 2004, <http://www.scmp.com>.

China's economic growth: "China Daily," *China Daily*, September 21, 2004, <http://www.scmp.com>.

China Daily: The name of the group commonly known as the Yellow Gang in the West. "China Daily" is the largest, independent news outlet, and through its efforts in the field of transparency, led by the group to an increased focus. <http://www.chinadaily.com.cn>. *China Daily*, "China Daily," 2004. Available at: <http://www.chinadaily.com.cn>. *China Daily*, "China Daily," 2004. Available at: <http://www.chinadaily.com.cn>. *China Daily*, "China Daily," 2004. Available at: <http://www.chinadaily.com.cn>.

參考資料

作者自序 完結篇

- world's largest economy: See Yang Zheng, "Carving Milestones for the Next Century," *WorldPaper Online*, November 1998 (available at www.worldpaper.com). For an optimistic analysis of China's growth, see Suzanne Harrison, "China Could Be Next to Hit US\$10 Trillio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ebruary 7, 2001, *Business Post*, p. 2.
- the only nation: Gerald Segal, "Does China Matter?,"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1999, p. 24.
- "world's sole superpower": "Quest for Dignity," *Asiaweek*, September 24, 1999, p. 40.
- Falun Gong: The name of the group commonly known as the Falun Gong is Falun Dafa; "Falun Gong" is the name of the physical exercises that practitioners engage in. For the sake of convenience, I refer to the group by its common name, Falun Gong.
- "profoundly important": Charlene Barshefsky, "USTR Briefing on the Trade Agreement Reached with China," released by the Office of the USTR, November 15, 1999.

第一章 請客吃飯 共產革命日薄西山

- For the Qing: Qing is pronounced "Ching."
- greatest famine in history: See "China's Chance," *Business China*, January 3, 2000, p. 1.
- anything but admit: The Party's failure to admit its shortcomings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s generally discussed in Jasper Becker, *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 (London: John Murray, 1996).
- fastest-growing economy in the world: Joseph Stiglitz, "Issue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Workshop on Issues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Tokyo, December 12, 1997.
- "vanguard production force": See Chapter 5.
- The Fifth Modernization: See Wei Jingsheng, "The Fifth Modernization: Democracy," in Wei Jingsheng, *The Courage to Stand Alone: Letters from Prison and Other Writings*, ed. and trans. Kristina M. Torgeson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1997), Appendix I.
- "I didn't really know": *Visions of China*, CNN *This Morning*, narr. Mike Chinoy, CNN International, September 16, 1999.
- "not a single person": Simon Beck, "No Protester Died in Tiananmen, Says Chi,"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ecember 12, 1996, p. 8. In other comments Chi admitted that soldiers had died that night. See Tom Rhodes, "General Denies 1989 Tiananmen Square Deaths," *Times* (London), December 11, 1996, p. 10.
- "Each time I did": Calum MacLeod and Lijia MacLeod, "Boom Times for Female Slave Trad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y 28, 2000, p. 11.
- "will explode": *Visions of China*, CNN *This Morning*, narr. Mike Chinoy, CNN International, September 16, 1999.
- "It is too horrible": *Born Under the Red Flag*, Ambrica Productions and WGBH Educational Foundation, 1997.
- "shouting the same slogan": *Born Under the Red Flag*.

第二章 點油之湖 民怨沸騰無以復加

- roughly pulls the old man up: "Falun Gong Arrests," *World News*, narr. Lisa Weaver, CNN International, February 5, 2000.
- Wang Yaoqing: "Hong Kong," *Inside Asia*, narr. Mike Chinoy, CNN International, January 14, 2001.
- "their bodies aflame": "Beijing," *Asia Tonight*, narr. Rebecca MacKinnon, CNN International, January 23, 2001.
- "symbol of protest": Willy Wo-Lap Lam,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to Part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ember 3, 1999, p. 9.
- "cannot change their hearts": Todd Crowell and David Hsieh, "The Crackdown," *Asiaweek*, August 6, 1999, p. 14.
- perhaps 30 million: See, e.g., Becker, *Hungry Ghosts*, pp. 266–274.
- "This Li Hongzhi": *Inside Asia*, narr. Rebecca MacKinnon, CNN International, January 8, 2000.
- that party was doomed: Beijing has not relented in its persecution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See "U.S. Legislators Demand Action on China Human Rights,"

- ssse, February 12, 2001. That party's founder, Xu Wenli, is currently serving a thirteen-year jail sentence for subversion.
- fewer than 5 million: "Popping the Investment Bubble: There May Be Fewer Than 5 Million Stockholders in China," China Online, May 25, 2000. Domestic media claim that there are about 61 million stock trading accounts. See "New Accounts," *China Daily*, March 23, 2001, p. 7.
- "more than 100 million": "Nation Respects Religious Freedom, Not Evil Cults," *China Daily*, February 20, 2001, p. 1. Beijing is apparently reluctant to publicize the growth in religious belief. Estimates remain vague, which has the effect of hiding the rising popularity of religion. Despite the apparent growth in believers, official pronouncements have used the 100 million statistic for some time.
- "believe in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Jaime A. FlorCruz and Joshua Cooper Ramo, "Inside China's Search for Its Soul," *Time Asia*, October 18, 1999, p. 22.
- fervently practice Falun Gong: An estimated one third of Falun Gong devotees are members of the Party. Melinda Liu and Katharina Hesse, "Crisis of Faith," *Newsweek*, November 8, 1999, p. 26.
- "China has achieved a great victory": William Kazer, "Lawmakers Lauded for Smashing Sec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ch 10, 2000, p. 10.
- "objective discussion": "China Frees Five Detained Christians, Activists," Reuters News Service, January 2, 2000.
- "They dragged me around": "Perspective," *Asian Edition*, narr. Rebecca MacKinnon, CNN International, January 11, 2000.
- the Party is not content: See, e.g., Josephine Ma, "Copycat Sects Purged as More Arrests Mad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ember 2, 1999, p. 8; Wang Nanfang, "Wuhan Smashes Falun Gong's Mutation, Cibeigong," *Changjiang Daily* (Wuhan), November 1, 1999, p. 1.
- even though they are more benign: See "Report: 600 Leaders of Banned Chinese Exercise Group Arrested," Associated Press Newswires, March 4, 2000.
- Uighurs: Uighurs is pronounced "Wee-gers."
- the white stick figure: *World News*, narr. Sanjay Singh, CNN International, February 5, 2000.
- "when the metal bird flies": Tim McGirk, "Just Right for the Part," *Time*, September 8, 1997, p. 39. Padmasambhava, an eighth-century Indian, had a similar vision: "when the iron bird flies and horses run on wheels, the Tibetan people will be scattered like ants across the earth." Dele Olojede, "The Living God of a Disappearing Land," *Hong Kong Standard*, December 7, 1999, p. 11.
- "Liberation from whom and what?": 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2nd ed. (New York: W.W. Norton, 1999), p. 500.
- in the hope: Less than a year after identifying Gyaincain Norbu as the true Panchen Lama, the boy, about seven at the time, was quoted by official Chinese media to have said, "With the help of international anti-China forces, the Dalai Lama has used his religious influence to plot for Tibet's independence, which not only tarnished the Tibetan religion, but also brought disaster to Tibet." "China Says Disputed Boy-Monk Is Free," Reuters News Service, August 16, 1996.
- from a distance: Charles Hutzler, "China Shows Diplomats Purported Pictures of Missing Panchen Lama Candidate," Associated Press Newswires, October 26, 2000.

- successor will be democratically elected: Pierre Lesourd and Dalai Lama Searches for Elected Successor," Agence France-Presse, January 28, 2001.
- is intent on exercising complete control: Beijing's conditions for talks include the Dalai Lama's acknowledging that Taiwan is pa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See "China Restates Terms for Contacts with Dalai Lama," Reuters News Service, December 5, 2000. This condition, completely irrelevant to Tibet, appears designed to avoid discussions of any kind.
- "The most important tenet": *World News*, narr. Sanjay Singh, CNN International, February 5, 2000.
- carry on the struggle: See Marion Lloyd, "Karmapa Seen as Leade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ebruary 10, 2000, p. 15.
- none of 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Although few know where Gedhun Chokye Nyima, the Dalai Lama's choice of the Panchen Lama, actually lives, it is unlikely to be in Tibet, as Beijing claims. Many have speculated that, assuming that he is alive, he is somewhere near Beijing, if not actually in the capital.
- "Not the same": Graeme Allen, interview by author, Shanghai, January 28, 2000.
- "There is not a day": Daniel Kwan, "Xinjiang a Time Bomb Waiting to Explode: Leade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y 29, 2000, p. 7.
- all the weapons and explosives they need: *Ibid.*
- "There's a fire burning": Matt Forney, "Suppression in Xinjiang," in *China in Transition: Towards the New Millennium*, ed. Frank Ching (Hong Kong: Review Publishing, 1997), p. 208.
- "The two communities live totally apart": Graeme Allen, interview by author, Shanghai, January 28, 2000.
- prove to be uneconomic: Beijing's massive Tibetan infrastructure project, the railway running between Golmud (in Qinghai Province) and Lhasa, appears to lack economic justification. See Mark O'Neill, "Politically Motivated Tibet Rail Link to Fulfill Mao's Dream,"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ebruary 11, 2001, p. 6.
- "Totalitarian systems are never forever": "Ignorance Key Worry: Dalai Lama,"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y 18, 2000, p. 10.
- President Lee Teng-hui's controversial remarks: Former President Lee's thoughts on the "two-states" principle are outlined in his article "Understanding Taiwan: Bridging the Perception Gap,"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1999, p. 9.
- they have little to do at their desks: Christopher S. Shapland Tibbs, interview by author, Shanghai, August 7, 1999.
- General Zhang Wannian: *World News*, narr. Rebecca MacKinnon, CNN International, March 7, 2000.
- "paper missiles": See Josephine Ma, "Cross-Strait Document Dismissed as 'Paper Missil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ebruary 23, 2000, p. 10.
- the election had been "a joke": "China's Premier Zhu Says Taiwan Vote a 'Joke,'" Reuters News Service, June 21, 2000. Zhu Rongji said, "If you say the president there was democratically elected, we reckon that's a joke."
- "The people of Taiwan have spoken!": "Chen Shui Bian," *Taiwan Decides*, *World News*, narr. Tim Lister, CNN International, March 18, 2000.
- "Mao made a big mistake": Ho Ping Hsien, telephone interview by author, March 23, 2000.

": Patrick Tyler, interview by Karuna Shinsho, *Visions of China*, CNN International, September 29, 1999.

- once again threatened nuclear war: Jasper Becker, "PLA Newspaper Details Strategies to 'Liberate' Island,"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ch 20, 2000, p. 3.
- 12.7 percent: John Leicester, "China Increases Military Spending in Budget," Associated Press Newswires, March 5, 2000.
- 17.7 percent rise in 2001: "China to Appropriately Increase Defense Expenditures in 2001," Xinhua News Agency Bulletin, March 6, 2001. For a discussion of this apparently large budget increase, see Jeremy Page, "China Boosts Military Spending with Eye on Taiwan," Reuters News Service, March 6, 2001. Because much, if not most, of China's military budget is kept secret (Fong Tak-ho and Pamela Pun, "Bigger-budget Military Turns Heat on Taiwan," *Hong Kong Standard*, March 7, 2000, p. 1), it is not possible to quantify with assurance the magnitude of any increase or decrease in defense spending.
- in excess of the economy's rates of growth: China's GDP, according to official statistics, increased by 8.0 percent in 2000. In 2001 it is expected that growth will be somewhat less than that figure. For a discussion of China's slowing economy, see Chapters 3 and 8.
- shutting the door to compromise: See "China Issues Statement on Taiwan Election," People's Daily Online, March 19, 2000.
- Destruction of your neighbor: Dalai Lama, interview by Larry King, CNN 2000, *Larry King Live Millennium*, CNN International, January 1, 2000.
- "I will go to Tiananmen Square": William Kazer, "Internet Sites Full of Patriotic Message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ch 20, 2000, p. 3.
- "whole world is just like one entity": Dalai Lama, interview by Larry King, CNN 2000, *Larry King Live Millennium*, CNN International, January 1, 2000.
- "Have you heard?": Greg Torode, "Protest Anger Turned on China,"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ecember 2, 1999, p. 12.
- "No one": Robert Kapp, interview by Mike Chinoy, *Visions of China, Insight Special Edition*, CNN International, September 30, 1999.
- "The Communist Party exploits us anyway": This comment was overheard by Lydia Chang on November 15, 1999.
- "I want the foreigners to know": Xu Xiaoying, interview by author, Dujiangyan, September 24, 2000.
- 70 to 130 million migrants: See "Country Cousins," *Economist*, April 8, 2000, China Survey, p. 15. Some believe that there are more than 130 million migrants, which is possible because recent statistics from China's Ministry of Labour and Social Security indicate that the number of surplus rural workers is about 150 million. See Bai Tianliang, "Urban and Rural Employment Faces More Pressure This Year," *People's Daily*, February 16, 2001, p. 5. As mentioned in Chapter 9, this surplus could be as high as 200 million.
- undoubtedly exceeds 200 million: *China Hand: The Complete Guide to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Hong Kong: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2001), Chapter 1, p. 41, estimates that unemployment and underemployment in the countryside alone may account for 200 million people. Unemployment is also a problem in the cities, of course. In the larger urban areas, about 23 percent of workers lost a job in the 1999–2000 period.

Vivien Pik-Kwan Chan, "23Pc in Cities Lose Jobs as Refor

Morning Post, January 31, 2001, p. 6.

- one hundred thousand additional unemployed: See "PRC Crackdown on Falungong Said Leaving 100,000 Jobless," *Agence France-Presse*, August 8, 2000. Another report puts the number of job losses at Zhong Gong businesses at 400,000. See "Report: 600 Leaders of Banned Chinese Exercise Group Arrested," *Associated Press Newswires*, March 4, 2000.
- effective labor unions are not permitted: Workers who try to establish real unions are either jailed or committed to psychiatric wards. See, e.g., "China Holding Labor Activist in Mental Hospital," *Associated Press Newswires*, February 8, 2001 (unionist Cao Maobing). Cao Maobing's imprisonment in a mental institution highlights a disturbing trend in China's treatment of dissenters. See Robin Munro, "China's Judicial Psychiatry,"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19, 2001, p. 6.
- virtually no mechanisms: When China finally ratified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n February 2001 it specifically noted that it would implement provisions regarding trade unions only in accordance with Chinese law. Meng Yan and Hu Qihua, "Legislators Approve Covenant on Workers," *China Daily*, March 1, 2001, p. 1. The effect of this reservation is to deny workers the right to organize unions of their own.
- "the passersby had turned into demonstrators": "Who Deserves the Credit?," *Newsweek*, November 8, 1999, p. 18 (comments of Václav Havel).
- "I was right": Richard M. Nixon, interview by Larry King, *Larry King Live*, CNN International, December 19, 1999 (reply of January 8, 1992, interview).
- They fell when fears turned to hope: See "Who Deserves the Credit?," *Newsweek*, November 8, 1999, p. 18 (comments of Joachim Gauck).
- "The only reason I still support the regime": "China's Long March," *Visions of China*, CNN Perspectives, narr. Rebecca MacKinnon, CNN International, October 1, 1999.
- the people will follow: Tiananmen protester Han Dongfeng adopts a different view. "When all hope is gone, that is when you can fight for what you believe without fear," he says. Han Dongfeng, "When You Lose Hope, You Are Not Afraid of Anythi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ebruary 24, 2001, Education, p. 8.

第三章 工業惡龍谷 國有企業重死拜刑

- rate of urban unemployment: China's statistics on "unemployed" do not include SOE workers who are "off duty," those laid off and receiving subsistence stipends while waiting for reemployment.
- probably six times that or more: See *China Hand*, Chapter 1, p. 41. Some estimate unemployment in rust belt industrial cities is about 30 percent. See, e.g., "Tianjian, China," *Asia Tonight*, narr. Rebecca MacKinnon, CNN International, December 27, 2000. There appear to be no reliable statistics on unemployment and underemployment for China as a whole. All the evidence suggests that the official figure of 3.1 percent is much too low, and the government's assertion that the rate did not in-

cent: "More Than 30% of SOE Employees Still Idle," *Ming Pao*

- (Hong Kong), August 30, 2000, p. B14.
- "one of the world's biggest and best collections": Foo Choy Peng, "Communiqué Echoes with Compromis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tember 24, 1999, Business Post, p. 4.
- Golden Summit: This narrative is based upon Susan V. Lawrence, "Too Many Mothers-in-Law,"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February 18, 1999, p. 12, and the results of Golden Summit's November 3, 2000, shareholders meeting.
- "The government manages the national economy": "Decision of the CCP Central Committee on Some Issues Concern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tructure," adopted on November 14, 1993, by the Four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Party at its Third Plenary Session.
- prefer to remain unprofitable: "China State Firms Caught in Loss-Making Rut," *China Online*, March 13, 2000.
- change the name of the Party: Mark O'Neill, "Party Urged to Drop Communist Ta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ebruary 28, 1999, p. 5.
- perhaps two to three percentage points of growth: Gerald Segal, "Does China Matter?,"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1999, p. 24.
- about 70 percent of domestic lending: "2000 Crucial for State Firm Reform," *China Daily*, March 1, 2000, p. 4.
- "If we did": Henny Sender, "Friends in High Place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pril 29, 1999, p. 68.
- even more loans for SOEs: See Geng Wei, "How to Improve External Circumstances for Reforming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the Next Few Years," *People's Daily*, August 21, 2000, p. 12.
- "rich fruit in SOE reform": "Be Sure of Victory in Decisive Battle," editorial, *People's Daily Online*, December 23, 1999.
- an eye-popping 140 percent: "Where the 239.2 Billion SOE Profits Come From," *China Information News* (Beijing), March 2, 2001, p. 1. The 140 percent claim is difficult to reconcile with the 4.5 percent increase announced less than two months earlier by Xinhua News Agency. See "China Confirms Success in SOE Reform," *Xinhua News Agency Bulletin*, January 9, 2001.
- the premier declared: See "Premier Zhu Rongji on Economic Issues," *People's Daily Online*, December 14, 2000.
- does not take into account: "Deadline for State Firms," *China Daily* (Hong Kong Edition), September 23, 1999, p. 1.
- to the tune of about ¥1.3 trillion: For analyses of the 2000 figures, see Mark O'Neill, "Data Paints Distorted Picture as State Sector Struggle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uary 20, 2001, Business Post, p. 3. For a discussion of the asset management company program, see Chapter 6.
- State officials deny: See, e.g., Huang Gang, "Loss-Making State Firms Return to Black," *China Daily*, January 10, 2001, p. 1 (comments of Sheng Huaren, then minister of the State Economic and Trade Commission). Today official media are more candid and acknowledge that profits recently reported by SOEs are mostly the result

- A study released: See Zhang Dingmin, "SOEs Tainted by AC Up: Audit," *China Daily*, December 23, 1999, p. 3.
- 99 percent of SOEs misstated: See Li Jiangting, "Enterprise Profits Inaccurate up to 33.4%," *People's Daily*, December 22, 2000, p. 2. For another central government study showing falsification of the financial results of state firms, see Zhu Yanyan, "Lots of Problems in Medium to Large State Enterprises," *China Business Times* (Beijing), January 5, 2001, p. 1.
- profits of China's publicly listed firms: Karby Leggett, "Public Firms Fight to Turn Profit in China,"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4, 2000, p. 1.
- Unsold inventories swelled: See, e.g., Jason Dean, "Industrial Firms in China Report Surge in Profits,"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11, 2000, p. 4.
- valued at more than US\$60 billion: Xiao Gong, "Idle Tools Cause Big Concern," *China Daily Business Weekly*, April 30, 2000, p. 1.
- "preposterous": Mark O'Neill, "Too Good to Be Tru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ne 29, 2000, *Business Post*, p. 18 (comments of unnamed Hong Kong merchant banker).
- SOEs produced: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0*, pp. 118, 168, and 407.
- "there's actually been a further falloff": Karby Leggett, "China Posted 8.1% Growth in Quarter on Surge in Spending and Exports,"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19, 2000, p. 5 (comments of Hu Billang of SG Securities).
- "a great historical leap forward": "Deci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on Major Issues Concerning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dopted at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Fifteenth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on September 22, 1999 (hereinafter cited as "Fourth Plenum Decision").
- "cardiac patients": Cao has written a poem about SOEs, "Farewell, Tonics for Cardiac Patients." The poem is found at the end of his speech "The Unavoidable Question of Privatization," Fortune Global Forum, Shanghai, September 27-28, 1999.
- approximately 110,000: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0*, p. 407. This number includes enterprises in which the controlling share is held by the state (in other words, it includes partially privatized enterprises). The number of SOEs is subject to great dispute, and estimates vary widely (with foreign estimates generally higher than official ones).
- Beijing would need: "Efficiency Holds Key to State Firm Reform," *China Daily*, October 7, 1999, p. 4 (estimate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of the State Council).
- Growth in 2000 was announced to be 8.0 percent: See Xu Dashan, "Nation's GDP Grew by 8% Last Year," *China Daily*, January 1, 2001, p. 3.
- the turnaround was more apparent than real: See Chapter 8.
- "has no clear winners": Edward Steinfeld, interview by Andrew Stevens, *Asia Business Morning*, CNN International, October 1, 1999.
- "we advance as appropriate": Jiang Zemin, "Strengthen Confidence, Deepen Reform, Create a New Situation in Developmen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Dalian, August 12, 1999 (hereinafter cited as "Dalian Address"). This major speech on SOE reform was published by the Xinhua News Agency.
-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urth Plenum Decision. To similar effect is a more re-

- ent, "Leaders Call for Enhanced Leadership over State Firms," *China Daily*, online, February 28, 2000.
 - "we have gained": Dalian Address.
 - "The cor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mpetition": Ibid.
 - Hualu produced mainly bad debts: See Yasheng Huang, "WTO Entry Is Critical to China's Stability,"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28, 1999, p. 10.
 - subsequently canceled: Sun Min, "Company Assumes Debt Loads," *China Daily*, November 3, 1999, p. 5.
 - trying to diversify: Henny Sender, "Friends in High Place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pril 29, 1999, p. 68.
 - "scientific management": Fourth Plenum Decision.
 - "avert risks": Dalian Address.
 - imposes cost controls: See Kathy Wilhelm, "Out of Busines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February 18, 1999, p. 10.
 - China's most important issue: Hu Angang, "The Future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 Economic Times* (Beijing), September 3, 1999, p. 5.
 - "a new conceptual breakthrough": "A Move to Breakthrough," *China Daily*, September 24, 1999, p. 4.
 - as if it will increase: Fourth Plenum Decision.
 - The grim news: Nicholas R. Lardy, *China's Unfinished Economic Revolu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8), p. 220.
 - "no one has yet found": Susan V. Lawrence, "Too Many Mothers-in-Law,"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February 18, 1999, p. 12.
 - "its pace of development": William Mellor, "China: The Next 50 Years," *Asia Inc.*, March 1999, p. 14.
- 第四章 封鎖不手軟 中共經濟受了網際網
- "You can use the photograph": Matthew Miller, "Independent Advisers Take Up Baton as Face of Economy Transform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ember 23, 1999, *Business Post*, p. 6.
 - China's fourth most popular Web site: "Top 10 Most Popular Sites in 1999," *China Daily Business Weekly*, March 26, 2000, p. 5.
 - about 22.5 million Internet users: "Internet Users up to 22.50Mn in China," *People's Daily Online*, January 17, 2001. Many analysts challenge the official figures for 2000. See, e.g., Doug Nairne, "Mainland Web Usage Lower Than Estimated, Says Surve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uary 12, 2001, *Business Post*, p. 3 (usage 25 percent lower than official figures).
 - the number of netizens: Charles Huang, an Internet entrepreneur, estimates that China will surpass the United States by 2003. *Visions of China*, CNN *This Morning*, narr. Mike Chinoy, CNN International, September 29, 1999.
 - one of China's portals estimates: This prediction was made by King Lai, chief executive of NetEase.com. King Lai, CLSA China Forum 2000, Shanghai, May 10, 2000 (panel discussion comments).
 - Edward Zeng of Sparkice: Edward Q. Zeng, e-mail to author, May 13, 2000.

- His country cousin needs more than four: State media recer of the New Economy in the countryside by telling the story of "black food" online. See "Elderly Villager Makes Money Out of Internet," People's Daily Online, January 10, 2001. In order to enter cyberspace, Lu paid ¥10,000 (about US\$1,209) for a computer. Urban per capita income in 1999 was ¥5,854.0, and the corresponding figure for rural areas for that year was ¥2,210.3.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0*, p. 312.
- Rutger Palmstierna: interview by author, Shanghai, October 25, 1999.
- ban on satellite dishes: See, e.g., "Shanghai Seizes Illegal Satellite TV Receivers," Associated Press Newswires, June 14, 2000. The ban is widely flouted. The most popular foreign channel in China is received by almost all of its viewers through illegal dishes. See "Rise of the Phoenix," *Business China*, October 9, 2000, p. 1.
- attempting to manage information: Sometimes Beijing's efforts to control the media fail miserably. Protesters in Shandong Province recently prevented authorities from closing an illegal television station carrying foreign films and sex videos. Zhang Haijun, "Illegal Television Station Still Broadcasting," *Legal Daily* (Beijing), February 14, 2001, p. 1.
- "The truth is, communism exhausted its possibilities": Lech Wałęsa, interview by Chris Burns, *Visions of Europe: Ten Years After*, World News Europe, CNN International, October 18, 1999.
- patrolling the Internet: China's provinces and cities are establishing their own Internet police. "China Says Provinces Setting Up Internet Police," Reuters News Service, August 5, 2000.
- neglects to enforc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 fond of reissuing multiple sets of rules covering the same ground in lieu of enforcing existing provisions. This trend is best illustrated in China's regulation of the Internet. After issuing the January 2000 rule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September and November 2000 promulgated other sets of prohibitions and requirements. Recently Beijing promised still more Internet rules. See "Internet Regulations to Be Updated," *China Daily*, January 18, 2001, p. 3.
- impossible to enforce: The newly-issued encryption requirements were so broad that they had to be cut back. In March 2000 they were clarified to reduce their scope, but they will probably be amended again because important ambiguities remain even after the revision.
- "Fifty years after China went through a Communist revolution": *Visions of China, Q&A in Shanghai*, narr. Riz Khan, CNN International, September 28, 1999.
- "In order to inspect the Internet, we must control it": "Shanghai Tells Corporate Internet Users To Register," Reuters News Service, January 7, 2000.
- "you could stand with a gun behind a man": Lech Wałęsa, interview by Chris Burns, *Visions of Europe: Ten Years After*, World News Europe, CNN International, October 18, 1999.
- The remaining three: Sing Wang, interview by author, Guangzhou, November 14, 1999.
- "as soon as they hear": Alysha Webb, "China's Expected Entry Draws Venture Capital to Internet," *Bridge News*, November 25, 1999.
- "China in this respect is democratic": Cindy Sui, "Chinese Schoolchildren Ignorant of 1989 Tiananmen Massacre," *Agence France-Presse*, October 1, 1999.

- not be independent": "Person of the Week," *China Daily Business Weekly*, October 17, 1999, p. 8.
- "can surpass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Zhu Pushes Hi-Tech Shenzhe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ctober 5, 1999, p. 1.
- "China needs the Internet": Peter Yip, interview by Marina Kolbe, *Q&A Asia*, CNN International, June 15, 2000. Yip is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China.com.
- few transactions involving state assets: As Graham Earnshaw, a China Internet analyst, says, "The situation changes, the line moves almost every day." Lydia Zajc, "Lessons in Setting Up Dotcoms in China," *review of The Life and Death of a Dotcom in China*, ed. Graham Earnshaw,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ecember 5, 2000, *Technology Post*, p. 10.
- she did not know what to say: Zhang Jingjun, interview by author, June 15, 2000.
- "there will be people who are upset": *Ibid*.
- still does not have a true Internet: See, e.g., Kristie Lu Stout, interview by Lian Pek, *ibizasia*, CNN International, November 11, 2000. Kristie Lu Stout, a China Internet analyst, says, "Some people say that the Internet in China is not a true Internet. A true Internet is a distributed network where no one is in charge, no one takes control and it's controlled, or, how should I say, managed only by the users or the participants that actually create the communities that generate the Internet. In China it's just the opposite. It's centrally run, there are only four gateways linking the Internet in China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largely running on one single carrier, and that's China Telecom, but that's the way China Internet has always been. Not a real Internet, but an Interne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China must build": Willy Wo-Lap Lam, "Combatting Web Imperialism,"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ne 14, 2000, p. 18.
- "electronic heroin": *Ibid*.
- Beijing announced the formation: "China Moving Ahead with Plan for Its Own Internet," Associated Press Newswires, January 6, 2001.
- "It cannot be stopped": Zhang Jingjun, interview by author, Guangzhou, June 15, 2000.
- "So that should be the end of it": *Ibid*.
- has lost much of its value: In September 2000, Tom.com, a Hong Kong portal controlled by Li Ka-shing, agreed to buy 163.net. The sales price was substantially less than the price agreed upon in the proposed transaction described in the text. Due to Mainland restrictions, Tom.com could not actually acquire ownership of 163.net itself. It could, however, acquire rights to various streams of income from this Guangzhou-based e-mail business.

第五章 無限上綱 工業政策造成永遠的無能

- He could name only: "McEnroe Brands ATP," *USA Today*, November 5, 1999, Sports, p. 1.
- "gone": Jonathan Alter, "From the Prison of the 'Isms,'" *Newsweek*, December 27, 1999, p. 33.
- private vendors: Alysha Webb, interview by author, Shanghai, January 7, 2000.
- "the highest growth potential": "Investing in China," *Visions of China*, *Asia Business Morning*, narr. Lisa Barron, CNN International, September 29, 1999.

- "I can't go down in history": "Infatuation's End," *Economist*, February 27, 2001, p. 77.
- Citic Heavy: See "Luoyang Mining Machinery Factory: A Tragedy of Errors," *Business China*, October 25, 1999, p. 3.
- the first publicly listed company: Peng Xiaohong, "Will Zhengzhou Baiwen Be Sentenced to Death?" *China Business Times* (Beijing), April 20, 2000, p. 5.
- only 7,528 bankruptcy filings: Cao Siyuan, telephone interview by Lydia Chang, February 13, 2001. Cao is considered the principal drafter of China's Enterprise Bankruptcy Law.
- not a system: There were 4,722 bankruptcies in 1999. Cao Siyuan, telephone interview by Lydia Chang, May 18, 2000. The large increase in bankruptcies in 2000 resulted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postponing bankruptcy filings that would have normally occurred in 1999 (the department in charge of a state-owned enterprise can prevent that enterprise from entering bankruptcy through various means, including invoking the provisions of the bankruptcy law). In 1999, bankruptcies were postponed to avoid alarming foreign lenders and investors who had already expressed concern over the failure of Guangdong International Trust & Investment Corp. in late 1998. Cao Siyuan, telephone interview by Lydia Chang, February 13, 2001.
- as if cripples: The image of cripples bound to one another is borrowed from General Electric logo. See "The House That Jack Built," *Economist*, September 18, 1999, p. 21.
- laying straw and flowers over a minefield: Cao Siyuan, "Evaluation of the 10-Year Implementation of the Bankruptcy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ankruptcy Reform in China: Gitic and Beyond conference in Hong Kong, April 13, 1999.
- the first borrower in that country's history: Juanito Concepcion, "Gitic Default Fuels Concern," *Hong Kong Standard*, October 28, 1998, Business Standard, p. 1.
- "the world's brashiest capitalist economy": "Private Salvation?," *Economist*, April 8, 2000, China Survey, p. 5.
- they are now regulated: The best example of this trend is the Price Law, which give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virtually unlimited authority to establish prices for tangible goods, nontangible assets, and services.
- CAAC, acting in its regulatory role: CAAC also acts as a manager to China's newly formed airlines, purchasing aircraft and providing ground support services. Chinese carriers have suffered as a result of CAAC's nonregulatory management functions.
- 80 percent of revenues: Guo Aibing, "Discount Dilemma Lingers," *China Daily Business Weekly*, April 16, 2000, p. 8.
- "Our purpose is to prevent the airlines": Nora Ying, "Price-Cutting on Airfares Is Under Siege," *Shanghai Daily*, March 29, 2000, p. 1. It evidently has not occurred to CAAC that lower fares mean more passengers, which helps the airlines too.
- the industry to consolidate: Guo Aibing, "CAAC Pushes Airline Consolidation," *China Daily*, July 22, 2000, p. 1.
- the third largest alumina producer: Xie Ye, "China Creates Alumina Monolith," *China Daily*, February 24, 2001, p. 3.
- "We can sit down and talk": "CNPC, Sinopec Sign Pact to Avoid Price Battle," Reuters News Service, March 26, 1999.

- the competition: See, e.g., Li Heng, "Grueling Fight by Oil Giants Forecast," *People's Daily Online*, February 27, 2001; "Cease Gas Station Purchase War," *Ming Pao* (Hong Kong), August 8, 2000, p. B12.
- using their powers: See, e.g., Hui Yuk-min, "China Unicom Joins Price Wa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ch 2, 2001, Business Post, p. 4. China Telecom still dominates the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at the beginning of 2001 it retained a 67 percent share of the overall telecommunications market and 95 percent of the fixed-line business. "One Goliath, Several Davids," *Business China*, January 29, 2001, p. 4.
- is still trying to stand in the way: See, e.g., Christopher Torrens, "who's in charge.cn: The Orchestration of China's Internet,"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December 2000, pp. 10-11.
- "There will be progress only if there is competition": Zhang Jingjun, interview by author, Guangzhou, June 15, 2000.
- "Practise not doing": Michael Vatikiotis, "Capital Idea,"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une 10, 1999, p. 55.
- some 120 government-sponsored incubators: Rustam Lalkaka, interview by author, Shanghai, October 25, 2000. The actual number may be slightly lower. See Tao Yungang, "Shanghai Incubators to Hatch High-Tech," *China Daily*, April 19, 2000, p. 2.
- Only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Rustam Lalkaka, interview by author, Shanghai, October 25, 2000.
- "we have a brand name": Quotations in the text attributed to Dinyar Lalkaka were obtained from interviews conducted by the author in Shanghai on April 11, June 19, and September 14, 2000.
- the Sinoified version of "dot com": The Lalkakas didn't come up with that moniker, but it has somehow stuck through popular demand. Dinyar Lalkaka, interview by author, Shanghai, September 14, 2000.
- ON-LINE INCUBATOR IMPLEMENTED: Shi Hua, "On-line Incubator Implemented," *China Daily*, April 20, 2000, p. 5.
- China's "first" incubator: "BCG to Launch E-Commerce Incubator in China," Reuters News Service, March 22, 2000.
- It has yet to be formed: Dinyar Lalkaka, interviews by author, Shanghai, June 19, 2000, and September 14, 2000.
- 80 percent of the venture capital: Xiao Guo, "Venture Capital Group Established," *China Daily*, February 20, 2001, p. 2.
- personally attending to the details: Willy Wo-Lap Lam, "Hi-Tech Confucian Futur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ctober 13, 1999, p. 19.
- about 99 percent foreign: Antoaneta Bezlova, "Last Chance to Get on IT Train, Global Information Network," IPS Newsfeed, December 3, 1999.
- "biggest securities fraud": Mark O'Neill, "Light-Rail Project Marks Start of Reluctant Move for Hi-Tech Glor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ust 9, 1999, Business Post, p. 3.
- "21st century belongs to Zhongguancun": Ibid.
- "as big as Hong Kong": Willy Wo-Lap Lam, "Hi-Tech Confucian Futur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ctober 13, 1999, p. 19.

- "a hot cake for both capital and human talents": Zhongqing Leading Science Park," China Business Information Network, December 6, 1999.
- 8,224 in early 2001: "Chinese 'Silicon Valley' Sets New Record," Xinhua News Agency Bulletin, February 5, 2001.
- up 27 percent in 1999: Mark O'Neill, "Silicon Valley Dream Remote from Realit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ebruary 21, 2000, Business Post, p. 3.
- almost 47 percent: "Chinese 'Silicon Valley' Sets New Record," Xinhua News Agency Bulletin, February 5, 2001.
- "The single greatest untapped resource": Meredith M. Walker and Richard Alm, "China's Churn," September 2000 (available at www.dallasfed.org).
- "In Qinghua, 82 per cent of graduates": Mark O'Neill, "Capital Woes at Core of Progress Doubt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ctober 29, 1999, Business Post, p. 4.
- only about a third of them return: "Debate Arises Over Foreign Study Temptation," *People's Daily Online*, February 26, 2001. Unofficial sources say that only a quarter of Chinese students have returned. See Mark O'Neill, "Old Heads Rule Roos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ust 29, 2000, p. 12.
-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create an ideal structure": Wang Chuandong, "Fair Focuses on IT Progress," *China Daily Business Weekly*, October 17, 1999, p. 5.
- Marxism is a scientific body of thought: "Learn More Science, Apply It Quickly, President Urges," *China Daily*, June 6, 2000, p. 1.
- a rarity: See, e.g., Jennifer Hyman, "Grand Plans Under Threa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ember 28, 2000, Technology Post, p. 8.
- becoming a sleazy haven: Karby Leggett, "In the SZ,"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2, 2000, World Business Supplement, p. 8.
- 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inventions: "Hang On Lads, I've Got an Idea," *Economist*, December 31, 1999, p. 99.
- "There is no attempt": Rustam Lalkaka, interview by author, Shanghai, October 25, 2000.
- needed a government bailout: Rustam Lalkaka, interview by author, Shanghai, October 31, 2000.
- "one of the world's most advanced science parks": "Financial Aid," *China Daily*, March 3, 2000, p. 2.
- "the first productive force": Dalian Address.
- less than 2 percent: Elaine Kurtenbach, "China, Seeking High-Tech Leap Forward, Gets Snagged in Its Past," Associated Press Newswires, February 5, 2001.
- "it's so vastly different it's unimaginable": Lee Kwan Yew, interview by Riz Khan, *Frontiers of China, Q&A in Shanghai*, CNN International, September 29, 1999.
- "The Communist Party": Vivien Pik-Kwan Chan, "Jiang Tells Party to Embrace Ne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ch 4, 2000, p. 1.
- his solution to all issues: "Party Building Given Top Priority," *China Daily*, February 26, 2000, p. 1.
- "poverty and trouble": Meng Yan, "Textiles Need More Assistance," *China Daily*, January 28, 2000, p. 5.
- "virtually doomed": Leslie Chang, "State-Backed Firms Join China's Internet Rac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6, 2000, p. 1.
- designed to force private portals to close: See, e.g., Mark O'Neill, "Beijing Closes

Feb Site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ctober 4, 2000, Business Post, p. 10.

第六章 銀行瀕亡錄 中國的銀行來日無多

- not been one single default: Daniel Kwan, "Junior Banker Hailed as Hero of the System,"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ctober 22, 1998, p. 10.
- approximately US\$720.9 billion: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0*, p. 311. Perhaps a third of the funds in China's household accounts is illegally parked corporate cash. Accordingly, the amount of true private savings in banks is undoubtedly less than the official figures indicate.
- still comprised 25 percent: Dan Yuqing, "Bad Loans Seen Bottom," *China Economic Times* (Beijing), January 18, 2001, p. 1; "Non-Performing Assets Bottoming Out—Governor," Xinhua News Agency Bulletin, January 17, 2001.
- mentioned by Standard & Poor's: See Jon Ogden, "S&P Sees Beijing Ratings Steady Despite Potential for Problem Loan Surg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ust 10, 2000, Markets Post, p. 1.
- "The more I knew": Johannes Schoeter, interview by author, Hong Kong, April 14, 2000.
- must have reduced: This calculation assumes that, apart from the US\$157.0 billion recapitalization, there was no material improvement or deterioration in the portfolios of the state commercial banks in 2000.
- Beijing's technocrats estimate: See, e.g., Wang Ying, "No Anxiety Needed of Big Debt Burden," *China Daily Business Weekly*, July 9, 2000, p. 1 (estimates of Wang Guogang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Recent foreign estimates: See, e.g., Bruce Gilley, "Moment of Truth,"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une 15, 2000, p. 58. A recent Merrill Lynch research report assumed, in determining China's fiscal condition, that the country would recover 15 percent of its nonperforming loans. See Merrill Lynch, Pierce, Fenner & Smith, Inc., "China—The New Power," January 12, 2001, p. 24.
- a figure more consistent: See, e.g., Lardy, *China's Unfinished Economic Revolution*, pp. 142–3 (especially note 51). It is estimated that Gitic creditors will eventually receive about 12 percent of the face value of their claims. Juanito Concepcion, "Banks May Recover Only 12pc from Gitic Unit," *Hong Kong Standard*, April 21, 1999, Business Standard, p. 1.
- somewhere in the vicinity: A portion of the unrecoverable loans is held by four "asset management companies," which are discussed later in this chapter. The figure in the text includes such loans and loans remaining in the banking system, which is comprised of banks and entities such as rural and urban credit cooperatives. Such figure does not include unrecoverable debt held by the state policy banks, which extend loans as dictated by central government policy.
- "There is no simple answer": Matt Forney, "China's Economy Slowed in Third Quarter,"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20, 1999, p. 1 (comments of He Guangbei of the Bank of China).
- "According to our audits": Wang Ying, "Banks Pass Audits," *China Daily Business Weekly*, January 23, 2000, p. 1.

-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Options for China's Finance the Banking System in China: Issues and Experience,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Policy Paper No. 7, October 1999, p. 321 (hereinafter cited as "BIS Paper No. 7").
- "For many observers: Rudi Dornbusch and Francesco Giavazzi, "Heading Off China's Financial Crisis," in BIS Paper No. 7, p. 40 (emphasis added).
- as even central bank statistics admit: See *People's Bank of China Quarterly Statistical Bulletin*, vol. 20 (2000-4), pp. 28-9.
- even by local units: See, e.g., Matthew Miller and William Kazer, "The Loans That Went Too Fa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ch 30, 2000, p. 15 (illegal deposit-taking company run by the local branch of the Party in Zhejiang in Jiangsu Province).
- more than its share of unrest: For an example of unrest in Chongqing, see "2,000 Victims of Illegal Chinese Investment Scheme Protest," *Agence France-Presse*, November 14, 1999.
- why Beijing is beginning to execute: See Fang Yibo, Wang Xianfu, and Pan Xiande, "Taizhou Tries 'Pagoda Fund' for Fraud and Taking Illegal Deposits," *People's Daily*, November 27, 1999, p. 4.
- "Isn't slower better?": Bill Savadove, "China Shuts Another Trust in Cleanup," *Reuters News Service*, August 7, 2000.
- Big Four: The Big Four are Bank of China,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and the Agricultural Bank of China.
- 68.4 percent of the deposits and made some 71.0 percent of the loans: The percentages in the text are derived from preliminary PBOC statistics, which were not adjusted to account for the Big Four's transfer of about ¥1.3 trillion of loans to four asset management companies. The statistics in the text have been adjusted to reflect such transfer.
- 150,000 branches: "Ready or Not," *Business China*, January 3, 2000, p. 12. The number of branches is subject to some dispute, as others believe the number is lower. The disparity in number may be due to how subbranches are counted.
- "The bad news": Douglas Lee Red, "Outlook for the Chinese Banking System," *Forecasting China to the Year 2002 and Profitability*,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Business China Group Shanghai, Shanghai, September 17, 1998.
- "only a portion": Karby Leggett, "China Central Bk Implements New Warning System for Banks," *Dow Jones Newswires*, May 21, 1999.
- The run lasted four days: Tian Junrong, "Luan County Relevant Responsible Person Seriously Reprimanded," *People's Daily*, November 3, 2000, p. 1.
- "tiger in a cage": "Run on Chinese Banks Unlikely—Survey," *China Online*, April 4, 2000.
- "quite unique": Xu Binglan, "PBOC Says Financial Issues Are Manageable," *China Daily*, April 5, 1999, p. 5.
- It was a fib: We know that because, only a few years after, the banks began reporting capital adequacy ratios well below 8 percent and today the PBOC is still talking about lifting the ratios to that percentage. See Dan Yujing, "Bad Loans Seen Bottom," *China Economic Times* (Beijing), January 18, 2001, p. 1.
- Do it quickly, do it big, and do it just once: See Rudi Dornbusch and Francesco Giavazzi, "Heading Off China's Financial Crisis," in BIS Paper No. 7, p. 40.
- The aftershocks of a banking crisis: Ibid.
- "to know some people": Owen Brown, "China to Step Up Reform of Banks as WTO Looms,"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21, 2000, p. 3.
- about ¥1.3 trillion: By the end of 2000, the asset management companies acquired about ¥1.3 trillion of debt (US\$157.0 billion) from the Big Four and ¥0.1 trillion (US\$12.1 billion) of debt from the policy banks, state banks that make loans as directed by government policy.
- preventing them from talking: "The Interference by local officials is discussed in Li Lun, "Seven Difficulties Facing the Restructuring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Economic Daily* (Beijing), January 11, 2000, p. 10.
- "free lunch": Wu Yan, "Have Debt-Equity Swaps Lost Temperature?," *People's Daily*, March 28, 2000, p. 13.
- "blackmailing" local governments: Wu Yan, "The Focus Behind the Focus," *People's Daily*, March 30, 2000, p. 13.
- "Cinda can exert pressure": "Passing the Debt," *Business China*, June 21, 1999, p. 1.
- will recover less the longer it postpones: Even the official media is coming to this conclusion. See Liu Yuan, "Asset Disposal: The Faster the Better," *People's Daily*, February 7, 2001, p. 5. One of the four AMCs, Huarong Asset Management Corp., is taking an aggressive approach by trying to sell about 5 percent of its portfolio of nonperforming debt to foreign parties. *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however, suggests that this course of action may be "mission impossible." Peter Wonacott, "Huarong Hires Ernst & Young for Asset Sales,"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21, 2001, p. 1.
- "We hope that": Christine Chan and Renee Lai, "PBOC Vows Radical Financial Overhaul,"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ember 19, 1998, *Business Post*, p. 1.
- "No government agencies or individuals": "China Seen Facing High Bar in Bad Debt Clean-up," *Reuters News Service*, April 27, 1999.
- "don't have much retail banking experience": Simon Pritchard and Wang Xiangwei, "Capitalist Boom and Gloom Predicted,"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ember 16, 1999, p. 3.
- all sorts of additional annoying prohibitions: See "Playing Favourites," *Business China*, June 5, 2000, p. 7; "New Hurdles," *Economist*, April 8, 2000, p. 91; "China Weighs Restrictions on Foreign Banks Renminbi Business," *China Online*, February 4, 2000. The PBOC sought to impose a capital adequacy ratio for the renminbi business of foreign banks. Despite press reports to the contrary, this proposed general restriction was not put in place (although it might have been applied to certain foreign banks on a case-by-case basis). The PBOC then sought to impose the 8 percent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capital adequacy standard to the local branches of foreign banks as if those branches were stand-alone banks. At this time it is not known whether the PBOC will continue its efforts to impose such a standard.
- The country's top think tank: Wang Songqi, "WTO: What Will It Bring to the Chinese Financial Industry?," *China Economic Times* (Beijing), November 16, 1999, p. 4.
- still paying interest: Johannes Schoeter, interview by author, Hong Kong, April 14, 2000.
- one third of the homeowners: Gordon Chang, "Big Four Banks Bleeding but Far from Deathbed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tember 9, 1999, *China Business Review*, p. 4.

- "it's better to repay late": Wu Yan, "Have Debt-Equity Swaps?", *People's Daily*, March 28, 2000, p. 13.
- "based on the repudiation of debt": "Warning Sounded on Dangers of Converting Bad Loans into Equit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ctober 13, 1999, Business Post, p. 6 (comments of Yi Gang, Vice-Director of Beijing University China Economic Research Centre).
- "deteriorated dramatically in recent years": Nicholas R. Lardy, "The Challenge of Bank Restructuring in China," in BIS Paper No. 7, p. 17.
-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not stupid": "Ready or Not," *Business China*, January 3, 2000, p. 12.
- To ensure greater control: Carsten Holz, "Two Solutions for China's Banks,"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29, 1999, p. 10.
- "no perfect recipe": Liu Mingkang, "Conclusion," in BIS Paper No. 7, p. 341.
- the same process is at work: Paul Mooney, "An Ancient Wall Street,"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une 17, 1999, p. 47.

第七章 反吸一口 國家補貼與企業家

- He's possibly the richest: Chen Rong is not the richest person from Shanghai included in *Forbes Global's* list of richest Chinese entrepreneurs (Rupert Hoogewerf, "China's 50 Richest Entrepreneurs," *Forbes Global*, November 27, 2000, p. 150). The magazine's estimate of his net worth does not include the value of his stock-trading portfolio and other nonbusiness assets because he did not disclose this information to its reporter. Chen Rong, interview by Lydia Chang, Shanghai, December 20, 2000. Some publications have estimated Chen's net worth at about US\$100 million. See, e.g., Trish Saywell, "Strik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23, 1999, p. 48.
- "My life seemed like an endless nightmare": Trish Saywell, "Strik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23, 1999, p. 48.
- He multiplied his stake: Chen Rong, discussed his early life with Lydia Chang in interviews conducted in Shanghai on May 25, 2000, October 30, 2000, and December 20, 2000.
- "they only remember the fun of bowling": Chen Rong, interview by Lydia Chang, Shanghai, May 25, 2000.
- "a deep impression": Ibid.
- AMF and Brunswick: Wen Kang, telephone interview by Lydia Chang, October 30, 2000. Kang is the manager of AMF's operations in China.
- about 45 percent: Anthony Neoh, "The Three Critical Drivers of the Chinese Domestic Capital Markets," CLSA China Forum 2000, Shanghai, May 10, 2000.
- the range of disagreement is huge: "Private Salvation?," *Economist*, April 8, 2000, China Survey, p. 5. For an explanation of the divergence of these estimates, see "A Private Affair," *Business China*, September 25, 2000, p. 1.
- "the largest potential for bowling in the world": Gil Klein, "China Trade Divides South," *Richmond Times-Dispatch*, May 1, 2000, p. A1.
- "I'm going to go put on a bowling shirt": Mark Yost, "AMF Bowling Chief Will Go to Lanes to Learn Business,"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4, 1999, Marketplace, p. B9B.

- studied the technology: Chen Rong, interview by author, Shanghai, June 7, 2000.
- foreign investment would fall dramatically: As it turned out, actual foreign investment in 1999 declined 11.4 percent from the previous year to US\$40.4 billion.
- "No weapon can wipe out the truth": Wei Jingsheng, "Unorthodox Opinions Are Heard on the Street," *Time Asia*, September 27, 1999, p. 85.
- "I hope someday that China": *Visions of China, Asia Tonight*, narr. Mike Chinoy, CNN International, September 28, 1999.
- "It's ironic that Time Warner has not pulled out": Lee Kuan Yew, interview by Riz Khan, *Visions of China, Q&A in Shanghai*, CNN International, September 29, 1999.
- foreign business often goes to bat: *Visions of China, Asia Tonight*, narr. Mike Chinoy, CNN International, September 28, 1999.
- "You have no idea": Linda Jakobson, *A Million Truths: A Decade in China* (New York: M. Evans, 1998), p. 143.
- *Fortune*, contrary to its usual practice, caved in: *Visions of China, Asia Tonight*, narr. Mike Chinoy, CNN International, September 28, 1999.
- "My childhood can be made into a movie": Chen Rong, interview by author, Shanghai, June 7, 2000.
- "Making money, that's my goal": *Visions of China, World News*, narr. Mike Chinoy, CNN International, September 22, 1999.
- Shenyang Micro-electronics: Huo Shiming, "The Saga of an Auction of an Enterprise," *Legal Daily* (Beijing), February 8, 1999, p. 3.
- five thousand similar disputes: "A Number of Question Marks in the 'Shenyang Micro-Electronics' Situation," *Legal Daily* (Beijing), February 8, 1999, p. 3.
- "Once it has money": Mark O'Neill, "Ex-State Workers Get Physical over Western-Style Method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uary 13, 2000, Business Post, p. 4.
- "What I am positive about": Jack Perkowski, "Creating Globally Competitive Companies in China," CLSA China Forum 2000, Shanghai, May 10, 2000.
- "The 21st century world belongs to the non-state sector": Willy Wo-Lap Lam, "WTO Strategy Holds Clues to Reform,"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tember 29, 1999, p. 19.
- "They do not really believe": Chen Rong, interview by Lydia Chang, Shanghai, May 25, 2000.
- "He is a Party secretary": Ibid.
- Deng Liqun: Willy Wo-Lap Lam, "Jiang Walks Tightrope Between Left and Righ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y 6, 2000, p. 7.
- Conditions approximating slavery: See, e.g., Xu Yue and Yan Hong, "Kunming Police Rescue 19 Abused Workers," *China Youth Daily* (Beijing), March 27, 2000, p. 1. has ordered the media: Willy Wo-Lap Lam, "Jiang Walks Tightrope Between Left and Righ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y 6, 2000, p. 7.
-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Chen Rong, interview by Lydia Chang, Shanghai, May 25, 2000.
- "should work hard": "Communist Party Must Improve Leadership Skills," *People's Daily Online*, May 15, 2000.
- "The Party can do what it will": Chen Rong, interview by author, Shanghai, June 7, 2000.

- "the retreat of the foreign beer makers": Peng Zuoyi, interview by Yan Zhigang, in Yan Zhigang, "Local Brands vs. Foreign Brands," *Economic Daily* (Beijing), July 7, 2000, p. 6.
- the fastest in the world: Peter Wonacott, "Tsingtao, Thirsty to Reclaim Its Title, Is on a Buying Blitz,"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21, 2000, p. 13.
- Price competition has wrecked the margins: Matt Pottinger, "Foreigners May Have Introduced Beer to China," Reuters News Service, August 20, 2000. Competition is so fierce in China that beer is now less expensive than bottled water.
- "a city of superlatives": *Visions of China*, CNN *This Morning*, narr. Mike Chinoy, CNN International, September 27, 1999.
- within eight years: See "How Now Hong Kong?," *Economist*, May 9, 1998, Financial Centres Survey, p. 27.
- more skyscrapers than New York: George Q. Fu (former judge of the Shanghai High People's Court and noted lawyer), interview by author, Shanghai, September 25, 1999.
- "The culture is tomorrow": Dean T. W. Ho, interview by author, Shanghai, January 22, 2000.
- "We Shanghaiese are shrewd and smart": *Visions of China*, CNN *This Morning*, narr. Mike Chinoy, CNN International, September 27, 1999.
- "Manhattan of the East": *China Daily*, November 1, 2000, p. 12.
- "You make them a little too long": Steven Mufson, "Economy of China Is Cooling,"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9, 1997, p. A1.
- "perfect": "Premier Envisions Perfect Social Welfare," *China Daily*, May 30, 2000, p. 1.
- taking such a long tim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ational social welfare system appears years away. See Jasper Becker, "Nationwid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Stalled by Lack of Will,"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ecember 24, 2000, p. 4.
- vicious price wars: See, e.g., Dai Yan "Price War Deemed Self-Destructive," *China Daily*, February 22, 2001, p. 5 (air conditioner manufacturers have not learned from the TV price wars).
- "reward": Zhao Xiaohua, "A Signal for Reduction in Car Prices?," *Beijing Daily*, January 25, 2000, p. 10.
- the discounts were available to everyone: Chang Weimin, "Tianjin Firm Stages Auto Price War," *China Daily*, January 20, 2000, p. 5.
- "inevitable": "Surplus" an Inevitable Period of Economic Transition," editorial, *China Daily*, December 1, 1999, p. 4.
- "no need for concrete": Chen Zonglin, interview by author, Duijiangyan, September 24, 2000.
- biggest ongoing civil engineering project: James Kyng, "Doubt over Three Gorges Power Demand," *Financial Times* (London), March 10, 2000, p. 10.
- New investment in certain areas is prohibited: China has always restricted foreign investment to specifically-enumerated areas. These days the restrictions have acquired a new purpose: to limit supply.
- a coordinated price increase: Karby Leggett, "China Sparks Increase in Steel Prices,"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 2000, p. 1.

- TV-Tube Productio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ust 16, 1999, Business Post, p. 3.
- about US\$0.73 per day: Du Dengbin, "Peasants' Income Waiting for a 'Turning Point,'" *China Economic Times* (Beijing), January 8, 2001, p. 1.
- nowhere in sight: Official statistics show that peasants' income increased by 2 percent in 2000. See Zhao Huanxin, "Poor Harvest Not Affecting Supply," *China Daily*, January 8, 2001, p. 1. That statistic does not appear accurate in view of other available evidence about the disappointing harvest in that year.
- lost her profits (and much more): Zhou Xiaoyi, interview by Lydia Chang, Shanghai, June 1, 2000.
- Growth picked up: See Xu Dashan, "Nation's GDP Soars 8.2 Per Cent," *China Daily*, July 19, 2000, p. 1; "China's GDP Grows 8.2 Percent," People's Daily Online, July 18, 2000.
- deflation eased: China claimed that consumer prices rose 0.4 percent in 2000. "China Maintains Stable Market Price in 2000," Xinhua News Agency Bulletin, February 28, 2001.
- "China's time is now": Kathy Wilhelm, "Starting to Sizzl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ugust 24, 2000, p. 57 (comments of Stephen Roach of Morgan Stanley Dean Witter).
- "My qigong level": Wu Chengwen, "Reveal the True Face of the Falun Gong Cult," *Nanfang Zhoumo* (Guangzhou), March 13, 1998, p. 5.
- "How can things turn around so quickly?": Jasper Becker, "Guarded Reactions to 'Explosion' of Mainland Economic Growth,"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ly 21, 2000, p. 18.
- say whatever is demanded: See Owen Brown, "Chinese Agency Plans Crackdown On Bogus Data,"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29, 2000, p. 3.
- "What's going up?": Matthew Miller, interview by author, Shanghai, September 2, 2000.
-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2000 budget deficit: "NPC Session Hears Plan Implementation, Budget Reports," Xinhua News Agency Bulletin, March 6, 2001.
- US\$1.1 trillion: "China's GDP Grows 8 Percent," Xinhua News Agency Bulletin, February 28, 2001.
- US\$246.6 billion: At the end of 2000, China had approximately US\$197.6 billion of internal public debt (public debt owed to domestic parties) and US\$49.0 billion of external public debt. China does not publish a figure for the total amount of its internal public debt, so this number must be derived from published statistics and is an estimate. The internal debt figure includes US\$32.5 billion of bonds issued in the partial recapitalization of the banks in 1998 (as discussed in Chapter 6) but excludes the amount of contingent liabilities. The amount of China's total external debt at the end of 2000, according to official sources, was US\$145.7 billion. "China's Foreign Debt Down 4 Percent in 2000," People's Daily Online, April 3, 2001. This amount, larger than the figure used above to calculate total public debt, includes obligations of nonsovereign parties and so is not used for the purposes of analyzing the ability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service its obligations. As a practical matt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ould probably stand behind some of its instrumentalities.

- Beijing has essentially borrowed: Most of the loans in the core were extended to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other entities controlled by the state. These loans are, therefore, indirect loans to the state itself and should be considered public debt. See Lawrence J. Lau, "The Macroeconomy and Reform of the Banking Sector in China," in BIS Paper No. 7, p. 59. Loans made by the state-owned policy banks, which extend credit at the behes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for public purposes, can also be considered public debt. See Nicholas R. Lardy, "Fiscal Sustainability: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vol. 4, No. 2 (2000), p. 36.
- about US\$860.8 billion in 2000: This figure was derived by assuming that 70 percent of the loans in the banking system go to state borrowers.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these days maintains that only about 40 percent of loans go to state borrowers. This percentage is much too low from all available evidence. In any event, there is no precise figure for the state's share of borrowing and the 70 percent figure is less than the current consensus of 75 percent. The figure in the text includes loans transferred to the asset management companies by the Big Four banks becaus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ill, at some point, have to accept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se loans. The US\$860.8 billion figure may underestimate the indirect loan problem because it does not include US\$177.5 billion in loans made by China's three policy banks even though all of their loans are extended at the direction of the state.
- 79.4 percent of current GDP: A report from Bank of China International, Bank of China's investment banking operation, says that the Mainland needs US\$850 billion to fund its pension system. Bei Hu, "Sick System 'Needs US\$850B Lifelin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ebruary 23, 2001, Business Post, p. 6. A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 informally puts deferred pension obligations somewhere between 100–125 percent of GDP.
- issued before the end of that year: See "China's GDP Grows 7.1 Percent This Year," Xinhua News Agency Bulletin, December 29, 1999.
- much more respectful: See Xu Dashan, "Nation's GDP Grew by 8% Last Year," *China Daily*, January 1, 2001, p. 3.
- Outright fabrication remains a serious problem: See Pan Yuan,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Will Use All Means Against False Statistics," *China Youth Daily* (Beijing), February 28, 2000, p. 2. The discrepancy in GDP statistics is larger than the state admits. See, e.g., Mark O'Neill, "Beijing Has \$546B Chasm in Key Data,"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ebruary 29, 2000, Business Post, p. 6.
- may only be a quarter: "Keep Spending," China Online, March 8, 2001 (assessment of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 the unrecoverable loans: Most, but not all, of the unrecoverable loans in the banking system were extended to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other entities controlled by the stat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to stand behind most of the banks and credit cooperatives by assuming the bad loans they hold because it is not prepared to see thes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ollapse. In fact, China's asset management company plan contemplates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ill bear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for loans made by the Big Four banks (or at least the portion of the loans that ultimately are not recovered). As noted in Chapter 6, the asset management company program is failing. Therefore, the state will, in one way or another, "be forced to pay the bill."

- "Despite Asset Management Solution, State Will Foot Debt Bill,"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uary 22, 2001, Business Post, p. 3 (comment of unnamed European banker).
- about US\$490 billion: The assumptions used in deriving this figure are outlined in Chapter 6. By the end of 2000 the Big Four commercial banks had transferred about ¥1.3 trillion (US\$157.0 billion) of loans to the four newly-established asset management companies. For purposes of assessing the state's financial strength, it is irrelevant whether the loans had been transferred because the state owns both the banks and these companies. Accordingly, the US\$490 billion figure includes the loans transferred to the asset management companies. This figure does not include the amount of nonrecoverable loans made by China's policy banks.
- total accumulated debt: This figure is the sum of China's public debt (US\$246.6 billion), the unrecoverable loans in the banking system (US\$490 billion), and the amount of unfunded pension liabilities (US\$850 billion).
- looks precarious: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condition would look much more precarious if all indirect bank lending to the state were included (instead of just nonrecoverable loans). In this case the state's debt would be about 181.4 percent of 2000 GDP.
- China's spending spree must end soon: For an analysis of Beijing's ability to spend, see Bruce Gilley, "Moment of Truth,"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une 15, 2000, p. 58 (comments of Nicholas Lardy).
- something even bureaucrats implicitly acknowledge: Although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publicly dismisses the concerns of Chinese economists about the government's ability to service its debt, the finance minister has announced that the fiscal stimulus program should end in 2002. See Andrew Browne, "Chinese Minister Sees Stimulus Spending Winding Down," Reuters News Service, December 19, 2000.
- "scary": "On a Knife-Edge," *Economist*, May 29, 1999, p. 88. *The Economist's* estimate of government revenue needed to service debt falls on the high side, but the point remains that China must devote an increasing portion of its budget to servicing its obligations.
- zoomed up: China's public debt was US\$168.9 billion in 1998, US\$212.3 billion in 1999, and US\$246.6 billion in 2000. The figure for 2000 is an estimate based upon announced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for that year. The external portion of the debt has increased at a slower pace than the internal portion (due largely to Beijing's fiscal stimulus program). It is estimated that internal debt increased by 19.8 percent in 2000.
- will top 2000's record shortfall: The projected budget deficit in 2001 is ¥259.81 billion (US\$31.4 billion), which is just a shade under the actual deficit for 2000 of ¥259.82. See "This Year's Deficit Is Equal to Last Year's—Minister," Xinhua News Agency Bulletin, March 6, 2001; "NPC Session Hears Plan Implementation, Budget Reports," Xinhua News Agency Bulletin, March 6, 2001. In 2000 the actual deficit was larger than the ¥229.9 billion first projected, so when history repeats itself, 2001's actual deficit will be higher than the projected one. Therefore, 2001's actual deficit, to be announced in March of 2002, will surely set another record.
- "a virtuous cycle": Huo Yongzhe, "Boosting Demand a Key Goal," *China Daily*, March 7, 2001, p. 1.

- and 22.8 percent in 2000: Xu Dashan, "Top Tax Gains Fill Daily," January 5, 2001, p. 1. In 2000 tax revenue hit US\$152.9 billion.
- still behind almost every other nation: Lawrence J. Lau, "The Macroeconomy and Reform of the Banking Sector in China," in BIS Paper No. 7, p. 59. In 1999, revenue was equal to 13.0 percent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up from 12.4 percent the year before). In 2000, tax revenue hit 14.2 percent of GDP, well below the international average of 30-40 percent. In both 1999 and 2000 China's government revenue as a percentage of GDP was low compared to the corresponding percentage for 1978, the beginning of the reform era, when revenue was 28.5 percent of GDP.
- as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ials admit: See, e.g., "Minister Explains Slight Drop in Revenue Growth," Xinhua News Agency Bulletin, March 6, 2001.
- especially its insolvent banks: John D. Langlois, "Taxing China's Banks,"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12, 2000, p. 12. Banks are not the only victims of Beijing's drive for more tax revenue. China's authorities are resorting to unusual taxes that will harm the nation's enterprises. See, e.g., Xin Zhiming, "New Advertising Tax a Dud," *China Daily*, January 4, 2001, p. 4 (tax on advertising expenses).
- 50 percent of the country's fiscal income: Dalian Address.
- SOEs' profits are illusory: See Chapter 3. Foreign analysts say that SOEs could help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ut of its revenue squeeze in another way: Beijing could sell them and use the proceeds to pay its ongoing expenses. There is, however, no consensus in senior Party circles to do this, and even if there were, years would be required to dispose of the thousand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an orderly manner. Moreover, there is another consideration: many SOEs are practically worthless.
- 7.0 percent: Sun Shangwu, "GDP Growth to Be Around 7%," *China Daily*, March 6, 2001, p. 1. The premier is not the only person to lower his estimates of GDP growth for 2001: private analysts are also doing the same thing. See "China Economy May Lose Steam, Needs Stimulus," Reuters News Service, February 12, 2001.
- China needs GDP growth: The decline in GDP growth is especially alarming when viewed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increasing population. Changes in real GDP per capita growth highlight the trend. This figure measures the per person increase in GDP (minus the effect of inflation or deflation). In 1997, real GDP per capita growth in China was 7.7 percent, in 1998 it fell to 6.7 percent, and in 1999 it ended up at 5.5 percent. *Monthly China Review* (Citibank periodic research report), May 2000, p. 11. The figure for real GDP per capita growth in 2000, when released, will be larger than 1999's, but the increase will be the product of the same magic that produced such a large surge in GDP in 2000. As mentioned in the text, the magnitude of the increase in GDP in 2000 is highly suspect.
- "The holiday season boom": Zheng Ying, "Holiday frenzy Shows Up Problems," *China Daily*, May 29, 2000, p. 4 (comments of Huang Guoxiong of Renmin University).
- consumer spending during the next weeklong holiday: "China Oct Consumer Price Index Flat Vs Consensus +0.3%," Dow Jones International News, November 14, 2000; "Leery Travelers Staying Put," China Online, October 6, 2000.
- even the official media suggest: See Xin Zhiming, "Consumption Rise Not to Be Pinned on Holidays," *China Daily*, October 21, 2000, p. 4 (rail and air traffic statistics were significantly down from the previous holiday, despite the government's claim that tourism revenue had spurred by 21.5 percent).
- air level of saving: See, e.g., Bing Lan, "Deposits Up As Income Growth Slows," *China Daily*, February 13, 2001, p. 1.
- "economic sugar-high": "China's Holiday Economics," *Economist*, May 13, 2000, p. 30.
- "The answer is no": Peter Wonacott, "Will Forced Holidays Help China?,"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26, 2001, p. 1 (comments of Song Guoqing of the China Centre for Economic Research). Holiday economics has changed consumer spending habits (but not necessarily the amount of spending).
- depends almost entirely: See Kathy Wilhelm, "Starting to Sizzl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ugust 24, 2000, p. 57 (comments of Andy Xie).
- expensive for the country: See, e.g., "Elusive Inflation," *Business China*, January 1, 2001, p. 6.
- declined in both 1999: Zhang Yan, "Exports, Imports Boomed Last Year," *China Daily*, January 14, 2000, p. 1.
- and 2000: "China Reports Increased Foreign Trade," Xinhua News Agency Bulletin, February 28, 2001; Bill Savadove, "China 2000 Trade Surplus Narrows from 1999," Reuters News Service, January 10, 2001. The surplus fell a little more than 17 percent in 2000 as imports rose almost 36 percent.
-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ials realize: See, e.g., "Chinese Leaders Raise Alarm on Slowing Exports," Reuters News Service, March 6, 2001.
- smuggle money offshore: China took drastic steps to stem capital flight in 1998, but the problem continues to plague the nation's finances. See, e.g., "Leaving Home," *Business China*, July 31, 2000, p. 12.
- "has no parallel in any other country": "Beijing," *Asia Tonight*, narr. Rebecca MacKinnon, CNN International, July 5, 2000.
- diverting even more: Professors Zhu Xiaodong and Loren Brandt of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argue that China's growth is stagnating "because of a sharp reduction of investment growth in the non-state sector." Zhu Xiaodong and Loren Brandt, "China's Last Frontier in Financial Services Reform," China Online, November 29, 2000. This reduction has occurred because, among other reasons, massive government spending has restricted credit to nonstate businesses.
- nine of the world's ten most polluted cities: "Younger Chinese Have Stronger Sense of Environment Protection," Xinhua News Agency Bulletin, April 27, 2000.
- Lanzhou: Mark O'Neill, "Spreading the Word in Gritty Lanzhou,"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pril 27, 2000, p. 20.
- Somewhere between 4 to 8 percent: See "China Stresses Overall Ecological Protection," Xinhua News Agency Bulletin, August 23, 2000.
- About 350 million of China's citizens: Jasper Becker, "Presidential Poser of the Millennium,"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ecember 12, 1999, p. 13.
- The state does not provide education: See, e.g., Jasper Becker, "At the Back of the Clas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uary 1, 2000, Saturday Review, p. 2.
- China is proud that it can send doctors to Guinea: See "Chinese Doctors Save My Son's Life," People's Daily Online, October 5, 2000.
- "worse than in Africa": "China's Rural Health Care Crisis: Forward to the Past," *Business China*, November 22, 1999, p. 5 (comments of Marcel Roux of 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As even the official media admit, "medical treatment is almost impossi-

ble to get" in impoverished areas. Zhang Feng, "Farmers' reform," *China Daily*, February 16, 2001, p. 1. Beijing is planning comprehensive reforms but has yet to figure out how to pay for better health care. Even optimistic views of the crisis mention the possibility of collapse of the medical care system. See Christine Beasley, "Health Care: The Sick Man of China," China Online, February 7, 2001.

- corruption cost China: Peter Wonacott, "China's Corruption Costs Estimated at \$150 Billion,"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8, 2001, p. 4.
- drop in the bucket: Beijing has already constructed a portion of the Olympic facilities and some of the other infrastructure. "Beijing's Olympic Bid Spurs Massive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Xinhua News Agency Bulletin, February 21, 2001. Xinhua calls these facilities and infrastructure "one of the largest construction projects ever in China sinc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eat Wall."
- National Day: "Can China Change?," *Economist*, October 2, 1999, p. 23.
- and the economy will stagger: Even official forecasts are becoming more gloomy. See, e.g., "Slowing China Exports Could Dip Growth to 11-Year Low: Report," Agence France-Presse, January 14, 2001 (projections of Qiu Xiaohua of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 will be ominous: Andy Xie, "China's Debt-Driven Growth Runs Out,"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2, 1999, p. 10.
- Lin Yifu: Lin Yifu, "Six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Resolved," *China Business Times Enterprise Weekly* (Beijing), October 11, 1999, p. 1.
- "will explode within five years": Mark O'Neill, "Maverick Flags Warning of Early Revolt Against Income Gap,"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ebruary 12, 2001, Business Post, p. 4.
- "Until the tide goes out": "Living on Borrowed Time," *Economist*, September 25, 1999, World Economic Survey, p. 23.

第九章 WTO的配島 入世將引發全面崩潰

- "I wouldn't go in there": The events involving Peter Wonacott are derived from telephone interviews by author of February 21, 2000, and November 1, 2000, and e-mails from Wonacott to author of February 22, 2000.
- glasses fall to the ground: Rebecca MacKinnon, telephone interview by author, February 29, 2000.
- "The anger and distress": Christian Murck, "Assessing Financial Risk in China" (panel discussion), CLSA China Forum 1999, Beijing, May 12, 1999, in CLSA Global Emerging Markets, *Assessing Financial Risk in China*, 1999.
- "bears directly on the honour": Bruce Gilley, "Hopping Mad,"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une 15, 2000, p. 32.
- "Worst Victim of Globalization": *Time Asia*, December 31, 1999, p. 151 (Signs and Portents).
- "America will be forever young": William J. Clinton,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Washington, D.C., January 27, 2000.
- "We can advance to the future": Geoff Wade, "Facing History,"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December 24, 1998, p. 29.

- expire, explore or decline": Tim Metcalfe, "Buzz Off into Spac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y 11, 2000, p. 17.
- staggering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China's Forex Reserves Hit 165.6 Bln USD," Xinhua News Agency Bulletin, January 17, 2001.
- China's trade surplu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Mark Egan, "U.S. Trade Deficit Shrinks Again in December," Reuters News Service, February 21, 2001.
- "The point about WTO": Robert Kapp, interview by Farland Chang, *Visions of China, Asia Business Morning*, CNN International, September 29, 1999.
- Those days, however, are over: See, e.g., Long Yongtu, interview by Robert Kestley and Mark O'Neill, "Long March Nears End,"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ebruary 28, 2001, Business Post, p. 16 ("future contracts will be decided by the joint venture partners themselves and not by bureaucrats").
- "about seventy books on WTO": Jasper Becker, "Vested Interests Pit Bureaucrats Against Chang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pril 6, 2000, p. 16.
- "China is fully capable": "Jiang Urges Officials to Fully Understand WTO Entry," Xinhua News Agency Bulletin, January 19, 2000.
- "Solid and down-to-earth preparatory work": Chang Weimin and Xing Zhigang, "Economic Sector Ill-Prepared," *China Daily*, September 18, 2000, p. 1.
- have no WTO plans: Jasper Becker, "Vested Interests Pit Bureaucrats Against Chang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pril 6, 2000, p. 16.
- will survive accession: Suzanne Harrison,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as Firms Face Uncertain Future After WTO Entr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tember 8, 2000, Business Post, p. 2.
- could crumble under the pressure: See, e.g., Matthew Miller, "Lucky Film At Last Concedes Need for Foreign Partne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ch 2, 2001, Business Post, p. 4.
- The process started first in Beijing: Rachel Morarjee, telephone interview by author, April 2, 2001.
- "I doubt the time-frame is long enough": Foo Choy Peng, "Dai Outlines Yuan-Trade Plans Before Influx of Foreign Bank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ebruary 18, 2000, Business Post, p. 4.
- "dropped to zero": Ian Johnson, "China Continues to Hobble Foreign Firms,"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23, 2000, p. 1.
- "what it means for China": "Jiang Urges Officials to Fully Understand WTO Entry," Xinhua News Agency Bulletin, January 19, 2000. The quotation is Xinhua's paraphrase of President Jiang's remarks.
- "More unemployment": Jeremy Page, "China's Labourers Lament Life After WTO," Reuters News Service, January 18, 2000.
- will be taken out of production: Jasper Becker, "WTO Has Mainland Farms in Its Tractor Beam,"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ember 18, 1999, Business Post, p. 12 (prediction of the State Council's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Land under cultivation is already decreasing. See, e.g., "China's Acreage Under Grain Plants Hits Record Low," People's Daily Online, January 27, 2001.
- "irrational": See Zhao Huanxin, "Changes Set to Boost Farming Incomes," *China Daily*, September 4, 2000, p. 6.
- rural incomes have slumped: Jasper Becker, "Reaping a Harvest of Despair," *South China*

- *Morning Post*, September 24, 2000, p. 11. Beijing maintains that growing, though it acknowledges that the rate of growth is declining. See Xu Dashan, "Can Our Farmers Compete?," *China Daily Business Weekly*, December 10, 2000, p. 1.
- unprofitable: For an example of what can go wrong when politics meets crop selection, see Yu Zhenhai and Shuai Zheng, "The Ridiculous 'Scientific Great Leap Forward,'" *Beijing Youth Daily*, February 5, 2001, p. A6.
- 500 million tons of low-grade grain: Zhao Huanxin, "Changes Set to Boost Farming Incomes," *China Daily*, September 4, 2000, p. 6.
- 1.3 billion tons: Jasper Becker, "Reaping a Harvest of Despai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tember 24, 2000, p. 11.
- has made its agriculture uncompetitive: In order to support peasant incomes, Beijing maintains a system of price supports. The price supports, until the end of 1999, applied to all grain without regard to quality. This system therefore encouraged peasants to grow low-quality crops, about a fifth of which were essentially inedible. The result is that farmers got hooked on producing uncompetitive products.
- will not be able to compete: Shai Oster, "Farmers Doomed to Grow Poore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ecember 3, 2000, p. 12.
- 150 to 200 million: For an estimate on the high side of the range, see Wu Yunhe, "Agriculture to Face Challenges," *China Daily*, November 26, 1999, p. 6.
- 9.7 million more farmers: "Estimate of Changes in Employment Structure During the Seven Years After China Accedes to the WTO," *Beijing Youth Daily*, November 16, 1999, p. 3.
- the real number will be four times that: Shai Oster, "Farmers Doomed to Grow Poore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ecember 3, 2000, p. 12.
- Some have even abandoned their lives: Jasper Becker, "Reaping a Harvest of Despai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tember 24, 2000, p. 11.
- "they preferred to die early": Huang Guangming and Li Side, "County Party Secretary's Tearful Petition Moved State Council Leaders to Act," *Nanfang Zhoumo* (Guangzhou), August 24, 2000, p. 1.
- "You cannot just put a farmer in a factory": Paul Eckert, "Experts See China GDP Gains from WTO Entry," Reuters News Service, November 17, 1999.
- they will source from cheaper foreign suppliers: Mark O'Neill, "Textile City Prepares for Big WTO Windfall,"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ember 22, 1999, Business Post, p. 5.
- foreign enterprises may largely own China's economy: Karby Leggett, "China Is Pressured to Bless Private Sector,"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4, 2000, p. 1.
- annual foreign investment more than doubling: "China WTO Entry to Bring FDI Flood—Goldman Sachs," Reuters News Service, April 17, 2000.
- the phenomenon will accelerate: Contracted (promised) foreign investment increased an impressive 50.8 percent in 2000. The jump in contracted investment indicates that actual foreign investment in 2001 will rise by more than the 0.9 percent increase in 2000. Nonetheless, Beijing is cautious about predicting a boom in foreign investment.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plans indicate that foreign investment will remain at 2000's level during the Tenth Five-Year Plan (2001–2005).
- "in order to sell products there": William J. Clinton, letter to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Senate, January 24, 1999.

- General Motors plans to do: Gong Zhengzheng, "GM to Sell More Cars in Western Region," *China Daily*, December 5, 2000, p. 5. General Motors also announced that it would import into China car parts for pickup trucks and Chevrolet sedans from its Brazilian subsidiary. Xiao Chen, "Our Country Will Import Cars from Brazil," *Financial News* (Beijing), December 26, 2000, p. 1.
- Imports surged: "Shanghai Imports Surged Dramatically after Tariffs Lowered," *China Securities News* (Beijing), March 16, 2001, p. 14.
- "Once we get into WTO": Mark O'Neill, "Textile City Prepares for Big WTO Windfall,"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ember 22, 1999, Business Post, p. 5.
- won't be able to match the prices: The leading foreign car manufacturer in China, Volkswagen, anticipates that its Mainland plants will not be able to keep up with imports after accession due to the scheduled reduction in tariffs. "World Summar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uary 27, 2000, Business Post, p. 12.
- just two days away by ship: Mark O'Neill, "Industry Faces Day of Reckoning over Entr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ember 16, 1999, Business Post, p. 4.
- The two German women: *China Daily Business Weekly*, June 11, 2000, p. 2 (photograph).
- "long-term bonanza": Gil Klein, "China Trade Divides South," *Richmond Times-Dispatch*, May 1, 2000, p. A1.
- Officials in the provinces want autonomy: Willy Wo-Lap Lam, "Restive Regions Seek More Autonom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ly 29, 2000, p. 8.
- will boost China's growth: See, e.g., Ni Xiaolin and Lin Jian, "There Will Be Profits, But Costs Too," *Shanghai Securities News*, November 17, 1999, p. 1.
- "a rough period": Jason Booth, "China's WTO Membership Could Hurt Some Firms,"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11, 1999, p. 15.
- They will do as they say: As an indication of the trustworthiness of senior leaders, China reduced its tariffs as of the first day of 2001 as it promised the leaders of APEC (Asian-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1996. Xiao Xu, "Nation Fulfills Commitment to Cut Tariffs," *China Daily*, December 30, 2000, p. 1.
- And a thousand new disputes tomorrow: Many of these disputes will involve subsidies. For a detailed discussion in the Chinese media of postaccession subsidies, see Ji Rufeng and Li Zhenzhong, "How Should China Respond to the WTO Counter-subsidy Agreement?" *China Economic Times* (Beijing), August 3, 2000, p. 4.
- fair trade will eventually come: Vice Trade Minister Long Yongtu, Beijing's chief WTO negotiator, points out that China will comply with its WTO commitments because membership in the global organization is in the country's own interests. Referring to the country's WTO obligations, he recently said, "if these commitments weren't beneficial to us, we would never have made these commitments." Owen Brown, "Chinese Official Says WTO Deal Is Imminent,"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16, 2001, p. 4.
- "China finds its own feet and gains world respect": "Good Deal Opens a Promising Future," *China Daily*, November 16, 1999, p. 4.
- "But if the government betrays us": Sophie Roell, "Who's Afraid of Chinese Nationalism?,"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29, 1999, p. 14.
- "will take the command and control out of communism": Samuel R. Berger, address, East Asian Institute,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May 2, 2000.

- "No communist nation": "China: A Great Leap, and a Big November 29, 1999, p. 100.
- boosting its policing capabilities: See Willy Wo-Lap Lam, "Leaders Prepares [sic] for WTO Winds of Chang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ne 29, 2000, p. 9.
- "We are the electricity": King Lai (chief executive of NetEase.com), CLSA China Forum 2000, Shanghai, May 10, 2000 (panel discussion comments).
- "unprecedented pressures": "Wealth and Power," *Economist*, April 8, 2000, China Survey, p. 19.
- "The reform of the government system": Willy Wo-Lap Lam, "On the Wave of Political Reform,"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ne 21, 2000, p. 18 (comments from the Forum of 50 Chinese Economists held in Xian). For similar comments, see Tang Daiwang, "Building an Administrative System That Dovetails with the World," *Nanfang Daily* (Guangzhou), June 19, 2000, p. B2.
- "How do you make sure?": Klaus Schwab, interview by Pranay Gupte, "Neighbors on the Same Planet," *Newsweek*, January 31, 2000, p. 56.
- "We do not make a liberal by hugging a Nazi": Congressional Record, May 23, 2000, p. H3598.
- "Everyone must be a winner": Klaus Schwab, interview by Pranay Gupte, "Neighbors on the Same Planet," *Newsweek*, January 31, 2000, p. 56.
- "they will seek greater say": William J. Clinton, letter to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Senate, January 24, 1999.
- "Snuff out all challenges": Willy Wo-Lap Lam, "On the Wave of Political Reform,"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ne 21, 2000, p. 18.

第十章 黨政史板 意識形態與政治困難處步

- "is marching unstopably":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Peru, "Long Live Maoism," August 1993 (available at www.maoism.org).
- "various forms of democracy": Shao Zongwei, "Nation Values Human Rights," *China Daily*, November 17, 1999, p. 1.
- "Chinese-style democracy": Dian Tai, "Complaint? Send Letter or Visit Here," *China Daily*, February 15, 2000, p. 1.
- missed few opportunities: Perhaps the most flagrant interference up to now has been Vice Premier Qian Qichen's open support of Tung Chee-hwa for a second term as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Beijing voiced its backing more than a year ahead of the sele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by a select committee. See No Kwai-yan and Kong Lai-fan, "Qian Backs Tung for Second Term in Offic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ch 8, 2001, p. 4.
- "History alone will make a judgment": Mark O'Neill, "A Maverick's Dreams for the Mainland,"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ebruary 25, 2000, p. 15.
- "Look, Tiananmen is behind us": "Ten Years On," *Economist*, June 5, 1999, p. 29.
- "I don't know anyone": Karby Leggett, interview by author, Shanghai, February 21, 2000. Leggett is a reporter for *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 hounded by security forces: See Chapter 2.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may be more alive than it appears, as it has apparently been operating from jail. See Willy

- Lam, "Universities Warned over Anniversar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y 27, 2000, p. 7.
- "fifteen different political parties": *World News*, narr. Rebecca MacKinnon, CNN International, June 4, 2000.
- "The Internet tolls": Scott Savitt, "China's Internet Revolution,"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21, 1999, p. 10.
- village elections: See, e.g., "China Says Still Has a Way to Go with Direct Grassroots Elections," *Agence France-Presse*, February 21, 2001; Tom Mitchell, "The Red Star Stand-off,"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tember 11, 2000, p. 15.
- "They said they are only here to talk": "Police Enter House of Chinese Dissident's Mother," *Agence France-Presse*, October 15, 1999.
- the bureaucracy of repression: Jasper Becker, "Jiang's Secret Police March O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ebruary 20, 2000, p. 9.
- it has stiffened its position: See Willy Wo-Lap Lam, "Beijing to Avoid 'Errors' of KM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pril 22, 2000, p. 5.
- levying their own taxes: See, e.g., Jasper Becker, "The Party and the Peasant Uprisi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pril 5, 2000, p. 17.
- dispensing justice: See, e.g., Huang Yong, "Village Cadres Set Up Jails, Imprisoning Two Hundred People," *China Youth Daily* (Beijing), November 24, 2000, p. 7.
- issuing their own currency: Jasper Becker, "Cadres Caught in Rural Currency Racke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uary 15, 2000, p. 8.
- "I do not see a clear linkage": Susan V. Lawrence, "Fuelling Fires of a Different Kind,"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March 30, 2000, p. 20.
- "The higher officials are": Mark O'Neill, "Criminal and Mistress Easy Prey for Press Speculatio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ust 2, 2000, p. 18.
- "Not fighting corruption": Minxin Pei, "The Corruption Conundrum,"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tember 28, 1999, p. 21.
- will soon lose its power: Vivien Pik-Kwan Chan, "Graft-busters Preach the Faith,"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y 24, 2000, p. 9.
- "China's biggest corruption scandal": Thom Beal and Peter Wonacott, "Smuggling Case Crosses Border to Hong Kong,"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28, 2000, p. 1.
- "it is equally important": Willy Wo-Lap Lam, "Free-Thinkers Find Little Room to Mov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pril 19, 2000, p. 23.
- the rule of law was already enshrined: Gordon G. Chang, "What Does the Rule of Law Mean in China?," *China Law & Practice*, August 1999, p. 33.
- Li Peng: "Li Peng on Party's Leadership over NPC's Work," *People's Daily Online*, March 14, 2000.
- "the rule of virtue": See, e.g., "Scholars Hail Jiang Zemin's Thinking on Morality," *Xinhua News Agency Bulletin*, February 21, 2001. Jiang says that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rule of virtue are of equal importance, but in reality he is using virtue to undermine the notion that the Party is subject to law.
- collectivism over individualism: See Clara Li, "Culture as Vital as Law, Says Jiang Aid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ebruary 13, 2001, p. 8. For additional views on collectivism, see "Xinhua Stresses Rule of Law, Rule of Virtue," *Xinhua News Agency Bulletin*, February 13, 2001.

- In this climate: In view of the trends discussed in the text, it is surprising that there has been little recent progress toward legal reform. See Clara Li, "Legal Reform Too Slow, Says Exper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ch 3, 2001, p. 7 (comments of Jerome Cohen).
- "suicidal": Su Guiyou, "Focu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Seeks Breakthrough but Will Never Engage in Privatization," *Zhongguo Xinwen She News Agency*, September 22, 1999.
- "in the hands of Marxists and Leninists": "Hardliner Slams China's Sell-Off of State Firms," *Reuters News Service*, December 30, 1998. Another official opposed to privatization is Li Peng. See Charles Hutzler, "China Digs In," *Associated Press Newswires*, May 23, 2000.
- "never engage in privatization": Dalian Address.
-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Dalian Address. Jiang Zemin extensively discussed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in Part IV of his work report to the Fifteenth Party Congress, which was held in September 1997.
- "In China the state took control of too much": Jasper Becker, "How Karl Marx Survived It All,"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ctober 1, 1999, p. 16.
- "by and large bring about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hina Marks 50th Founding Anniversary," *Xinhua News Agency Bulletin*, October 1, 1999.
- "tens of generations": Steven Mufson, "The Real Deal,"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1, 1999, p. B1.
- "the state's control of the economy": Jasper Becker, "How Karl Marx Survived It All,"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ctober 1, 1999, p. 16.
- "why we still claim to be a socialist country": *Ibid*.
- "If you are going to have socialism": Chua Lee Hoong, "Rule of Law Above Democracy, Says SM,"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October 29, 1999, p. 3.
- more people studying Marxism: Jasper Becker, "How Karl Marx Survived It All,"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ctober 1, 1999, p. 16.
- being sold to corporations and not individuals: Josephine Ma, "Shenyang Woos Foreigners to Manage Firm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tember 27, 1999, p. 10.
- "socialized public ownership": Jasper Becker, "How Karl Marx Survived It All,"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ctober 1, 1999, p. 16.
- approximately 55 million: Li Bin, "Zhou Xiaochuan Discuss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Securities Markets and Their Future," *Shanghai Securities News*, December 4, 2000, p. 1. Since Zhao's estimate there has been a flood of new stock trading accounts. There are now about 61 million such accounts in China today. "New Accounts," *China Daily*, March 23, 2001, p. 7. The percentage in the text is derived from the results of the 2000 census. See "China Issues Communiqué on Major Figures of Population," *People's Daily Online*, March 28, 2001.
- "only socialism can save China": This phrase was one of Jiang Zemin's favorite lines during late 1999. See, e.g., "Jiang Stresses Policy on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Xinhua News Agency Bulletin*, October 25, 1999.
- "Between you and me": Chua Lee Hoong, "Rule of Law Above Democracy, Says SM,"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October 29, 1999, p. 3. Lee was referring to Jiang's National Day speech in 1999.

- investor filed: See Yan Ming, "A Stockholder Sues Hongguang," *Shanghai Securities News*, December 15, 1998, p. 1.
- "Or fix it slowly?": Susan V. Lawrence, "Mr. Privatizatio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March 2, 2000, p. 44.
- "protected by the national constitution": "CPC Meeting to Design Future of State-Owned Sector," *Xinhua News Agency Bulletin*, September 16, 1999.
- closer to the mark: Toda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ismisses talk of large-scale disposals of shares. See, e.g., Li Bin, "Zhou Xiaochuan Discuss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Securities Markets and Their Future," *Shanghai Securities News*, December 4, 2000, p. 1.
- "money for nothing": Duncan Clarke, interview by author, Shanghai, October 14, 2000.
- "The first job is political organization": Susan V. Lawrence, "The Road to Power,"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October 7, 1999, p. 46.
- "Talk politics": *Jiang Zemin: Discussing 'Talk Study, Talk Politics, and Talk Righteousness': Excerpts*, ed. Jian Bian (Beijing: Party Construction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9). The phrase "talk politics" has its roots in Jiang's "talk more about politics" campaign. For a discussion of Jiang's concept of talking politics, see Willy Wo-Lap Lam, *The Era of Jiang Zemin* (Singapore: Prentice Hall, 1999), pp. 46-49, 159-60.
- participating in 118 meetings: Wang Mingquan, "Efforts for Democratic Living Meeting in 'Three Stresses' Education," *Qiushi*, Issue 15 (1999), p. 35.
- "rehearsing for the National Day parade": Susan V. Lawrence, "Stressful Summer,"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ugust 19, 1999, p. 16.
- "top priority": "Party Building Given Top Priority," *China Daily*, February 26, 2000, p. 1.
- "The more complicated": Dalian Address.
- currently spreading its cells: See, e.g., "New Party Units to Be Established," *Shanghai Daily*, December 7, 1999, p. 2 (Party branches to be established in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Shanghai with more than three Party members).
- "Who do these guys think they are?": John Pomfret, "In 2 Chinese Cities, Celebration and Contradiction,"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9, 1999, p. 1.
- "We swallow our consciences": *Visions of China*, *World News*, narr. Mike Chinoy, CNN International, September 22, 1999.
- "this great disaster for our country": *Visions of China*, *Asian Edition*, narr. Stacey Wilkins, CNN International, September 29, 1999.
- And why today?: Song Yongyi's imprisonment is discussed in Chapter 11.
- disavow its ideas: The Party's next test of flexibility involves opening its membership to private businessmen. So far, it has resisted doing so. See Daniel Kwan, "Businessmen Still Barred from Part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ch 7, 2001, p. 9.
- "must not be achieved at the expense of ideology": Willy Wo-Lap Lam, "Beijing to Avoid 'Errors' of KM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pril 22, 2000, p. 5.

"this is a better China": Lee Kuan Yew, interview by Riz Khan, *Visions of China*, Q&A in Shanghai, CNN International, September 29, 1999.

- "mesmerized": Robert Kapp, interview by Mike Chinoy, *Visual Edition*, CNN International, September 30, 1999.
- "so that they don't float away": Nicholas D. Kristof and Sheryl WuDunn, *China Wakes: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a Rising Powe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5), p. 444.
- "The most likely scenario": *Ibid.*, p. 463.
- "powerful, democratic and civilized": "Unity, Stability, and Build the Chinese Nation Stronger," *People's Daily*, May 8, 2000, p. 1.
- "we want to say to the world 'Why not!'" : Hu Qihua, "Exploring into a New Space," *China Daily*, June 5, 2000, p. 10.
- "has not been realized to the maximum": Lee Kuan Yew, interview by Riz Khan, *Visions of China, Q&A in Shanghai*, CNN International, September 29, 1999.
- "great, glorious, and correct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Zhu Reviews P.R.C.'s Achievements in Past 50 Years," Xinhua News Agency Bulletin, September 30, 1999.
- the one thing they cannot do: It seems China's leaders are meddling more these days rather than less. Municipal planners in Beijing, proving that restraint is in short supply, now insist that all buildings in the Chinese capital come in gray or shades of that color. See "Beijing Sets Color Style for Buildings," Xinhua News Agency Bulletin, November 4, 2000. A survey showed that most Beijing residents oppose the mandated color scheme, but the bureaucrats are persisting in their efforts to ban offending shades. Jin Baicheng, "Grey Days Coming to Capital," *China Daily*, November 13, 2000, p. 3.
- biggest birthday bash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Visions of China, Asia Tonight*, narr. Michelle Han, CNN International, September 29, 1999.
- "In China it is the leaders who are the centre of everything": Jasper Becker, "China Says Services Beat Bu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uary 2, 2000, p. 3.
- not to commemorate dead leaders: "China Prohibits Building Memorials for Late Leaders," Xinhua News Agency Bulletin, February 21, 2000.
- Only in the later days: Peter Wonacott, telephone interview by author, February 21, 2000.
- "It could have gone either way": Caroline Cooper, interview by author, Shanghai, February 26, 2001. Cooper was an instructor in the Princeton in Asia program at nearby Qinghua University at the time of the demonstrations.
- you could hear recordings: Xiao Yu, "Anniversary Passes Quietly at Universit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ne 5, 2000, p. 8.
- a tense moment for Narrod: Sharon Narrod, interview by author, Shanghai, March 29, 2000. The incident in Tiananmen Square took place on March 27, 2000.
- can build the world's largest radio telescope: "China Builds World's Largest Radio Telescope," *People's Daily Online*, July 10, 2000.
- like Poland's Solidarity: Willy Wo-Lap Lam, "Jiang Compares Sect's Threat to Solidarit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ebruary 12, 2000, p. 7.
- I WILL SEE MY MOTHER! *China Daily*, February 15, 2000, p. 1.
- "severe drought and famine": *Ibid.*
- returned orphans to be an illegal organization: Jasper Becker, "Nobody's Childre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y 10, 2000, p. 13; Jasper Becker, "Ban on Orphans Hunting Pas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y 10, 2000, p. 1.

- arty made mistakes": Jasper Becker, "Top Secret Live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y 25, 2000, p. 15.
- "a parade of rubbish bins": Dai Qing, interview by Mark O'Neill, "Banned Voice Will Not Be Silenced,"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ne 4, 2000, p. 11.
- "Chinese citizens will tell you": Robert Kapp, interview by Mike Chinoy, *Visions of China, Insight Special Edition*, CNN International, September 30, 1999.
- "But of course that is not the truth": Chen Jinzhi, interview by author, Stone Forest (Shilin), September 29, 2000.
- "Our brains were flooded red": *Born Under the Red Flag*.
- "The Chinese people are convinced": "Communism Remains Supreme Goal: Jia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ctober 26, 1999, p. 9 (comments during his state visit to France).
- "the superior socialist system": "Zhu Reviews PRC's Achievements in Past 50 Years," Xinhua News Agency Bulletin, September 30, 1999.
- "yet we must take a firm grip on truth": Huang Huamin, "Xu Chigong Working Report Conference Organized by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Liberation Army Daily* (Beijing), April 26, 2000, p. 1.
- "are full of vigor and dynamism": Zhu Rongji, address, Asia Society 11th Annual Corporate Conference in Asia and CLSA China Forum 2000, Shanghai, May 10, 2000.
- "The message delivered by the music": "Nation Builders," *Asiaweek*, September 24, 1999, p. 74.
- About 44 percent of the world's suicides: Sing Lee and Arthur Kleinman, "Suicide as Resistance in Chinese Society,"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eds.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London: Routledge, 2000), p. 221.
- "I cannot believe in another god": Xu Chang, interview by author, Beijing, January 12, 2001.
- "You foreigners have no idea": Jakobson, *Million Truths*, p. 144.
- "Our society is thoroughly rotten": *Ibid.*, p. 146.
- "Taiwan can elect its own leaders—pretty cool": Matt Forney, "China Worries About Taiwan's Exampl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22, 2000, p. 5.
- "We want democracy": Jasper Becker, "The Party and the Peasant Uprisi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pril 5, 2000, p. 17.
- "The Chinese people love democracy and freedom": Greg Torode, "President Makes an Impressio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tember 10, 2000, p. 6.
- or even to have elections at all: John Pomfret, "China Searches for New Beliefs as Communist Ideology Wane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September 27, 1999, p. 1.
- "The revolution just benefits corrupt leaders": Jasper Becker, "The Party and the Peasant Uprisi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pril 5, 2000, p. 17.
- The number of rural cadres is increasing: See, e.g., Willy Wo-Lap Lam, "A Matter of Window Dressi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tember 6, 2000, p. 18.
- "Cadres dare not take action": Liu Chang, "Have Farmers Been Spoiled These Two Years?," *China Youth Daily* (Beijing), July 5, 2000, p. 8.
- armed with only farm tools: Unarmed Chinese are increasingly willing to fight armed security forces. See, e.g., Zhang Jie, Jing Wei, and Zhou Wu, "Argument Precipitates Problems," *Hefei Evening News*, December 27, 2000, p. 2.

- “‘Jiang Zemin is corrupt too’”: Jasper Becker, “The Party is getting poorer and poorer”: Josephine Ma, “Rural Democracy Struggles to Surviv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pril 5, 2000, p. 17.
- “‘a chance to start some things over again’”: Billy Graham, interview by Larry King, *CNN 2000, Larry King Live Millennium*, CNN International, January 1, 2000.
- “Our opinions mean nothing”: “Impact of China WTO,” *BizAsia*, narr. Rebecca MacKinnon, CNN International, September 19, 2000.
- “cosmetically improved”: *Visions of China, Insight Special Edition*, narr. Jonathan Mann, CNN International, September 30, 1999.
- “There’s a billion people”: Christopher S. Shapland Tibbs, interview by author, Shanghai, June 2, 2000.
- “This is the reaction”: Susan V. Lawrence, “Stressful Summer,”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ugust 19, 1999, p. 16.
- “Society moved on”: *Cold War: Conclusions 1989–1991*, narr. Kenneth Branagh, CNN, July 2, 2000.
- “It broke the dam”: Ibid.
- different route to rejuvenation: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under Gorbachev sought to liberalize politics while tightly controlling the economy whil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under Deng and Jiang is trying the reverse. The important point is that China is not going far enough to restructure itself, just as the Soviet Union under Gorbachev failed to understand all that had to be done. Incomplete reform did not work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it will fail in China too. That’s why the essentials of the reform proces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are the same.
- “What legacy do you want to leave”: Daniel Kwan, “Look to Legacy, Urges Jia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ebruary 21, 2000, p. 7.
- “leading us into the future”: Erik Eckholm, “Becoming a Young Pioneer Is the Rite of Every Chines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September 28, 1999, p. 6.
- “Where is the goal?": *Born Under the Red Flag*.
- “but sooner or later it will collapse”: *Cold War: Conclusions 1989–1991*, narr. Kenneth Branagh, CNN, July 2, 2000.
- “They are eating our flesh, drinking our blood”: Jasper Becker, “Reaping a Harvest of Despai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tember 24, 2000, p. 11.
- “The countryside is pretty unstable nowadays”: Josephine Ma, “Rural Democracy Struggles to Surviv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pril 11, 2000, p. 8.
-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says: “Workers Hold Protests over Unpaid Wages,” *Hong Kong Standard*, January 1, 2000, p. 3.
- “the sign of the end of a dynasty”: Calum MacLeod and Lijia MacLeod, “On Grievance Stree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tember 25, 2000, p. 17.
- “Historical experience”: Premier Zhu Rongji, National Day Speech,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September 30, 1999.
- “They want people to see their power”: John Pomfret, “In 2 Chinese Cities, Celebration and Contradiction,”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9, 1999, p. 1.

is my turn?”: Lee Kuan Yew, interview by Riz Khan, *Visions of China, Q&A in Shanghai*, CNN International, September 29, 1999.

- CHINA IS AN UNSTOPPABLE FORCE: Farzam Kamalabadi, “China Is an Unstoppable Force,” *China Daily*, March 20, 2000, p. 4.
- “a chance to start some things over again”: Billy Graham, interview by Larry King, *CNN 2000, Larry King Live Millennium*, CNN International, January 1, 2000.
- “Our opinions mean nothing”: “Impact of China WTO,” *BizAsia*, narr. Rebecca MacKinnon, CNN International, September 19, 2000.
- “cosmetically improved”: *Visions of China, Insight Special Edition*, narr. Jonathan Mann, CNN International, September 30, 1999.
- “There’s a billion people”: Christopher S. Shapland Tibbs, interview by author, Shanghai, June 2, 2000.
- “This is the reaction”: Susan V. Lawrence, “Stressful Summer,”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ugust 19, 1999, p. 16.
- “Society moved on”: *Cold War: Conclusions 1989–1991*, narr. Kenneth Branagh, CNN, July 2, 2000.
- “It broke the dam”: Ibid.
- different route to rejuvenation: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under Gorbachev sought to liberalize politics while tightly controlling the economy whil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under Deng and Jiang is trying the reverse. The important point is that China is not going far enough to restructure itself, just as the Soviet Union under Gorbachev failed to understand all that had to be done. Incomplete reform did not work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it will fail in China too. That’s why the essentials of the reform proces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 are the same.
- “What legacy do you want to leave”: Daniel Kwan, “Look to Legacy, Urges Jia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February 21, 2000, p. 7.
- “leading us into the future”: Erik Eckholm, “Becoming a Young Pioneer Is the Rite of Every Chines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September 28, 1999, p. 6.
- “Where is the goal?": *Born Under the Red Flag*.
- “but sooner or later it will collapse”: *Cold War: Conclusions 1989–1991*, narr. Kenneth Branagh, CNN, July 2, 2000.

第十二章 毀滅之路 中國如何滅亡

- a “million truths”: This phrase comes from the title of Linda Jakobson’s book, *A Million Truths*.
- Jason doesn’t want to learn more Chinese: Yang Yuping, telephone interview by Lydia Chang, November 8, 2000.
- “the fall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eface to Zhang Liang comp., *The Tiananmen Papers*, ed. Andrew J. Nathan and Perry Link (New York: PublicAffairs, 2001), p. xii. Zhang is correct but only in a literal sense. Of course, a united Party can defeat all challengers. Yet the existence of challengers—or even challenges—may split the Party when senior leaders cannot agree, for whatever reason, on what to do.
-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says: See “US Using Papers to Foment Chaos,” *China Daily*,

January 10, 2001, p. 1. Althoug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nouncements are not genuine, just a few days after the announcements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issued an explanation of penalties for, among other things, leaking documents containing state secrets. See "Supreme People's Court Notice," *Legal Daily* (Beijing), January 22, 2001, p. 2.

- "his biggest concern": John B. Stuttard, *The New Silk Road: Secrets of Business Success in China Today*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2000), p. 75. China's fifth census, conducted at the end of 2000, claims that China has a population of 1.29 billion people. See "China Issues Communique on Major Figures of Population," People's Daily Online, March 28, 2001.
- China needs years: See, e.g., Greg Torode, "Invasion Would Fail, Says Admiral,"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ch 9, 2000, p. 6.
- loyalty to the Communist Party: These days the PLA devotes much of its energies to studying politics. See, e.g., Shi Yongcai, "Seriously Implement the Important 'Three Representatives' Thought, Further Strengthen Party Construction in the Army," *Liberation Army Daily* (Beijing), May 19, 2000, p. 1.
- "Gentleness beats fortitude": Jason Blatt, "Chen Quotes Tao Sage to Justify Softer Lin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pril 17, 2000, p. 7.
- "with their own blood and lives": Premier Zhu Rongji's annual press conference,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March 15, 2000.
- "Taiwan Leader Should Face Reality": "Taiwan Leader Should Face Reality," People's Daily Online, May 31, 2000.
- "This is a reality": Chen Shui-bian, interview by Allen T. Cheng, " 'We Don't Want War,' *Asiaweek*, March 17, 2000, p. 22.
- "war is certain to break out": "Zhang Wannian: War Over Taiwan Strait Certain Within Next Five Years," *Oriental Daily* (Hong Kong), November 19, 2000, p. A7.
- "Like a wolf": Alice Hung, "Chinese Dissidents Say Inspired by Taiwan Democracy," *Reuters News Service*, May 20, 2000.
- can take the main island: "Jiang Warns Brash General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y 13, 2000, p. 1.
- Jiang Zemin commissioned briefings: "Jiang Asks What Brings Collaps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une 8, 2000, p. 12.
- the demise of the Soviet Union: See "The Strange Case of Karl and Adolf," *Economist*, September 11, 1999, 20th Century Survey, p. 8.
- the time for an invasion is now: Willy Wo-Lap Lam, "PLA Main Beneficiary of Taiwan Deadlock,"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y 16, 2000, p. 8.
- leaders think that war will be popular: See, e.g., Jiang Chen, "Poll Backs Stern Stance on Taiwan," *China Daily*, March 17, 2000, p. 2.
- "We need a war, which we will lose": Christopher Coker, interview by author, Shanghai, May 15, 2000 (the comment in the text was made to Coker in Shanghai in May 2000).
- "They consider the life of a Chinese worthless": Mark O'Neill, "Ignorance Feeds on Ignorance to Fuel Concern over Military Threa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ch 27, 2000, *Business Post*, p. 4.
- "We joined hands and waited for the tanks in dead silence": *Cold War: Conclusions 1989-1991*, narr. Kenneth Branagh, CNN, July 2, 2000.

- "the most sophisticated crowd-control system": Simon Pritchard, "Uncertain Year Ahead for Most of Working Clas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ember 17, 1999, *Business Post*, p. 14.
- "Still less should we use dictatorial means": Vivien Pik-Kwan Chan, "Zhu Warns of Difficult Year Ahead,"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ch 6, 1999, p. 1.
- "I stood there and cried silently": *Born Under the Red Flag*.
- "Corruption angers the Chinese people": "China's Long March," *Visions of China, CNN Perspectives*, narr. Rebecca MacKinnon, CNN International, October 1, 1999.
- "I hate to the marrow crooked officials": "Chinese Veteran Takes Protest to Beijing Rooftop," *Reuters News Service*, January 17, 2000.
- protected by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See Li Yuxiao, "Questioning the Big Luoyang Fire," *Nanfang Zhoumo* (Guangzhou), January 4, 2001, p. 1.
- Du died at his favorite nightclub: Chen Hui, "Bureau Chief Drunk Dead in Nightclub, Relatives' Farce Leads to Death," *Beijing Youth Daily*, November 19, 2000, p. 6.
- HARSH SENTENCE SHOWS STATE'S RESOLUTION: "Death Penalty for Cheng," *China Daily*, August 1, 2000, p. 1.
- "He should have involved Beijing leaders": Mark O'Neill, "Criminal and Mistress Easy Prey for Press Speculatio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ust 2, 2000, p. 18.
- "can help avoid the appearance": "Cheng Kejie Unlikely to Rid of Death Penalty: Law Expert," People's Daily Online, August 2, 2000.
- The state will be armed and the peasants will not: With or without arms, peasants fight. In the Jiangxi Province riots of August 2000, peasants fought heavily armed policemen with nothing more than farm tools. See Calum MacLeod and Lijia MacLeod, "On Grievance Stree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tember 25, 2000, p. 17. In the future, protesters need not want for arms because China is becoming flooded with them. See Jin Yan, "Guns, Where Are They From?," *Santian Weekly* (Shanghai), Issues 3 and 4, January 15, 2001, p. 42.
- "All Chinese people have patience": Chen Shui-bian, interview by Karen Elliot House, Hugo Restall, and Russell Flannery,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11, 2000, p. 12.
- "This time the wolves really are coming": James Kynge, "Warning on WTO 'Shock' for China," *Financial Times* (London), November 20, 2000, p. 5.
- "Even casinos have rules": Tiffany Wu, "Foreigners Welcome China Crackdown as Market Frets," *Reuters News Service*, February 11, 2001.
- steam rooms of Shanghai: Li Jing, "Dark Side of Funds," *Caijing* (*Business & Finance Review*), October 2000, p. 20.
- about 30 percent of the stocks: "Stocks, Lies and Manipulation," *Business China*, September 11, 2000, p. 4. "Almost every stock in China is manipulated," says Li Yue, a finance professor at People's University in Beijing. Karby Leggett, "Drive Against Manipulation Clouds China's Market Reforms,"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February 2, 2001, *Money & Investing*, p. M1.
- the largest yearly loss: Karby Leggett, "Beijing to Save State Retailer with Debt Plan,"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4, 2000, p. 1.
- The stock shot up about 31 percent: Karby Leggett, "Blind Rally: China Pumps Up a Stock Bubbl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1, 2000, p. 1. Zhengzhou Baiwen is

- not the only sick company to benefit from stock market boomlets
- "Bankruptcy vs Bail Out," *China Daily Business Weekly*, November 17, 2000, p. 10.
- "We are resigned to the will of heaven": Mark O'Neill, "ZDS Staff Must Wait to See if Heaven Will Fall,"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ember 20, 2000, Business Post, p. 5.
 - more than US\$180 million: Karby Leggett, "Beijing to Save State Retailer with Debt Plan,"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4, 2000, p. 1.
 - bad companies must be chased out: On February 22, 2001, the CSRC issued rules for the delisting of loss-making companies. In general, a company posting losses for three straight years is subject to delisting under the new rules (as they were under existing law).
 - "the old style of doing things": William Kazer, "White Knight Saves Baiwen from Threat of Delisti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ecember 2, 2000, Business Post, p. 4 (comment of Chen Tiwei, a consultant specializing in corporate reorganizations).
 - "immense risk": Ba Wei, "Financial Risk: Out of the Safety Zone," *China Information News* (Beijing), November 8, 2000, p. 1.
 - "investors will take to the streets": Karby Leggett, "Blind Rally: China Pumps Up a Stock Bubbl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1, 2000, p. 1.
 - they've grown: See, e.g., "China's Stock Market Ranks Sixth in the World in Market Value," People's Daily Online, February 22, 2001.
 - at least that many listed companies that are failing: Liu Shinan, "Bankruptcy vs Bail Out," *China Daily Business Weekly*, November 17, 2000, p. 10.
 -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Suzanne Harrison,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as Firms Face Uncertain Future After WTO Entr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tember 8, 2000, Business Post, p. 2.
 - "irregular": Chen Rong, interview by Lydia Chang, Shanghai, May 25, 2000. Chen said that the markets had been "irregular" when they were established and they are "irregular" today. His conclusion is that China itself is "irregular."
 - especially acute: China's markets will fall in a 1929-style crash, according to three prominent economists, because of the lack of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 See Mark O'Neill, "Economists Fear Regulation Void Will Lead to Crash,"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March 9, 2001, Business Post, p. 5.
 - "We were not ready": *Cold War: Conclusions 1989-1991*, narr. Kenneth Branagh, CNN, July 2, 2000.
 - "but there is nothing which may not happen": Diana Preston, "A Conspiracy of Triads," review of *The Dragon Syndicates* by Martin Booth,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8, 2000, p. 6.
 - "In this sort of situation": *Cold War: Conclusions 1989-1991*, narr. Kenneth Branagh, CNN, July 2, 2000.
 - "A political party, no matter how hard it tries": Chen Shui-bian, interview by Mark L. Clifford, "China 'Must Learn from [My] Election,'" *Business Week*, August 14, 2000, p. 50.
 - "The trouble is the trouble we make ourselves": Wang Chuanning, interview by author, New York, June 21, 2000.

節自本書第五章 ——

今天你在中關村還是買得到盗版軟體，而中國本土的軟體商無一不與盜版軟體，而中國本土的軟體商無一不與盜版軟體無角。中關村裡仍然找到破舊的街巷，在許多方面都像是個貧民窟。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中關村已成了不肖企業的避風港，以其優惠稅制招徠根本沒有在園區設廠的公司。

中國政府企業政策從過去到現在所犯的的錯誤越來越明顯，許多方面的實質進展都少得可憐。當然，事情在2010年之前還是有可能發生變化，中國政府訂出雄心萬丈的計畫，要讓中關村在2010年稱霸全球。然而，如果參照過往的紀錄，中國政府屆時恐怕要開始設法挽救中國的高科技業與科技園區。因為政府的強力介入，中國今日創建的高科技公司，將會淪為明日的錯誤。北京當局抱持著史達林年代的老舊觀念，它發展高科技業的方法仍然是五十年前建立重工業時用的那一套。

因為中國不能，所以政府的高科技產業計畫將難逃失敗的命運。中央經濟計畫官員面對經濟發展的觀念理論時，已經江郎才盡。高科技園區很類似毛澤東的人民公社與國有企業；它們與社會其他領域隔絕，需要國家的強力支援才能夠發展。我們不難了解，為什麼每當技術官僚想要有所成就時，他們就會把一塊土地圍起來畫定為發展特區。中國的經濟體系充滿了禁令與限制，非常不利於成長與發展。對一個有限的地區授予特權，遠比改變整體經濟的基本架構來得容易，儘管後者才是當務之急。特區讓計畫官員可以進行小規模實驗，而且這種作法比較符合一個謹慎體系的本能反應。不過計畫官員會以授予特權來促進經濟發展，還有一個原因：藉由決定誰能夠受益，他們可以繼續掌握大權。

因此中關村雖然號稱代表中國的未來，實際上卻只是過去的避光避照。